

穿棒子靴的故事

——梅北湖化植明公化記事



穷棒子社的故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1809 字数26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5 插页1

1966年2月北京第1版 1966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60001—155000册

定价(2)0.96元

序 言

《建明公社記事》編写小組

一

“穷棒子”的故事，是改天換地的故事。
“穷棒子”的历史，是改天換地的历史。

二

从三条驴腿办社起，到有水庫有汽車的人民公社，这是党和群众的伟大創造。这一創造过程，也是一个艰巨的斗争过程，主要是阶级斗争的过程。我們以此为一条紅綫，編写了这本书。

参加編写的同志，有的和西鋪大队貧下中农在一起住过很長時間，交过知心朋友，参加过这里的工作。有的是县委干部。多数同志和群众一同劳动过。注意“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我們这样作，因为最好的調查

研究，是参加工作参加斗争。不过时间短一些，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三

编写公社史和真人真事的故事，必须注意我们时代的历史真实。这种真实性，它要求对革命事业有利，并不是要求有闻必录。编写者了解情况愈多愈好，愈细愈好，以便于分析和抓住主要的环节来写。不应当简单化，不应当草率从事，不应当捕风捉影和只听少数人的反映。

一部公社史，(这里以西铺大队为重点)，它包括一个地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重大内容，它包括对历史和人物的评价，有时还包括对当地风俗、山水、乡土的记载，所以不能任意虚构，弄得张冠李戴，事件混淆不清。

这本书的详细提纲，曾在西铺大队党支部和“二十三户”的会议上宣读过，会后听到一些很好的意见。省、地、县和公社的某些党委同志，对这本书的编写工作也很关心，研究过书的内容。提纲作过几次修改。某些文章写成以后，在一部分群众当中，念过一次。这些方面，都加强了文章的真实性。我们感到，编写这样的书，没有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关心是编不好的。

四

西鋪大队社員王生的儿子，他編过好几首贊美人民公社的新民歌，其中有这么两句：

建明公社是枝花，
党来亲自来栽培。

我們应当滿腔热情地歌頌劳动模范的故事。我們更应当歌頌党的領導，群众的智慧。劳动模范的成长，本来就是和党的領導、群众的智慧分不开的。人民公社是中国广大群众必走之路，也是我們党领导的成果。由于編写者，只有少数同志亲身参加过这个地区的工作，如何具体地生动地表现这个地区的历史，我們所做到的，恐怕只是第一步。

五

公社史的写作体裁，有故事体，有列传体，等。这本书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当然是一种尝试。这本书是按公社史的要求来編写的，目前它并不叫作公社史，叫做記事，打算等书出版了之后，經過一段时间的考驗，再征求一些意見，再修訂，再改正，使之逐步完善。重点的公社史，更应当这样来作。

中国作家协会今年很提倡报告文学的写作。在报告文学创作活动中，编写“五史”，是实践党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战斗任务之一，又是一个新的创作历程，这不只是几年时间以内的事，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内的事。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我们热诚地希望，在这个伟大时代中写的公社史，能留作革命长征路上的几棵树木，历史长河里的几朵浪花。

1963年11月末

目 次

序言《建明公社記事》編写小組 (1)

第一部分 新打柴記

| | |
|-------------|-------------|
| 两个战友..... | 丁 羽 (3) |
| 长城烽火..... | 丁 羽 (17) |
| 枪和土地..... | 丁 羽 (35) |
| 三条驴腿..... | 陈青山 (54) |
| 打柴創業..... | 陈青山 (73) |
| 較量較量..... | 李滿天 (89) |
| 区委書記..... | 古 章 (112) |
| 穷棒子精神..... | 陈青山 (131) |
| 幸福哪来? | 張 朴 (144) |
| 再上柴山..... | 刘 哲 (153) |

第二部分 二十三戶

| | |
|-------------|-------------|
| 二十三戶小史..... | 張庆田 (167) |
| 王生家史..... | 張 朴 (191) |

| | | |
|-----------|-----|-------|
| 王榮家史····· | 古 草 | (243) |
| 戴存家史····· | 葛 文 | (286) |
| 佟印家史····· | 刘 眞 | (309) |

第三部分 王家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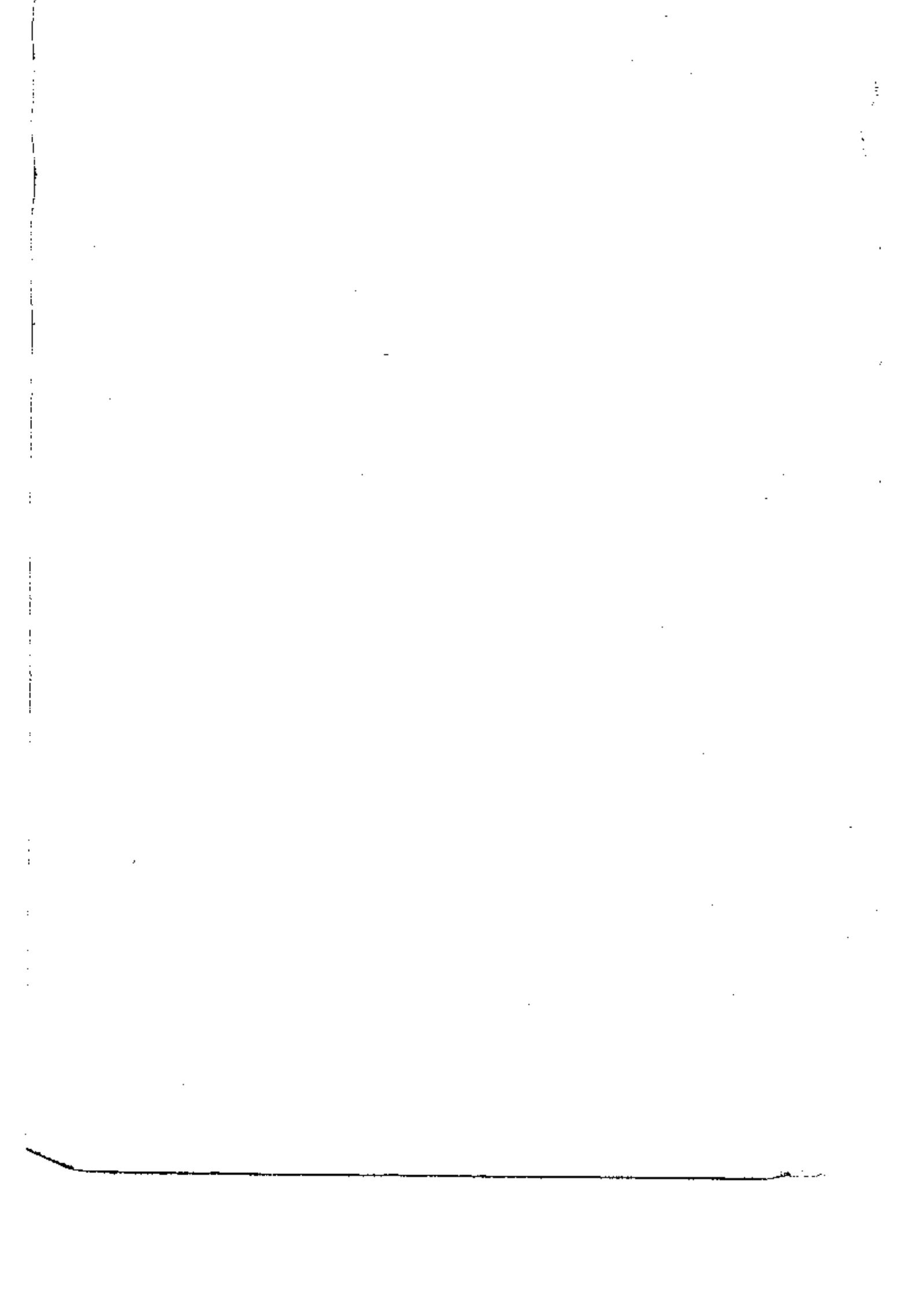
| | | |
|------------|-----|-------|
| 分家····· | 东 木 | (323) |
| 二巡警父子····· | 幼 江 | (334) |
| 賊六子····· | 陈青山 | (355) |
| “狼崽子”····· | 幼 江 | (384) |

第四部分 建明社頌

| | | |
|------------|-----|-------|
| 建明湖····· | 田 間 | (407) |
| “老打头”····· | 刘 哲 | (414) |
| 美好的青春····· | 張庆田 | (423) |
| 开花結果····· | 葛 文 | (431) |
| 山村讀書声····· | 长 正 | (439) |
| 老管家····· | 司 仃 | (448) |
| 新“伙計”····· | 东 木 | (455) |
| 老羊倌····· | 任彦芳 | (466) |

第一 部 分

新 打 柴 記



两个战友

丁羽

出遵化东门三十多里，山山岭岭就逐渐连接起来。烟筒山、长峪山、景忠山，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头，摩肩擦背把大地挤成了一小块又一小块。山多土薄是这个地区的特点。

这一带零零落落散布着成十个村子。大的一两百户，小的几十户。长峪山下有个较大的村子，叫四十里铺，东头叫东铺，西头叫西铺，合起来共两百几十户人家。

王国藩和杜奎两家都在西铺，紧住斜对门。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拾柴禾，挑野菜，谁也离不开谁，好得象亲兄弟。国藩自幼死了父亲只和老娘过活，他上无兄，下无弟，自个儿顶住门户。杜奎哥儿四个，三个哥哥在外为人帮工。他年纪虽小，也支撑了家务。

艰难的日子过去一年又是一年，到了一九三二年两人一个十五一个十六了，长得浓眉大眼，宽肩膀，高身杆。杜奎大一岁，比国藩也壮实些。

那天，兩人腳前腳後從南山挑下兩担柴來，走到半坡，杜奎說：“歇歇吧，我餓得前心貼後背上啦。”國藩也放下柴担，說：“歇歇就歇歇，我眼睛瞅東西也有點瞅不准啦。”

杜奎一邊用破褂子擦汗，一邊鎖着眉頭說：“你知道王功大爺今早餓死的事嗎？”國藩說：“我媽說啦，媽還哭了一早晨。咳，這年頭，咱窮人可要想點法子。”“有啥法子，還不是死路一條！”“不能這樣說，路是人走的，王功大爺的路，咱們可不能走！”

早先，王功在本村地主賊六子家當長工，後來年紀大了，干活不靈便了，就被趕了出來。他為人厚實，肚里有氣也不往嘴上出，忍着淚拿起棍子去要飯。年前臘月里，紛紛揚揚下着鵝毛雪，眼看一家五口凍餓難耐，他身不由己地走到賊六子家門口，想要點熱粥喝。門一開，賊六子的閨女貼出半個臉蛋，嘟起嘴說：“老鬼，你又來啦，咱家養你一輩子不成！”砰一聲，關上門。王功氣炸了心肺，從此再也不登王家大院。到了春天，實在沒有活路，老兩口痛哭了一場，把九歲的閨女童養給人家，五歲的兒子送給了馬棚峪一家親戚，兩歲的小閨女賣了三斗玉米，枕头里的糞子也抖出來摻野菜吃了。吃過幾天，還是糧斷米絕，鍋清灶冷，老头子連餓加病，終於在今天早晨咽了氣。

國藩和杜奎歇了一陣，又挑起柴担繼續趕路。山下沙河套西頭那一片黃土地上，麥子已長出沉甸甸的穗子，迎風擺弄；多么喜人的收穫季節就要到來。可是，這哪有

穷人們的份！这里那里，全是王家大院財主們的地呀！

猛然間，听得“砰砰”两声枪响。只見王家大院两个护青的无賴，从土坎上象餓狼般扑了过去，一会儿就赶上并抓住了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孩。小孩頑强地掙扎着，哇哇直叫。

杜奎說：“走，咱俩快去瞧瞧！”国藩說：“好！”两人就快步赶了上去。

“这麦穗我是路上撿的，不是地里掐的。不信，你瞧！”小孩哭着摔过去一束枯萎了的麦穗。很明显，新掐下的决不是这个样子。

“他媽的，我們亲眼看見，你还强辯！”

“誰强辯？你們才是强辯！”

这时，邻近鋤地的庄稼人，围上来了。

“弄枪动火这是玩儿的！”一个老农民說。

“哼！財主家的威風，大秋后的蚂蚱，长不了。吃这一套！”一个青年农民憤憤地說。

“算啦，算啦，为小事，动大气，犯不着。”一个怕事的农民說。

“什么算啦，算啦，这样的事也能含糊嗎？无端开枪打人算不算犯法？”杜奎放下柴担，两手叉在腰里插話了。

正在这时，王家大院的狗腿子范泰不知怎的钻出来了。范泰在穷人面前，专爱耍他那两片嘴唇皮子。穷人被債逼得走投无路了，他就說：“咳，留着这两間破草房干啥，干脆卖了还債，俗話說，无債一身輕嘛。”穷人被租子

逼得火燒眉毛了，他就說：“嗨，捏住嗓子眼兒，一天省它半升三合，不是就出來了嗎？有道是儉是聚寶盆呀！”可是今天他看到一伙人這樣橫眉豎眼瞪着自己，鋤頭扁担全握緊在手里，早泄氣了，只得順坡下馬地表示：“好，好，看在鄉親們的面上，算啦，算啦！”說完，趕忙催護青的無賴走了。

杜奎的氣可沒有消，他吐了口唾沫，憤憤地說：“哼！你算了，我們可不算了呢！”

不久，四十里鋪暴發了一次向王家地主的自發鬥爭，窮苦農民也算出了一口氣。

王家地主是當地的首富，如何起的家，說來話長。只知道他們祖輩有句傳家秘言：“人無橫財不發”。傳到“賊六子”手里，他又添補上一句：“不殺窮人不富”。這賊六子排行第六，當面要人們稱呼他六爺或者六先生，背地里人們都叫賊六子，他有四個侄兒叫王維平、王維清、王維田、王維藩，也都各自成家立戶。其中要算王維平最虎口狼牙。賊六子兩只賊眼一睜一個鬼主意，大斗大秤進，小斗小秤出，剔牙挖碎，半個銅子兒也要攥到手才睡得着。王維平嫌這樣太小氣，干脆窮人借米借錢，先扣三個月的利息，還有個名稱，叫做“出門三聲炮”。

那時因為上年發了一場大水，窮人家家戶戶鬧災荒。山坡里的野菜、草根、樹皮都吃光了，賣兒賣女、逃荒要飯的，少說也有三四十家。王家大院卻趁火打劫，春借一斗，秋還二斗，還得有土地房屋做抵押；好地一畝出一石

玉米，坏地一亩才六斗玉米。只消半年时光，王家叔侄一口气吃进了五六十亩。

穷人们肚里无食，身上无衣，住的茅草房，七倒八歪，风扫地，月当灯。王家大院灰楚楚一长溜瓦房，他们还嫌不够阔气，大兴土木又盖起护院炮楼来了。

盖到一半，有个姓韦的石匠被石头砸了脚，一两天工夫，右小腿肿得象根粗木桩，躺在贼六子家磨房里，痛得直咬牙。这韦石匠很有一身手艺，凿个凤凰就象能閃翅，打个狮子真如能滚球。他为人平和，和村里老小都合得来。有个叫范永祿的小伙子，平常重义气，来看望了几回，见他伤势不轻，劝他说：“老韦，你在这里要汤没汤，要水没水，算清账，我们送你回家去将养吧！”

韦石匠听了，就扶根棍儿去找贼六子，刚把话提了个头儿，贼六子就眯眼皮说：“那怎么行！高楼平地起，你把我石工耽误了，泥水匠、木匠不是也跟着耽误了吗？”

韦石匠说：“你有钱，不会另找人？”

“另找人？”贼六子吊着眼珠说，“现要现找，化双倍的钱，怕都找不来呢！”意思很明显，要走，工钱要赖账啦。

正交涉，王维平背着手踱进来。韦石匠转面恳求说：“少爷，请你说一句，把我的账清一清，我想回家去养伤。”

王维平瞪起蛤蟆眼说：“什么？清账？说得好听！你他妈自己不小心砸了腿，耽误了工程，我们还要和你算账呢！”

韦石匠虽然性子温顺，也听不得歪理，不由上了火：

“这是我的血汗，你們給，我要；你們不給，我也得要！”

狗腿范泰忽地钻出来，拍着韦石匠的肩头說：“好說，好說，該給的錢少不了，不該給的也拿不走。”他不由分說，把韦石匠仍旧推回磨房里。

范永祿一向火暴性子，听韦石匠这样从头一說，气炸了，回去立时圆眼一睜，对村里人嚷嚷开了：“賊六子狼心狗肺，真不是人养的！韦石匠拚死拚活，无日无夜的給他盖炮楼，如今伤筋害骨啦，連工錢他都不給！”

他从东头嚷到西头，从前街嚷到后街。

有些要飯的提起要飯棍說：“走，咱們帮韦石匠要錢去！”

有些鋤地的丢下鋤头說：“走，咱們和狗日的賊六子評評理去！”

王国藩年紀虽輕，一向有心計。他对范永祿說：“大叔，咱們癩着肚子，王家大院却修盖炮楼。他家的粮食滿仓流，为啥不去吃它几天？荒年吃大戶，老人們早就这么說过啦。”

人們正在火头上，国藩塞进一把干草，哪有不着的！不少人立时嚷着附和：“对，吃大戶，要工錢！”

“对，魚帮水，水帮魚，斗死总比餓死强！”

杜奎更是好样儿的。他大吆大喝，挨門挨戶地去动員：“走，帶上碗，拿上瓢，到王家大院喝粥去！”

一帮年青人縮袖捋臂地出来了；老头儿、老婆子、大

媳妇、小闺女，也都跌跌撞撞，捧瓢端碗地出来了。

范永祿揮起胳膊，大吼一声，一馬当先，帶領人們直奔王家大院而去。

象火星撒上草垛，一霎时燒紅了半边天。

穷苦农民在王家大院里橫冲直闖，揚眉吐气，第一次显示了威力。厨房里一滿鍋小米干飯，早被搶吃一空，盆摔了，鍋砸了。拳头揮动，喊声震天。

王維平弟兄几个吓得不敢露面，护院的无賴逃跑无踪，只有賊六子和范泰两人被堵在正房里。賊六子臉白得象張紙，光眙眼睛，沒了處主意，堆起笑臉裝出一副可怜相說：“乡亲们，我光景虽比你們強些，可也为难呀，这样吧，韦石匠的工錢我們給他，另外，再拿出一石玉米来让大家煮粥喝。”吓得象团烂泥的范泰，也哆哆嗦嗦，鼓动两片嘴皮接着說：“好說，好說，大家不是近邻，就是远亲，六爷还眼看你們餓死不成！六爷亲口說啦，一石玉米确实不少哇，掺点野菜煮成粥，还不喝个三頓五頓……”

“一石玉米不行！”許多人喊着。

“还要給韦石匠发养伤費！”范永祿等人也补了一句。

在众人的威力下，賊六子眙着眼皮，从一石增到一石半，增到两石，增到两石半，最后增到三石。养伤費也答应发五元。这时，他唉声叹气装穷了：“咳，这样咱家自己也紧巴紧了！”

那年月，大家都缺乏斗争經驗。有些老头妇女，看見賊六子装出的这副可怜相，心軟了。范永祿等人也拿不

出旁的办法。斗争就这样搁浅了。

当天，范永祿等人从王家大院挑出三担玉米，放在西铺王老三的豆腐房里煮粥，一人一瓢的分着喝了。过一天，范永祿等人又帮韦石匠算清了账，领上养伤费，送他回家去了。

这一次斗争，虽然没有动摇了王家大院的根基，可是在黑夜里发出火星，已经算不小的胜利了。

二

转眼过去几年，国藩和杜奎已经二十出头，吃糠咽菜，受冻挨饿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也长成了两条汉子。

黑暗的年月，又压上阴惨的乌云。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又染指冀东。遵化城里搞起了汉奸伪政权。贼六子这些地主，自己不出面，推出个爪牙来当了伪保长，今日要粮，明日派款，七捐八税都压在庄稼人头上。穷苦农民更是过不下去。

不久，爆发了抗日战争，接着，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又接着，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零零星星地传到又穷又偏僻的四十里铺村。过年春天，冀东一带也有了八路军的行动。泡在苦水里过日子的庄稼人，日候夜盼地望着光明的到来。

一天，国藩和杜奎下地回来，两人悄悄地谈论开了。国藩说：“老奎，听说长城边上有八路军便衣队活动呢，几

时能到咱们这儿来就好啦！”杜奎說：“真的嗎？”国藩說：“好些人都这样說，还能假啦！”杜奎說：“那咱们找他們去！”国藩說：“那怕不容易，听说他們和庄稼人一般打扮，长就一双飞毛腿，三五百里說到就到，人家头上又沒刻字，你知道誰是？”杜奎說：“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只要果真有，还愁找不到！”国藩一想，也有道理，就点头說：“好，咱们去試一試。”

第二天，两人帶了点干粮，悄悄地出发了。一路上紧打听慢打听，来到柳河峪附近时，果然打問出苗头来了。听人說昨天便衣队来到这个村，把一家大地主的五支大枪起了出来，現在正給村里人們讲抗日救国道理哩。杜奎正好在柳河峪有一家亲戚，两人高兴极了，就脚不沾地直奔柳河峪。

到了杜奎亲戚家，杜奎一听说真有八路军，急着要見面。这家亲戚就帶他們去找，果然找到了便衣队曹队长。

曹队长問明了两人的情况，又笑着問：“你們村的地主有枪嗎？”

杜奎生怕曹队长不去他們村，有意掺点假水，搶先回答：“有，我們村有个大地主叫賊六子，叔侄四家，少說也有十来支枪。”

国藩明知杜奎說走了嘴，可是望曹队长他們去的心太切，就随声唱影地加了一句：“有两支还是新买的，西洋貨。”

曹队长想了想說：“你們在这里住一宿，明天咱們一块儿去。”

杜奎盼不得見了云就下雨，他黑眼珠一轉，又編出几句來：“我們村里謠言正盛哩，明天去，說不定他們把枪支插起來啦。”

曹队长又想了想，笑着点点头：“好，小伙子，咱們准备一下就动身。”

天下着毛毛細雨，队伍翻山越岭，飞快前进。两地相距仅二十來里，傍晚时分，国藩和杜奎两人把便衣队三十多人領进了西鋪村。这一下，村里轰动起来了。人們早就听說这个队伍不打人，不罵人，不拿一針一綫，都挤上街头來瞧熱鬧。国藩和杜奎找上伪保长，直扑王家大院。

賊六子叔侄四人，这几天正心惊肉跳，却沒料到变得这么快。黑虎虎一群人压进王家大院，賊六子首先吓慌了。曹队长先向他們交代了抗日救国的政策，接着要他們主动交出枪支。賊六子点头哈腰，一連声的是，是是，提到枪，話头就轉了：“寒舍实在沒有什么枪，有两支破家伙，也叫几个护院的背跑啦。咳，这样吧，队长远來，請先在寒舍吃点便飯……”

狗腿范泰也接上說：“好說，好說，队长和弟兄們远道而來，歇息歇息再說，看，渾身都淋湿啦，我，我这就去打点酒，备点菜，让队长和弟兄們吃了暖和暖和。”他也不管別人理不理，顛顛屁股就出去了。

曹队长又耐心地向賊六子叔侄交代了一番政策。賊

六子还是老話一句：“两支破家伙叫护院的背跑啦……現在不知枪在哪里，人在何方。”

正在这时，杜奎一人背了两支快枪进来了，后面几个便衣队押着两个护院的。原来这两个家伙一看来了这么多便衣队，想逃，門口出不去，牆高跳不了，只好钻进半圈的玉米秆堆里打哆嗦。杜奎在曹队长和賊六子磨唇費舌的时候，暗下招呼几个队员搜索到牛圈，一声吼叫，那两个家伙就“媽呀，媽呀”，乖乖送出枪来。

曹队长接过枪，笑了笑說：“这两支枪可一点也不破呀！你們放老实点吧，别的枪在啥地方？”国藩也插口說：“你們各家不是都有护身枪嗎？快交了吧！拿出来打日本鬼子，这算你們爱国。”

賊六子哑口无言。王維平还矢口不认：“咱們王家就只这两支枪，哪里有什么护院的、护身的，你知道个啥！”

曹队长見他們把話都說絕了，也就板起臉孔說：“既然你們这样不識好歹，我們也就不客气啦。”

这里正在說話，范泰已經出去通風报信，要各家地主快插枪。

王維平的媳妇抱起枪，放进板柜，一想不穩妥，又赶快拿出来填进炕洞，嫌不严实，又急忙拉出来塞进灶門，灶門淺，枪柄露在外面，又慌着抽出来。她里屋轉到外屋，外屋甯进里屋，就是找不到个严密的地方。最后，她抖开一条被子，把枪睡在被窝里。队员們进屋一掀被子，枪到手了。

王維清和王維藩兩人媳婦，平時是冤家對頭，事到臨急，顧不得宿仇舊怨，一個說：“嬌，槍放在哪兒好？”一個說：“喲，我也沒了主意！”最後兩人抱了槍，爭着搶着地竄進後院豬圈，先塞在椽空間，仰頭一瞅不妙，又急急拿下來填在豬圈底，上面厚厚地堆了一層草。回來一個站在東房口，一個站在西房口，斜眉搭眼地望着後院豬圈。國藩領着幾個隊員在傢里翻，翻不出來。看了她們的眼色神情，一猜度，心裡有了底，走到後院豬圈，彎身一瞧，老母豬把草拱開一個窟窿，一支槍身已經露在外面。

賊六子的老闆女是個有名的刁鑽貨，一向又詭又潑。她竄進一間隱密的冷屋，想把槍塞進狹小的炕洞。杜奎帶人來搜槍，有個燒火的老太婆朝冷屋一嘮嘴。杜奎砰一脚踢開門，那老闆女回身一看，知道藏不住了，立刻說：“唷，你們來得正好，我正把槍挖出來，打算送去呢！”

六支槍齊嶄嶄地往堂屋一擺，賊六子叔侄都怔住了。

當晚，便衣隊就宿在村里。第二天，又在四十里鋪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高長順等四五個年青人硬求地要跟他們走，曹隊長也同意了。

傍黑，曹隊長又把賊六子和偽保長兩人找去說：“我們隊伍今晚要轉移，想籌兩百元經費，眼下莊稼人很是困難，就請王家府上借一借，怎麼樣？”賊六子一听，驚得出身冷汗。往外拿錢，比割肉還痛。他當時推脫：“咳，隊長，不瞞你說，我們王家其實是個空架子，不要說一百二百，就是一二十也一時拿不出來呀。老話說虧眾不虧

一，抗日救国是大事，理应众人尽心，让村里大家均摊均摊吧！”

贼六子这一说，伪保长身上可冒汗了。上一回收户口捐，就是贼六子的贼主意叫均摊，害得村里人都骂他。眼下除了王家地主，谁家还有余钱？他眼瞅着曹队长，囁囁嚅嚅地说：“咳，眼下庄稼人们是凑不起来呀！”

曹队长说：“对哇，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穷人们出了不少力啦，你们有钱人不拿点抗日经费，能算中国人吗？”

贼六子看着推不脱，又想滑过去：“咱家的事人多嘴杂，我一人难以作主，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曹队长立时制止住他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人，这点小事就在你一人决定啦！”

贼六子推不脱，滑不过，就又拿出他的老办法来，哭穷叫苦，先答应了个三十元，后来又挤到三十五、四十元、四十五、五十元。他哭天抢地地说：“再也沒一点办法啦，就是拿锥子锥、鞭子抽、刀子割也沒法儿啦。”

曹队长心里象明镜似的，早已看穿了这伙地主的花招。他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故意松了一口说：“五十就五十，那么你家那一头新买的大骡子，部队上馱个东西啥的要用，得借一借。”

这一下，贼六子可傻了眼。那头骡子是二百四十元买的，再加上五十元，将近三百元，不是多出一半了吗？他又是酸，又是苦，又是辣，不知是啥滋味。只得乖乖地

拿出两百元錢。

便衣队走后第二天，王家叔侄吵嚷开了。四个侄儿破口大罵；賊六子眉头打疙瘩，背起手，象老驴轉磨地在屋里轉个不停；范泰縮在屋角，象只猫头鷹。

他們明显地感到，时势变了，穷苦农民耍起来了，抗日的烽火将会越燒越旺，老黄历已經瞧不得了。

王維平撩起长衫，一拍大腿說：“一不做，二不休，山沟沟里是翻不起大浪的。上遵化，那边有咱至亲好友，咱們和这批穷小子走着瞧。”

当天中午，王維平、王維清、王維田、王維藩四兄弟，果然套起車，搬上箱籠細軟，带上妻小，吆吆喝喝地搬到遵化去了。

当天晚上，賊六子也套起車，搬上箱籠細軟，带上妻小，偷偷摸摸地溜到遵化去了。

长城烽火

丁羽

一

王家地主走了，庄稼人们起来了。革命的火种撒下，很快就燃烧起来，成立农会，组织民兵。国藩和杜奎二人对于抗日工作，很是积极。

冀东一带抗日斗争的日益展开，成了插在敌人背上的另一把尖刀。日本鬼子想进行残酷报复，这一年就来了个大“扫荡”。

黄鸦鸦的日本鬼子夹杂着灰溜溜的伪治安军，东冲西闯，杀人放火。那一天，闯进了四十里铺。村里人逃进南山和北山，民兵在山头上监视敌人。过了三天，还不見敌人撤走。民兵出去打探了几回，国藩和杜奎也到山岗上瞭了几次，看不清鬼子啥动静。杜奎说：“咱们进村瞧瞧去！”国藩说：“要去，得化装化装。”杜奎说：“不用。鬼子抓的那一批民伕，不都是和咱一样的庄稼人吗？”国藩一想说：“好，咱这就去。”两人向领导说明，领导也同意了，并嘱咐他们小心行事。趁着黄昏月色，两人紧了紧腰身，掖上两颗手榴弹，外面套件破袄，摸进了村里。

村里猪腸狗肚，到处都是，怪味恶臭，直钻鼻子，只三天工夫，簡直变成了鬼的世界。两人蹑手蹑脚，摸进国藩家院子，一进门，就吓了一跳，脚边横着个血淋淋的长角怪物，細一瞅，原来是个割下不久的牛头。屋里掌着灯，从外面看得清有十来个伪軍，有的躺在炕上，“心肝呀”、“妹子呀”的哼着不入耳的小調；有的“天呀”、“地呀”的正推着牌九。国藩拉拉杜奎的衣襟，出了国藩的院子，又摸进斜对面杜奎家院子。杜奎一脚踩到这群狼羔拉的野粪上，正要罵一句，国藩捂住他的嘴，扯着他的衣襟又出来了。不远是杜生开的大車店，因为門口有三棵大槐树，人們叫它三槐店。两人正闭气凝神地走着，猛听得一声喝叫：

“八格牙魯，什么的干活？”

两人吃惊不小。国藩立时鎮定住回答：“取柴燒水的干活。”

一个日本鬼子端着带刺刀的枪，叫他們一个一个的过去，上下仔細打量过后，揮手叫他們“开路”。两人壮着胆往前走，經過大槐树一抬头，只見树杈上吊着几顆不知名的死难烈士的人头。两人心里象被鋼針扎着似的难受。他們不敢久留，匆忙繞到三槐店院后，翻院墙进去。院里正拴着五六匹毛驴，赶驴的都在屋里鬼混，馱子都未卸下。两人摸了摸，在一个驴馱子上摸到了一大捆硬梆梆的物件。杜奎悄声說：“大概是枪！”国藩也低声应了句：“有点象！”两人迅速动手卸下馱子，抬到院墙根。杜奎先

翻过墙，接过去馱子，国藩也跟着翻出院墙。这时，听得屋里哇里哇啦走出一帮人来，杜奎說：“国藩，你先把它扛走，在村西黄土崗等我，我来断后……”国藩最知杜奎脾气，二话沒說，弯腰扛起馱子，便往村外突。杜奎拉出手榴彈的弦，竖耳听着，估計国藩已經出村，他也迅急跑出村子。

在村西黄土崗，两人碰了头。杜奎又扛着馱子爬上一个崗，放下馱子說：“不怕啦，咱們瞧瞧里头是啥东西！”解开绳，剥去外面的油布，又撕开一层包装紙，嘿！上面是一大網电綫，下面是个长方扁平的木箱，那木箱漆得淨亮，在月光下直打閃。杜奎說：“啥玩艺儿？打开瞧瞧！”东摸西摸，触到一个小铁疙瘩，一摠，木箱啪地掀开了，里面却黑糊糊，真不知是啥玩艺儿。杜奎伸手一摸，五个手指头烏黑烏黑的，放在鼻前一聞，一股火油味，在腿上一按，齐刷刷落下五个黑印。杜奎煩惱地說：“啥鬼八怪，咱們砸了它！”国藩說：“別砸！交到区上去，說不定是啥宝贝呢！”

第二天，鬼子撤走了。两人把木箱和电綫送到区上。赵区长一看木箱，笑着說：“好！好！你們干得好！鬼子送来了一架东京出品的油印机，連收条也沒要你們的！”

日本鬼子的“扫蕩”失敗了，汉奸特务的活动却非常猖狂。斗争也更加艰苦了。

一天，三槐店的杜生匆匆地找到杜奎說：“剛才我店里住进四个客人，身份证上写明是做木材生意的。一进

店就横眉竖眼要这要那。我洗脸水拿迟了一点，一个留分头的家伙，差点搨我两耳光。他们硬要我派人赶集给他们割肉包饺子吃。做生意人哪有这样霸气的？还有一个留八字胡的家伙屁股后面还突出一疙瘩，象是枪……”

一听说是枪，杜奎脚底象抹上了油。他稍一思索说：“你快回去把他们糊住！要吃饺子，好办，包！反正小子们也是吃不成的。”

杜奎迅速找到了国藩。两人互相商量了一下，就找来了王凤祥、张志民、温自泉三人。王凤祥外号王大胆，打鬼子一向天不怕，地不怕。张志民说话有点结巴，但两个拳头象钢打铁铸。温自泉个子不大，是有名的机灵鬼。

杜奎如此这般和他们说了一遍，就都相跟着去了。

到了三槐店，三人先埋伏一边，国藩和杜奎悄悄溜到了窗下。从窟窿眼里朝里一看，只见这四个客人全是身穿大褂商人打扮。那个留八字胡的家伙年纪最大，约三十上下；其余的全只二十出头。那个留分头的家伙鼻上还架着副茶镜。他们有的躺在炕上悠闲地喷着烟圈；有的跷起二郎腿，嘴里哼着刺耳的小曲。再一细瞅，那个留八字胡的家伙，屁股后面果然突出一疙瘩，用一只手按着，眼睛滴溜乱转，满身流气。杜奎低声说了句：“嗯，可能是……”掀起门帘，一迈腿就进去了。国藩在外面紧张地注视着动静，考虑对策。

“查身份证！”杜奎高声说。

这伙人全都一楞。那个留分头的家伙，很不耐烦地

說：“剛才查過了，怎么又查？”

“這你不用管，快拿出來！”杜奎几乎是命令。

這伙人只得又一個一個慢吞吞地拿出了身份證。杜奎逐一看了看說：“這不中，要檢查你們身上！”這時，他已經走近那個留八字胡的家伙了。

那個“八字胡”，心知不妙，假裝解扣子，一轉身亮出了盒子槍。杜奎早有準備，眼明手快，撲了過去。“八字胡”靈活地一閃身，杜奎却撲了空。正當“八字胡”拿着槍對着杜奎要扣動扳機的一剎那間，杜奎的一只鐵手已鉗住了他拿槍的手，緊接着，用另一只手在他臉上狠狠搗了一拳。“八字胡”就軟癱了。那個留分頭的，從背後撲來，被杜奎一個後蹬，蹬翻在地。

“別動，動就開槍！”窗戶眼里忽然伸進了兩支烏油油的家伙。

“別動，動就看刀！”王鳳祥手舞大刀片子，几步跨了進去。

這一下，這四個家伙全都惊呆了。緊跟着，溫自泉手里拿着兩根粗麻繩也跨了進去。杜奎等就把他們逐一捆了起來。

正當國藩和杜奎把這四個家伙往區上押時，外屋的鍋開了，滿鍋餃子擠擠擦擦，翻來滾去。“小分頭”扁着嘴，抽搐了幾下，這回想吃也吃不成了。

趙區長自是高兴，大大嘉獎了他們一番。後來查明這伙人是屬於敵唐山某特務機關領導的，來頭不小。

春天又来了，虽然是战火纷飞，但是满山的桃李仍然繁花怒放。

在一个红日初涌的早晨，国藩和杜奎如约赶到了南山沟一片茂密的林子里。一会儿，打扮得象一个大掌柜的冀东区党委苏林燕同志也赶来了。三人坐在一棵挺拔的大松下悄悄的說到了正題。

苏林燕同志首先表揚了他們在对敌斗争中的勇敢坚决；接着又开导他們如何正确認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中的作用。这时，正好滿天云飞霞动，老苏意味深长地說：

“你們都看吧，头頂的白云，剛才还是一堆一堆象魚鱗，現在呢，一条一条已拉成馬尾了。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高空有一股狂風在吹。我們革命者就應該象这股狂風，把一切黑云濃霧都吹散。你們不要看眼下日本鬼子还这么横行霸氣，其实也只不过是一小片黑云。只要我們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一起，天天拿这股狂風吹它，迟早也是要散的。”

老苏要兩人談談意見。国藩說：“沒有什麼意見，听党的話，扛起扁担跟党走到天尽头就是！”杜奎說：“我也是这样。”

就在这一天，这一对出生入死的青年伙伴，庄严宣誓，由苏林燕同志代表党組織，接受他們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二

两人入了党，肩上的担子比以前重了，工作比以前也更积极了。

这时候，民兵队伍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四十里铺、白马峪、接官厅、大于家沟、上下汪市庄、靠山庄等相邻村庄的三十多个骨干民兵，组织成了一个游击小队，杜奎担任指导员。国藩则在前些时候已当了村的办事员。为了便于隐蔽在群众当中，大家都化了名，活动也是不固定的。

隔不多久，日本鬼子在四十里铺也安上了据点，东西两头修起岗楼，分驻着五十多个伪治安军。村子里大烟馆、赌场、酒馆、窑子都开起来，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简直成了鬼的世界。

却说伪治安军里有个叫李大个子的机枪班长，原也是穷苦农民出身，当了伪军以后，受着习染，抽大烟、滥赌钱，不学点好。但是他受了日本鬼子的欺负，心里也是怪憋屈的，有时几杯酒下肚，不免发泄几句不满的言辞。我们党特意挑选出来，打进敌人内部，支应敌人的维持会长十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跟他厮混起来，越混越熟，一两个月之后，两人成了好朋友。

一天，李大个子背着机枪，踏进十同的家就喊：“大哥，真把人气炸啦，他妈的王三麻子是个什么货，还不是

做了活烏龜，換來個小隊長，這會兒倒教訓起老子來，說啥思想有問題啦。我真咽不下這口氣。他們要把我調到三屯營去，他媽的，調就調，老子才不怕呢！”十同一聽，口中不言，先端出酒來，勸他喝几杯消消氣，然後火上添油地捅了几句，想把他的火燒旺，鼓動他携槍反正。誰知這家伙却是草雞，三杯酒下肚，氣也真的消下去了，反而掉下眼淚想起媳婦來。十同只好改變主意，借故出來，找國藩和杜奎兩人去商量。杜奎一聽說有一挺機槍，就高興地說：“咱們把它扛走！”國藩說：“扛走也要想個法子，這麼老大的東西，顯眼着呢！”十同想了想說：“我先去把他灌醉，咱們天黑再行事！”說完，返身回家，添酒加菜，一個勁兒勸李大個子喝酒。直到天黑下來，那家伙被灌得兩眼血紅，胡言亂語，發開了酒瘋。

十同說：“老李，在炕上躺一會兒再回去吧！”李大個子覺得天旋地轉，舌頭也有點僵硬，結里結巴地嘟念：“躺一會……就躺一會！咱哥倆……算是前生有緣，今世……今世結伴……”一歪身躺在炕上，把機槍橫倒，墊在枕頭下面。

不大会兒，李大個子就打起了呼嚕。十同摸着他的頭臉說：“看你，這樣墊着多不舒服。來，不夠高再放個枕頭。”說着，把機槍順手抽出來，另加個枕頭。李大個子爛醉如泥，什麼也不覺得了。

國藩和杜奎早在對面屋里等着。機槍一到手，兩人就急忙用破麻布和麻繩纏扎起來，一會兒改裝過了。十

同眼盯着两人，轻声而又严肃地说：“这物件来之不易，你们一定把它送到上级手里！今晚东岗楼戒备松些，你们从东面突出去！”国藩问：“这里呢？”十同说：“这里我来对付，我有办法对付这只蠢猪！”

两人出了门，街上已经冷冰淡水没有什么行人。国藩说：“咱俩拉开点，万一出了事，我顶住，你扛上机枪快跑！”杜奎说：“你前面走，可也留着神！”两人拉开约三十步光景。这时一弯眉月挂在天边，影影绰绰，啥也看不真。村周围都是一丈多深的封锁沟，只有岗楼下面的一条道通向村外。快到东岗楼前面，只听一个灰鬼子吆喝：“站住！口令！”

“老百姓。”国藩壮着胆大声回答。

“举手过来！”

国藩举起了手，慢吞吞地走过去。灰鬼子正待盘问检查，杜奎不声不响，一支箭似的迅速穿了过去。等到灰鬼子发现，端起枪吆喝时，杜奎早跑出去老远。“砰、砰”两声枪响，划破黑夜的天空，却没有损伤杜奎的一根毫毛。

冲过了岗楼，再走出三四里地，已经是抗日人民的自由天地。杜奎放下机枪，在一个土岗上坐定，等候国藩上来。等了一个多钟头，不见一点踪影，岗楼边上手电筒乱晃，村头的狗一声接一声地乱吠。杜奎心想：“糟啦，国藩八成被捕啦！”他心头象刀割，喉头象绳勒，难受极了，转而一想：“天塌啦，也要顶住！不管怎样，肩上的机枪也得

交到上级党手里！”想到这里，身上不觉来了力量，扛上机枪，撒开大步，连夜赶了二十多里，来到区上，还只半夜多点。赵区长几个人开会刚散，还没睡觉，一听说杜奎扛出一挺机枪，不用提多高兴了。正好咱部队上的张连长也在区上，他眉开眼笑地说：“好！好！鬼子真是越来越爽快，这回连机枪都送来啦！”区小队的李队长更是逗乐：“每回打仗，鬼子总是咯咯叫，这回咱们也给他个叫咯咯。”

赵区长听完杜奎的汇报，眉头锁起了疙瘩，他很为国藩的安全担忧。随后想到十同一定会从中周旋，国藩也一定会随机应变，事情一定会向好的一方发展，眉头才舒展开了。但是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任何时候都应该做好两种准备，既想到好的一面，也要考虑到坏的一面，就对杜奎说：“你明天趁法回村去，先到邻舍家打问打问，再到十同那里去探听探听，如果有什么意外，赶快突出村来报告。”

这时公鸡已叫过两遍了，眼看就要天亮，杜奎心里挂牵着国藩，他只向赵区长说了句“我走了”，就又撒开大步往回赶。

回头再说十同把机枪交给国藩和杜奎带走，挨过了个把钟头，就把李大个子轰起来说：“不好啦，刚才来了两个八路，把机枪扛走啦！”李大个子吓出了一身冷汗，酒劲儿早跑了。他张大一对血红的眼睛说：“大哥，别开玩笑啦！”十同认真地说：“谁和你开玩笑，不是我苦苦求情，你也早去见阎王爷啦。不信你看……”说着摔给他一张字

条。李大个子哆哆嗦嗦地說：“大哥，你知道我不識字。”
十同就拿出来念給他听：

拿走机枪，
留你一命，
要再作惡，
決不留情！

八路军两战士

李大个子听了这几句言辞，渾身篩糠似的跪在地上說：“大哥，你救救我吧，丢了枪，回去可沒命啦！”

十同放慢声調說：“咳！咱們都是脑袋挂在褲腰带上过日子，过了今天誰能料到还有明天！”說到这里，又叹了一口气：“也是咱哥俩相好一場，是禍是福我一个人担着吧。你知道今晚的口令嗎？”

李大个子急忙說：“知道，知道。”

“知道就好。”十同接下去說：“我給你找根粗木棍背上，假装是机枪，騙过崗哨，連夜开小差逃命去吧！”

李大个子不知就里，反叩头如搗蒜，千恩万謝地說：“大哥，我李某人只要逃得活命，往后一定重报你！”

就这样，李大个子趁半夜开小差跑了。

第二天清早，东崗楼里做飯的老張匆匆忙忙跑来对十同說：“坏啦，坏啦！国溝被抓住啦！”原来老張是十同的内綫，他借口买菜，专意出来报告这消息的。十同听了，大吃一惊，忙問：“怎么样啦？說了啥沒有？”老張說：

“他总是那一句話：‘我媽病啦，我是連夜去請大夫的。’別的啥也沒說。這會兒還吊着呢。”十同放下心來，說：“這就好辦。你先回去照看一下國藩！”

吃過早飯，十同封了五十塊銀洋，差人送給東崗樓的王三麻子。那王三麻子見錢眼紅，從國藩身上又搞不出什麼口供，就做个順手“人情”，把國藩放了出來。

杜奎在村外煩等了一上午，快吃中飯時才進了村，先到西頭王三孀家串門。三孀象往常一樣的只是訴說苦情，沒提別的，杜奎才放了一半心。下午瞅機會去找十同，知道國藩已經被放出來，事情也已平息，一塊石頭才落了地。從十同家出來，故意繞了幾個彎，閃身進了國藩家門口。國藩媳婦坐在炕沿上，眼睛哭得紅桃似的，站起來迎着杜奎說：“四叔，坐吧，孩他爸身上給打得哪有一塊好肉呀！”說着，眼淚撲簌簌直掉。國藩媽身子有病，有氣無力地說：“你兄弟這回是，咳！是撿回來的一條命呀！”杜奎素性剛硬，見國藩身受重創，也不覺鼻酸掉淚。國藩傷勢雖重，神志倒是清楚，他招呼杜奎坐下說：“機槍送到了嗎？趙區長他們好吧？”杜奎說：“機槍送到啦，趙區長他們不用提多高興呀。”說着，掀開國藩蓋的被子一瞅，只見渾身上下血漬一片連一片，他又是一陣心酸，咬咬牙說：“國藩，傷在皮肉，不太要緊，我想法買點洋藥給你調治調治就好啦！”國藩說：“不要緊，他們扎我、打我、灌我、吓我，我都挨過來啦！”杜奎說：“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個仇，咱遲早得報了它！”

杜奎这人，有话藏不住下句，有事过不得半晌。当晚，他就约了王凤祥等几个民兵，摸到东岗楼前面埋了个大地雷。埋好不久，刚好有个伪军班长在窑子里喝了花酒，在赌场里又赢了钱，一路上哎哎唷、哎哎唷地哼着小曲回来，刚哼到“小寡妇哭五更”的第三更时，“轰隆”一声踩响了地雷，臭骨烂肉被炸成了好几块。杜奎心头的气恨才消了点。

第二天，杜奎到遵化城去替国藩买药。回来走过靠山庄前那段沙河套子时，太阳已升到西山顶了。猛见迎面过来一股灰溜溜的伪军，约摸三四十人。杜奎急忙闪进玉米地里。直等伪军从路上过去，他正想钻出来，瞥见前面有个伪军，倒背着枪，双手提着裤子在赶路，看样子是拉屎掉了队。他朝前一望，离村头岗楼一里地内没有人影；往后一瞅，那股伪军已经拉开一两百步远近，心想正好机会。立时拉出手榴弹，一步从玉米地里窜出来，低声吼了一句：“站住！放下枪！”那个灰鬼子万万也没有料到，大天白日，又在村边，忽然从地下会钻出个八路军来，双手提裤，哪来得及使枪，叫喊又怕手榴弹立时冒烟，被杜奎的虎势豹胆慑住，只有哆哆嗦嗦地举起手来。杜奎一把夺过枪来，背在身上，用手一指说：“向左转走！”灰鬼子丧魂落魄，任凭杜奎摆布，乖乖地被押到区上去了。

区里把这支枪奖给杜奎。赵区长握住他的手说：“宝刀配勇士，这支枪是配跟你的，希望看到你更大的成绩！”

杜奎自是高兴，急忙回村，给国藩敷了药，并把经过

情况向国藩讲述了。国藩听了，也是一番高兴，身上的伤好象好了一大半。

三

腊尽春来，转眼又是一年。敌人屡次失败，变得更加疯狂，更加残暴。在艰苦的战斗中，我们的主力部队越来越坚强，民兵武装也越来越壮大，加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冀东区的形势也逐渐好转。攻碉打堡，胜利消息频传。

国藩和杜奎在富马寨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心头就象盘上了喜鹊窝。国藩说：“嗨，这回敲双城子，我看准是葱头大蒜连根拔啦！”杜奎说：“说的是。可就是没咱的份，怪憋气呀！”国藩瞅着杜奎，笑了笑说：“看怎么说。杨团长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打双城子好比砸敌人的头；在四十里铺附近打伏击，好比砍敌人的腰；咱们在接官厅后山诱敌阻援，就好比切敌人的尾，同样都是光荣任务呀！”这个道理，杜奎其实也懂得，刚才的话，只是口头说说罢了。

回到地点，杜奎马上召集民兵进行动员：“你们都想打大仗、揍鬼子、缴好枪吗？”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愿意，有的还学八路军的样子举起了拳头。杜奎挥了挥手，接下去说：“打大仗，就得象个打大仗的样子，吊儿郎当可不中。听清楚啦，后天半夜带足干粮喝够水，在南山集合。这是军事秘密，那怕是在老婆孩子跟前，也不能露一声半

句。……注意啦，軍事行动，要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叫打，半个手榴弹也不能往出扔；喊声冲，哪怕枪林火网也要跟鬼子拚。……好啦，就这样，今天我请客……”把随身带来的一包花生米抖出来。

国藩见杜奎动员得过于简单，就又把从上級那里听来的有关当前形势的话，补充了几句。具体作战计划，他却是只字未露。

行动的那一天来了，半夜集合。大清早，国藩和杜奎已经把三十多个民兵，在接官厅后山上埋伏停当。太阳露了头，又一步步升高。大道上可显得格外荒凉寂静。国藩悄悄对杜奎说：“咱包司令在双城子的这出戏，想必已经唱上啦！”这一说，又引起杜奎的牢骚，他扬起两片黑眉毛说：“人家是热茶热饭，咱这是冷汤凉水，差远啦！”没等国藩开口，他自己又嘿地笑了声，说：“花旦黑头，还不一样都是唱戏，咱们的也快唱上啦！”

就在这个时候，双城子那边果然热闹上了。今天赶集的人特别多，菜担、柴担、山货摊、杂货摊摆得满街都是。跟着一顶花轿也进街了，前面是旗牌鼓号，后面是笙箫吹打。迎亲送嫁的长袍马褂，红绸绿缎，很是排场阔气。

吹吹打打，这花轿豁閃豁閃直往伪军驻的岗楼前走来。原来双城子有两个大岗楼，一个里驻着一中队伪军，一个里驻着一小队日本鬼子，小队长叫池田，因为长相很象猪头，人们就叫他猪头队长。眼看花轿快到伪军驻的岗楼前了。那伙灰鬼子可乐坏啦，一个个大背着枪，死皮

賴臉地挤上来看新娘，搶着想在新娘臉上捏一把，身上摸几下。誰知剛掀开轎帘，格格格，轎里突然扫出一梭机枪，挤在花轎周圍的灰鬼子們还未明白过来，就被扫得呼天喊地，哭爹叫娘。

机枪一响，集立刻炸了。不少人从菜筐里、从柴禾里、从貨車上一下子搬出了枪，齐向崗樓扑去。这一百多个灰鬼子来不及抵抗，被打死的打死，被繳枪的繳枪，不消半个钟头，就被消灭的干干净净了。另一个崗樓里的日本鬼子却有了准备，他們凭着火力强、炮樓堅，頑死抵抗。猪头队长抱起电话机，一个勁儿向駐在三屯营的老上級荒井上尉求救。

三屯营是日本鬼子的战略据点，一向駐有重兵。現時除去一个中队的日本鬼子外，还有一个伪区团。荒井上尉接到猪头队长的电话，十分恐慌，生怕中了八路军的調虎离山計，不敢亲自出馬，慌忙派伪区团长帶領三百伪軍出援。

三屯营离接官厅后山只四五里路，伪軍的兵馬一出动，杜奎派出去的民兵哨就望到了。陣地上立刻緊張騷动起来。杜奎不住喊叫：“埋伏好，不能暴露！准备好手榴彈，沒有命令，誰也不能投！”有些民兵却好奇心盛，一会儿探出个头，一会儿伸出只手，把国藩和杜奎急得什么似的。

敌人越来越近了，五百步、四百步、三百步，最后只有一二百步远了，警戒尖兵都已晃过去，眼看着这伙灰鬼子

就到眼前，杜奎虎地立了起来，大喊声“打！”随着扔出一顆手榴彈。紧接着，几十顆手榴彈一齐飞了出去，轰隆隆一陣爆炸，灰鬼子七歪八倒，全乱了套，一个个抱脑袋撅屁股，慌慌乱乱地往回窜。

伪区团长这只凶狠，凭着他几年来和八路军作战的經驗，知道眼前只不过是一小股民兵的騷扰，正好是拣小便宜、向日本鬼子报效的好机会。他紅着眼，立在馬鐙上，揮起盒子枪，对着往后逃跑的伪軍吆喝：“站住！站住！”几个还在抱头逃跑的，被他几枪毙在当路上了。

趁着敌人混乱，杜奎喝了声“轉移”，就帶領民兵順山間小路往西撤去。伪区团长搭起望远鏡一看，哈哈大笑：“好！看你們这群崽子往哪儿逃！”一面指揮追击，一面命令追击炮手瞄准开炮。

国藩和杜奎带着民兵正往西跑，猛然間，轰一声，前面不远处响了一发炮彈；大家正发楞，轰一声，后边一发炮彈又炸了。杜奎当即喊了声：“疏散隐蔽，繼續前进！”国藩跑过去想拉一个队员蹲倒，不想一脚踏空，轆碌碌从陡坡上滚下来，看看滚到半山腰，幸好被一棵小松树卡住了。杜奎出身冷汗，急忙抓住几棵小树溜下去，拉起国藩一看，衣服被扯烂了，身上碰伤了好几处，嘴上也血糊糊的。国藩用手往嘴上一抹，抹下了半片上顎，还粘着四五顆牙齿。他一声沒吭，就手往自己嘴上按，按住了，閉起嘴，又跟着杜奎順山坡往前走。

民兵前面跑得快，伪軍后边追得紧。赶了十多里路，

眼看快到四十里鋪了。猛然間，四山枪声齐响，杀声震天，枪彈、手榴彈猛雨般落进灰鬼子密集的队伍里。伪区团长叫声不好，知道决非小股民兵，而是中了埋伏，落入八路軍的口袋陣了。他渾身发抖，立即調轉馬头，指揮伪軍順来路往回突圍。

杜奎帶領的民兵也立时調过头来，一个个小老虎似的，跟随八路軍战士拚命往下压，想尽快封严这个口袋，来一个瓮底捉鳖。民兵里有个叫小柱的，从小放羊出身，两只脚掌象牛皮一样。昨夜行軍，他嫌爬山費鞋，把两只破鞋脱下来和手榴彈并排掖在腰里。今早在接官厅一打响，人家都抽出手榴彈向灰鬼子擲去，他呢，慌急慌忙却把一只破鞋扔了出去。杜奎瞪了他一眼說：“你这不是扯蛋嗎？”他一瞅，也失笑了，臉紅到后耳根。这会儿，他那一手放羊擲石子的本領可全有用武之地了。手榴彈一个一个地被扔出去，又远又准，在敌人群里开了花。

这一次伏击打援，围歼了一百多个伪軍，繳获了大批战利品，杜奎帶領的民兵，也繳获了六支步枪和不少子彈。

伪区团长帶領着他那残余的亡命鬼子，狼狽逃归三屯营去了。

援軍一被打退，我們的队伍立即会攻双城子，当天就把日本鬼子的崗楼拿下来了，三十多个日本鬼子全部被歼灭。

这一仗，真象在日本鬼子头上打了一悶棍。不久，四十里鋪据点里的敌人也被迫退了。

枪和土地

丁羽

经过了艰苦的斗争，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终于被打败了，接着又打退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攻。一九四七年初，不断传来消息，要实行土地改革了。这里的人民从苦海里爬出来，又将得到世代想望的土地，真是欢欣鼓舞，喜笑颜开。不幸在人们的头上又翻起了一片乌云。

这片乌云是以杜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翻起的。经过很是曲折复杂。

杜志的年岁和杜奎相仿，身体也是棒棒实实的。抗日战争快结束时，他对抗日工作也积极过一阵子，因此在一九四四年钻进了共产党内，不久还担任了村支部组织委员。这人个人野心不小，总好出人头地，干了点工作，就脚不沾地，眼睛插在头顶上。杜奎不客气批评了几句，他就怀恨在心。这点毛病，被村里大佛教头子高凤桐和富裕中农王悦看在了眼里。他们甜言蜜语，投其所好，着实给杜志灌了几碗迷魂汤，一会儿说他象条龙，国藩和杜

奎万难相比；一会儿又说他天庭饱满，字宇方圆，是难得的福相。这样一日长二日短，杜奎也就跟着大佛教厮混起来。

这大佛教是有来头的。原来抗战胜利以后，卖国贼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使下，一面调兵遣将向解放区猖狂进攻，抢夺人民胜利果实；一面派出大小魔怪，潜入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魔怪，有的装成善士，有的化成美女，暗里张开血盆大口专意吃人害人。大佛教这个反动会道门，也是许多魔怪里的一个。它直接受敌唐山军统特务刘鸿勋指使。

大佛教又在西铺暗里闹腾起来，引起了国藩和杜奎的警惕，一件旧事立即在心里翻腾。

那一年，村里时疫流行，大人闹伤寒，小孩闹麻疹，人心正慌。大佛教闹开了。什么“老母撒下大法船，不渡无缘渡有缘……亲拉亲，友拉友，苦海捞人一样般”；还有什么“化票子，秧根基，后天地位有你的。你不化，我不提，你往东来我往西；往西得道成真果，往东大海淹死你”！等等骗人的鬼话，悄悄从这个人的耳朵根，传到那个人的耳朵根。

一天，杜奎对国藩说：“大烟鬼高凤桐家里，天天晚上有人走动，准不干好事。咱们今晚去闹个水落石出。”国藩说：“好！”那晚，杜奎果然带了几个民兵去查夜。

更深人静以后，月色明光锃亮。杜奎先在墙外侧耳一听，隐隐有小鼓和木鱼的声音传出；爬上墙头往里一

瞧，只見有个老道正身披法衣，手舞法劍，一面胡言乱語，一面和一批道徒跪在当地叩头求告。被哄騙来的群众，也就跟着叩起头来。老道站起来装腔作势又舞了一阵子劍，然后开言道：“我盘古普渡众生，善解众难；入我道，买我盘，超升云端；入我道，挂我盘，血災可免……”

接着高凤桐站出来，又装神又扮鬼地说开了价钱：“买一个盘是九十九元钱，超升天界；买半个盘是五十块钱，站在半云层。买了盘就是入了道，可以有福同享，有馬同騎。一时买不了盘，也可以先化五块钱挂个名，能暫免一死……”

老道这么一吓一哄，有的人也真願上当。民兵小柱的娘，那晚也去了。她是連买咸盐的钱都没有的，但又生怕自己的独根苗苗遭災，就央求說：“我眼下一个钱也没有，欠一欠中不中？”高凤桐厉声說：“死老婆子，这是什么地方？你竟敢胡扯蛋！敬神，敬神，只有心敬才能感神。神灵的錢也能欠嗎？”这一說小柱的娘急的沒法。

高凤桐不再理会她了，拿出一只小口袋来开始收錢。眼看收了三五个盘。杜奎怕再不下手要晚了，赶紧下来和候着的民兵悄悄說了几句，就把人分成两撥，一撥到前門叫門，一撥到后門堵口。

猛听得大門上敲得“砰砰”响，“查夜、查夜”的喊声震耳朵。这群黑夜老鼠，立即象听见猫叫一样，惊炸了。那个法力无边的老道，更是惊恐，慌慌忙忙的脫法衣，拆坛場。王悅顫着声說：“別乱，打后門走！”吱呀一声拉开門

領先想溜。

“站住！”杜奎說，“你們干啥？老实說吧！”

“我們串个門，大家拉拉也不行？”王悅詭辯。

“串門摆坛場干啥？”杜奎隨着又指那个老道士問：“这是誰？”

自称能入地升天的老道，这时却定住身一样站在当地，結里結巴話也說不出口，哆哆嗦嗦腿也打顫。

“他是我的朋友，姓徐，从迁西来收柴賬的。”高凤桐代答。

“收柴賬还用戴道士帽，穿道士靴？”杜奎迫得很紧。

原来徐老道一时心慌，只脫了法衣，却忘了脫道帽道靴。馬脚一露，高凤桐再想狡辯也沒了言詞，手里还拎着口袋，只是发毛。杜奎一把夺过口袋，倒出鈔票，大喝了句：“这是干啥！”

赃证具在，高凤桐不得不說出实話。剛才买了“盘”的人，也后悔不迭，把錢都拿了回去。杜奎瞪着眼教育老道和高凤桐說：“下一回再这样装神弄鬼，哄騙錢財，要处理你們！”从这回以后，这批人果然老实一些。

如今連杜志也迷住了，两人怎不着急！开始，两人还想找杜志好好談一談，要他赶紧回头。誰知話不投机半句多，杜志这家伙恶声粗气地說：“你們管得这样宽干什么？是紅是黑，我自己清楚！”

杜奎气得八丈高。国藩說：“咱們說不了他，找領導去。”当时还未建乡，直接归区領導，两人就一五一十把情

况汇报了。杜志因此吃了一頓批評，对国藩和杜奎怀恨更深了。

一天，杜奎偵察到，杜志赶了一挂車送一个老道模样的人物上唐山了。那人鹰勾鼻子，老鼠眼睛，象哪儿见过似的。他心里一捉摸，一点不错，就是那次在高风桐家打过交手的徐老道。这个魔鬼每次来都把村里鬧得烏烟瘴气，如今杜志亲自送他上唐山，还有不搞什么阴谋的？

杜志一回家，国藩和杜奎就去找他。杜奎把火气压了又压地問：“杜志，你車上坐的什么人？”

“問这干啥？是我迁西的表舅子！”

“不对吧，我认得这人！”

“认得又怎的，大天白日走步路你都要管嗎？”杜志說着挽袖捋臂耍起蛮来。

杜奎当然不吃这一套，也跟着拉开架势。国藩一看，这样硬干不大妥当，大家都是党员，在党内会上总能弄得清楚，就劝說：“杜志，咱們自己人得說老实话。你今天的态度就不对，仔細想想，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把党的恩情全撇在脑脖后！”

两人憋着一肚子气离开了。他們全都沒有想到，杜志这时已經不是什么共产党员，而是叛党投敌的唐山飞轎队特务了。那徐老道当然不单是什么老道，他上次秘密来，已和杜志挂上鉤，杜志已供給了一些情报。这次又来，就是給杜志送来唐山特务組織发的二担多大米錢的奖金，并且鼓动他亲自去唐山接头。杜志这个无耻的叛

徒，尝到了“甜头”，心早黑了，这次去唐山，就把我八路军坚壁在松朋营一带的三屋子军装和别的军需品，全报告给敌人。这些东西，后来全部损失，杜志却因此又得到了四担多大米钱的奖金。

从这回以后，村里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混乱了。一股妖风邪气。谣言传得很多，什么“三月三，黑罗劫，狼哭鬼叫，天旋地塌，七七四十九天不见日头月亮”；什么“月儿戴草帽，南山穿灰袍，三月兵马乱，五月血灾到”；又说什么“门口挂桃符，炕头插柳枝，腋下吊红布，可以逢凶化吉”。当时村里的支部书记是吴凤孝，这人粘粘糊糊，立场不够稳。谣言一多，他已经六神无主，有时自己也迷神信鬼，炕头插起柳枝，腋下吊起红布来。国藩和杜奎对他提过几次意见，他都躲躲闪闪不作明确答复。每次开党的会议，都是一上来就吵架，杜志等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了。

刚好这时候，外地工作迫切需要人，领导上把国藩和杜奎调离了本村。这一来，杜志等人就窃取掌握了村里的大权。

二

杜志上任不久，邻近有些村庄已经进行土地改革了。这个叛徒和他的小集团，故意转移目标，把斗争矛头集中到国藩和杜奎身上。他们抓住国藩和杜奎在复杂艰苦的

抗日戰爭時期，有些工作做得比較粗糙生硬的缺點，任意加以誇大。一会儿說他們耽誤了多少多少工作，一会儿說他們貪污了多少多少公款。真凭實據却拿不出一件。為了進一步愚弄群眾，欺騙上級，他們還以大佛教道徒為骨干，煽動村里群眾，聯名到縣里去告狀。群眾不願意去，他們就威脅說：“不去就是‘擋路石’，要罰六十斤小米！”歪風邪氣，籠罩全村，渣滓滓滓全飄上來了。

看到這種情形，過去在黨領導下戰鬥過來的窮苦農民，怎能不氣憤呢！不少正直的人出來抱不平。戴寬借着趕集，有好幾次偷偷把村里的消息報告給國藩和杜奎。杜志知道了這件事，咬咬牙說：“這是老干部的‘電綫杆子’，非砍掉不可！”就叫人把戴寬捆起來，着實揍了一頓。戴寬却昂起頭說：“揍吧，舌頭長在我口里，說不說是我的權利。我知道你這小子就是不存好心！”溫自奎氣得罵街，杜志當晚找上門去說：“你不要這樣不識時，土地還沒到手呢！再不老實些，有你的苦吃！”溫自奎却是硬氣，拍拍胸脯說：“你愛怎么的就怎么的好啦！我不怕！你淨干虧心事，就不看看人家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嘛！”

不久，來了一個工作組，幫助土地改革工作。

杜志等人開始心驚肉跳坐臥不寧。但是沒有幾天，高風桐就得意忘形地对杜志說：“不怕，咱們說啥，他們信啥。訪貧問苦，訪來問去跑不了是咱們手下的一伙人，還能不給國藩和杜奎小鞋穿！”杜志听了，和他們一伙人秘密商議，要假意表現積極，騙取工作組的信任。杜志又找

个机会，向工作组何组长说：“国藩和杜奎是拦路大石头，不搬他两人，群众不答应！”何组长却给杜志碰个钉子：“咱们当前的任务是斗争地主，不是打击老干部。”

在工作组帮助下，斗地主分土地的热潮，逐渐掀起来了。贫农团成立起来了，团长是杜恩，人民法庭的法官是王荣和杜凤。逃往遵化的王家地主王维藩、王维田举家被押了回来。（贼六子和王维平、王维清再次潜逃，不知下落，留待以后算账。）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善群众生活，党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过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斗争，地主阶级的威风已不比过去，现在一经回忆诉苦，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象枯草坡上投进烈火，顷刻烧红了半边天。他们一方面划成分分土地，一方面开庭审判斗争两个地主。

这一天，审判大会开始了。

台上面坐着贫农团的委员们，一个个昂头挺胸，扬眉吐气。下面立着地主王维藩和王维田，头低垂着贴到胸脯。广场上坐着黑压压的群众，有的擦拳磨掌，有的铁绑着脸，有的在小声议论：

“两条腿的数野鸡，四条腿的数狐狸，黑心地主要数贼六子最狡猾了。可惜让他漏了网！”

“不怕，加把劲打垮‘刮民党’，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天下。‘狐狸’‘野鸡’还不是一样手到擒来！”

“狗生狗子，狼养狼崽，这两个家伙不要看他眼下装出一副可怜相，先前也一样虎口狼牙哪！”

只听啪的一声，法官王荣击起了醒堂木。一說訴苦开始，受害人一个一个跳上台去。王家大院几代的剝削賬是算不清的。有的訴說自己早先如何借了王家几十块钱，高利盘剝，总也还不清，后来几亩坡地被霸去，两間破草房又給搶去，逼得妻离子散。有的訴說自己的老爹如何給王家扛了半輩子长活，后来生了病，就被逼从长工房里赶出来，風雪天在半路上活活給冻死了。也有的妻子哭叫着要为丈夫报仇，儿女嘶喊着要为父母伸冤。口号声喊得象打雷一样。

王維藩和王維田象两只落入阱里的狼，縮成一团。

又是啪的一声，法官王荣又击起了醒堂木。他要王維藩和王維田低头认罪，交出土地和剝削財。

王維藩叩头如搗蒜，連称：“有罪，有罪！”

王維田翻起死魚眼睛，連叫：“寬恕，寬恕！”

但是他們却一点也不認賠剝削賬，一个說：“在遵化已經化得淨光，哪里还有分文！”一个說：“做生意亏本很大，只有一屁股的債！”

“不老实，吊起来！”“打死这俩狗日的！”群众的吼声山搖地动。

在群众的威力下，王維藩和王維田不得不抖抖索索，說出了几个埋藏剝削財的地点。

开过会，大家就分头去挖掘。有好几处却是空的，只挖到两处，共銀洋四十元，衣服一缸。

正当大家准备乘胜追击的当儿，杜志他們却暗里放

出冷冰冰的話語：“這簡直是‘干炸’，人家早已傾家遷移，在本村還哪有浮財！”

老貧農王榮早先要過飯，受盡地主剝削，對地主階級的仇恨很深。但他一向又好打小算盤。聽到“干炸”的謠言，心里一合計，可不是，四十元錢和一缸衣服，全村貧苦戶均攤，每戶一塊錢半個袖子都攤不上，有多大油水！他首先就消極了，貧農團其他成員有的也都不上勁了。跟地主的鬥爭就這樣半生不熟，不了了之。分配土地倒進行得比較迅速，每人平均分了一畝多地。

乘這機會，杜志他們又傳出了這樣的老話：“國藩和杜奎是攔路大石頭，非搬掉不可！”有時工作組的同志從街上走過，那一撮人還故意哄哄鬧鬧，交頭接耳。他們想盡各種辦法，包圍蒙蔽工作組。工作組何組長誤以為這是群眾對國藩和杜奎有意見，應該當面對質，分清是非。

老何一發話，杜志抓住雞毛當令箭，急急忙忙布置了打擊國藩和杜奎的準備工作。

國藩和杜奎還以為是工作調動，高高兴兴地回到村來。誰知前腳剛進門，後腳就被杜志派來的一伙人圍上了。他們吵吵嚷嚷要國藩和杜奎出來說話。國藩和杜奎認為自己身正不怕影斜，就大大方方地走出來。誰知這伙人動手就搗。杜奎一看勢頭不對，喝了聲：“你們干什么？”隨着就拉开了架勢。杜奎的力氣是有名的，那伙人覺後退幾步。但畢竟雙拳難敵四手，終被搗走了。

這天晚上，杜志的小集團開起了秘密會議。他的左

右丞相高凤桐和王悦坐在两边。按照杜志的打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两人弄死算了，但他知道关系重大，不愿自己开这个口，他的左右丞相呢，也是各怀鬼胎，都想掀鬼上吊，吊起不管。于是你推给我，我推给你，推来推去，不得结果。最后大烟鬼高凤桐想出了个借刀杀人的绝招。他说：“工作组对贫农团的话是怎说怎听，明天咱们要贫农团的法庭开庭审判。会上，咱们把国藩和杜奎的打人、贪污等罪状全往外端。国藩和杜奎一定要辩。一辩两下就会闹。一闹，咱们的人就上前揍。拣致命的地方来两下，即使当时不死，也活不过三日五日去。人多势众，谁能知道是哪个下的手……”“哈哈”，他自己先得意地笑了。

“哈哈”，三头狼同时都笑了。

杜志当晚就去找人民法庭的法官王荣，先是大叔长大叔短地捧了一顿，接着告诉他打算明天开庭审判国藩和杜奎，要他主持。王荣一向十分精明，尽管有时为自己打点小算盘，但他对国藩和杜奎的为人是了解的。要审判国藩和杜奎，他心里自然不愿意。当着杜志的面，假意应允；杜志一走，他就掂斤掂两的思摸，万一闹出事来，你杜志倒是没事人，我王荣可先把脖子放在刀刃上呢！第二天，他就哼哼唧唧躺在炕上装起病来。法官一病，这个庭自然开不成了。

国藩和杜奎被关的那间小屋，窗上都钉上了铁条，十足象个囚笼。一天早晨，当几丝阳光从窗缝中漏出来时，

杜奎又气憤地罵道：“媽的，這是些啥貨色！捆我們就這麼緊，手脚都給捆麻了。立場，還有屁的立場？”一会儿又悄悄对国藩說：“我想好了一條道。前幾天進來時，我瞧見外屋的架子上有把鏽菜刀。你只要能把我的腿上的繩子弄得松些，我就能摸出去把它搞到手。咱們割斷繩子，沖出去和他們拚了算啦。”国藩想了想說：“不好，不好，眼下不單是他們幾個人的問題，不少群眾也受他們蒙騙被他們唬住了。硬拚不是好主意。”杜奎說：“那就聽你的，可是要快想法兒，這幫傢伙早晚會下毒手的。”国藩說：“這樣的事情，上級怎能不管！再說村里還有工作組，諒他們也不敢行凶下毒手。早晚真相總會大白的，你我要緊的是挺住！”杜奎才沒話了。

果然，沒過兩天，杜志這個小集團還在密商毒害国藩和杜奎的辦法時，縣委派民運部曹部長到西鋪來了。

曹部長到村以後，正和何組長說着話，忽然外面吵吵嚷嚷進來一批人。有的嘴裏不干不淨，直罵国藩和杜奎；有的更是要耍，喊叫槍斃，槍斃……。

曹部長實在驚訝，但他還是鎮靜地問：“你們都具體說說，国藩和杜奎究竟有些啥罪狀？”

這批人是煙鬼高風桐臨時支使來的。里面盡是大佛教道徒和流氓無賴，哪有什麼頭腦。經曹部長一問，便問住了。

一個道徒硬着頭皮說：“国藩和杜奎打日本鬼子時，派担架什么的，常好瞪眼，要是不去，他們還要打人，這不

是欺負人嗎！”

另一个道徒怯懦地补充：“还有派公粮征軍鞋什么的，咱村总比別村多，这不是存心吃里扒外嗎？”

曹部长拿起笔来，一宗一宗地記下了，接着又严肃地問：“还有别的罪状嗎？”

杜志在旁又急又气，只是干瞪眼，象这样說下去，不是自己反告了自己的状嗎？可一时又想不出办法制止。又一个道徒，更不知好歹地补充了句：“还有，打日本鬼子时，王国藩和杜奎常在村头村尾埋地雷，这不是有意糟害人嗎？”

曹部长听到这里，一拍桌子說：“就凭这样的所謂罪状，要捆人、押人、枪毙人嗎？真是岂有此理！陷害人！”

这一下，杜志傻眼了。他所驅使的这批笨蛋，搬起石头倒砸了自己的脚。

“人先放出来再說！”曹部长命令道。

請願的道徒，一看气势不对，一个个溜了。

杜志只好把国藩和杜奎放了出来。

第二天，在曹部长主持下，党内开了一个會議。这时杜志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領导上还认为这是干部内部的糾紛，对他严重的違法乱紀、两面三刀的反革命罪行也就認識不够。会上除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評以外，还給了他一个警告处分。另外，也批評了村支部的軟弱和缺乏原則性。

三

轉眼到了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國藩和杜奎不在村里，工作組也早已離開了，杜志這些壞傢伙為所欲為，村里的黑雲蓋得更嚴了。謠言怪語就象成群的黑老鴿，天天張開翅膀飛東飛西。地主、富農、流氓、大煙鬼、大佛教頭子等等社會渣滓，全飄了起來，有的還串門上戶，來回走動。這時，國藩和杜奎正回家來，看到這種情形，心象刀絞一樣痛。兩人在一起談論，杜奎說：“怎麼有些人都上南山溝去，你也撿糞他也撿糞，五黃六月丟下地里活計，去撿幾個馱糞蛋干啥？這些王八蛋一定在南山溝搞啥鬼勾當！”國藩沉痛地說：“我也在這樣想。咱們前些日子消極了是不對的。村里的事情黨員不管，誰管？咱們入黨時，不是表示過願意扛起扁担跟黨走到天盡頭嗎？現在中途放下，算啥名堂，還是要干！”杜奎說：“你這話算是說到我心里啦，咱們明天也上南山溝！”

第二天，趁著清晨霧氣，兩人借著砍柴也上南山了。這里每一塊岩石，杜奎都是踢蹬慣了的。兩人撿了個合適的林子，一面砍柴一面留心了望。約摸七八點鐘，見一個人探頭探腦上來了，看樣子象是屈富。等到走近了，伏在路邊的杜奎一下站起來，迎上去說：“屈富，你上山干啥？”屈富心虛胆怯地說：“我，我找個人！不，我，我也想砍點柴！”杜奎連嚥吞都不讓他打一個，立即迫緊問道：

“砍柴为什么不带扁担、绳子、镰刀？嘿，你还当我不知道吗？走，咱们到林子里说话！”屈富想反抗，但一看杜奎手里那把白亮亮的镰刀，手脚早软了，只好听从着走进林子里。

屈富原是个被骗入了大佛教的胆小人，经过国藩和杜奎说理教育，对他做了好一阵工作，他才抖抖索索说开了实话。

原来前些日子，由杜志主持开了个圆桌会议，共十八个人，阴谋参加大佛教头子张丰春、徐老道等人策划的暴动。日期定在五月十五。看西南方火起，就是讯号。说是有佛爷保佑，刀枪不入。先杀老干部，再杀无用的老头、小孩。这会儿打仗用的钩连枪，包头的黄布，跑路的双脸鞋都已经分头准备好了。

国藩和杜奎又问他哪十八个人，屈富也一个一个说出来，并且说：“这个头，当然是杜志。但他不愿挂这个名，就用张纸在中間画上太极图，四周分成十八小格，每格填上一个人名字，这样谁都是头，谁也都不是头了，这就是圆桌会议！现在他们正在三道沟子开会哩，我是被派出来放哨的……”

国藩和杜奎见他都坦白了，就安慰他说：“你回去啥都别说，还象往常一样。你的问题，我们将来一定帮你解决。”

屈富走后，两人飞快下山，把这个情况向区里报告了。区里又连忙向县上报告。县里已经接到好几次类似

的报告，就立即通知公安部队，加强调查工作，积极准备扑灭这次叛乱。

誰知这批特务匪徒嗅到了我人民群众和政府的警觉，突然提前两天，于五月十三日半夜发动了叛乱。叛乱的中心在离四十里鋪約十二三里的高各庄。

自称“皇上”的匪首張作春穿起了龙袍，“娘娘”宋金賢象核桃皮一样的老臉上填滿了鉛粉，两个特大的金耳环晃晃悠悠。軍师徐老道开始念咒作法。小屋里烛光摇曳，一片阴森。

紅笔先生捧上了“生死簿”，上面开列的是积极工作的干部和貧农团負責人的名单。这伙妄想地主阶级重新复辟的匪徒，把他們的刻骨仇恨，全傾泻在这張名单上了。“皇上”用鸡爪一样的手指，拿起“御笔”重重的在上面勾了一紅道，算是“宣判”。随着，軍师的老鼠眼睛里，立即射出了吃人的凶光：“杀！杀‘恶人’就是‘行善’，我老祖法力无边，凡善男信女，刀枪不入。子时‘起义’，寅时祭旗，天明总攻……”

下面跪着的一批腰纏黃布，脚穿双臉鞋的道徒骨干，連連叩头称是。

随着嘩的一声，这伙匪徒手执鋼刀、鋤刀、鈎連枪，窜出小屋，紛紛向指定的对象圍攻去了。

那一天黎明，西南方忽然冲天火起。杜志这个无耻的叛徒，立刻心情緊張起来。他是又高兴又混乱。高兴的是他們的人动手了，要是和反扑到石門的国民党军队

一会合，天不是馬上就变了嗎？混乱的是叛乱忽然提前，自己又沒有接到通知，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村子里这几天忽然出現了陌生的面孔，象在背后探察自己的行动；国藩和杜奎又突然双双外出，弄不清什么原因。这样反过来复过去一考虑，他觉得还是不过早暴露的好。他一面派人飞快去打探，一面秘密召集他的小集团會議。誰知在这样紧要关头，他那左右丞相的方寸也乱了，一会儿說下手好，一会儿又說不下手好。正在迟疑不决，打探的人回来了。他唾沫四濺地讲述叛乱的情况：

“嘿，咱們的人下手了。今早五更天摺来高各庄貧农团主任两口子，那女的还是妇女主任，在山沟里一块儿砍了祭的旗。現在房子都燒了二三百間，人也砍了二三百口了。他媽的，有些人硬是不怕死，不願跟咱們走。有个妇女抱着小孩象豹子般向咱們撞来。咱們立即在她身上錘了七八个血窟窿，夺过小孩，你一条腿我一条腿，一扯成了两半……哈哈，人家說咱們杀人眼紅，成了紅眼队了。哈哈……”这个无耻的家伙，把他們殘暴的血腥屠杀，当作一件有趣的新聞来描写。

这一下，大烟鬼高凤桐勁头上来了，他主張馬上动手；王悅可还有点三心两意。杜志呢，眉头鎖起疙瘩，他是在考虑：国藩和杜奎已經跑了，杀了旁的人有点不解气，再說，万一鬧不成，那就……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商量不出个結果。

那边，这伙叛乱的匪徒，燒毀了高各庄、大安乐庄等

大小十多个村子后，威胁着一批落后的群众，向西北方向疾进，企图绕道奔袭遵化。在牛家岭，遭到了我人民解放军某连的狙击。

开始时，我军还只是朝天开枪，配合喊话，要这伙匪徒迷途知返。谁知这样一来，反给阴险毒辣的徐老道钻了空子，满以为他那老祖的法力真个能避枪御弹，就嗾使一批反动骨干不要命的向我军扑来。三五个正在喊话的战士全被砍翻。不得已，我军只得开枪正面射击，匪徒们才纷纷应声倒地。双方就在牛家岭对峙起来。这时，邻近各村的民兵，也都纷纷奉命参战，迅速把这伙匪徒团团围住。

匪徒们占据了五道庙，还企图作最后挣扎。“皇上”的龙袍已扯得七零八碎，“娘娘”的粉脸已涂满硝烟，金耳环簌簌颤抖；大臣们个个丧魂落魄。只有军师徐老道再次披头散发，拈香念咒，要手下一批残余的骨干上前卖命。

快中午时，杜志派去打探的人又回来了。这回，一进门头搭拉着，十分沮丧：

“坏了，坏了，咱们完蛋了，在牛家岭被解放军包围住，机枪象爆豆子一样。上去一对，倒下一双。他妈的，什么刀枪不入，佛爷保佑，全是骗人的鬼话。徐老道已经上吊呜呼了，‘皇上’、‘娘娘’、‘大臣’，全都被俘了。他妈的，我可不上这个当了……”

这个消息就象一声闷雷，打得魔鬼们赶紧又披上画皮。王悦跳下炕穿起鞋就想溜；高凤桐瞪起死鱼眼睛失

去了主意。杜志惶惶失措地說：“赶快把准备好的刀枪、黄布这些东西埋藏起来，誰也不准暴露，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准暴露！大家快回去！”

杜志等自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瞞过人民和政府的眼晴。他們又打錯了主意。国藩和杜奎协同公安人員早把这伙人的一举一动都調查清了。經過研究，隔了几天，終于依法把杜志和高凤桐两人逮捕，而且毫不費力地从他們家里抄出了埋藏的鋼刀和黄布等东西。赃证俱在，再无話說，杜志等不得不低下头来。

后来，从这次叛乱匪首之一徐老道的案子里，終于查出了杜志的老根——老牌的敌飞轎队派遣特务。

处决了这次叛乱匪首張作春、宋金賢、娄滿义、王万宗等七人以后，經過上級批准，杜志这个无耻的叛徒，也被押回四十里鋪，經過公审，当众枪决了。

头頂的烏云終于驅散了，路上的絆脚石終于踢开了。四十里鋪的人民終于擦亮了眼睛，分清了誰是誰非，在党的领导下重新迈上康庄大道。国藩和杜奎再次担任了村皇的干部。国藩是村长，杜奎是治保主任。

三条驴腿

陈青山

一九五二年，四十里鋪一带雨水調順，岁丰年收。

秋收后的一天傍晚，王国藩和杜奎等正在村西头閑談，貧农王林走过來說：“你們都听說了嗎，咱区在东小寨和王老庄办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鬧了个大丰收，比咱庄的互助組可强多啦。”

王林这一嚷嚷，立即引来了一堆人。大家紛紛議論农业社的长短。說长的认为既然人家办好了，咱們要办，也一定能办好，人多力量大嘛。說短的进行认为亲兄弟还鬧分家呐，这許多人合在一起，哪有个好。

国藩和杜奎两人悄悄地念叨。杜奎說：“依我看，这是一条正道。土改才三四年，咱村不少人家卖地出屋，擋都擋不住。新发戶却买地造房，胃口越来越大。你沒听白馬峪几家富裕戶說：‘再过几年，把四十里鋪那些穷小子的炕头也要买过来！’口气多大！多气人！看来只有大家把土地合在一起，集体劳动，互济互助，才能一块儿走富裕的路。”国藩說：“农业社比互助組强，这是肯定的。”

区委在一次讲话里明明白白地说过，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当前的互助合作运动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临时互助组，一种是常年互助组，还有一种是合作社。就象爬阶梯一样，一步比一步高，一级比一级好。”

杜奎立忙说：“那咱们为什么不爬得高些呢？”

国藩说：“嘿，事情没那么容易。东小寨和王老庄试办的结果虽也证明这一点，但拿咱村来说，能一下办得起来吗？”

杜奎说：“这不是明摆的嘛，咱村有些互助组只挂个空名，闲的时候互助，忙的时候倒单干；就是好点的互助组，问题也不少，齐工找米，找米找去，还不是有驴工牛工的人占便宜，穷苦人照样没办法吗？现在群众既然也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办不起来？”

国藩说：“好，那咱们和支部书记吴凤孝说说，召开个党员会研究研究看怎么样？”

在党员会上，国藩和杜奎把意见一谈，大家举手都赞成，而且当场表示愿意参加。会后又串连了十多户群众，共二十七户，写了申请书，推定国藩和杜奎到区里去联系。

区里考虑到农业社还在试办阶段，经验不够丰富，开始时不大同意。后来看到国藩和杜奎等决心大，劲头足，也就批准了。

国藩高高兴兴地拿了批准书回到村里。当晚又召开了党员会。可是一上来却是个冷场，闷了约有半顿饭的

工夫，也不見有人開頭。杜奎又啟發了一次，溫化之才開口說：

“一個共產黨員嘛，任何工作都應當帶頭，辦社當然更應該做群眾的模範。不過要講家庭願意呀，我辦不到。我那個老婆算沒治，我說了半天，她也沒吐活口。只好等一年再說。唉！這有啥法哩！”

大伙一看他打了退堂鼓，立刻把目光轉到國藩和杜奎身上，看他倆怎樣辦。國藩自然感到很驚訝，但他當時沒表示態度；杜奎可沉不住氣了：

“你不是說家庭沒問題了嗎？怎麼這陣又這樣說？一個共產黨員于工作還得全依老婆，她認識不清，你可以幫助她嘛，難道……”

“可她死活不干，我也不能總生氣呀，”老溫分辨說，“再說這入社也不是非一個日子不可，我等一年還不中嗎？”

他倆這一頂嘴不要緊，討論的問題却因此都僵住了。接着好幾個人發言，也都是吞吞吐吐，搖擺不定。國藩見這樣情形，就暗示支書吳鳳孝掌握一下會場，吳鳳孝哼了聲說：

“既然溫化之提出家庭不願意，我看咱們都回家商量商量可以不？”

他這一說，有的人果然拍拍屁股就要走了。

國藩一看他這樣主持會議，心里涼了半截，又沒有旁的辦法，只好讓大家散了。

屋里只剩下国藩杜奎他俩。国藩虽然心里不痛快，但没表露出来，杜奎却脸朝北墙直生闷气。国藩拿出从县委拿来的那张办社批准书，“啪”一下放在炕上说：

“这回完了，闹了个猫咬尿泡——空欢喜，大家都不入社，我只好把这批准书再送回去啦。”

“怎么？”杜奎急转回身，“送回去？不能！上级批准啦，谁爱入不入，都不入光咱俩也得办社。”

“好，我当主任你当社员。”国藩逗了他一句，又说，“你总犯这爱上火的老毛病，不论啥工作，越到节骨眼上，越得沉住气。”

“真气人呀，上次会上说的很好，这阵又不算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样，人家非党员该怎么办？”

“我倒有个药方？”

“什么药方？”

“区委批准咱们办社时，赵书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示，合作化道路是几千年来未走过的道路，不仅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而且有严重的阶级斗争，一定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拿咱们这儿来说，西铺是一个情况很复杂的村子，你们办社一定要注意这两点，要坚决依靠贫雇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你想，这不就是药方？”

“对呀，这倒说得在理，那咱们就这么办。”

“这次群众报名的有多少户？”

“十来户哇。”

“都是誰家？”

“有王林，有王榮、王生哥倆，還有邵慶林、邵慶昌弟兄，還有……”王國藩點點頭，說：

“這就看出來了，這幾個不是要過飯的就是扛過長活的，是農村真正的無產階級——貧雇農。老溫雖然是黨員，又是轉業軍人，可他家經濟成分已在上升，小日子過得火紅，再加上他老婆自私心重，緊盯住王悅他們幾戶的大牲口大車不放，對於入社怎麼會痛快呢？吳鳳孝雖然過去也受過苦，是地道莊稼人，但這個‘老好人’的搖擺勁你我在杜志事件中還看得不夠嗎？後來他雖然也作過沉痛的檢討，但是思想意識的徹底轉變，不是三日兩日的事。你說這些原因對不對？”

杜奎立時眉眼中閃出了笑紋，說：“對，有道理，我看咱就找這些過去要飯的和扛長活的戶。”

“對，咱就這麼辦，真心想入社的咱就動員，對於二心不定的人先不用拉扯他。這回我在區委會，趙書記和李書記就想到了這點，他們說：‘窮棒子嘛，有的是窮志氣，要辦社就非團結他們不可。’”

“對對……”杜奎極力贊成。

正在這時，黨員梁近田和吳秀英腳前腳後回轉來了。

杜奎問：“你們不是走了嗎，怎又回來？”梁近田說：“我考慮過了，我是黨員要堅決聽黨的話，入社！”吳秀英說：“我也考慮過了，我是黨員，丈夫還在朝鮮打美國鬼子，我聽黨的話，入社！”

国藩說：“好、好！来！咱們就一起来研究一下怎么办社的事。”

二

四人分头进行了几天工作。已經串連了二十来戶入社的人，才知道这次風波一方面固然是有些人自己动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王悅他們挑撥才引起的。王悅这个家伙，原来是杜志反革命集团中的一个角色，杜志、高凤桐一被捕，他立即当众哭哭啼啼的檢討，說自己被騙，要痛改前非。党和人民当时看他已认了錯，同时犯罪情节也輕些，因此寬大了他。誰知經過这几年，他并未悔改，这回糾集了一批富裕中农，在暗地里使坏。他凭着家里有几头好牲口，一会儿說要和这个合伙搞互助，一会儿又說要和那个合伙搞互助。这两天正在紧拉老貧农王荣，企图挖掉农业社的牆脚。

杜奎知道了这情况，就对国藩說：“我去找王荣，把他拉住，別让他上当。”国藩說：“好！”杜奎因此就找到了王荣，先問：“大哥，你入社的主意拿定了嗎？”

王荣哼了一声沒言語，杜奎又追問了几声，他才吞吞吐吐的說：“这……这入社么，我打算明年再說。”

杜奎立时觉得很心煩，差一点又要发火，但一想到前天黨員們研究时提出要耐心动員的話，才緩和了下口气又問：

“你不入社，还想入互助组不？”

“互助组么，好了就入。”

“社若比互助组好呢？”

“那——就入社。”

杜奎抓住这话头，接着说：“大哥，入社的好处你也听过了，你说共产党哪个政策给过你亏吃，为啥你对入社拉心拉肝的？”

王荣抬头看了看杜奎的脸，觉得这话挺硬，低头又沉了半袋烟的工夫，才说：“这农业社的好处我都听了，可我就是今年不入。”

杜奎虽然性子暴，但心眼很活，他稍一考虑就提高嗓门：“告诉你，农业社比互助组有优先权，你明白不明白？”

“啥叫优先权？”

“比方说，明年假使闹了灾，收成不好，政府发救济粮的时候，就先发给农业社，剩下才是互助组，再剩下才是单干户，这就叫做优先权。”杜奎看王荣对这个办法很注意，便继续说：“过去那年月咱村哪年不领救济粮？就拿你说吧，领的还少吗？你若是不入社……嗯，你考虑考虑吧。”

王荣这几天对入社的宣传听的真不少，总没有听进去。杜奎这个“优先权”的说法，却一下就打中了他的病根子。这救济粮对四十里铺村的很多人都有极深的印象。前几年差不多每逢春冬政府都要进行救济，只是近两年随着互助组的发展，生产提高了，救济才逐渐减少

了。前几次发救济粮的时候，王荣都是重点。所以他立时就七上八下的打起了主意。想想入社再想想救济粮，想想救济粮又想想入社，直想得满脸通红，才慢吞吞地说：

“我还是——入社。”说完扭过脸狠劲的装起烟来。

杜奎见王荣入社的心情很不自然，就又和颜悦色的解释说：“大哥，话又说回来，入社的优先权不光是救济粮的问题，真若受了灾，人们生活没办法，不入社的政府也一样救济。刚才我说入社的优先权主要是生产方面。比方说供销社来了大骡大马，或是胶皮大车，当然也先卖给农业社，因为我们农业社是集体所有，人多力量大；互助组是个人所有，就是给他大胶皮车，谁家买的起？”

王荣老汉是个很有经验的庄稼人，他最知道大牲口好车对生产的作用，听了杜奎后尾这段解释，入社的心情才算定了，咧着大嘴一乐，点了点头。杜奎也长出了一口气，站起来告辞走开了。他一气找到国藩，把经过情形一五一十说了，刚说完“优先权”，国藩愣了下，说：“可不能这样办呀，这叫强迫命令啊！”

“嗨！你先别急，我还有下回分解呢！”接着就又把如何解释的话也说了。两人不由相对大笑起来。笑声刚止，党员梁近田进来了，他先汇报了下各户入社的情况，末了说：“我看差不多了，共二十来户，咱就成立吧。”

国藩看了看杜奎：“怎么样，明天咱就成立？”他们三个人都同意了。

三

第二天晚上，天气很好，冰盘般的月亮悄悄的爬上了长峪山顶。国藩和杜奎等党员在街上悄声细语的商量怎样开好今晚的会。有人担心说：“别人都好办，就怕王荣不到场。”杜奎说：“咱们按门挨户找，还怕他不来？”国藩考虑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咱们就到王荣家里去开会！”

几个人都愣住了。有的说：“就他思想有问题，为啥偏到他家去开呢？”还有的说：“在他眼皮底下开会会有多别扭。”国藩却笑笑说：

“若在别处开，他可能真不参加；若到他家去开，不但他到场，他们一家人都等于参加了会。使他一家人都看到大伙入社的火热劲头，不比光讲入社的大道理强得多？王悦他们正在他身上打主意，他正骑在墙头上，心往两边晃，用大伙的火热劲头把他拽过来不就妥了吗？”

人们都表示同意，立即分头找人去了。

工夫不大，王荣的东屋里就挤了个满满腾腾。炕头那个好地方自然是妇女，老头们也按旧规坐在炕沿上。其余的人大部分蹲在地上。炕西头放着王荣他家吃饭用的桌子，桌上放盏煤油灯，灯火还没个豆粒大，被风吹的只晃悠。杜奎小心谨慎的端起灯，查看了下人数说：

“差不离到齐了，四十三个人，二十一户，开会吧。”

国藩一面答应，一面端詳开会的人們。他轉圈把大伙都仔細看过之后，又往炕头上一瞧，正和王荣老伴打了个照面。她沉着臉翻了兩眼，又把臉扭过去了。国藩故意說：“大嬸，头次在你們家开社員会，給大伙烧点水喝好不好？”

王荣老伴皺了皺鼻子，說：“天挺黑，灯不亮，黑糊糊的沒法燒！”

国藩說：“大嬸不要忙，等把社办好，将来給你按上电灯。”

“电灯？我沒那份命！”

国藩又說：“命，随思想走，思想好了命就好哇。”逗的滿屋人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一笑，自然就想起了王荣。杜奎用灯屋里屋外的找了找，才发现王荣在外堂屋摸黑蹲着，就說：

“大哥，你是房东，快請到屋里。”

王荣老汉本来就有点情緒，立时沒好气的說：“你們不知道这屋窄，还偏在这开会，真是……我在这挺好！”

杜奎也乐着說：“哎哟，大哥不用着急，等社办好了給你盖新房。”

“新房？我沒那份福！”

杜奎也学着剛才国藩的說法：“福，也随着思想走，思想好了福就好。”这下惹的人們又大笑了一陣。最后还是国藩宣布开会，才算靜了下来。

国藩首先把成立农业社的大体意思讲了讲，接着說：

“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办农业社必须强调自愿的原则，不但入社自愿，就是看社不好，秋后还可退出，决不强迫。我们只有把社的生产搞好了，使社员的收入逐渐增加了，才能吸引广大农民走这条道路……”说到这里，他有意针对王荣的思想补了几句：“有的人到现在还二心不定，这说明他对入社还不清楚，刚才我不说了么，你看社不好，秋后还可以退……”

王荣在外堂屋听屋里讲话是有些困难，但末后这句他听真了，站起来往前挪了两步，用肩膀撞了撞旁边一位老头，忙问：“国藩说秋后可以入社，是真的吗？”

这位老头只是点了点头，没理睬他。王林老汉一旁插嘴说：“别说秋后，就下去三年我也不入社。这些年我就穷，办社还能办出两个穷来？”王荣一听他话中带刺，就小声说：“我问问都不中吗？”

国藩一听他俩嘀咕起来，就顺便让大伙都议论议论。这一来，大家都大声说开了。有的说这，有的说那，不过大体的意思还都是决心办社。国藩一看有门，忙叫大伙安静下来，说：

“咱们按过去的老办法——喊个口号就算表决，同意不？”大伙都说同意。他于是大声喊：“大伙对入社同意吗？”

“同意！”声音象打雷一样。这样农业社就算正式成立了。

国藩掏出笔记本叫大家报一下土地和牲口农具。这

下，又沒人吱聲了，沉了半天，一位老头擠上前來，說：“這二十多家的家底不都在你倆心里裝着嗎？往本上一寫不就得了嗎？”

王榮生怕有的隱瞞了啥的，忙抬頭說：“還是各戶報一報吧，叫大伙都听听誰有多少？”

大家採納了這個意見，就報起來了。報一分地國藩往本上記一分，一邊記，一邊算。報完了，國藩宣布土地總數是二百三十畝，因為各戶都沒有大農具，就開始登記牲口。進行到這項，又沒人言聲了。國藩低頭看了看大伙，不由一樂，自言自語地說：“唉！難怪不發言哪，哪一戶有整個牲口的！”又說：

“大伙可能認為自個的牲口少，沒法報，這不礙事，有多少，報多少嘛，大伙湊在一起，不就多了嗎？”

被他這麼一說，哄的樂了一陣。接着佟春說：“我們六家伙養一頭驢。”

杜春說：“我們是四家伙養的。”

范玉林說：“我們那驢股多，是八家。”

杜亮說：“我們那瘦驢是五家的。”國藩認為報完了，便放下筆，想算一下總數，剛一低頭，見溫自禮一旁只撓腦袋，一想他還有驢股，忙問：“溫自禮，你不是也有驢股嗎？”

“我那驢股比別人的多，我該幾分之幾哩？”

“唉！你也按剛才人家那樣報嘛，為啥還要來個百分比呢？”

溫自礼說：“我那驴是十二家养的，十二天該我使喚一天，这叫百分之几的股？……”

結果他还是来了个百分比。屋里屋外嘩的大笑起来。有人一边拍打着他，一边說：“你真是越不識数越往賬眼上钻。”国藩拍額算了下，說：“你們五家这驴股加在一起，还不够一个整驴，这个賬我也算不上来了。”

人們一听，又鬧騰了一陣，几位不爱鬧的老头，心急的說：“你別跟溫自礼学，按咱們算驴腿的老办法算得啦。”

国藩又算了算說：“若按驴腿……是三条多一点！”

杜奎說：“哎！多麻煩，前勾后抹，就算三条驴腿吧。”

三条驴腿，人們都觉得挺新鮮，今天都提起了精神，紛紛議論起来。只有王荣老汉，低着头，“叭嗒叭嗒”抽着烟，說：“哼，就这么个社呀！还不如原先我們那互助組哩，我們那是两头牛两头驴。”

杜奎一听，赶紧接上說：“大哥，你在那中农組里占得了啥便宜？还不是用人工换点牲口用。咱們虽然驴腿少，可是人腿不少哇。‘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生产一样能够搞好。”人們觉得杜奎說得有理，王荣老汉也沒的話說了。

接着，国藩叫大家安靜下来說：“一个社要有領導，現在咱們开始选正副主任。”邵庆林和邵庆昌两个老头几乎同时說：“还选啥，就是国藩和杜奎两人最合适。”

人們嘩啦一陣掌声，都同意他俩。結果是国藩的主

任，杜奎的副主任，又选了妇女副主任吳秀英。人們鼓掌欢迎，他們三人坐到了桌子跟前。熱鬧过后，国藩說：“主任好歹的算选出来了，按人家东小寨社的章程，还得选一名會計，希望大家象剛才那样热烈痛快的选！”

他要求痛快，結果还是不痛快。沉的时候不短了，还是一位老头先开口問：“这會計都是管啥的？啥样条件合适？”接着又有个人問：“从打日本鬼子那时候起，咱村选过沒数的干部，就是會計这个詞沒听說过。叫人咋个提法？”

国藩猛然意識到自己交代的不清，不由失笑了，就补充說：“对，对，怪我沒和大伙說明白，这會計就是专管社的賬目錢財的，大家就按这个条件提吧！”

“管賬不是叫先生么？怎么叫‘快計’？”又一个人問。

杜奎說：“你說的那是老一套，新事得按新办法，會計这是新詞。”

国藩說：“先生也好，會計也好，反正管理賬目錢財，得有文化，就按这个条件选吧！”

會計的作用，大家弄明白了，可是一听說要选个有文化的人，又把大家难坏了。这二十一户里，誰有文化呢？每个人从小孩知事的时候起，就天天忙着卖命糊嘴，哪来的時間念书！就算有時間，又哪来的錢上学呀！大家扳过来，数过去，想了半天，也沒想出个合适的人来。

正在为难，国藩忽然提議說：“大伙看佟启怎么样？”

人們好奇怪，佟启还没有入社，怎么能当社的會計

呢？大家正惊疑不定，国藩笑着解释說：

“我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因此，昨天我已经同他提过了这事，今晚，因为他家里有病人没顾上来参加会。大家若同意的話，我們就去找他来。”

人們一听都表示欢迎。不大会佟启就被找来了。一进門人們先鼓了一陣掌。佟启紅着精瘦的小臉坐在桌子对面，腼腆地說：

“我干不了，大伙还不知道我只念过两冬半书，哪能拿起笔来了呢！”

“矮子里拔將軍，拔来拔去还不就是你！”

“干得了，念过两冬半书，在咱們这里还不就是个秀才！”

“行，干吧，小伙子，誰不知道你有一股钻勁！”

大家七嘴八舌都說佟启这行，那行。佟启見推辞不了，只得搬出实际困难：

“大伙光看我认几个字不中，我不会写洋字碼，怎么能写會計賬呢？”

“你都会写啥样字碼呀？”几个老头問。

“那是老式苏州碼！”佟启咂着嘴說，“人家會計賬得橫写，老苏州碼可不能橫写呀！”

杜奎着急地說：“我們三条驴腿能种地，老苏州碼就不能写賬？你先甭愁橫写豎写，反正好心不如淡墨，写个啥样算啥样。”

大伙也都你一言我一語的鼓励佟启，直到他勉勉强

强的任了职，才散了。

四

社成立的第二天，他们就鼓起劲来搞生产。国藩和杜奎分头带领着人们上了南山坡，凿石头，捣坝基，整理梯田。队伍拉出一长溜，村里全震动了。

北风天，阴坡排满冰碴，干活的人们却热得出汗。国藩正敞开短褂刨地，猛抬头，见远处移过来一个小黑点。

小黑点逐渐变大，走近来，原来是村里的孤儿戴存。他黄瘦黄瘦的，身上穿着一件破襟断袖的单衣，蓬着头，赤着脚。国藩一看见他，立刻就想起他那凄惨的遭遇。土改那年，他家分了十多亩地，和别人一样过上了翻身喜悦的日子。谁知第二年夏天，他父亲先传染上疫病死了；隔了三个月，他母亲又去世了。留下他和四个妹妹。那时节，各家各户都是单干着，穷叔伯们谁有力量能帮助这一大群孤儿孤女过日子呢！他含着眼泪卖了地，当了房，还了旧债，埋葬了双亲；含着眼泪送大妹妹去当童养媳；含着眼泪把三个小妹妹全送了人。他自己也就成了流浪儿。这中间，国藩和杜奎他们虽然帮过不少忙，但也只能解解一时眼前之急，顾不了他长年生活。后来他流浪到遵化城里，给一家饭馆里当了小堂倌。不久，主家嫌他瘦小，挑不动水，还常打碎碗盆，把他辞退了。他生活无门，又流浪回来了。

戴存走到跟前，国藩問了問他最近的情况，他骨嚙着圓眼珠問：“大叔，你們这是干啥？”

“我們剛成立了农业社，大伙一起干活儿。”

戴存迟迟疑疑地又問：“我能加入嗎？”

“我說能。可是这样的事情得大伙討論。”

“大叔你說能就中。大伙儿一起干活就是痛快！”說着他也在一旁搬起石头来。国藩叫他歇歇，他都不听。可是干了一会儿又不見了。

休息的时候，王生坐在一棵老楊树下抽烟。只听树上索索一陣响，飄下几根枯枝来。他一惊：今天的老鴉也怪，叼了枯枝倒送給我来了。又是索索索一陣响，忽然一大把枯枝潑头盖臉打下来。他立即跳了起来，手搭凉篷往上瞧。眼睛不好，只模模糊糊看見一个小孩在树上爬。“誰呀？”“我！”听声音是孤儿戴存。

“小戴，快下来吧，你这是干啥？”

“二叔！树上有个大喜鵲窩，我把它拆下来，好生火！”

“快下来吧，这不是玩的！”厚道怕事的王生心头怦怦跳。

“不怕的，二叔，我这就下来！”說下来，其实还是不下来。这个纵慣了野性的孤儿，把脚勾在一个斜出去的樅杈上，喊了句：“二叔，你看！”忽然双手一張，整个身子就悬空倒挂起来。樅杈不太粗，上下直晃悠，身子也跟着晃悠。

“唷！”王生吓得惊叫起来，“下来，下来！……”

“不怕的！”孤儿还是不忙不慌，只见他一个转身，象猴子般轻捷地抓住了树干，然后“吱溜”一声，从树上滑下地来。

“二叔，刚才那个倒挂叫‘金钩挂玉’，那个吱溜，叫‘长虫脱皮’，你知道吗？”

王生早已吓出一身冷汗，连说：“知道，知道，我知道你早晚要脱层皮。”

这时国藩走过来，听说了这件事，把戴存着实教育了一顿。可是这个孤儿，又象听又不象听，弯弯腰拣他的枯树枝去了。

中午，国藩把戴存领到自己家里吃了饭，又给他找来一件破棉衣和一双鞋，还亲自给他的鞋上钉上鞋带。

晚饭后，他就召集社员开会，讨论戴存入社问题。大部分社员都同意。他们说：“咱们组织起来就是为了大家富裕，这样一个孤儿，农业社不帮助谁帮助！”也有个别社员说：“咱们穷，要过饭，可是至少还有几亩薄地呀！这个孤儿有啥呢！”有不想收留的意思。最后经过国藩和杜奎的说服，个别社员也转变了态度，大家一致表示，穷帮穷，水帮水，一定要帮助这个孤儿成家立业。

接着，有人反映情况说：“现在村里有些人正在说咱们农业社的坏话。什么‘这群领救济粮和寒衣的骨干凑在一起，早晚得穷散架了！’‘浑水里的泥鳅，反正变不了龙！’”

杜奎气虎虎地說：“你們不用提名，我也知道說這些話的是誰。下午我从街口过，王悅那个老狐狸故意冲我的脊背說：‘穷棒子社就是办上三年，生产要是赶上他了，他把眼珠子樞下来用脚踩个泡。’”

“他有几个眼珠子？”国藩說，“他說這些話倒不怕，就是咱們眼下困难多，需要想法一个一个地解决。只要把社办好了，这些怪話自然沒有人听它了。”

散了会，几名党员留下来，一面分析情况，一面想具体办法。杜奎最后提議說：“我看咱这社在村里办不了啦。”

大家被他說楞了，都不知這話是啥意思。

国藩一乐說：“难道办社还能搬到外村去打游击？”

他又把大家都說笑了。杜奎也乐着解釋：“我說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把人們組織起来去打柴。根据过去的經驗，人們一进山就和部队一样，不但听不見村里一些閑言碎語，还能集中教育。打上个把月的柴，不但增加了收入，还能把大家的思想提高了。只要咱們思想提高了，錢也有了，他們說啥也不怕。”

大家立时兴奋的喊了几个“好”。接着又研究了动員和准备工作，第三天清晨，杜奎就領着十八名好劳力进山去了。

打柴創業

陈青山

人們上山打柴那天，正赶上刮挺硬挺硬的西北風。路旁的枯枝呼呼直摆，山上的落叶沙沙乱飞。人們的破棉衣被北風一吹，挖骨的冷，很多人捂着耳朵避着風向，里趔外趔的走着。杜奎虽然冻的拱着肩直吸冷气，但他看大家走的这样慢，便想：离打柴的王寺峪还有四十多里，象这样慢磨，赶黑怎能到？再說有人正笑話我們穷棒子社，遇上他們显得多不帶勁哪……想到这，就挺起了腰板，紧了紧行李带子，揮手鼓动說：“大伙精神点，越快走越不冷！”又向几个小伙子使了个眼神：“誰先到給誰热炕头……”說完，甩开两条长腿，跑到了大家的最前面。

大家被他这么一鼓动，果然活跃起来了。好动的小伙子們你一言我一語的互相追赶起来。老头們被这群欢蹦乱跳的年青人一带，也就不得不加快脚步。大家这么一鬧騰，就誰也不觉得冷了。沒走上十里路，每个人的前額上都渗出了汗珠，眉毛上和胡子上也冻結成一层厚厚的白霜，乍看好象一支老头队。就这样，晌午剛歪，赶到了王寺峪。

他們到这里来打柴，是杜奎通过他姐姐家联系好的。一进院，杜奎便宣布：“吳秀英要給大伙做飯和縫补衣服，就和我姐姐住一个屋，剩下咱們十八个男人，往四个屋分住着。”

人們因为剛才紧赶慢赶出了一身汗，乍一停下来，周身发冷，都巴不得到屋里暖和暖和，听杜奎一宣布，很多人抄起扁担往外就走。王生他們几个老头却站着不动。杜奎以为他們想就地住这个院，正想給他們去安置，王生說話了：“十八个人共四床被，住四个屋中嗎？我們这沒被的跟誰呀？”这一点被，杜奎心里一下明白过来，歉意地笑着喊：“大家站住，回来重新分配房子。”

杜奎办事一向周到，沒想到这回却疏忽了。二十三戶社員家里，哪家不是全家伙盖一床被子。这四床被子，还是临来时紧倒騰慢倒騰才倒騰出来的呢！他又笑了笑，高声对大家說：“咱們一共四条被子，住四个屋不行，住两个屋吧，挤着点暖和，大伙說中不中？”“中！咱們打了柴，把炕燒得热乎乎的，还頂被子盖呢！”大伙沒駁回都同意了。

杜奎立时分出九个人上了西院，杜奎他們九个就住在他姐姐家的西屋里。大家把带来的粮食集中起来，放在杜奎他們的屋里。社副主任吳秀英当下就去做飯，杜奎等人趁这个空間去拜訪村上的干部。大家鬧騰得很晚才吃了中午飯，飯后料理了一下杂务，天就黑了。睡觉的时候，麻煩出来了。杜奎他們这屋的炕过于窄小，剛躺下

六个人就挤满了。杜奎愁的满屋乱转，端起煤油灯炕上炕下乱照，仍是无计可施。忽然他瞅见北墙上挂的捆柴绳子，不由乐了，回头说：“有办法，来，来，大家只管躺，保险睡得开！”大伙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没打问，又挨个儿往下躺，刚躺下两个人，他又大喊：“不中，得一个头东一个头西错开来躺。”

大伙嘿的一声笑了，很多人知道，这个办法并不新奇。又一顺一倒地往下躺，躺到第七个人的时候，又挤严了。人们一边嚷着不行，一边翻身就要起来。

杜奎忙叫大家稳住，他噌的一下蹦上炕来，晃着膀子挤了个空，背靠墙坐下，两脚蹬住边上的人猛劲一蹬，便蹬出个空来，扭头向没躺下的人喊：“来，来，快躺下。”这个人嘿嘿的乐着躺下了。他等大家都躺好了，再把两条被子给盖好，自己才找个空儿躺下，并凑趣的问大家：“你们知道这叫啥办法吗？”

大家虽然觉得很挤，但总算安心的躺下了，也就都想说个笑话。再加杜奎这么一问，立刻都开口了。有的说这，有的说那。杜奎总说不是。最后他告诉大家：“这叫杀车！”大家哗的一声笑了起来。庄稼人谁都明白“杀车”是怎么回事，这是用车拉东西时把东西捆紧的办法。这一晚，大家就这么杀着车睡了。

第二天，杜奎很早起来，问大家冷不冷，几个老头哼了两声，说：“冷倒是不冷，就是你这‘杀车’受不了。”

杜奎问：“怎么受不了？”

老头們說：“我們不是玉黍秸杀在車上拉家去燒，我們还得上山打柴呀！”“我們不怕，”佟春他們几个年青人醒來說，“再給我們蹬上两个也沒关系。”

杜奎怕老头們生气，忙把話接过来：“这个意見很好，今晚你們老年人都到西院去，那边炕大些，我們这屋多来两个年青体壮的中不中？”他这样和大伙一商量，老头們也就沒意見了。当天晚上，他就把人員进行了調整，八名老头都調到西院，杜奎这院住了十名体壮不怕“杀車”的青年人。大家就这样每晚“杀”着車睡觉。

虽然每晚挤得不行，但大家的心境很寬。每天起早进山，晚上回来，每人最少能打三挑柴，誰也不喊累。就是那些柴树打着不順手，不是苦楸就是麻藜，枝尖条硬，一不小心就把手扎破，沒几天工夫，就有好多人受了伤。但大家的干劲大，不在乎。最难办的还是衣服和鞋袜，被树枝一挂，更不象样了。有的棉袄上窟窿挨窟窿，有的棉褲光剩下了棉花套。鞋子本来就烂，現在更是前張嘴后开口，帮和底开始分家，套都套不住。吴秀英除了做飯，每天晚上給大家补衣縫鞋。不几天，麻线 and 布头全用光了。沒有办法，大家只好猛劲打柴，抵抗寒冷。衣服还好說，鞋子破了，有些人的脚被树茬碰破，担着柴不敢快走，真是发愁。

一天，大家在山坡上休息，有个青年吞吞吐吐的說：“四叔，咱們啥时卖柴回家？”他这一提头，好多社員都眼睜睜等待回答。这一下，杜奎为难了。他想了想，說：“咱

們臨來時不是說柴拉到家再賣嗎？現在中途改變計劃怕不好。眼前的困難還是想法克服一下吧……”

“你光說克服，克服，腳可受不了哇！”兩個青年人不滿的插了兩句。其他人看樣子也要開口。

杜奎故意瞧了瞧自己的破鞋，說：“腳往樹茬上碰，的確不好受，不過只要把牙一咬，也沒有啥大不了的事。抗日那年頭，被日本鬼子追掉鞋，光着腳丫子跑山梁還不是常事？那年頭跑都能跑，這年頭為什麼走都不能走呢！”接着，他就講起抗日鬥爭的英雄故事來了。一股革命的激情涌進了青年人的心裡，大家又鼓起勇氣，歡歡喜喜的砍起柴來。這時邵慶林正在杜奎的左面砍柴，杜奎問道：“老叔，你經驗多，縫補破鞋有旁的辦法沒有？”邵慶林說：“我也正在思謀這件事，山上葛藤到處有，依我看，用葛藤綁綁捆捆，也能對付。”杜奎聽了，滿心歡喜，繞到山溝里割下幾枝，在自己破鞋上捆綁着試了試，果然滿對勁。他於是大聲嚷起來：“喂，小伙子們，土地爺給咱們送藤鞋來啦！你們看！”說完蹺起了自己的右腳。

“好哇！”大家全哄鬧起來了。

有些人立即也去找來葛藤在自己的破鞋上捆綁起來；有些人還別出心裁的用葛藤綁棉衣、綁帽子。葛藤這時在他們的手裡，妙用無窮。

這樣又堅持了十多天，打了三十多萬斤柴，垛在沙河套上，象幾座小山。王寺峪村過往的人們都驚動了，紛紛誇贊：“成立農業社，真是力量大。”

为了要和国藩商量卖柴等事，这天清早，杜奎洒开大步离开王寺峪，不到晌午就赶到了家。

他向国藩汇报了山上打柴的经过，国藩也对他谈了谈家里生产的情况。两人计议了一阵，最后国藩说：“柴还是就地卖掉吧，这么多要往回运实在没有力量。社员们如果能支持得下，还是再多打几天，去一趟不容易呀！咱们眼巴巴盼着拿这一笔钱创基立业呢！补鞋的布和鞋掌，还是得想法买一点，‘藤鞋’‘草鞋’腊月寒天毕竟不中呀！社员们冻坏了不是玩的！在家里的怎么困难也好说。我这就去凑点钱，你路过三屯营顺便买好带去。”

杜奎回家吃过晌午饭，就又往回赶，经过三屯营买了一些布头和鞋掌，傍晚又赶到了王寺峪。

大家都围上来问长问短。杜奎一面说话，一面刷拉一下抖开了一包东西，里面尽是补鞋用的麻线、布头、碎皮。

“这下可好了！”大家几乎同时舒了一口气。

“大嫂子，今晚劳驾补补我的两只‘破簸箕’！”

“兄弟媳妇，把我的也捎带上！”

吴秀英大包大揽的说：“都不用急，我今晚豁出不睡觉，也要把你们这些破玩艺儿都补上。”

尽管女主任这么积极，杜奎可知道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他就分派邵庆林等几个有经验的老汉帮忙，拾缀了大半夜才拾缀完毕。

第二天，大家穿上修补好的鞋袜和衣服，有说有笑的

又上山了。杜奎一面跟大家一块打柴，一面抓机会張罗卖柴。这样又过了五六天。一天清早，忽然紛紛揚揚漫天飞起大雪来。村里村外变得白茫茫一片。山沟里看不见路，大片的松林都蒙上了厚厚的雪，苦柳林和麻藜丛也被雪埋上了多半截。年根岁尾，这么大的雪天誰还上山呢！就连山鳥也都飞到阳坡去覓食，不再滿山遍谷乱飞了。只有穷棒子社的打柴队照常进了山。他們踏着沒膝盖的大雪，用鐮刀撥拉着坚持又打了一天柴。第二天，雪盖得更严了，杜奎他們才决定停止打柴，收拾回家。把几笔柴賬一合計，共卖了四百三十元。

王荣老汉算个人經濟小賬一向精明。杜奎他們还在一笔一笔加那柴錢，王荣坐在一旁，閉着眼睛，早已一笔一笔分算好了。自己估摸能分到多少錢，这笔錢該买些啥东西，到哪里去买。当杜奎把錢包起来要收藏时，他眼珠一轉，思摸着把自己的那份錢先拿到手，装在自己腰包里，才更妥当。于是凑上前去，瞅了瞅杜奎說：“我眼下有急用，借点錢中不中？”

王荣这点毛病，杜奎是一清二楚的，这时見他說得这样认真，以为真的有急用，就問：“出了什么事嗎？”

王荣迟迟疑疑地說：“我路过三屯营，想买点过年的东西。”

这一說，許多人沉不住气了：“老奎，錢是大伙的，把紧呀！”

杜奎也知道不能开此先例，就順水推舟地說：“对，我

一定把紧！誰借也不中！”

王荣眨了眨眼，不滿意地說：“錢是花的，不是拿着玩的，借点怕什么！”

杜奎說：“你沒听見嗎，錢是大伙儿的，若是我个人的，你借多少都中。这可不行！”王荣碰了个釘子，只好暫時收起借錢的心。

这时，邵庆林老汉也凑上来了，他說：“不回家我倒沒困难，一回家我就难住了。你們看我身上的这件破袄能进庄嗎？”

这几天，杜奎因为忙着張罗卖柴，对社員們的衣着沒来得及注意。听邵庆林一說，上下一打量，可不是，破棉袄的大襟都沒了，褲子上好几处露了肉。他撓了撓头，心想：这可有啥法呢！又一看自己身上，說：“不要紧，我这个棉袄破得好些，給你，咱俩換着穿。”

“不中，这不是瞎鬧嗎？”旁边的人都叫起来，“他穿着难看你穿着就好看嗎？你到家还要东跑西顛的，要換我們和他換。”

邵庆林見大家这样热情，感动得連声推辞。杜春說：“大家都別愁了，我有法，明天上路时，把我的棉被給他圍上还不中！”

人們嘩嘩地大笑起来，都說：“这个办法好，保險不露肉，还暖和。”“对，这和棉袍差不多……”大家正連声說笑，几个小伙子忙抱起被子給邵庆林老汉試装。圍上以后，杜奎又从門外找了根綁鞋的葛藤往腰里一扎，也真象

是一件奇寬特大的新衣。人們又是一陣哄堂大笑。杜奎說：“明天到家的時候，你單獨從後門進去，免得給王悅他們留下話柄。”大家又扯了一陣閑談才散。

第二天，他們就告別王寺峪的老鄉回家了。

打柴的人回家，村里全轟動了。人們紛紛議論：“人家是有志氣，一家伙從山上搞下四百多元錢，真是組織起來力量大呀！”只有王悅等少數人，原來指望打柴白闖一場，窮棒子社早日散攤的，現在見是這樣，就象當頭吃了一悶棍。王悅走出走進，耷拉著頭，又在起他更歹毒的念頭。

國藩和杜奎等人吃過飯就聚在一起商量怎麼處理這筆錢的事。

國藩說：“聽說你們要回來，我昨天到區委匯報了下情況，提出這筆錢該怎麼處理好。趙書記說：‘眼下快過年了，各戶這麼困難，按說應該分點錢。不過你們社連一個牲口一輛車都沒有，明年開春怎麼種地？還是和大家商量一下，說清楚難過的日子好過的年的道理，咬咬牙別分錢，留下買車買牲口中不中？’”

黨員吳秀英和梁近田等人說：“這個意見倒好，不過能商量妥嗎？王榮一個人就難辦。”

杜奎說：“事情沒辦，不能先往難處想。我們把道理講清楚，也許不費啥事，誰還不知道難過的日子好過的年。”

國藩想了想，說：“這樣吧，今晚咱們再到王榮家里去

开会，你们都把意见准备准备，争取做到不分钱！”

听说这是一次分钱的会，人们来的比成立社那次还要多。把王荣家的屋门都挤得“咯吱咯吱”乱响。王荣和他老伴却一点没有烦厌的意思。他老伴还破例的搬过炕桌放在炕当中，回身又从柜里取出自己省抽的大叶子烟，又拉过她那用旧报纸糊的烟筐籬，把烟叶用手捻碎，笑面融融的让：“谁会抽烟只管拿，伸手算一份啊！”又忙着找洋火去了。

满屋子人都觉得王荣老伴今天态度特别，上次象刮西北风，这次象送东南风。大家都挤眉弄眼的互相示意。会抽烟的，也老实不客气地伸手到烟筐籬里抓烟。烟抽着了，会也开始了。厚厚的几叠钱票子，堆在炕桌上。

杜奎先把打柴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国藩接着就开腔：“咱们社成立一个多月了，大家都很努力。打柴的上山打了二十多天，挣回了四百三十元钱；在家生产的，也是垒孬基，起冻粪，一股劲的干。现在眼看快要过——年了……”他有意把“过年”两字拉得很长，想看看王荣等人的表情。只见王荣歪着脖，正聚精会神等着听下文。国藩却把话锋一转说：“按理这钱应该分了过个好年。可是过了年，咱们就得准备春耕，社里只有三条驴腿，车套都没有，怎么送粪种地呢！常言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所以我想这柴钱还是不分，买个牲口买个车的……”

“你说啥，不分？”王荣等不及再听下去就插嘴，“好几

年啦，我家过年都没吃着饺子，今年辛辛苦苦上山打柴，有了点钱还不分？因为入社还不过年？……”

“对，还是分了过年，生产明年再说……”好几个人同意王荣的意见。

会场被王荣他们一咋哄，就乱了。炕上炕下的人都站了起来，外堂屋的人往里屋涌，立刻把国藩和杜奎两人围了个风雨不透。数不清的脑袋，伸向了放钱的桌子。国藩他俩也站起来边挥手边给大家解释。杜奎粗中有细，一看王荣他们很多眼睛，紧盯着桌上的钱票子，而且越盯越往前凑，只差伸手抢了，他于是用手肘在国藩的脊梁上猛劲拱了一下。国藩立即就意识到了。他一把将钱票抓起来往衣袋里一装，说：“要分，今天晚上也分不成。有的劳力强有的劳力软；有的劳力多有的劳力少；有的打柴时间长有的打柴时间短。也得讨论分算一下呀！如果都照人头分劈，那合理吗？”接着又有意将了王荣一军：“老荣，如果你也同意照人头劈，咱们今晚就分。”

这一说，王荣怔住了。他吊着眼珠一计算，就计算出这样分对自己不利，一下站起来：“对，这笔账是得好好算算。我家三个劳力，都强；有的家只一个劳力，还弱；怎么能平均劈呢！算清了，明晚分也一样！”

国藩和杜奎这个“缓兵之计”，作用可真不少。会后，两人趁空又进行了研究，决定明天上午分开两组酝酿，把赞成不分钱的骨干分插在里面进行启发和诱导。

在小组讨论会上，气氛就变过来了。国藩掌握的这

个組，由于反复的解釋和党员的帶头，到晌午前多数人的思想就通了；杜奎掌握的那个組里，王荣几个人还是坚持要分，討論还没結果。下午，两个組接着又討論。国藩这組先散，他来找杜奎交換情况，一进门，只見王荣老汉沉着臉問：“国藩，这錢假使不买牲口和車，要討論到啥时候，年前討論完了哇？”

滿屋人都被他說笑了，連国藩和杜奎也乐了。国藩說：“好，咱們晚飯后就进行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好啦。”

人們又到王荣那东屋开会。杜奎这回沒有和国藩坐在一起，他和几名党员坐在王荣跟前。国藩在炕上先介紹了两組討論情况，接着就請大家发表意見。党员和积极分子們先提出了不分錢的理由，不少人立时贊同。王荣他們几个願分錢的低着头不吭声。国藩見多数人同意不分錢，就說：“那么大伙說說，都买些啥呢？”

話剛开个头，杜奎就插断了：“先別忙，我看有的人态度不明，这样决定了，会后还会有意見。咱們索性正規一点，举手通过。”国藩說：“好，同意不分錢的——举手！”大家唰的一下，都举起来了。杜奎連忙把灯端到王荣跟前，和藹地說：“大哥，你仔細数数，举手的占少数的話，咱們就分錢。”

王荣老汉真的扭着臉轉圈数了数，又皺起了眉头，低声說：“真怪呀，原来有那么多人願意分錢，怎么一轉眼又都变了呢！”事情也真湊巧，不知哪个湊乐沒够的小伙子举着两手，叫他看見了。他一拍大腿說：“怪不得举手的

人多，这里面还有假呀！”

結果又鬧了一陣哄乱，只好又舉了第二遍，王榮才服了。

这事正式決定以後，就討論买东西的問題。这回王榮第一个發言了：“我願意買車，有錢了總使扁担還中？”

邵慶林說：“我願意買牛，又能耕地又能攢糞。”

邵慶昌說：“咱們山区少不了馱，買馱比買什麼都要緊！”

佟印和戴存兩個年青人不耐煩了，齊聲說：“怎麼誰愛啥就要買啥呢！這樣的話，我們願意買羊！”

杜奎聽到這兒，也大聲說：“咱們這不是‘變戲法’，要啥來啥！統共就那麼四百三十元錢，能買這老些東西？……”

國藩怕在這些小事上又搞得翻車，忙攔阻說：“算啦，算啦，都依大伙，完了咱們再細細斟酌。”這才散會了。

第二天一早，國藩和杜奎就帶了錢到遵化去趕集。

这天午飯後，壞分子王悅又蹲在門口晒太阳。晒太阳是做個樣子，其實是招惹一批人進行挑撥。前兩天，他針對王榮老漢私心重的毛病，慫恿他“肉到口，錢到手”，弄得王榮顛三倒四一口咬定要分錢。誰知這一計失敗了。國藩和杜奎今天又去趕集買牲口買車，他心里象貓抓一樣，又惦算壞主意。剛好這時王榮也在街口露面，他招呼說：“老榮，過來抽袋烟。”王榮就湊上去了。

“这回你們社要大發了啊！”王悅假意恭維。

“发什么，八字还没见一撇，谁知道将来是啥样！”王荣说。

“老实说，再发上三发，也还不如我们的互助组呢！”接着就把他们那个名为互助、其实单干的组的家底，大吹了一通。老王荣听得心里痒痒的，觉得穷棒子社实在太寒碜了。

瞅着老王荣二心不定的神情，王悦诡秘地说：“你估计他们今天能买回啥吗？哼，不用想。买来买去这点钱还不是大部分买进了他们自己的——”下面“腰包”二字，是冲着王荣耳朵根说的。老王荣的心一下就跳到喉嚨眼上了。

冬天日子短，说太阳就压山了。这时，忽然传来了一群“哗哗”的叫声。一群小孩象风一样卷过来：“快去看呀，农业社里买了一大群羊，还有老黄牛，大黑驴哩！”王荣听了，似信非信，他脚底象抹上了油，拍拍屁股急忙往社院走去。

社院里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二十三户的人几乎都来了。

戴存、修印用手挨个摸老绵羊身上的绒毛，还把自己的脸蛋，贴到老绵羊喷着热气的嘴边，简直就想亲嘴。两个小伙子实在爱得不行，数了数，共十九只。

邵庆林几步窜到老黄牛跟前，扳开它的嘴一瞧，摇摇头说：“太老了，简直和我的年岁差不多！”

国藩在旁笑着说：“老牛耕地有经验嘛！”

邵庆昌也几步窜到大黑驴身旁，左瞧右瞧，摇摇头说：“怎么这样瘦，简直和我没两样！”

杜奎也在旁笑着说：“喂得好点，明春就上膘了！”

只有王荣惊疑地站在一边，他没有看到他心爱的车。

国藩早注意到老王荣的神情，走上前说：“老荣，我们今天跑了三个车行，都看了，不是价钱高，就是木料湿，全不合适。我们定做了一辆，要开年正月半才能去拿。”这一下，王荣才没有话了。

其实，国藩和杜奎两人今天真是煞费了苦心。他们先买了羊，又买了驴、牛和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农具，一点钱数，总共剩下了五十块钱。赶到车铺里一问，大车的价钱不是一百八十元就是一百六十元，相差实在太远。后来找到后街一家车行里，看到一辆车轅有点残了的車，标价是一百二十四元。国藩摇摇头说：“还是买不到！”杜奎说：“不怕，先定下来，开春我再带人去打几天柴，不是就有钱了，再取也不晚。”两人就这样预付了五十块钱，算定购了这辆车。来回路上，两人只吃了点从家里带上的玉米饼子，一分钱也没舍得零化。

开了年，杜奎果然又带一小部分人进山打柴，到月半回来。这次打柴得来的钱，拿一部分去把那辆定购的车赶回来，剩下的一部分三元二元的分给了社员。社员自是高兴。

这一天后半晌，老王荣正在路边上张望，果然看见国藩和杜奎赶了一辆车回来了，车上还象装着点啥东西。他

几步就迎上去，嘻嘻笑着跳上了車。“咯吱”一声，車轆响了一下，他沒有介意；車到了社院前，往下卸从路上順便裝来的沙子时，他一使勁，車轆“咯吱咯吱”連声响了。王荣仔細一瞧，臉色就变了：“这也叫車嗎？”

杜奎馬上頂他：“这不叫車，叫啥呢？”

国藩笑起来說：“老荣，你会上提出要买車的时候，光說的数量，沒有說出质量呀！”他見王荣还是沉着臉，又接着說：“不怕的，百样事情起头难，今年丰收了，咱們再想法买辆新的。”

听到滿院子車、馱、牛、羊的叫鬧声，听到国藩和杜奎俩爽朗的笑声，王荣臉上也終于有了点笑模样。

較量較量

李滿天

清明节前三天，下了一場透雨，后山一派青綠，山坡上的果树也长上了花苞。正是种地的好时节，可是社里还没有种籽呢，粮食对对付付的吃过冬来，谁家还能饿着肚皮留种籽。王荣說：“这回可該政府想法儿了吧！”国藩还是那句話：“社剛办起来，八字还没見一撇呢，就向政府伸手，往后还怎么办！”其实国藩自己心里也没底，就开社員会研究，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按着上次各戶分头找旧材料盖羊圈的办法，自己动手，二十三戶分头去找去借。

第三天，孤儿小戴存从表哥家借了两瓢紅高粱种籽，回来已經天黑了。老远望見村口影影糊糊的有人走动，赶到跟前一看，是国藩和杜奎二人。国藩問戴存：“怎么这晚才回来？”

戴存沒有回答，却把嘴一噘，嘟嘟囔囔地說：“真把人的肚皮气炸啦！”

“什么事把你这么气的？”

戴存一口气往下說：“半道上听人念叨，王悅那家伙光看咱們的笑話，还要和咱們社比勁呢，咱們种啥庄稼他

种啥，吹大牛說要把咱們社踩到他脚下去。”

杜奎說：“这牛皮他在当街吹了好几天啦，你还当新聞來說呢！”

戴存說：“他还說什么臭要飯的、穷棒子社，要沒有摘星星的本事，就别想赶上他去。”

杜奎接上說：“他也沒有摘月亮的本事吧！”

戴存把眼皮一眯：“你們听了就不气？”

国藩噗地一笑，說：“气啥？我还在心里謝他呢。”

听了这话，不但戴存惊怪地大睜起眼，杜奎也是心懷不滿。他忿忿地說：“謝他？我恨不得揪住他的后脊梁，往当街摔他个响泡呢！”戴存說：“到啥时候啦，你还淨說笑話！”

国藩这才不紧不慢地說：“不是笑話。过去日本鬼子和蔣匪軍那多凶，杀人燒房子，想鎮住咱們，到底吓住咱們了沒有？”

杜奎粗声粗气地說：“吓住咱們？它越发凶，咱仇恨越大，到底都被咱們打敗啦。”

戴存不耐煩地說：“咱是說王悅那家伙呢，你們又扯到啥上去啦！”

国藩說：“这就回到你那題上来啦。你說，咱們鬧这个穷棒子社，困难不困难？”

“这还用說。”

“如今王悅要和咱們比勁，他吹那么大牛皮，咱們敢和他比不敢？比过他比不过？”

听国藩这么一說，两个人都恍然大悟，咧开嘴乐了。

国藩接着又說：“他一比勁，真把你的肚皮气炸啦，那才正好趁了他的心願。他說咱們沒有摘星星的本事，咱們立下凌云志，真敢摘星星，这还不該謝謝他嗎！”

国藩口里这么說，心里还是免不了有点愁煩。这二十三戶，除去佟启还将就点，其他二十二戶全是穷得当当响的，鬧好了沒說的，万一有个什么差錯，慢說关涉合作化大事，先影响这二十三戶的飯碗呀！他怎能不愁呢？他想趁这工夫，給大家多鼓鼓勁，把地种好。就对杜奎說：“天还不太晚，咱找上大伙再念叨念叨怎么样？”

杜奎点头同意，就去找人。国藩領着戴存回家吃了飯，也上社里去了。

大家先嘮了几句閑談，国藩就开口說：“看来王悅和咱們社对头是做定了，大伙要說敢跟他比，咱就比；要說不能比，咱就认輸算啦。”

当时沉悶起来。杜奎急得蹦起来說：“掉脑袋的事都干过来啦，如今又要不了命，出不了血，有啥不敢的！”

跟着众人七嘴八舌的才議論开了，有的說：“咱早憋着一口气和他比呢。”有的說：“光听那螻蛄叫还不种庄稼啦。”只有王荣和王生弟兄俩光是抽烟，不言語。国藩瞅着炕里坐的王生說：“二哥，你說咱們能比嗎？”

王生一手托着干瘦的腮帮，一手撑着烟袋說：“比，还有不能比的，我就是想咱这二十三戶才合三条驢腿，虽說又买来一头牛一头驢，可是又老又瘦；人家王悅一戶就是

一头大驴，两头大牛，这上面是差着点。”

杜奎又站起来大声說：“你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王生又不言語了。国藩就又开导說：“二哥这番考虑也是的。比如过去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和蔣匪军的武器就是比咱们强嘛。可是还得考虑另一方面，那结果怎么样呢？”

王生接着說：“你不用给我打比方啦，这我也思摸啦，他一户一头驴，两头牛，咱二十三户才合三条驴腿，加上一头老牛，一头瘦驴，可干活的人呢，他老婆是不下地的，他和他能干活儿的两个儿子总共也只三个人，咱二十三户合起来又有多少干活的！”

杜奎又跳又笑地說：“你这才說对啦，要看到人的力量呀。”

說得大家都笑了。剩下王荣老汉还没表示态度，国藩就問：“大哥，你看呢？”

王荣从炕里往炕沿上挪了挪，揷了烟灰，把烟袋紧攥在手里，随后慢声慢气地說：“帳是該这么算，不过……”揚臉瞅瞅国藩，又低下头含含糊糊地說：“听說他粪积的不少，人家又是富裕户，咱们缺这少那的，是够呛呀！”

别人还没开口，王生往前一挪，冲他哥哥說：“他手头寬裕这不假，可刚才不說了嗎，咱们人比他多呀，大伙都长着手哪，慢說有三条驴腿加两头牲口，沒这个，咱使鎬刨也不比他种的差。”

众人都贊成王生的意見。国藩見王生說的帶勁，也自高兴，又問王荣說：“大哥，你看二哥說的在理吧！”

王荣却不正面答复，他把烟袋在手里繞个圈說：“我看还是抓紧种地要紧，咱們分两撥，一撥人到村西种谷子，一撥人去西大梁种玉米，管他王悅比勁不比勁，咱們先早早把庄稼种起再說。”

国藩立时称赞說：“大哥这意見滿好，明天老奎領几个人去村西种谷子，你領人去种玉米，怎么样？”

大家都沒意見，当晚計議定了。

第二天清早，天上还挂着稀疏的星星，社員們就吃完了早飯，太阳剛一露头，下地的人們已經出了村。王荣肩上背着盛种籽的口袋，王生跟着毛驴；国藩也去了，他肩上扛着犁，犁上搭着套；其他几人有的扛着鍬，有的背着筐，說說笑笑奔西大梁走来。山坡沟坎上新出土的野草，放出陣陣清香味，各种不同顏色的小鳥，在淡綠淡綠的树枝上飞动鳴叫，好一片清新美丽的山野春景。来到地头，王荣、王生这些老汉先坐下抽袋烟，年青人却不安生，不是拣起石子打鳥，就是学着猴子爬树。王荣老汉抽完烟，站起来，象个領头人的样子說：“別光歇着啦，干吧！”众人立时套上毛驴，取出种籽，王生老汉和毛驴搭着拉犁，国藩扶犁，王荣后面撒种，其他几人有的撥粪，有的刨坎平地。

种过两趟，小戴存的話来了：“奇怪奇怪真奇怪，为啥不見王悅套犁种地来！”

听了这话，王荣不由朝上边的地块瞅了一眼，那正是王悦的五亩地，和社里这六亩地埂连埂壟順壟的挨在一起。他心里叨咕：这王悦真的为啥不来呢！莫非說和社比劲是他吹空气儿的？心里这么想，口里却說：“人家敢許上别处种去啦。”

戴存又說：“他太阳晒屁股，做梦种地呢。”

王荣忽然呀了一声說：“別說啦，那不人家来啦！”

众人順沟口一望，果然看見有三个人晃晃蕩蕩順沟底上来，王悦大小子扛着犁；二小子牵着毛驴；王悦背着种籽口袋，一手还揚着个紅纓鞭子，吆吆喝喝，咋咋唬唬的滿神气。他抬头一望，才望見大梁上有好几个人，就催小子，掏毛驴、紧赶慢赶地上了大梁。

小戴存見他們三人走近，故意把头揚得高高的；国藩只顧耕地；王生眼睛不得劲，什么也看不大清；王荣倒是想打个招呼，見別人这样，他也不好开口。那王悦却把种籽口袋撂在地头上，直起腰，搭了話：“嗨！你們来人不少呀！”

小戴存斜了一眼，立时回答：“我們有人嘛，你想来还来不了呢。”

王悦挨了碰，把牙一咬，在两个儿子身上使气，連催帶嚷地套起毛驴，也紧忙慢忙地种起来。

国藩看在眼里，口中不言，吆喝毛驴。那毛驴竖起耳朵，紧走着往前拉。犁头过处，軟軟糊糊的湿土往两边分开。种到半趟，正和王悦打个对过，王悦那头大驴的耳

朵紧挨国藩肩膀擦过去。王悦把嘴一毗，冲着国藩皮笑肉不笑地说：“王主任耕的真棒呀！”国藩回答了一句：“差不了！”

王悦嗓子眼里象塞了块东西，想骂句什么也骂不出来，他心里又是恨，又是恼。这家伙，紫红脸上镶一脸浅麻子，水蛇腰，薄嘴唇，能言善语。早先地主气盛的时候，就爱巴结权贵，替王家大院收租跑腿，溜舔点残喝。封建势力被打倒了，杜志他们搞反革命活动，他是骨干。人民政府平息了“红眼队”叛乱，取缔反动会道门，他假装悔改，骗得政府的宽大处理。可是在他身上杜志的阴魂依旧不散，对党，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这回成立农业社时，他讽刺、挑拨、打击、破坏，能施的鬼法都施了，农业社不但没有垮下去，还置买了驴、牛、大车，情满气盛地站起来了。王悦哪能就此罢休，他另变一套，存心和社比赛，妄想把社比垮。凡是挨着社的地，社里种啥庄稼，他也跟着种啥庄稼，同样的地块，同样的庄稼，那才能显出谁高谁低来。人们看着他王悦把社给比下去了，那还有谁再有劲去入他们那穷棒子社？穷棒子社不垮也得垮了。这一来，不但出了口气，他放债雇工的路子也就活了，单干发财的道儿上也没有什么阻挡了。因此，社里在这儿种玉米，他也在他的地里种上玉米；社里在蔡家沟种了六亩谷子，他也在紧挨着的六亩地里种了谷子；社里在大岭沟栽了三亩白薯，他也在紧挨着的二亩地里栽上白薯。

社里的苗出土了，王悅地里的苗也出土了；社里的苗齐齐嶄嶄的往上长，王悅地里的苗也齐齐嶄嶄的往上长；社里榜了三遍，王悅也榜了两遍。这事不但轰动了西鋪和东鋪，也惊动了周圍村庄的人們。村里下地的人們，或是路过，或是繞几步远，总要到这里来看两眼。外村的人們，就专门跑来当熱鬧看，看了回去又添枝添叶地当新聞讲；若是遇上几个人，禁不住就地边議論一番。有的說：“从現時来看，苗棵长得一般高，全是油黑嶄綠，分不出上下高低。”有的說：“現時苗棵的长形和色气是沒有两样，可是一眼看高，一眼看低，日子还长着呢，好戏还在后头哪。”这么一說，有的人就說：“是呀，王悅人家要是买了豆餅或化肥描一下（注：描粪是这儿的土語，即追肥），那就显出两样来哪。”有的人立时反对：“人家社里那么多人手，要是认真榜起来，他王悅可抓瞎啦。”有的人又反駁：“王悅人家有的是錢，到时候覓几个短工，不也赶前啦。”有的人說：“他覓短工也覓不了社里这么多人手呀。”别看言多語杂，向着社的人們光担心社里輸了，一心希望社里庄稼长好；向着王悅的人，只盼望王悅得胜，生怕他被社里比垮了，失去他們这一棵隐身草。正是：有的好明有的暗，各人心思不一般。这且按下不表。

到了夏至时节，杜奎从地里回来，風風雨雨听到人們的議論，就找到国藩說：“那玉米都长多半人高啦，还难分上下，老这么着，咱比不下他去，可不象話；万一有个啥，可更丢人。”

國藩說：“丟人事小，合作化道路事大，二十三戶飯碗事大。”

杜奎在桌上砸了一拳，說：“是啊，咱非得想法兒趕過他去不可！”

“王悅罵咱們是窮棒子社，咱們想法兒，也只能想窮法兒。”

杜奎着急地說：“窮法富法，總得想法兒！”

兩人皺着眉頭想了一會，國藩正要說話，杜奎跳起來說：“有啦有啦，咱們有十九只羊，把羊糞搗到玉米地里，那就……”國藩接上說：“你和我正是一個心眼兒。”杜奎說：“那咱就動手干吧！”國藩說：“且慢，區委不是常對咱們講嗎，和王悅較量的事，實際上是一場階級鬥爭，勝負關係重大，凡事要跟群眾商量。咱兩人想出法兒來啦，也得開會和大伙商量商量再辦。”

當夜召集了二十三戶社員，國藩把要趕過王悅的話一提，正待講幾句鼓動話，王生老漢就插口說：“咱們那羊糞也攢的不少啦，搗到玉米地里，還愁趕不過他王悅！”幾個人同聲嚷道：“俺們也正是這個主意。”

國藩向杜奎看了一眼，杜奎心眼里火燒水滾似的高興，把拳頭高高一舉，大聲吆喝：“咱們明兒天不明就動手，中不中？”

“中！”眾人應聲喝叫，連宿鳥都驚得飛叫起來。

第二天天不明，王悅還在做夢，夢見他那玉米長得一丈多高；社里的玉米還不到一尺，相比之下，象個高山跟

小崗。他正乐得呲开大嘴笑，忽然被人声狗叫惊醒了。立时从炕上爬起来，顾不得穿衣裳，披件大袄，急步走到街門，就門縫里往外一望，月光下，社里那条小毛驴拉着铁輪大車，咕轆轆走过街道。后边，一人一副挑子，鬧鬧嚷嚷的相跟着。他揉揉眼睛，細看筐里挑的啥，却看不清，就輕輕打开門，躡手躡脚地跟在后边一瞅，又急忙返回家来，对睡在炕上的老婆和儿子吆喝：“快起！快起！还死猪一样的挺着哪！”老婆儿子惊得虎一下坐起来。老婆問：“啥事这么急毛喊叫的？”王悅跳着脚叫：“穷棒子們給庄稼捕羊粪哪！”接着象蚂蟥掉进热鍋似的在地下乱轉。轉了几圈，又猛地站住，嘿嘿笑着說：“哼！他們有羊粪，咱也有，还有那牛粪猪粪呢。”就立即催逼两个儿子，牵出大驴，从羊圈里起出粪，装好筐，驴馱人挑，也向西大梁赶去。

这时小麦发黄，野草竞长，气候轉热，山坡上的树木茂茂騰騰。王悅一路只是掬牲口，催儿子加快脚步。走到半沟，社里挑粪的人們已經返回来了，正打个对过。小伙子們都拿眼瞅着王悅一家子。王悅两个儿子搭拉着脑袋，王悅却向大伙儿睨了一眼，把腰一直，故意迈几个大步，那担子在他肩头上軟溜軟溜的閃。正自得意，听得后边小伙子們嘻嘻地笑，笑声中还夹杂着一些細碎的言談，却听不清說的什么。王悅恨恨地低声嘟囔：“穷棒子們笑吧，将来叫你們哭都哭不出好声音来！”他的恨气还未消，铁輪大車咕轆轆地下来了。王悅又是一个煩惱：穷棒子們有一辆大車，他却沒有。又听得王荣老汉跟他說話：“你

們也来啦！”他很想罵一句，沒有罵出口，只回答了一聲：“拉不下！”擦着大車過去了。走了幾步，放下担子，回過頭來，抹了把汗，嘿嘿的對後邊的大小子說：“窮棒子們高興吧，他們那大車是一百六十塊買來的，看秋後打不下糧食，吊起肚子餓着，咱掏一百塊，那大車就成咱家的啦！”說完，又催兒子：“快走！快走！那大車是咱家的啦！”好像那大車真成了他家的一樣，大嘴咧得合不住。

走到地頭一看，又是一個煩惱襲擊他的心頭，嘴立時拉得老長。原來社里今天是男女老少總動員，男人們挑糞，婦女們描糞，男人們把糞挑到地頭上，婦女們就裝上筐，提到地里去描，糞到就描，全施到庄稼棵上去了。他家里幹活的統共就三人，按一家來說，是不算少，比起社里二十三戶，那就可憐巴巴的啦。吹笛顧不了捏眼，捏眼顧不了吹笛。他吊着眼珠子盤算：今天這一天能把糞鼓搗到地里來，就算不錯啦，明天起個大早，三個人一天怎么也描起了。窮棒子們窮忙活，今天也未必能描完。盤算定當，就把手一揮，說：“走！”大小子睜着眼問：“咱們不描呀？”王悅暖着眼說：“你想圖心閑呀！走，挑去！”三個人趕着毛驢，挑着空筐下了坡。

大小子受了王悅的訓斥，心里不是味道，干活沒了勁；二小子也是不夠麻利。王悅光是心急，倆小子不上勁，他肚子氣得一鼓一鼓的，真想呼鷄喝狗地訓教一頓，轉念一想，又忍下去了。一邊担着糞筐緊步走，給倆小子做樣子；一邊甜言蜜語地叨念：“今天咱們早挑完早歇工，

晚挑完晚歇工，早挑完了，烙大餅，炒鸡蛋，来頓好的。”这么一說，那两个儿子果然来了勁。打起了点精神。

下地干活的人們，有的止住步，有的停下活，都滿有兴趣的瞅熱鬧。这是一场比賽，以二十三戶农业社为一方，以王悅一家子单干为一方，双方的比賽很是激烈。王悅要在人們面前显能，晃当着脑袋，甩搭着一只手，叉开大步喳喳地往前走，还一个勁儿吆喝两个儿子。社里的小伙子們更不示弱，挑着粪筐，一个赛一个，有的喊加油，有的喊快跑，煞是欢騰。

挑了两趟，王悅自己先有点吃不住勁了，两条腿被什么东西拖着似的迈不开，心里发急，身子却不給他来勁，連吆喝儿子的声嗓，也不似先前那么粗了。

到了后半晌，眼瞅着社里的羊粪就要挑清了，王悅的还剩不少呢。他发个狠，把每只筐都装得滿滿实实的，两个儿子呲牙咧嘴，毛驴的腰身弯成个曲綫，王悅自己也被压得喘不出气来。赶到吃力使气地挑上大梁，社里已經挑完粪，男人們歇了一气，帮着女人們描最后一趟粪。王悅他們急忙倒了粪，返回身还没走进村，社里男男女女，說說唱唱、打打鬧鬧地收工回来了。王悅心里发毛，顾不得催儿子，自己紧跑几步，到家里撂下筐就装粪。他原来計算，再滿滿实实的来一趟，就算成功了。誰想还是完不了，人困馬乏，慢說儿子和毛驴都受不了，他自己这时也够草鸡的了。无奈何，只得淺装少担，就这样，那毛驴你使鞭子抽，也不給快走；两个儿子走几步，歇一歇，吆喝也

是白搭；王悦自己也是一步一挪，两步一蹭，好容易担到地头，天已经大黑了。下了大梁，出了沟，进了村，有些人家已经吃上晚饭了。

王悦瞅了瞅剩的粪，把粪筐一撂，象跟谁使气地说：“今天就算完成啦！”

两个儿子象得了大赦似的，把毛驴牵进圈，往槽里倒了草，返身回屋。见他娘煮的稀粥，二小子就嚷着说：“娘，赶快烙饼，烙了饼还炒鸡蛋呢！”站在门口了着天空的王悦转身猛喝：“烙饼炒鸡蛋，吃鸡巴蛋吧！”儿子没有好气，正要顶老子一句，几道电闪划破黑空，“咯嘣”一声脆响，又是唿隆隆一阵闷雷。接着狂风呼号，刮得沙飞土扬，刮得树折叶落。西北天上黑锅底似的黑云，如一块大幕幔压了过来。大小子埋怨说：“我说把粪描上，这……”王悦更是气粗，大声喝叫：“还费那淡话，白天晴得好好的，谁知道，老天爷也跟咱作对！”说话中间，“咯嘣”又一声响雷，风过处，雨点唰唰的落了下来。王悦对着黑空，差点叫出声来：“老天爷，你留点情吧！”老天爷却不顺王悦的心意，瓢泼似的大雨，直下了一个多钟头。

王悦咒天骂地，一夜折腾的没睡觉。

第二天，屋里还浑黑，他就起来了。一口气跑到西大梁，一瞅，地边的粪堆被雨水冲得一干二净，因为他的地靠上头，社里的地靠下头，粪都流进社里的地里去了。积水坑里，还飘浮着一些粪渣，他捞了两把，又生气的把手一甩，直起腰，斜着眼瞅社里那六亩玉米。那玉米昨天刚

描了糞，夜間得了雨，又沖進了王悅的糞堆，揚頭昂腦，象故意傲王悅。王悅使勁把頭一甩，視線又轉到自己的莊稼，自己的那些玉米好象飯到口邊又被人奪走，垂頭喪氣的在怨恨他。他一跺腳也怨聲恨氣地說：“憑他們窮棒子人多，哼！過了初一還有十五呢，糞沖走了也不怕，明天去城里買肥田粉，看他窮棒子們還有啥招兒！”

這工夫，國藩和杜奎兩人也往西大梁來看地。雨后的山野，又是一番景象，山是特別青，樹是格外綠，花是異常艷，空氣是那麼清爽，莊稼是那麼茂盛。國藩抬頭一望說：“地頭上站的那是誰？”杜奎仔細一瞅說：“嗨！是王悅那鬼呀！”

王悅一眼瞥見他們兩人，低聲罵了一句，急忙往斜坡一溜，揀着山路溜跑了。

國藩和杜奎走到地頭上，杜奎笑了聲說：“王悅是看他的糞堆來啦，他的糞真多，全描到咱們地里來啦。”

國藩唔了聲說：“這才是頭一出戲，精彩的還在後頭呢。他不會善罷甘休的。”

王悅是不會就此罷休的，他果然賣掉了兩隻羊，上了城里，買來七十多斤化肥，往他那五畝玉米地里描上了。

杜奎不服氣地說：“他描肥田粉，咱也去買來描。”國藩說：“人們肚子都餓着沒的吃，使啥買呀！”“那咱就讓他看咱的笑話？”“不，咱還是來咱的窮辦法，他使肥田粉，咱耨，常言說：鋤頭底下出水，一遍一遍，多耨几遍，准比他差不了。”杜奎听了，當然贊成，就發動大伙，出發耨地。

王悅兒子見社里耨玉米，跑去對王悅說：“人家耨地啦，咱也耨吧！”王悅嘿嘿笑着說：“讓他窮棒子們窮折騰去吧，咱不。咱那玉米吃了肥田粉，你看着它給咱長吧！”

這回他却料錯了。肥田粉使多了，又速晒幾天，玉米苗不但沒見長反而焦黃上來了。王悅這才着了急，也下地去耨。一家三個勞動力却是耨不過來。社里耨過了兩遍，他一遍還沒耨完，別的地塊里的莊稼又不能全擗了不管。他百計無奈，最後一拍大腿，吩咐兒子：“去雇幾個短工來！”兒子去了半天，搭拉着腦袋、噘着嘴，一個人回來了。王悅問：“短工呢？”兒子說：“雇不着。”王悅罵兒子“窩囊廢”，兒子不服氣地說：“你自己去試一試看！”“老子就不信全東西鋪連個短工也雇不着！”他自己去了半天，回來腦袋搭拉得更低，嘴噘得更高。沒別的話可說，只是咒罵：“他媽的！把窮棒子社不鬧垮，咱這日子真算沒法過啦！”原來早先扛長活，打短工的，差不多都在二十三戶里，如今組織成社，誰還來再給他干這個？剩下那些中農戶，正當農活緊的時候，自家的都忙活不過來，任你出大價，他們也不願扔下自己的活兒去替別人打短。

王悅發了半天火，又在這二十三戶的農業社身上打起主意來。他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瞅個機會，對社里的邵慶堂說：“你的光景怎麼樣？還有吃的嗎？”慶堂說：“早沒的吃啦。”“怎不想法兒？”“沒的法兒想呀！”王悅就裝出一副關心的樣子說：“割荊條呀，一百斤荊條換三斤紅高粱，這不是到口的糧食呀！”

庆堂回来对社里人一說，杜奎說：“王悅这家伙又在使啥坏心眼儿吧！”王荣接上說：“三斤紅高粱，一百斤荆条，他一手給紅高粱，咱一手交荆条，怕啥？怎么也比餓着肚子强呀！”众人一听，倒也是的。就集合去南山割荆条。

王悅收买了几千斤荆条，心里暗喜，得意忘形，在当街对几家中农說：“他們割多少，咱們收多少，压綠肥使不了，晒干了，当柴禾燒也值得。叫他們积不了肥，又誤了庄稼营生，明年更过不了！”

这話被社里人听見了，回来一反映，杜奎气得呼呼地說：“看怎么样？我說他揣着坏心腸嘛，我去使扁担拍死他！”

国藩暗自叹口气，說：“咱算上了他一回当，吃一塹，长一智，往后割了荆条，自己压綠肥，貴賤不卖給他們啦。”

众人听了，也激起义憤，大长志气，割荆条，压綠肥，干得挺欢。这么干了七、八天，人們肚子里少东西，身子弱，到底頂不住了。

那工夫，实在是說不上的艰难呀，二十三戶里，大多数的戶早就断了頓，只是靠挖馬荳菜来过活。那一天，王生老汉来找国藩，半吞半吐地說：“国藩，我……想歇几天，中不中？”国藩知道他的难处，还是亲切地問他为啥，問了几遍，王生才說：“不說你也清楚，咱这二十三戶，有多一半子人家揭不开鍋，我家里也是两天沒啥吃的啦，淨

一把子張口的物件，怎办呢，我是想着出去找点吃的。”国藩說：“二哥，青黄不接，你到哪去借呀！”“不是去借，我想把过去的营生拾起来，要点飯吃。”

国藩一听，差点掉下泪来，前些时候，互助互济，国藩拿出点玉米，杜奎連小猪也卖了。这几天，国藩自己也是沒啥可吃，光是喝点苋菜湯，身上倒是胖起来了，却沒一点气力。这还不大要紧，最可气的是王悦那家伙。社員們挖馬苋菜，他赶着驴打道边过，驴把嘴伸进盛馬苋菜的籠筐里，社員們拘驴，王悦斜着眼，鼻子里笑着說：“你別拘，我的驴還沒那么賤，不吃你們那个。”想到这点，国藩就认真地說：“二哥，咱們人是穷，志可不穷呀。”王生說：“这話我記住啦，再穷，也是一个穷嘛，还能給咱再添上个穷娄！我这回出去要飯，不管到哪里，死活也不說是社員，不給咱社里丢名誉。”国藩含着泪說：“二哥，你千万不能出去，白薯已經結上块啦，实在沒法儿了，刨点白薯掺和着吃，也餓不死人呀！”王生也含着泪說：“咳，国藩你也是种地人，怎就不想想，吃青如同吃金，顾了眼前，往后日子还怎么过！”

这些国藩当然是明白的，可是到了这严重时刻，他怎能不忧心如焚呢。恰好在这工夫，如大旱喜雨似的来了解救。

原来区里已了解到这种情况，赵書記連夜赶到西鋪来，找到国藩和杜奎說：“你們生活这样困难，为啥不告訴区委一声呢！”国藩說：“我們可以对付。”“怎对付？”杜奎

沉吟了一会，說：“早先比这困难多了，还不是吃糠咽菜的过来啦。再說，白薯結了块，实在过不去，刨点吃，怎也好对付。”赵書記看着他們两人說：“吃青行嗎？”国藩說：“我們知道要减产，可是……”赵書記說：“减产可减大啦！你們农业社头一年办，还有个王悅和你們較量，你們想，这胜败关系多大！”

国藩和杜奎沉默不語，赵書記就笑着說：“你們为啥不貸点款？”国藩說：“我們不願先在脊梁上背上帳。”赵書記說：“你們这种精神是好的，可是也得实事求是。貸了款，买点粮食，分給社員們吃，有了勁，生产出来的不比这多呀！”随后又說，“区委已确定派李書記到这儿来蹲点，帮助大家来克服困难，大家要发憤图强，长志气，把社切切实实办好，让大伙看到它的优越性。”

第二天，信用社主任送来五十元錢，說：“赵書記說啦，让你们量吃的。”

国藩和杜奎心里多么激动，就不用提了。他們当时就按实际困难情况每户分了三两元。社員看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这样关心他們，又有了吃的，情緒顿时高了許多，耨地、压綠肥，又是一番熱鬧。

这时节，玉米长上了穗子，棒子尖挂上了花紅綫。王悅眼瞅着社里的玉米象小树林似的越长越旺，油綠綠一大片；他的玉米却染上一层菜黄色，有的叶尖上还发了干，又是嫉恨，又是焦急。最可气的是看熱鬧人們的神色，他們口中不言，眼里却在說話：“大局已定啦！”

大局已定嗎？他不願承認這個，也不會就此罷休的。那一天，路過地邊，碰上社員溫自禮正割草，他瞅着庄稼，對溫自禮說：“你們干勁不小呀！”溫自禮唔了一聲：“不小。”王悅又說：“庄稼不錯呀！”“唔，不錯。”王悅轉着眼珠呆了一會，又說：“不錯是不錯，你們還得要飯吃。”溫自禮奇怪地問：“那為啥？”王悅眯眼笑着不答應。溫自禮又問一句，他才慢吞吞地說：“我這是你說呀，別人我還懶得告訴呢，你們不是貸來款嗎，你知道貸了多少？我不說你是不清楚，貸來了兩千一百元呀，只給你們分了五十元，那兩千零五十元，哼！都肥了他們黨員啦，這你們還不要飯怎辦，這話是我對你說，你可千萬別告訴別人！”

溫自禮聽了這話，當時如果反映到社里，本會一說就明，也不至鬧出一場風波來。千不該，萬不該，一時糊了心眼兒，听了蛇叫，當是鳥鳴，竟信以為真，撂下活計，唉聲嘆氣，回得家來，還說給王榮。王榮也自糊塗，自己信了，又轉告別人。俗話說：“好話不出門，壞話一溜風”，不到一天工夫，好多社員都知道了，嘰嘰喳喳，胡猜亂想。溫自禮和王榮無緣無故地病了，其他社員也沒心思干活兒。只蒙着國藩和杜奎幾人。

國藩和杜奎看見人們這般情緒，好生奇怪，問人們，却問不出啥來，那王榮只是一句氣話：“怎着也是餓肚子，要飯。”杜奎發了急說：“怕餓肚子就得加緊生產，嘸嘴生氣，肚子能飽啦！”“肚子不飽，也不能當傻瓜！”“你這是啥話！”“啥話，你問溫自禮去！”杜奎急忙找到溫自禮，溫自

礼更是赌气不讲，經不住杜奎再三追問，他才把王悅那段鬼話倒了出來。杜奎一听，气得哭笑不得。“咳！你呀，算糊塗到家啦，人話不听，偏信那鬼話！”“不是真的？”“王悅是个啥家伙，你还不知道！他放出屁来，你就不聞一聞是香是臭！”

杜奎回来对国藩一叙說，国藩也生了会子气，接着又苦笑一声，說：“这事咱也有缺点，光顾了忙生产，要是早点把这些向大伙說清楚了，也不会鬧出这事来。”又回头对會計佟启說：“今晚开个会，把帳目給大伙公布一下！”

晚上在社員会上，佟启不但把那五十元貸款交代清楚，还把社里其他一切财产和收支情况一宗一宗的报給大家听。报完了，国藩問大家还有啥疑問沒有，众人說：“这就明白啦，还有啥可疑的！”有的說：“王悅那家伙为啥要放那屁，害的人好苦！”

国藩站起来，向大家看了一眼，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爱护咱們，給了五十元的生活貸款，解决了咱們很大困难。王悅紅里攪黑地說啥两千一百元，两千一，哪怕两万一，他說了，由他去担承，咱們农业社身上可沒那些債。”停了停，又說：“可是明是鬼話，有的人为啥偏要信呢？人家时时刻刻在計算咱們，咱們自己倒迷了心眼，是非不清，好坏不分，淨吃那暗亏。往后这类事还会有，只要咱們眼睛擦亮，心眼放明，他那啥鬼計妖法就都不灵啦。”

經過这一回事件，大家受到的教育着实不少。眼瞅

着社里和王悅的庄稼已經分出了高低，社員們劳动情緒特別高。到等秋收，不但社里和王悅比賽的那块玉米賽过了王悅，全部庄稼的产量都超过了王悅，社里每亩平均产量是二百五十四斤，超过了历年西鋪村的产量，王悅的产量差好几十斤。在这一番較量中，二十三戶的农业社取得了偉大的胜利，王悅是彻底失敗了。

諷刺、挑撥、打击、破坏、較量，他使尽了一切坏法，那二十三戶的农业社，不但沒有象他妄想的垮了台，还获得了丰收，巩固下来，而且吸引了其他农民，扩大成八十三戶了。

一九五三年这一年，王悅和社較量是彻底失敗了。

人們記得，他时常站在当街，賭咒发誓地向一些单干的中农說过的一句話：“穷棒子社，他們要能赶上我去，我把眼珠子摳下来踏个水泡！”这工夫，人們就說：“咱們看他王悅摳眼珠吧！”

王悅吹气尽管吹气，他当然不会摳下眼珠来的。可是不久，碰巧出了这么一件事。

离王悅家門口不远，当街有个铁匠炉，铁匠打制镰刀，往里加鋼，正在斬截一节鋼。不少人圍着看熱鬧。王悅叼着烟袋走出来，歪戴着帽子，也走过来瞅熱鬧，剛站下三几分钟，忽然嗖的一声，被斬截断的一小片鋼飞过来，不偏不倚，正打在王悅的右眼上，只听他啊哟一声叫，弓下身子，用手捂住眼。众人莫名其妙，上前看时，王悅的右眼珠子已經象一顆死蛇蛋了。

人們不禁高興地說：“不用他掘啦，那眼珠自个儿掉下來摔成泡啦！”

變成了一只眼的王悅，變得更凶惡了，他象一只被擊傷的惡狼，呲牙咧嘴，妄圖最後掙扎。他明顯地感覺到過去的一套已經不行了，於是象變色蜥蜴似的又另變一種顏色，抓取農業社這個形式，和國藩杜奎他們的農業社再來一次較量。

一九五四年三月，有一天，王悅召集了十四戶中農，說：“咱們也鬧它個農業社吧！”那些人都驚訝地說：“你也要鬧農業社！”王悅嘆了口氣說：“今年不比去年啦，這年頭，你們看不出來，你們要不入他們那個社，咱們就得自个儿成個社。”那些人說：“我們還想再看一年呢。”王悅說：“不用再看啦，往後帳也不好放啦，地也租不出去啦，活兒忙了雇個短工也雇不上啦，不鬧社是過不去啦。”王悅看見大家猶猶豫豫，二心不定，就嘿嘿笑地說：“我說個辦法你們看怎麼樣，咱們的地、牲口誰的還是誰的，糞都往自己地里使，秋後打了糧食誰的也還是歸誰的。”有人奇怪地說：“那，那不是假的嗎，人家農業社可不興這麼着。”王悅又嘿嘿地笑着說：“管它是真的假的，反正第一層，趕上時興，可以向政府貸款；第二層，免得他們拘管咱們，照舊過咱們的日子。”

那些中農有的贊成，有的還猶猶豫豫，王悅就在外面大吹大擂，說他們也組織了一個農業社。

他們那個“社”有人提出：“你說社成立啦，可是沒得

到正式批准，这算数吗？”王悦阴险地笑着：“这我早考虑到啦，咱们好比肉，还是肥肉，就是有肉无骨，这也不要紧，找个他们的党员，顶个社长，还怕批不准！”“找谁呢？人家党员差不多都入了社啦。”有人说：“既然这样，把国藩或杜奎弄过一个来，不就行啦。”王悦一听，心下暗暗叫苦，可是他嘿嘿一笑说：“那人家决不会来的。”“那怎么办？”王悦又阴险地一笑，“我倒早想好啦，温化之是个从部队上转业回来的党员，他家还没有入社，拉他进来，给他点甜头，他一干上，这还有啥问题。”说着，得意地咧开嘴笑了。

他得意的咧着嘴去找温化之，温化之真没有拒绝，不但一口答应，还谈得挺合拍。王悦更是得意了。一切都谈就绪了，就叫温化之到区里去申请批准。温化之这回可是心中有底。自从李书记经常来这儿蹲点以后，曾找他谈过几次话，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党员在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摇摇晃晃是不对的，对王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不问不管也是不对的。因此，他到了区里，并没有办什么申请批准的手续，却把王悦的阴谋活动向区委一一汇报了。

历史上的罪恶，加上现行破坏活动，王悦就在这年五月十七日被逮捕判刑，劳动改造。

王悦和农业社的这一场复杂尖锐的较量，到此才告一段落。

區委書記

古 草

開完會，三星老高了，家家戶戶早已都睡了，國藩杜奎兩個在當街又聊了一會，杜奎就去做出發的準備——明早帶領八十三戶社員去打柴；國藩就回社址，準備休息——他和李書記同住在这个小東廂屋里。

國藩推開門，屋里黑洞洞的，沒有一個人。

他把兩個行李鋪好，就又出屋，看見飼養員，問：

“沒看見李書記到哪儿去？”

飼養員說：“剛才他還在這兒——”

“做啥着？”

“哈！李書記真細心負責，別人比不了啊！”飼養員一邊給牲口添草，一邊說，“天天夜里他把牲口槽一个个都給摸過來，生怕草料不合適，有雜東西。剛才他摸出一塊土喀拉，不放心了，囑咐了我一會子……”

國藩在牲口棚旁邊站了會兒，听牲口咯吱咯吱吃的挺香。他望了望滿天的繁星，想起這一天繁忙的工作，該辦的事李書記差不多都辦完了，過會必回來。他也累了，

就先回屋，脱衣服躺下就着了。

当他睡过一觉，醒来的时候，只见一个大高个蹑手蹑脚的推门进来，摸索了一会，找了盒洋火，把小豆油灯点上。这时才看清楚：这个大高个有四五十岁，光头，长挂脸，尖下颏，大鼻子，卧蚕眉，双颊稍有连鬓，浑身上下瘦瘦的，穿着一身旧式的黑棉裤黑棉袄，两条腿和两只胳膊显得特别长。

这就是李书记。国藩翻了一个身，问：“这么晚到哪去着？”

李书记嗯了一声，说：“南院东圈那个母猪下小猪了。”

“下几个？”

“一窝下十八个。”

“啊……”

“黑夜下猪，总得有人照看，要不就会压死……”原来李书记照看“下猪”的去了。

“睡吧，李书记……”国藩又翻了一个身。

李书记却没睡，他把灯端过去，拿出一张纸，一支笔，趴在小木桌上，在写什么。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李书记使劲费力地写了好一会子，才写满了一页。大概他感觉写的不够好，又从头到尾改了一下。可是，后来他又一看，大概还不满意，就撕了，揉了一个球，扔了。接着，又拿出一张纸来，又写。国藩躺在炕上，掉过头来，说：

“李書記寫啥呢？太晚了，累了一天，睡覺吧。”

李書記還是聚精會神地在寫。他又寫滿了一張，看了看，大概必是還不對心事，改了改不行，又撕了，揉成一個球，丟了。接着，他又拿出一張白紙來，又寫……國藩已睡着了。

第二天，又是繁忙的生產，緊張的工作。杜奎帶領四、五十個人上山打柴去了，國藩留下和李書記一起督促往地里運糞，準備開春脫坯用的土，積肥，壓地，打咯拉……晚上一開會又是開得很晚——散了會，他照常摸摸牲口槽，檢查檢查草料（他強調牲口要吃好夜草），以及看看豬、羊、副業房……到半夜才回到小屋。回到屋，他還是不休息，還是照舊點上小豆油燈，拿出一張紙、一支筆，趴在那小木桌上，照舊的寫。寫，改，撕了，又寫，又是扔滿一地紙球。……這樣下去好多天。有天夜間，國藩問：

“李書記你三更半夜的總寫，到底寫啥呢？”

李書記這才說：

“嘿！縣委總說咱們這兒搞的好，總跟咱們要文字匯報；最近趙書記又捎信來說，區委決定提前開書記碰頭會，要把咱們這兒的經驗總結一下……”

“啊，原來是這樣。”

“我給你們總結了三頁半，題目是：‘白手起家，勤儉辦社，窮棒子精神’，你看看，哪兒不合適，再改。”

國藩聽說要總結他們的經驗，便趕緊伸手拿過一張，

就着小豆油灯看——見上面密密麻麻、歪歪斜斜，象小学一年級学生的作业：

白手起家 勤儉办社 穷棒子精神

国藩很兴奋。他把三頁半都看完以后高兴的說：“是这样……是这样……”心里想：“別看李書記沒文化，总结的可真好……”

李書記叫李继增，遼化四区人，貧农家庭出身，从小就吃苦，沒上过学，十六岁时父亲死去，全家六口人靠他一人生活。八路军开辟这个地区，他开始在村里活动，一九四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办事員，村支书，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脫产出来，先在四区当組織干事、組織委員，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調到这儿，任鸡鴨村区(十区)区委副書記。調来不久，根据区委分工，他就扎入到西鋪这穷棒子社来了。

他来西鋪时，穷棒子社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国藩和杜奎出了不少主意，如：怎样又勤又儉、自力更生、贯彻省委指示；怎样团结大伙，实行民主办社，做好思想工作；怎样組織竞赛、評工記分、互助互济、解决生产和生活問題……。二十三戶社員很快就发觉：这个李書記不但做事认真、懂得党的政策，而且榜地拔麦，挑水送粪，样样在行，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干起活来是头把手。

这年生活很苦，李書記都叫号飯。号到一家，一看是菜粥，蝇子嗡嗡嗡；号到一家，一看是菜粥，蝇子嗡嗡嗡；

国藩杜奎怕李书记吃不下去，有一天，国藩說，

“别号飯了。”

“咋啦？”

“单給你做点吧！”

“不用！”

接連三天，李书记說了三个“不用”，国藩也就不再張罗了。社員对李书记这种同甘共苦的精神，从心里佩服。

秋收——显示出組織起来的优越性了。社員的实际收入比单干时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还积累了两千四百元的公共财产。社外許多农民看到社的优越性，紛紛想要入社。

继增书记认为这是“扩社”的最好时候，就着手做这件工作。

但二十三戶社員不太同意，特别是王荣戴存出头橫着，不叫吸收，理由是：“我們头一年頂十年过；当初那样困难，他們不但不帮助，反而諷刺、看笑話；現在弄好了，誰也不用想沾边；二十三戶悶头干它十年八年再說。”针对这思想，继增书记就與他們个别談話、說服教育，但咋說也不中；后来发觉这主要是国藩杜奎两个不通，就又跟国藩杜奎談；来来回回做了好长時間工作，一直到县委召开三級干部會議，貫徹总路綫、批判关門主义为止。

扩社结束后，他就着手总结二十三戶办社經驗。由于文化淺(脫产后才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慢慢认字)，

他写材料很吃力。但他是个毅力很强的人，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熬过多少个夜晚，总结还是写了出来。

国藩把这总结看了两遍，杜奎回来后，国藩又给他念了一回，并在二十三户社员会上讨论了一次。这些虽都是他们大伙实际做的，但经李书记一总结，大伙都感到提高了。

二

这天早饭后，继增书记带着个布兜子，回到鸡鸣村区委会。他先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个靠近菜园的很小的房间。屋子没生火炉，桌子上椅子上又有很多尘土，他呆了不到两分钟，就又出来，进了后院东屋。这屋子温度很高，火炉熊熊地燃烧着，铁壶里的水沸腾着，壶嘴里冒出来一股股的蒸气，继增的全身顿时暖和过来了。

“回来啦？”一个中等个儿、很壮实的男子，一面打招呼，一面正充满信心地拿着一把按钉，把一张图纸按在墙上。他年在三十左右，穿着一身普通干部服，挎着一棵三号手枪，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干部模样。这张图纸，标示出全区土地、人口、经济发展的情况，也标示出互助合作运动的规模。在这间不大的四壁已经布满了地图、照片、信兜、大枪的房间里，又挂上这张图纸，更显得严实了。“今天是鸡鸣村集，咱们的会得下午开了。”他又对继增说。这时他已把图纸按好，正从继增手里接过来一卷材料，西

鋪办社經驗总结。

“啊，总结写出来了？”

“嗯。”

“西鋪二十三戶扩大以后，情况怎么样？”

“情况一直很好……”继增坐在靠窗的办公桌旁，补充着。

“国藩杜奎他們把今年的生产计划和各项指标訂好了嗎？”

“定下来了。国藩领导一撥劳力在家里生产，积肥、送粪、摸石头、擋壩阶；杜奎又帶領八十三戶社員到迁西打柴去了。”

他叫赵涌兴，是鸡鳴村区的区委书记，本地人。他的经历和继增同志大体相同；貧农出身，一九四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村里当支书，一九四八年脫产出来，先在区里当宣傳委員，一九四九年到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后，任区委副書記、書記。当一九五二年春东小寨和王老庄开始試办起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他和其他的区干部一样，对这件新的工作，是不懂因而也不会领导的。每次下乡，总是繞开社走，不敢接触社里的問題。有一次东小寨农业社主任陈泰主动到区里来找他，請示投資問題如何解决，他不敢做肯定的答复，只籠統的說：“你回去跟社員群众商量吧，大家同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到一九五二年秋后，又新建了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区干部不会领导社的問題，就一天比一天地更加明显和突出了。这时，上

級党委正发出指示：要求書記动手，积极领导互助合作运动。为了贯彻上级指示，取得办社經驗，涌兴首先带领大家学习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并背着行李卷，带着几个区干部，深入到洪鴨屯姜公忠农业生产合作社搞試点。

当时在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窝工現象比較普遍，他就先从“窝工”問題着手，和老农及社干部一起、座談、找原因、想办法。最后，制定出一个四定（定工、定质、定数、定时）方案，并在四定的基础上，結合着推广山西省郭玉思农业社实行包产的经验。及黑龙江省任国栋农业社推广新耕作制度的經驗。他在洪鴨屯一直搞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間，区委开会都到这里来开，通过會議，涌兴把洪鴨屯的经验經常告訴大家，大家也把別处的問題及时向他反映。洪鴨屯成了总结經驗、交流工作方法的学习站。經過試点、总结、交流，不仅把洪鴨屯农业社的包工包产問題解决了，克服了窝工現象，推动了别的农业社；而且也丰富和鍛炼了他們区干部。几个月后，当陈泰又到区里来找他，向他請示有关劳动管理問題的时候，他不再籠統的說些“回去跟群众去商量，群众說怎么办就怎么办”之类的話了，而是拿出了許多具体办法，帮助陈泰解决了許多具体問題，使东小寨村的农业合作社日益巩固，生产有很大提高。这样，领导被动的局面轉变了，区干部对于领导农业社的工作开始摸到了一些門路，他們由不懂到懂、由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由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到一九五四年春，全区已发展到四十三个农业社。現在，

他除了抓好区委的一般工作外，正突出地集中研究农业社发展后所产生的一些新的問題……。他看过继增書記带来的西鋪經驗的总结后，心里非常高兴。他正要跟继增商量有关下午會議內容的一些問題时，有一个村干部掀門帘进来了。

“赵書記，我們村剛成立了一个貧农社，別人不清楚，你准知道：我們村最穷啊。要牲口沒牲口，要車沒車，要农具沒农具，——这空手叫我們咋搞啊？”进来的是閻家屯的社主任繆海山。他头一句話就把問題提出来了。

“你說咋办呢？”赵書記見繆海山那种严肃的神气，不觉笑了。

“依我說，国家得貸給我們点款……”繆海山坐在床鋪旁边那个橛子上，两只粗大的手揣着一碗冒热气的开水，一口一口的喝着，还不断的說，“社成立了，国家得支持，要不我們这社搞不了……”

“貸款？”

“嗯。”

“貸多少？”

“先貸二百！”

“哈，你这口气真不小啊！”赵書記說。继增在旁卷了棵烟，遞給繆海山。

“确实有实际困难嘛。你們二位書記都在这呢，办社尽光嘴說不中啊，我們真一点底沒有，不貸款那不行啊！”

“你們應該学习西鋪的办法，”涌兴收敛了笑容，轉为

郑重的說，“西鋪原来也不比你們富啊，可是人家二十三戶去年搞的很好。”

“赵書記，你总說西鋪、西鋪，国家不定給西鋪多大支援呢，我們哪能比西鋪呢。”繆海山这时已暖和过来，他抽着烟，还在讲着自己的理。

“有啥支援啊，人家主要靠自己，”涌兴仍然郑重的說，“一九五二年秋后他們剛一建社时，二十三戶全部財產就只有三条馱腿，其他要啥沒啥，社員連棉袄都穿不上，不用說投資。論困难，他們比你們还困难。可是他們並沒有依靠国家貸款，而是根据省委指示，听了区委的話，自力更生，用自己双手，到四十里开外的山上去打柴，卖錢添置生产資料，只一冬，他們就打了价值四百三十多块的山柴，除解决一些社員的生活困难外，还添买了一头牛、一头馱、十九只羊、一辆花轎車、还有其他一些小型农具，足够維持全年生产。只是在青黄不接、实在沒办法时，国家才給他們五十元的生活貸款。”

說到这，涌兴就順便把继增書記拿来的那篇“总结”給繆海山念了一段。最后又接着說：

“国家現在正搞工业建設，处在困难时期，咱不能动不动就要求貸款。当初西鋪二十三戶缺这少那，人家可以到山上去取，你們閻家屯的貧雇农，为什么不可以长志气，也到山上去取呢。我看，你們就應該学习西鋪的这种精神，有困难自己克服。現在，你們社剛建立，八字還沒見一撇呢，就要求貸款，这对你們沒有好处。当然，必要

时，国家也会给你们支持，但从你们来说，不能有这依赖思想……”

“赵书记在屋吗？”

“谁呀？”

“我。”随着声音，从棉门帘里又探进来一个头。接着，这个戴着毡帽头、眉毛上胡子上都带冰碴的人就进来了，而且不只他一个，在他后边，又陆陆续续的进来好多个——这些都是各村的干部。今天是鸡鸣村集，他们除去赶集以外，又顺便找赵书记请示工作来了。

和穆海山的说话被打断了。涌兴和这些后来的干部一一打过招呼，不用让，他们都各自找了坐位。大家高高兴兴挤满了一屋子。坐在这里边的，除去于家沟的村长、鞭子峪的支书、大安庄的治保主任外，其余都是新建社的社主任：强庄子的强玉清、斗岭子的刁贺、付家城的张保印、洪山口的王世举、廖各庄的赵瑞……他们请示的问题，除去治保主任和村长的民政工作，优抚工作等以外，其余大都是有关合作社的问题。而合作社的问题里，最多的又都是“没牲口、没车辆、要求贷点款”的问题。

涌兴原也是老村干部，他的性格又比较随和，所以，和各村干部的关系都是无拘无束。他的屋子不仅各村干部可以随意进来，全十区的每个农民和社员也都可以随意进来。他们在一起谈话，有公的，也有私的，“问题”“工作”都是在这样随时随地的交谈中解决的。

但今天，涌兴的态度却比以往有些严肃了。他的眼

睛总不断的盯着墙上新挂起的那張图紙，脑子里集中地在考虑着一件事……，对于这些“要求貸点款”的社干部，他一个一个的都把他們打发走，对繆海山說的那些話，他又郑重地向他們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傍晚午时，屋子里只剩下继增和他两个人。涌兴对继增說：

“从县委三級干部會議后，不到两个月時間，咱們全区就由原来的十一个社发展到四十三个社，几乎村村都有社了。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可是，随着社的发展，一个新的問題又出現了：社成立后，究竟应该怎么办？——許多干部思想还不明确。剛才来的这几个社主任就很明显。有些社稍有困难，就想貸款，单纯依靠国家的思想很重。昨天叫办公室統計了一下，仅刁庄子、白馬峪、赵庄子等五个村，一次就要求貸款七百多元，要算上今天这些就更多。可是国家在一九五四年給咱們区全年的农貸数字还不到一百五十元。”

涌兴又把西鋪的总结拿出来，翻了一下，接着又說：“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出，勤儉經營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現在看，西鋪的經驗对我们越来越感到重要……”

“在这个問題上，西鋪二十三戶里开始也有思想斗争……”继增低着头，眯縫着眼，他說話和听別人說話都是很认真的。

“我現在考虑这么一个問題：农民是现实的，光讲道

理，思想問題不容易解決，我的意見是最好叫他們到西鋪去實際看一看——在建明社召開一個互助合作觀摩現場會，把全區的社主任、支書、會計、社員代表都叫去，推廣西鋪的經驗，豁着幾天時間，把思想統一一下。你看怎麼樣？”

“行。”

涌興又說：“要開，咱們就要準備得充分一些。你看，除了勤儉辦社以外，西鋪還有什麼特點值得大家學習的？”

繼增又低着頭，眯縫着眼，想了半天說：“還有國藩社奎他們的民主作風也好，有事常和大伙商量，這次上山打柴都是商量幾次才定的。”

涌興說：“對，這點也很重要。”

“前些日子，他們幾乎天天晚上在社址召開社員會，把問題、困難、家務財底擺給大家，發動大家討論、出主意、想辦法。”

“這正符合地委和縣委關於民主辦社的指示。我看咱們這次現場會上，除了談他們的勤儉辦社，還要介紹他們的民主辦社。只有遇事和群眾商量，傾聽群眾意見，才能發揮大家的積極性。你看行不行？”

“行。”

“開始我們少講，主要叫國藩社奎講，叫二十三戶社員講，叫大伙實際看，看完就分組討論，再組織大會發言，末了區委再拿出意見。”

“行。”继增都很同意。

两天后，在西鋪就召开了互助合作观摩現場会。

在會議中間，各村干部亲眼看到和听到了二十三戶社員在党的领导下，如何从三条驴腿起家，自力更生，勤儉創業，由穷变富的事迹；看到了他們依靠自己，克服困难，不向国家伸手，到山上去取的穷棒子精神；看到了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在組織起来后，仅仅一年的時間，他們不仅有了車、馬、牛、驴、猪、羊和各种农具，积累和扩大了公有财产，而且社員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誰不知道那尝尽旧社会一切疾苦、要过多年飯的王生，誰不知道那在旧社会走头无路、貧病交加、七口人伙盖一条被子的王菜，誰不知道那十四岁父母双亡、出房当地把三个妹妹送人、变成流浪乞討的孤儿戴存……如今，他們都丰衣足食；家家都有了新被褥，个个都穿了新棉衣，囤里、缸里、盆里、罐里的粮食都直往外流；戴存不仅把房子贖回，把妹妹接回，而且在准备成亲。……看到这些景象，一二百个与会者都異常感动，有的甚至流下了眼泪。

通过这次會議，大伙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加强了办社的信心，也学到了办社的方法。西鋪的經驗在全区开花了。閻家屯的繆海山不再要求貸款；赵庄子、强庄子、斗岭子……各村原来提的要求都自动撤銷；他們——支部書記和社主任都亲自帶領社員去深山打柴。“缺柴缺米，到山上去取”，“缺驴缺馬，到山上去拉”。勤儉之風、不依靠国家之風、自力更生之風盛行起来。只一冬，

全区就打了四百二十万斤柴。社比过去多了，贷款数字却比原来少了。一九五四年全区发放的农业贷款只四十多元，比一九五三年少十倍。在区委和周围兄弟社的鼓舞下，西铺的干劲更高，今后应该怎么办，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更明确了。

三

一九五六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在西铺南山，在沟沟坎坎、高高低低的坡地梯田上，出现了一伙伙的劳动人群。人群比往日密，比往日多，比往日也干的欢、干的紧。他们穿着黑色的蓝色的衣服，挥动着胳膊，抡着大镢，撬着石块，抬着条筐。条筐一来一往，把大小石头从地当中送出来，送到一个陡壁处，又倒在山沟里。他们根据事先做好的规划，把可以清除的坝阶（在几块坡度不大的梯田上布满着很多零散的小坎阶的），清除了。这些象征着旧的私有制度留下来的一道大界石，被打碎了。在他们的脚下，耕地一点点扩充，有的两块地合成一块地，有的四块地合成一块地。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坝阶一个个一块块减少了。他们从起大早吃过早饭到现在，还没休息。太阳从东方升起，又升高了，他们每个人的脑门上，冒出一层层的汗珠，镢刃迎着阳光，闪闪发亮。棉衣脱下来了，或者丢在一旁，或者摔在树枝上。他们有的光着膀子，有的只穿着一件单褂，在接近零度的气候里，并

不感到寒冷，而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流着、流着一股巨大的热流……小褂很快又被汗水塌透了。

当日头老高、继增书记擦了擦汗、又和屈福万抬起一筐石头的时候，只听东边传来一声哨响，杜奎在喊着：

“休息半点钟！”

“嘩啦啦……”一筐石头顺着山沟滚下去。

“休息半点钟！”

“嘩啦啦……”又是一筐。

人们听到杜奎第三次的喊声，才把镐抛在一边，把筐放在跟前，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各找地方坐下来。他们有的吸着烟，有的在高声谈论着。和往日不同，他们今天没有笑闹，谈论的是一些严肃的事。戴存今天也没上树，而是郑重的坐在大伙中间，听大伙谈论昨天晚上所没有谈论完的事。

“把这些坝阶拿下来，咱们种大倭瓜啊。”一个年青的农民提议着。

“才不种倭瓜呢。”另一个农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倭瓜也种，但不占这些耕地，咱们刨鱼鳞坑，”将近六十岁的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年农民一边喝着水，一边说，“这些地咱们还是种粮食啊。”

“对，主要是种粮食，”队长屈福万也接过来，“咱们队通过倒坝阶、换坝阶、刨坝阶，一下就可扩充耕地三十多亩，加上其他三个队，全村就是一百好几十亩，要种粮食，起码可以多打五六万斤，这不是最好的‘实际行动’嘛。”

杜奎沒休息，也沒參加這議論，他光着脊梁，脖子上系着一條圍巾，扛着把鎬，穿過一條溝，從屈福萬隊又到杜寶隊去了。

繼增書記坐在屈福萬右邊，他穿着個背心，披著個棉襖，卷著一棵煙，在吸著。他明白隊長這“實際行動”的含意。自從地委周書記和縣委曹書記來過一回，把他們的經驗總結去，《河北日報》和唐山《農民報》就大字標題，登出了遵化十區“書記動手、全黨辦社”，和西鋪村“勤儉辦社”的文章；緊接著，中央編選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又對這兩篇文章加了批語。當涌興他們倆分別在全區和全社範圍內層層開了好多個會，傳達這兩篇文章和中央的批語的時候，特別是傳達到：“……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每一個社員、每一個黨員和每一個幹部是受到了多大的鼓舞啊！而正在這時，西鋪村的初級社又決定和白馬峪、東鋪、大子家溝三個村合在一起，成立一個高級社。大家的情緒就更高了。“實際行動”就是表示他們對中央和各級黨委的回答，也表示他們對高級社的響應。

“我同意屈福萬大哥說的，咱們還是得多種糧食，”婦女隊長也發表了意見，“杜寶那隊昨兒晚上都討論好了，人家不但要多種糧食，還計劃把一百多亩豆子谷子和雜

粮改种高产作物：棒子和白薯。”

“咱们队的生产计划和指标也应该重新做做。”

“就是。和尚坟那片地，咱们很可以改种棒子。一亩谷子最多只打二百上下斤，一亩棒子至少可以打四百。”

“毛主席表扬了咱建明社，全国也都知道了咱们，若不争取多打粮食不中啊。”

“去年咱们这儿粮食达到自给，没由国家供应；今年咱们非得由缺粮变成余粮才行，多了不敢说，起码交它国家几万斤——这才是最好的‘实际行动’。”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正说到这里，一群黑的白的山羊、绵羊从半山窝里出现了，羊群蠕动着，随着地形起伏着。羊倌屈恩抽着响亮的鞭子，和羊群一起向这边拥过来。

“屈恩！”那个主张种大傻瓜的青年农民捂着嘴喊了。

“屈恩！”又一个农民喊着。

“到这歇会来！”

屈恩站住了，他听见了叫声，也用手捂着嘴，回答说：“不啊，我离不开羊，羊也离不开我啊！”

“你不是提过意见——放羊放够了吗？”大伙都知道二十三户之一的屈恩在前天还有换班思想，想调调工作。

“不啦！我要放一辈子啊……”随着回答，又是响亮的一鞭子，屈恩赶着羊群从小西沟又往庄户沟那边拐过去了。

羊群走远了。大伙从屈恩又谈到队里发展羊的问

題。繼增書記今天沒有多說話。他聽到社員們講的，看到大伙今天勞動的情緒，特別是屈恩在一天之內就有了這麼大的變化，他心中有說不出的興奮。他眯縫着眼，在心里想着、計劃着一些新的事：“把這些埧階倒過、換過、刨過後，再跟國藩杜奎商量一下，組織大伙修一條水渠；清明節前後，再發動社員，大力突擊一下植樹造林。然後跟涌興商量一下區委在這裡再召開一次現場會；糞價問題必須統一口徑，趕快落實下去，否則就要影響養豬；最重要的是幹部和黨員的政治學習要健全起來，要國藩杜奎他們帶頭學習好；……”做為一個區委書記，他和涌興一樣，想的很多很細很遠，想到自己責任的重大。

半個鐘頭過去了。當一聲哨響，杜奎出現時，繼增書記和大伙一樣，復甦起來，以更高的激情，投入到勞動的熱潮里。

穷棒子精神

陈青山

高級化，财产多，不能再使毛驴車。

大囤流，小囤滿，不能忘掉勤和儉。

上面两句話，反映了两种思想。一种是讲闊气、闊排場；一种是讲勤儉，不鋪張。一九五五年冬，西鋪、东鋪、白馬峪、大于家沟四个村山初級社联合轉为高級社，开始时，这两种思想，曾經有过一度激烈的斗争。

先是在社委会上，副主任高玉滿首先发表了他的高見：“咱們社是全国知名的社。現在又高級化了，就應該有个高級化的样子。那些小毛驴和花轆轤車太不打眼啦。咱應該把小毛驴全卖了，买回大騾子大馬；花轆轤車也卖了，换成胶輪車。这样，不但干活頂事，也衬得起咱們这个全国出名的社。”

高玉滿一說完，好几个委員都发言支持他的意見。

只有副主任杜奎表示反对：“小毛驴和花轆轤車有它的用处，全卖了换成新的大的，怕不符合勤儉办社的精神吧！”

社主任王国藩靜靜地听大家发言，看着爭論不休，他就說：“不管知名不知名，也不管初級社高級社，都得提高生产，不是为图好看。再說，咱們高級社剛成立，八字還沒見一撇，就动手买大牲口大車，这符合不符合勤儉的原則？”

高玉滿側过臉来冲国藩一乐，又把臉轉向大家說：“勤儉是咱們建明社的傳統，当然不能忘掉，我认为把那些驴換成騾馬，几个驴的料給一个騾或馬吃，这不是省料嗎？把几个花轆轤車換成一輛胶輪車，几个赶花轆轤車的人減到一个赶胶輪車，这不是省人嗎？难道这不符合勤儉原則？”說完回手把小烟袋鍋掏出来，插在烟口袋里使勁装着烟，等待回答。

国藩瞅了瞅高玉滿，本想进一步說明自己的理由，但又一想：初級社是一村一社，干部和社員互相都了解；眼下四个村联合組成高級社，彼此之間还不太清楚，急于反駁人家的意見有些不合适。再說，高玉滿原是白馬峪村初級社的主任，白馬峪是个富村，勤儉二字在他們心里还没有根子，不如等大家把意見都发表出来，然后再一块儿解决为好。这样，把想好的話压了回去，只說了句：“高玉滿又算了一笔賬，大伙討論一下吧。”高玉滿认为自己这个意見連国藩都沒回答上来，更加得意洋洋，滔滔不絕地又說了一陣。国藩听他說完，不慌不忙地問道：

“老高，你說几头驴能換一头騾子？”

“嗯，按現在的牲口价，买一头騾子得卖七个驴吧。”

“車呢？”

高玉滿揚起胡茬密布的下頰，瞅着屋頂想了想：“就咱們社的這些車，三四輛換一輛膠輪吧。”

國藩說：“是呀，咱們社除了原有的大牲口大車以外，每個生產隊最多也不過八九頭驢、三四輛花粘轆車，若按你這個計劃把牲口和車都換了，每個生產隊不就變成一頭騾馬、一輛膠輪車了嗎？這對生產有利嗎？”

“唉！你這不是活人叫尿憋死嗎？”高玉滿接着說，“咱們喊了多少天高級社好，高級社優越！究竟好在哪儿？優越在哪儿？只有使上大騾馬車才顯得提氣。”

國藩還是耐心地解釋說：“老高，你這個賬算了半天還是多花錢的賬。我們可要記住那句老話——過日子要從圍尖上省，不能從圍底上省。上級一再告訴咱們，一切要從需要與可能出發。區委的指示，也是要發揚勤儉辦社，自力更生的窮棒子精神。咱們高級社成立只這麼幾天，生產還沒搞，就花大批錢買騾馬和膠輪車，這不叫……”到嘴邊上的話，他又咽了回去，看了大伙一眼說：“大家想一想這麼辦合適嗎？”

大家聽國藩這一解釋，心里都明白了八九。有的說高玉滿想的太大，有的說他算的賬不對，也有的干脆說他有鋪張浪費思想。這個討論果然越來越激烈了。

討論到後來，大家的意見已逐漸一致，大多數人不贊成高玉滿這種講排場的主張。會議本可結束。但是國藩又一想：買不買大牲口大車，不僅是個財產處理問題，更

是关系到勤儉和浪費的重大問題。通过这件具体事例，想法进一步提高大家的認識，不是更好嗎？他于是用商量的口气說：“咱們这个討論，如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本来可以結束啦。可是这个問題，和咱社今后的生产有很大关系。生产队长們直接領導生产，究竟是买好还是不买好，他們比咱們更清楚。我想把队长們也找来一块儿商量一下。如果他們都不同意买，就沒有說的了；如果他們也同意买，咱們重新再研究。大家看这么办可以不？”各委員都点头同意。

一接到通知，队长們撂下飯碗就急忙来开会。十四个队的正副队长和管委会的全体委員，把社办公室挤了个滿滿騰騰。国藩他們几位主任为了主持會議方便，照旧坐在办公桌跟前。国藩先把上午管委会討論的情况作了一番介紹，特別談到买大牲口大車的問題时，他将高玉滿的主張和自己的意見不偏不倚的进行了說明。說完后他怕介紹的有遺漏或有偏差，扭头对高玉滿說：“老高，我有說的不全面和不恰当的地方，請你补充补充！”

高玉滿点头笑了笑，表示贊成国藩的介紹。国藩就向队长們說：

“你們不論对生产或对社員們的心情，比我們了解得多，你們还是多发表发表意見吧！”

沒等他說完，“轰”的一陣大笑。接着队长們就叨咕起来了。有的說：“这不是开玩笑嗎？咱們山地从古以来就有使毛驴的習慣。誰不知道咱这山坡子地送粪和收秋

都用毛驴馱，怎能把毛驴都卖掉呢？用七八个驴换一头骡子，干脆就别生产啦。”

有的說：“如果驴馬和胶輪車多的話，当然好，可是咱們社現時买得起嗎？”

十四队队长說得更具体：“就是买得起，也不能把毛驴和花帖轆車全卖掉哇。誰不知道我們队山坡地多。听說胶輪車拉东西是多，走平路可以，上坡下坡可費勁。走山地还不如花帖轆車好使哩！”他轉臉問有胶輪車的队的队长：“你們說是不是？”滿屋人都乐了。

队长們对于勤儉和浪費的道理沒讲多少，說的都是实际工作中的体驗，說服力却很强，管委会的干部們虽然也都是庄稼人，但开会多，談問題时，在方式和語气要讲究一些。这些队长們可不讲这个，都是直出直入，开門見山，对于高玉滿的批評确实有些火药味。高玉滿也是从抗日时期就在村里負責的老干部。水里来火里去，經受了各种考驗。但由于工作条件不同，自己思想上又不够警惕，滋长了好大喜功，讲究排場的毛病。眼下听了这許多中肯的批評，等于吃了一服清凉解毒剂，心里大大震动了一下。老話說：“良药苦口利于病”，他这个病，总算得到了医治。加上他这个人平常胸怀开闊，不大計較个人面子这些小事，所以一旦认清了自己的毛病以后，倒也能愉快地接受別人的意見。他等大家說完以后，就站起来一揮手說：

“咳，問題是越爭論越明啊！听大伙这样一分析，我

認識到自己的主張既不符合实际，又不符合勤儉。地地道道是个鋪張浪費的計劃。同意大家对我的批評……。现在我正式把那个讲究排場的意見收回来。”

沒等他說完就啪啪地响起了一陣掌声，随着掌声就是哄哄的議論声。有的說管委会的工作认真，有的說高玉滿的自我批評精神好，一直議論到天黑才散。委員們队长們因为这几天工作很忙，一听散会都急急忙忙地往回走。国藩因为今天这个会开得不錯，对今后勤儉办社会起很大的作用，心里很高兴。对高玉滿的自我批評精神，也感到敬佩。但他还怕高玉滿心中嘀咕，想找他扯几句。高玉滿剛要上自行車，猛回头見国藩跟在后面，就又停住，对国藩說：

“我們村南那道泉水的工程是不是再向县里請示一下，县里既然答应給咱們勘测，就該快点米人动手，咱們明年开春好动工啊！”

国藩見他毫不介意，对工作依然这样热心，不由滿心高兴，两眼盯着他那忠厚而愉快的面孔，笑着說：

“老高，快回家吧，剛才你那报告挺累的啦。”

高玉滿嘴角扯起深深的笑紋，說：“你別逗了，什么报告，我不知道那是檢討！”推起自行車走了几步，回头又冲国藩笑了笑，翹腿上车，“嗖”的一声飞走了。

第二年地一解冻，修泉的工程开始了。因为这工程在白馬峪村附近，又是高玉滿張罗的，管委会就責成他主管。高玉滿对这个工作果然很感兴趣。每天領着測量員

滿山遍野的跑着測量，起初他除了給測量員介紹介紹地形，只是幫忙干點零碎活兒。幾天後，他就象個內行人似的了。什麼皮尺呀，水平儀呀，都敢擺弄擺弄，什麼挖多寬多深呀，水的流量呀，也常插嘴算計算計。由於他對這項工程抓得緊，十幾天就勘測完了。測量員臨走的這天，在泉旁和他交代說：

“高主任，開這道泉的工程有兩個方案：一個是叫水順你們村南這道乾河溝往東流，這樣做澆地少；一個是把水引過這條乾河溝，從你們村東頭往西拐，一直繞到東鋪村頭，能澆幾個生產隊的地。不過……”測量員用鉛筆敲打几下記錄本，揚頰對着眼前的乾河溝，“這個工程在咱們全县來說可算不小哇，要用水泥在河底修個暗洞，叫水從河南岸鑽入暗洞，再從北岸鑽出來，這叫引水過河。”

“怎麼，水鑽入地下還能夠鑽出來？”高玉滿驚奇地問。

“嗯，科學嘛！”測量員點點頭，沖河溝揮舞了下記錄本，象對自己的設計十分滿意地說，“這工程從我畢業以後還是第一次遇到哪，你們若是能按質量完成的話，不但能澆地，還是一個很好的風景哪，水從暗洞中鑽出來，由於壓力大，和噴泉一樣好看。你們建明社再來人參觀，就非到這來看看不可，你說這不好嗎？”

高玉滿聽了測量員這個美化的設計，不覺又引起了他那貪大好盛的心意，目光從測量員身上轉向四周動勞的人群，不由暗想：真要能修起這麼個水渠，人們傍晚從

地里回来，洗洗手臉和衣服，青年男女在水泉边游逛游逛多好啊！……正当他为这未来的美景入醉入迷的时候，忽然年前管委会上那碼事象布谷鳥一样，不可，不可，叫鬧开了。他回过头来朝測量員問：

“按这个計劃，需要多少錢？”

“一千多元吧。”

“什么？一千多——元？”

“高主任，这不算多，”測量員又加用一些名詞說，“……不光开渠、挖沟、修暗洞需要多少吨水泥，还需要鋼筋和木料等东西，再加上人工和运输力，一千多元确实不多。”

“有比这个省錢的办法嗎？”高玉滿沉思了一下，緩慢地問。

“唉！咱俩一起跑了这些天，你还不知道这是科学嗎？”測量員側过臉望了望太阳說：“对不起，我得赶快走啦，你們对这次工程有啥意見，往县里打电话找我好啦。”

測量員說完就走了。高玉滿坐在河沟旁的上坎上，連抽了好几袋烟，思考着这个工程的計劃，一直想到太阳落，下地的人們都往回走了，他才回家。一边吃飯，一边同年前买大牲口大車那碼事情比較。比来比去，比出了一条理由，他认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碼事。上次自己提出的那个計劃，确实是根据不足，脱离实际；可是眼下这个水利工程計劃是測量員設計的，人家有充分的科学根据，說的又很全面。他觉得这回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提出

来和国藩主任商量了。主意已定，第二天早饭后他就奔社里来了。走进社院一看，一个木匠正在干活，旁边除了木匠家具，还有一些长短不齐的木杆子和厚薄不匀的板子，有的还是划了线 and 凿了眼的半成品。他正想往屋里走，文教委员老王拿着尺子走了出来。两人打过招呼，他又打听国藩在不在，老王用尺子朝旁边那些板子一指说：

“你来的真不巧，国藩主任做木匠活刚走。”

“怎么，他干木匠活？”

老王说：“你不知道我们村要修篮球场了，国藩亲自帮着做篮球筐板哩，因为板子薄不合标准，他找板子去啦。”

高玉满一听他们村要做篮球架，可就想起年前那次会议来了，于是说：“修篮球场跟生产有啥关系？”

老王说：“瞎！想不到你也这么说！你们当主任的这样不关心文化工作，叫我这文教委员怎当？现在是高级社了，总拿二十三户时候的眼光看问题还中？那时候找个会计都没有，现在哪村没有高小和中学毕业生？他们是有文化的年青人，和咱们不一样，每天有空打个篮球什么的可少不得呀！”

老王这个人乐观好盛的劲儿比高玉满还大。旧社会那时候，虽然村里很穷，过年过节唱戏或办会什么的，差不多都是他操持；办社这些年，村里开个什么会或操办业余剧团等事也是他领头，所以村里选上他当文教委员。一样的事情，叫他说，准使你高兴。高玉满听他这一解

釋，自己那股貪大好盛的勁頭更上來了，嘴角上扯着笑紋，興奮地眨着眼睛。老王見他听得入了迷，故意逗他，用尺子朝北一指說：

“不但修籃球場，我還打算在社對過那楊樹行前邊蓋個戲樓，從咱們社里挑選一批青年演員。往後慶丰收時，不能再象過去那樣光開會，咱們白天是籃球賽，晚上是大戲，叫周圍各社的人們都到咱們建明社來看熱鬧……。”

“嘿，你這個文教委員氣派可不小哇！可是你這些計劃國藩主任都同意了嗎？”高玉滿似信非信地問。

老王一樂，口氣變慢地說：“嗯，這不過是我的打算，可沒敢和他說哪。光這個籃球架，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依我說應當從城里買副新的，既合規格又好看，可國藩說：‘咱社有木料又有木匠，自己做就行啦。’結果這些木料果然不合標準。”他貓腰拿起一塊划了綫的板子說：“據青年人們說，籃球筐的遮板都得好松木，這楊木不中。可就是這楊木吧，也太薄啊！經我好說歹說，他才又找板子去了……”

他倆正說着，國藩扛着塊木板來了。老王上前先用尺子量了量，說：“這還是不夠標準呀！”

國藩把木板放在地上說：“走路多快的人，也得一步一步的走，絕不能一步就蹦很遠。我們這些板雖然不合規格，可是總比沒有強。等生產提高了，再做標準的還不中嗎？”

老王臉色一紅，勉強地笑了笑，不言語了。這回輸

着高玉滿逗老王了：“王文教委員，你那蓋戲樓的計劃怎麼樣？”

“去你的吧！”老王冲高玉滿使了个眼神又說，“你不是找国藩有事嗎？”

国藩和高玉滿到了屋里，兩人都抽着了烟，高玉滿便把修泉的計劃介紹了一遍，几天来学的那些名詞術語都用上了。最后說：

“这一千多元确实不少哇，我想用別的办法代替，向村里有經驗的老农打听，都說这道水自古以来就在那乾沟南边，要使水流过这河沟可实在沒办法。看起来科学技术可不簡單哪。”

国藩把抽尽了的烟灰往板凳上磕了磕，說：“是呀，科学我們不能反对，可是群众里也有科学呀，咱們乡間有好多病医院治不好，可是村里有些老偏方一治就好，你說这不是科学嗎？”

高玉滿不自然地笑了笑，手摆弄着烟袋說：“这个我明白，不过这修泉的偏方到哪去找呢？”

国藩說：“偏方有哇，咱們县君子口村袁士珍不是全国的劳模嗎？他在造林和引水上山等方面有很多創造，到他那里去找一找怎么样？”

“对，对！”高玉滿高兴地站了起来，說，“你一說，我就想起来了，去年在党訓班学习时，領導上一再指出：只有虛心向別人学习，才能学会本領，解决困难。我怎么又忘了呢！明天我就去好不好？”

国藩点了点头，高玉满高高兴兴地走了。第三天午饭后，社里正开管委会，高玉满回来了。大家刚站起来要打招呼，他就满面带笑的說开了：

“这回可有了办法啦。人家袁士珍把水引上山去，也没有修地下暗洞，好多沟坎都是用渡槽把水引了过去。咱们这个工程我也和袁士珍說了，我俩商量了一番，修个桥式的大渡槽也能代替那地下暗洞，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经过一番讨论，都同意这个办法。并且让高玉满继续主管这项工作。同时还决定从各生产队抽调一些强劳动力投入这项工程。高玉满领着这些人大干了十几天，工程就完成了。

这天傍黑就要放水了。王国藩、杜奎、于永水、张永清这四位主任带领着全体委员都去参观，他们到达时，四周男男女女早已把渡槽围了个风雨不透，正在七嘴八舌称赞这个工程。国藩他们一看果然有点来头，那渡槽长有几丈，宽有三尺，桩和架是木头的，槽面是用石头和白灰砌成的，从南到北和镜一样的平，和白瓷一样的白。人们正不绝口的夸赞，只听高玉满在槽南头大声喊叫：

“大家注意，放水啦！”

国藩他们刚喊了声“好！”水“嘩”的一声顺槽面流了过来。人们哄的一声欢腾起来。有的人挤到槽头洗手，有的人蹲在槽面上喝水，姑娘和小伙子们说笑着溅水玩。几位主任在旁一商议，国藩就大声向人们说：

“大家注意啦，叫高主任把这个工程的修建经过说说

中不中？”

“中！”人們大聲擁護。高玉滿一手拄着鐵鍬，一手擦了一下他那黑胡茬的嘴巴，說：“這工程原計劃在河溝下修一個水泥暗洞，成本是一千多元。經過國藩和我們研究以後，決定到袁士珍那裏去參觀學習，回來才改變成修這個渡槽。渡槽的木料是咱們山坡上的樹；槽面的石頭也是咱們山上的石頭。除去買了幾百斤白灰以外，都是咱們自己家出的料。把那些料都算錢的話，共合五十多元，比原來計劃節省一千元。……”聽到這裏，大家的掌聲象打雷一樣。

熱鬧了好一陣，聚集的人群才逐漸走散了。幾位主任和往常一樣，一邊走着，一邊談工作，一直談到白馬峪村頭。國藩看了看墨黑的天空，跟高玉滿打趣地說：

“老高，你剛才的這個報告，不能再算是檢討吧？”這回，高玉滿心懷暢快，嘿嘿地笑了。

幸福哪来？

張 朴

穷山坡，石头多，
上山下山鞋磨破，
姑娘做双绣花鞋，
下山不想再上坡。

穷山坡，石头多，
石头怎比光棍多，
一間破屋半床被，
黑天白日是个。

在旧社会，这里的姑娘，眼睛都是向下看的，穷苦的生活，艰难的岁月，逼迫得她们一心一意想嫁到山下面去，离开这些穷山沟，苦山岗。姑娘们出嫁的时候，娘家是陪送不起嫁妆的，只给做一双绣花鞋，穿着这双绣花鞋走下山去，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日子。

姑娘们长大了，一个个嫁到山下，这可苦了小伙子们。过去，在四十里铺一辈子娶不上媳妇，终身打光棍的，并不在少数。可是，自从一九五二年成立了“穷棒子”

农业社以来，仅仅经过了四年的时间，穷山沟变成了富山沟，苦山岗变成了笑山岗，乱石道变成了平马路，破茅屋变成了石瓦房，家家银行里有存款，屋子里放着丰产粮。山上的姑娘再不想往山下嫁了，就连山下的姑娘也抬起头来，自动地找上山去。仅一九五六年一年，建明社就有二十一对结婚的。

地里粮食丰产，家里增添人口，人财两盛，真是天大的喜事，全村到处是笑声，老人孩子一齐乐。可是，就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发生了一场小风波。

过去下地，集合钟没响，小伙子们早在集合场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说一声下地，整齐得就象天上的雁群。自从结婚的多了，日子富裕了，下地就不那么整齐，总是成对成双的，有时集合钟敲过了，小两口才慢慢的走出来，到收工的时候，太阳刚刚压着山顶，小伙子们就沉不住气了，总是东张张西望望，看看自己的媳妇在哪个山坡上干活。新媳妇们也愿意早点回去，梳洗梳洗打扮打扮。这样时间一长，上工的时间晚了，收工的时间早了，本来当天可以做完的活计，就拖到第二天，再加上搬山坡换地块，这样就耽误不少的工夫。有的小伙子还常常旷工，队长批评他们，他们说：“仓里有粮，银行里有钱，少干两天也受不了憋，忙什么？”有的小伙子还闹吃闹穿，抱怨生活不好，愿意出门找个工作，说什么：“挣钱不挣钱，闹身海潮蓝。”老人们看到这些现象，摇头叹气说：“人心没足，他们可知道过去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可是又不愿意开

口，觉得队长說他們还不听呢，自己何必再費唾沫。

这一天，邵庆昌的儿子邵海由地里回来，看見桌子上又摆的是玉米面餅子秫米粥，就把筷子一摔，說：

“老是玉米面餅子秫米粥，好象不吃这个心眼受不了似的，我又不是专吃玉米高粱的虫，就不許換換样，吃点白面粳米也死不了人。”

邵庆昌老汉一听这话生气的說，

“你小子想吃什么？想赴席没人摆，想喝酒没人买。过去皇上吃得好，那都是穷人的血汗，燒餅果子沾香油好吃，那得劳动去挣。玉米高粱这是庄稼人的上等粮食，你小子坐轎不知道脚磨地，这玉米高粱都是一把汗一把汗挣来的，你翅膀没长全，倒挑起飯食来了。”

儿子也不肯让父亲，就你一句我一句地頂起来。鬧得一家子都没吃飯。邵庆昌老汉赌气找到国藩和杜奎說：

“主任，你們得管管邵海这小子，他走路光挑着干岸站，忘了过去的河沟是怎么过来的，老子才几天不吃糠咽菜，他就摔筷子砸碗挑飯食。这日子没法过了。”

邵庆昌老汉的话还没完，一个队长闖进门來說：

“主任！咱这活没法干了，队里屈風自打娶了媳妇，晚上看戏白天睡觉，不是赶集、就是串亲，你叫他干活，脑瓜子一搖三撥浪，咱这庄稼怎么种？”

其实这些現象国藩和杜奎都看到眼里，他們把两个人打发走后，就召开了一次支委会，会上大家把最近的情况一汇集、研究，就觉得上级党提出要加强年青一代的社

会主义教育，实在是非常迫切的。当场决定派国藩和杜奎对这班青年进行一次教育。

晚饭后，月亮从长峪山头露出脸来，集合钟响了，青年男女走进小学校。除了新结婚二十多对之外，还有没结婚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一共不下六七十号人。大家说说笑笑，整个教室象翻了江。就在这个时候国藩和杜奎走进门来。杜奎说了声：“现在开会。”大家静下来。有的人还在小声议论着今天开会的内容，这个说一定是有突击任务，那个说，说不一定是派人到拖拉机站去学习……另一个说：“嗨，别说啦，王主任要说话啦。”

国藩站在讲台上，扫视大家一眼，说：

“今天我们开一个学习会，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

一个小伙子又高兴又调皮的说：

“主任，你问吧，我们的学习坚持的可好啦，国内外大事，生产知识，保险有问必答。”

“不，”王国藩摇摇头，“我不问国内外大事、也不问生产知识，我要问问你们，我们今天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这一下把好多人问楞了，明明生活过得很好，怎么又问过得怎么样呢？也有些人好象心虚，他们低下头不吭一声。一个小伙子说：

“我们生活过得很幸福。”

有些人也附和着说：

“对，我们生活过得很幸福。”

“是呀，我們生活过得很幸福，”国藩重复着大家的话，“可是，我再問問你們，我們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問得有点奇怪，一个小伙子笑嘻嘻的，好象这个问题不值得一答似的說：

“怎么来的，这誰不知道，劳动换来的呗！”

国藩的臉色变的严肃起来，他的話說得很慢，可是很有分量，

“劳动换来的？那么我来問你，你爷爷劳动了沒有？你爸爸劳动了沒有？为什么他們穷苦了一輩子，不用說过上幸福生活，連碗飽飯也吃不上？”

这一下可把小伙子問住了，整个教室鴉雀无声。

杜奎的火早就憋不住了，他嗖地一下跳上台去說：

“你爷爷給地主做了一輩子长活，死了連个棺材也买不起，用領破席卷了卷埋了；你爸也給地主当了一輩子牛馬，災荒年落了个餓死，他們哪一点比你們劳动的差？他們天天比日头起的还早，比牛馬干的还多，为什么过不上幸福日子？你說呀！”

祖一輩，父一輩的穷苦生活，出現在大家眼前……大家低头沉思着，誰也不說一句話。

忽然，在教室后面傳來低低的嗚咽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外号叫二大肚子的王子林在哭。国藩知道他从小受苦，就說：

“王子林，你說說你小时候的生活。”

国藩这样一說王子林哭得更厉害了。国藩說，

“別哭，你說說嘛。”

王子林抹了两把泪，看了看大家說：

“你們知道，我的外号为什么叫二大肚子嗎？”

有几个小伙子哧哧地想笑，可是被整个的严肃空气給压住了。

王子林接着說：

“那一年鬧災荒，媽媽餓得生了病，她倒在炕上一点力气也沒有了，对爸說：‘你給我个窩窩吃吧，吃个窩窩我这病就好啦。’可是我们家连一口窩窩也沒有，急的爸在屋里打轉轉。好容易爸从别人家要了一个窩窩来，媽媽两手捧着窩窩，看見我們餓得那个样子，她流下泪来，舍不得咬一口窩窩。”

說到这他又哭起来，許多人都低下头。他又接着說：

“媽媽病不好，爸还得給地主去扛活，家里一点吃的也沒有，姐姐就到山坡挑野菜給我吃，越吃野菜我越觉餓，胳膊腿瘦得象麻杆一样細，肚子越来越大，人們才給我起了个外号，叫二大肚子。”

說到这里許多人都落泪了。国藩接着說：

“过去的日子这么苦，可是現在的生活还有人不知足，摔筷子砸碗挑飯食，不願意吃玉米窩窩秫米粥。就說邵海吧，你知道你爸爸媽媽过去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你們原来是馬峰峪人，在那里实在沒法混了，你爸用一副挑子把你們挑出来，你們連个住处也沒有，你媽媽要飯吃，在半路上生的你。你問問你爸爸媽媽，他們过去見過白

面粳米什么样？他們在入社以前可吃过几頓餃子？你現在都嫌玉米面窩窩秫米粥不好吃。大家好好的想一想过去的日子吧。”

国藩的話声剛落，許多人紛紛要求发言。王生的大儿子述說着他小时候，跟着爸爸要飯的苦处，住破庙，住山洞，蹲树窟窿，狗咬人罵，挨餓受冻……

大家听了这些事实，都哭了起来。

国藩和杜奎觉得时机已到，又重新向大家問道：

“你們再仔細的想想，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到底是怎么来的？”

剛才发言的那個小伙子，站起来慢慢的說：

“因为有共产党的領導。”

“对，”国藩向前赶了一步，提高了声音說，“是共产党救了我們，共产党領導我們成立了农业社，穷山崗才长出好庄稼，苦山沟才有了好日子，穷棒子們才变得象个人！可是你們想想，你們对得起党嗎？”

杜奎剛才的火还没有压下去，沒等国藩說完，他就搶着說：

“你們哪一点对得起党？党叫我們过上好日子，穷棒子娶上了新媳妇，你們就什么都忘了，上工晚，收工早，摔筷子砸碗挑飯食，还說我們这里生活不好，要到外面找工作，小两口整天价赶集走亲戚。虽说两口子应当亲亲热热，可也不能見了媳妇連工作生产都忘了。”

杜奎說到这里停了停，国藩又接他上面的話茬說：

“党领导我們走合作化的道路，就为的是我們过好日子，过幸福的生活，小两口亲热，感情好，这是好事，不能象我們那个时候，結婚几年，在街上还不敢和媳妇說話。”

有几个人被說的笑了，旁边的人赶紧制止他。国藩又接着說：

“想想过去，看看現在，生活越幸福，工作生产的勁头就应当越大。再說，我們的生活还没有达到真正幸福的地步，这幸福就象一座山，”他指着窗外远远的景忠山，“我們現在才剛剛登着山根下面的一块石头，就滿足了，就懈勁了，那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山頂上？什么时候才能过上真正幸福生活？离共产主义还远着哪，还得加把勁，使勁干！”

小伙子們被說得低头不語。忽然屈風站起身来，羞愧的說：

“主任，过去我錯了。我觉得咱們的生活差不多了，該享享福啦，就把工作生产丢在了脑后。这不是我們两都在这呢，以后保证改过。”

国藩和杜奎見屈風檢查自己，就对大家說：

“屈風檢查了自己，你們大伙也說說，看近来的出工情况怎么样？”

“不好，不好……”声音說得低沉而慚愧。

“那么，我提議，”国藩說，“明天晚上，以团支部为核心，召开一个青年生产出工檢討会，大家說中不中？”

“中！”

杜奎又接着說：

“我提議，从后天起，請我們村受苦的老人，給我們讲讲他們的历史，大家看中不中？”

“中！”

这两声中字，說得这样响亮，震得教室嗡嗡地直响，声音在寂靜的深夜里，一直傳到长峪山谷中。

从此以后，每天晚上，青年們都集合在这个教室里，听自己的長輩們讲他們过去的血泪史。每天清早，当集合钟敲响的时候，男女青年社員們早已經带头走出村庄，他們排得那么整齐，又歌又舞，歌声越响，生产进度也就越快，庄稼长得也就越强。

再上柴山

刘 哲

一九六二年，秋天过去，冬天开始了。

大地，又脱去了绿色的盛装，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
厚重、雄偉、辽阔。

公路两旁的梨树、栗树、橡树、杨树……象列队似的，
拉开了一排排、一条条的哨兵线。

有六辆胶皮车，出了西铺村，沿着公路，朝着东方，朝着太阳，
蹦蹦地跑着。车把式耍着清脆的鞭子，车铃放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马儿撒着欢，哧哧地叫着。

每辆车上都坐着十多个人，他们都穿着崭新的棉衣，戴着棉帽，
一个个闪着黑红黑红的面孔，笑着、闹着、唱着。他们屁股下面坐着一卷一卷的行李，
行李下面是一袋一袋的粮食。镰刀、扁担、绳子横七竖八地插在空隙处。
油、盐、大白菜装载在车尾巴上。

这是一支西铺大队的战斗队。他们刚刚结束了秋种、秋收、秋堡，
刚刚结束了庆祝建社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没有休息，就整顿人马，
准备行装，在党支部的号召下，再上柴山，打柴练兵。

領隊的仍舊是大隊長杜奎。他坐在頭輛車的前邊，目光炯炯地望着前方。十年，短短十年間的農業生產合作化，特別是最近三年間的人民公社化，給山村帶來的巨大變化，在他心裏也象拉开了一條哨兵綫。

過去是三條驢腿人扛耢；如今是牛馬成群拖拉機……

過去是蓬門草屋，風掃地月當燈；如今是高房瓦舍，電燈電話……

過去是山高土薄，愁澇愁旱；如今是水庫閃着銀光，梯田翻起稻浪……

但是，革命的路上永遠是不平坦的。村支部最近一次會上，就研究了這樣的問題：要加強對年青一代的教育。有些年青人，由於生活的改善，由於缺少艱苦的鍛煉，逐漸已經忘掉了過去的苦日子是怎樣過來的。這次趁豐收以後，發起上山砍柴，一方面固然是為了解決社員今冬明春的取暖做飯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要發揚老傳統，讓這伙小青年也尝尝甘苦滋味。所以，六七十个勞力中青年人占了大部分。

杜奎想到這兒，回過頭來看看身後幾個小伙子，見他們正聚精會神地在一顛一簸的車上打百分。二隊隊長老王榮戴着狗皮帽，擠在一旁，正想得神。

杜奎用手肘碰了一下，問：“大哥，你這回出來想點啥？”

“想點啥？還不是為了咱隊里的事！”

“什么事？”

“今早出来时，咱队張金龙这小子老三老四地说，这回打来的柴，一定要各打各要，否则，他不干了。你想，这象話嗎？”

“各打各要？”杜奎立即眉毛一立，“你怎么回答呢？”

老王荣把狗皮帽往后一掀：“我说，那还行！要是各打各要，那些留在家里搞生产的怎么办呢？副业上的人怎么办呢？饲养员怎么办呢？咱得巩固集体呀！”

“对！”杜奎长出了一口气，“这回你算批评对了。不管什么事，咱们得首先想到集体，巩固集体。”

从这件事上，杜奎想到老王荣这几年来的变化。尽管在有些事情上，他还是好打小算盘，但是集体的观念是强多了。比如秋收时，有一天晚上忽然下起了雨，队上新打的三四千块土坯码在场上没有苫头，队里的席又不够用。王荣就把自己家里的新炕席揭下来苫在坯垛上，还不够，又把新雨布拿来苫上。这就带动了好几户社员，有的拿席，有的拿草帘，把坯苫好，没有受到损失。可见老贫农毕竟是老贫农，他的心和党的心，和广大社员的心是贴在一起的。

“这回打柴，你是后勤，完成任务有信心嗎？”杜奎又给他出了个难题。

“嗨，怎会没有信心！你看，咱们过去二十三户打柴是怎么样的队伍？这回打柴可是怎么样的队伍！嘿嘿！”老王荣咧开嘴乐了。

他們正这样叨咕着，“嗖——”后面飞上了一辆自行車。車上坐着戴存。这个孤儿現在已經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笑着打招呼道：“四叔，我先走一步了，咱們郭家峪見！”

“嗖——”后面又飞上了一輪自行車，車上坐着村团支部書記屈文。他左手把着車，右手揚起打招呼說：“四叔，咱們打头陣了！”

“嗖——嗖——”接連十多輛打柴队的自行車，象雁行般輕巧地掠過，消失在远方的山谷里。

轉眼打柴队进山已經三天了。头两天，打柴这个劳动，这伙青年还感到新鮮。天不高，他們唱着歌儿进山。尽管密密集集的柴林，連鬼子也钻不进去，镰刀一砍一踹老高，可是他們手划破了不喊痛，柴捆子也是压了又压，紧了又紧，每挑总有一百五六十斤。到了第三天，情况就两样了。歌声消沉了，許多小伙子头搭拉着；柴捆子也变小了，走起路来两腿打晃。有个别的，还悄悄嘟囔：“大冷天，什么活不好干？打柴！一担柴能值几个錢？不干也受不了憋！”这些現象，杜奎都看在了眼里。

这天晚上，他把青年們集合起来开会。

会前，“歌手們”歌不唱了，“扑克迷們”扑克也不玩了，一个个呆坐着，低头嚙嘴，象斗敗了的公鸡。杜奎有意纒上去摸摸这个的肩头，扳开手看看那个的手掌心。只見大部分人肩头紅肿了，手掌心也血泡累血泡。說实

在的，他有点心疼他們。但是一个战士在困难面前能够这样斗志消沉嗎？这是万万不能够的。他于是亮开象洪钟一样的嗓音問：“怎么，一个个都蔫巴啦？”

有些人羞怯地一乐。

随着，他提議說：“唱个歌不好嗎？”

团支书屈文首先响应：“对，咱們唱个歌，先唱《社会主义好》！”

雄壮的歌声起来了，許多人立即就显出了青年的朝气。

唱过了《社会主义好》，屈文又提議：“咱們再唱个《社員就是向阳花》。”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員都是藤上瓜，
瓜儿連着藤，
藤儿牵着瓜……

唱完歌，杜奎說：“現在开会，大伙都說說，是不是有点噙不住了？”

有的說：“咋一来是不大习惯，过几天想必就好啦！”

有的說：“最高的山咱能过，这点苦就不能受？沒問題，就是让咱专业打柴也行！”

但也有少数人縮着不吭声。有个叫吳德光的，嘟起嘴，不知在生誰的气。

杜奎有意挑他說：“小吳，背后你是有意見的，这回也

当面說說是些啥想法？”

小吳把小分頭一擺，果然一点也不示弱：“說就說，怕啥！大冷天为什么一定要上山喝西北風？人身是肉長的，又不是石頭！家里活有的是，干什么非來砍這一星半點柴？”

小吳話音剛落，矮胖子張金龍也敲起邊鼓：“說不苦那是瞎話，照我說早點回去算啦！”

這一挑，爭論就明了。會場立刻熱烈起來。

戴存說：“咱們是打柴鍛煉來了，不是享福來了。苦一點又怕什么呢？三條驢腿創業的時候，不比這更苦嗎？”

屈文說：“咱們青年人老喊着要學習先輩的革命精神，這點苦都受不了，還革什麼命？”

小吳還是頂牛：“到啥時候說啥話，誰讓咱生在這個好時候呢！”

“生在這個好時候，就該躺倒光享受不勞動了？”

“都像你一樣，咱國家的邊遠地區還怎么建設？”

會場上這時成了短兵相接。

“回家干別的活不是一樣勞動嗎？”

“你這是避重就輕，見困難就退縮！”

“衣服破了，你給我買嗎？”

“你這是胡鬧，打柴哪有不挂破衣服的！”

杜奎聽到這里，再也忍不住了，他把手一揮，大聲說：“都靜下來，我也說幾句。你們都是基干民兵。有了戰鬥

任务，是坚决克服困难，消灭敌人呢？还是撒腿往后跑，当逃兵呢？”话不多，可是打中了一些人的要害。好多人都低头不语了。

杜奎接着又把过去二十三户时上山打柴的情况说了说，目的是启发他们忆苦思甜。末了，他当场宣布：“这回打柴，咱们强调自愿。愿意留下的，咱们欢迎；坚持回去的，咱们也不强留！”

会后，吴德光等少数人，还是卷卷行李回去了，张金龙随大流留了下来。

这样又过了七八天。这中间杜奎接到通知，回去开会。他就把山上的工作临时交给五队队长杜宝负责。杜宝是西铺大队六个生产队里的一个老队长，一向以打硬仗著名。几年来风里雨里，水里火里，一直跑在社员们的前头。可是他不大会说话，有时工作方法也比较简单。

这时，沙河套上的柴垛，已经垛得象一座小山。原来瞧不起打柴的人，也动心了。他们想：“眼前柴价挺贵，要是各人打的都归自己，会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呀！”有些人就在背后嘀嘀咕咕。

有一回，张金龙等挑着柴担下山时，杜宝一看就来气了：“小伙子，你今天没有吃饱饭还是咋的？柴担子不怕被老鹰叼走？”

“人家有力气的人不上山有啥法，我就只能挑这一点！”

“噢！”杜宝吼上了：“年纪轻轻，自私心就这么重哪！”

回去我准告訴你爹。”

“你不是咱們隊的，管不着！”

“同你說，不解決問題。”跟在張金龍後面一個小伙子也插言幫腔。

這一下，把杜奎氣炸了。他放下柴担想發作，但又一想：自己是領導，和社員打架不象話，只得把這口氣咽進了肚里，挑起柴担自管自趕路。

回到宿營地，剛好杜奎回來了。他一面擦汗，一面硬聲硬氣地說：“老奎，你回來可好了，這攤子事你挑起吧，我算沒有這個能耐！”

杜奎笑笑說：“怎麼啦？”

“怎麼？張金龍這小子今天沒把人肚子氣炸！”隨着把事情經過一五一十說了。

杜奎立時立起了眉毛，細細一捉摸，知道問題的核心還是打了柴歸誰所有。要是鬆口說，各打各要，無疑是可以鼓起少數人的積極性的。但是這樣做行嗎？首先這和大隊支部的決定，廣大社員的利益不相符。再說這樣的積極性能維持多久？發展下去將會是什麼樣子？無疑是既削弱了集體，又禍害了個人。他於是當天晚上又組織了一個小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是：集體打柴該歸誰？

爭論一開始就展開了。

張金龍等少數人說，咱們在山上死氣慙力，挨冷受凍，打了柴按理應該歸自己。家里人想要，也可以自己來嘛！

屈文、戴存等多數人說，咱們二十三戶窮棒子社由窮到富就是靠的集體。從前單幹的時候，一家一戶誰也沒有鬧好過。這回咱們來打柴，隊里給拿着油、菜，補助着糧食，打柴歸個人不合理。

末了，杜奎亮開大嗓門，問那些主張各打各要的人說：“你們主張打來的柴應該歸自己，人家飼養員不燒柴中不？放牧的不燒柴中不？彈花的不燒柴中不？倉庫保管員不燒柴中不？榨油的不燒柴中不？米面加工的不燒柴中不？打鐵的不燒柴中不？車輛修理的不燒柴中不？會計不燒柴中不？……還有其他副業生產的人不燒柴中不？要是這樣，人家把牲畜、羊群、榨油、打鐵等等都歸自己中不？……”

這一連串簡短、急促的問話，一句句象小鋼錘一樣敲在每個人的心坎上。敲得大伙眉飛色舞，非常解氣；敲得張金龍等少數人，理屈詞窮，張口結舌。會場頓時一片鴉靜，只聽到喘氣的聲音。

杜奎沉了沉，瞅瞅大伙，見張金龍等少數人低下頭不說話了，知道已擊中了要害。然後，他又和緩地勸大伙：“現在咱們一舉一動，都得想到集體。咱們的每捆柴禾中有別人的一份，別人的勞動中也有咱們的一份。這叫做大伙為一人，一人為大伙。象有些人那樣，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別人，只看到芝麻綠豆大的小利，看不到長遠的大利，那叫自私自利，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思想……”說到這里，他忽然提高聲音：“你們是要集體主義思想呢？

还是要个人主义思想？”下面异口同声地回答：“我們要集体主义思想！”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笑笑問：“要集体主义思想该怎么办呢？为什么有些人松松散散、疲疲沓沓，一天才割鷹抓似的两小捆？那叫啥集体主义思想！”

張金龙慚愧地立起来說：“我过去想錯了，保证改过，你，你就看明天的吧！”接着別的人也表示了态度，一定要好好干。

接連几天，杜奎領头带他們上山，火辣辣地干了一場。

正在这时，党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精神下达了。杜奎对他們作了传达，同时还和当地党支部一起組織学习討論。通过这次学习，大家的眼界寬闊了，都認識到发展集体經濟，坚持階級斗爭的重要。思想觉悟无形中提高了一步。許多青年紛紛表示：“我們要忆苦思甜，不忘階級斗爭，誓作紅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們要吃得苦，經得起風雨，把老建明社的革命紅旗扛到底！”……立时，山上出現了一个热烈的打柴竞赛高潮。

由于家里社員群众也学习了党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精神，集体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开花結果了。中途回家的几个青年，檢討了自己的錯誤，也再次要求回山。他們同样受到了山上全体青年和社員們的欢迎。

轉眼一个月过去了。預定打柴的日子已經滿期。西鋪大队党支部考虑到山上的社員們都很累了，而家里又忙着要突击送糞，就写信来催他們回去。可是这伙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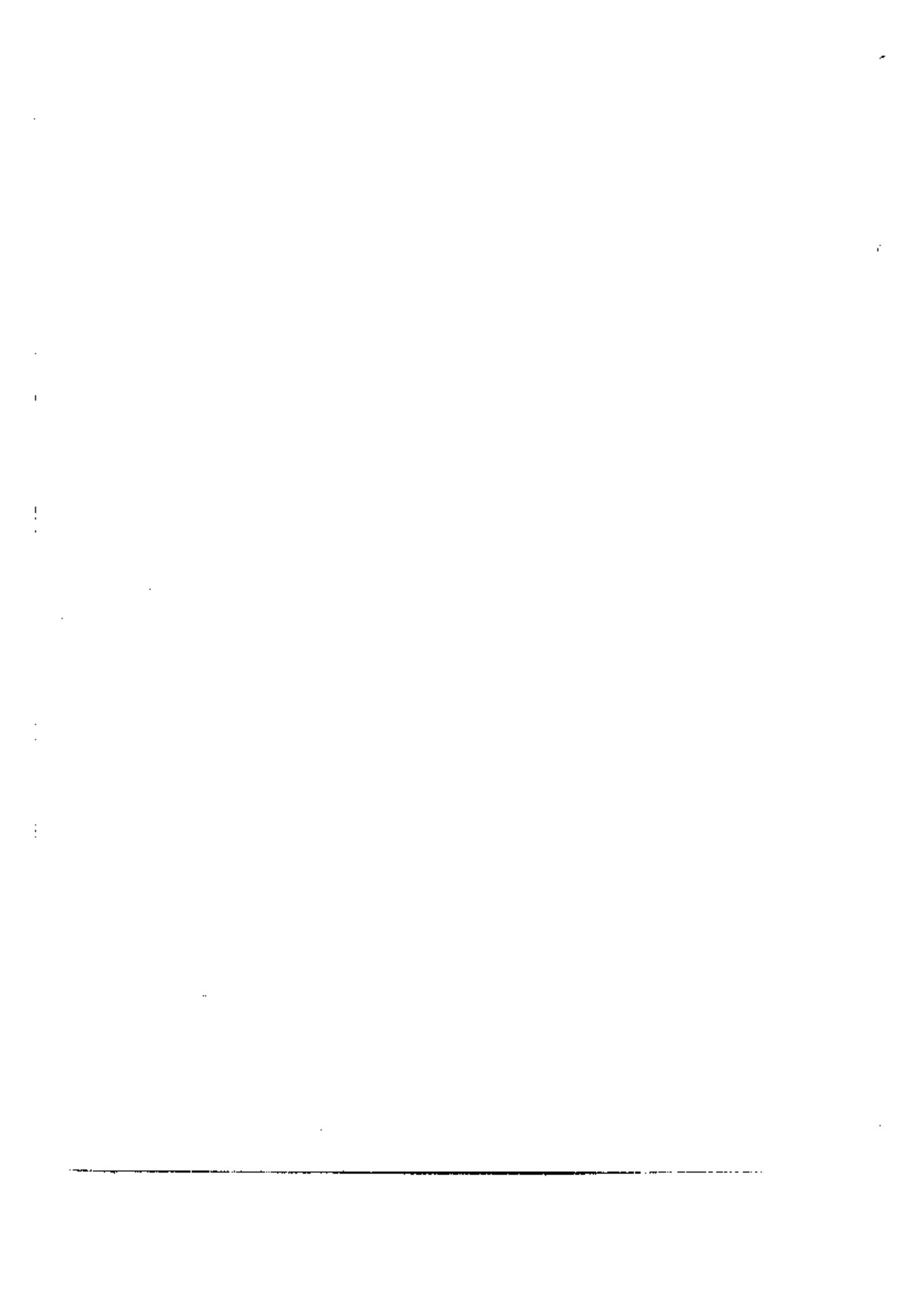
們一个个表示,要再多打一些时候,为集体多儲备一些柴火,累积一些資金。及至国藩第二次写信来催,才不得不整队回家。

临走时,当地許多群众連夜为队员們准备飯食,清晨起来又把队员們送出好几里路远,才恋恋不舍地分別了。

在短短一个月里,他們共打了六十多万斤柴,练出了一支紅色的队伍。

第二 部 分

二 十 三 戶



二十三戶小史

張 庆 田

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

——摘自《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按語

這二十三戶是什麼樣的人呢？讀過這篇文章按語的讀者，很可能想了解一下。這二十三戶的名單如下：

王國藩 杜奎 王生 王榮 王林 王金平 戴存
梁近田 邵慶林 邵慶昌 杜春 杜星 杜亮 杜
同 佟印 佟啟 佟瑞芝 佟春 范玉林 吳秀英
溫自禮 田玉蓮 屈恩

解放以前，全村一百五十四戶，只有十五戶能維持生活。十五戶當中有四戶地主，三戶富農，八戶富裕中農。其餘，大部分跟人家扛活、做月、討吃、背“毛”（在金礦背

矿石)、开店以及走关东等等。

提到貧苦，这二十三戶貧苦农民当中，除去會計修启以外，其他二十二戶，有的人要过飯，有的人扛过活、做过月，有的人給地主看过树，有的人在金矿給人家挖过金。王生一家子要过二十四年的飯，王荣也要过飯，戴存是一个孤儿，屈恩是个老羊倌。

就是这些人，曾經在县委、区委领导下，提高了階級觉悟，組織起来，自力更生，发憤图强，勤儉办社，終于改变了西鋪地区一穷二白的面貌。这就是人們称道的“穷棒子精神”。

西鋪村前，千百年来都是一片沙石，沙多土薄。一九四九年以后，种上树了。这片防風林种得很好。短短的十年之内，綠树长得象綠色的长城一般；建明湖的水，弯弯曲曲，流到村子前面。初次来到这里的人，如果不知道往日的历史，很难体会这个地区的变化。在这里住得久的人，如果不想想过去的痛苦，封建势力(地主、富农和五花八門的会道門、“大佛教”等)的压榨、欺逼和滔天的罪行，也很难体会今天社会主义的偉大力量。

王生一家人，土改前住的一間破茅棚，是地主的一个馬棚。土改后給他分了瓦房，他还不肯搬去住，他不是不肯住瓦房，是怕孩子見人家吃好的，就嚷嚷，心里难受。他沒有搬家，直到他盖起了一座新房，住进了新房子。新房的大門不是对着大街，而是对着西鋪。东西鋪之間，只他一戶，大門朝向西边。人們說，他这是为合作化为社

会主义作一个紀念。

可是，有人反对，散布迷信謠言，鼓动他拆毀这个大門，說是小門对着大門（对面是原来高級社的社址），不吉利。这也說明：牛鬼蛇神在这里并没有絕迹，我們应当提高警惕。

我們从过去这里流傳的民謠，可以看到西鋪村的人民生活：

穷人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錢高；
眼前只有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監牢。

糠菜半年粮，祖居破草房，
全家一条被，三代着一装。

現在那就大不相同啦。他們除去口粮，每年卖给国家十多万斤余粮。初办社时是三条驴腿，現在公社里有了汽車，村里牛羊成群，果子滿林，新房成排，戶戶电灯。一九五六年以前，看見有人騎着自行車在当街走过，那要轰动全村：

“看洋驴去呀，看洋驴去呀！”

現在全村有自行車一百多輛。抗日战争期間，日本鬼子丢了一个铁皮暖壶，游击組誤以为是个炸彈，看守了三天，現在这样的“炸彈”有三百七十多个。此外，还有高中生九个、初中生十七个。

王生的媳妇和王生的儿子，是民校的学生，識字都在

一千字以上，他們母子倆都能編些新詞。王生住的新房子，白粉牆上貼着王庆宇（王生的二兒子）寫的一首新歌：

建明公社是鮮花，黨來親自栽培它，
三星高照出彩霞，花開美滿社員家。

前面說的二十三戶，他們共同組織初級社時，各有不同的經歷；在時代的風浪中，也還會有不同的變化。他們已經經歷了無數的考驗，但是新的考驗仍在等待着。

王國藩和杜奎，現在是大隊的主要幹部，《打柴記》中已經提到他們。王生、王榮、戴存，有單獨成篇的家史。老羊倌屈恩等人的生活經歷，另有較詳細的記載。“窮棒子社”在打柴創業時期，二十三戶中的一戶軍屬吳秀英，隨着大伙一起上山打柴，是當時打柴隊伍中唯一的一個女勞動者。人們提起她來，真是要感動得落淚。不過她已經離開本村，早就跟着丈夫到四川去了。這些不在本村的戶，暫時成了這篇小史中的空白，留待日後追記。其他還有幾戶，這裡根據訪問印象，將他們的主要特點，三言五語，略記一二，分別在小史中做個簡單的介紹。

看 樹 的

——記梁近田

梁近田是個外來戶。

舊社會有句俗話：樹挪死，人挪活。窮人為了尋求活

路，只好搬来搬去。可是，在过去，路有千条，哪有穷人的路。天下虽大，哪有穷人的家。

梁近田的爷爷住在姚家峪，拉了饥荒，把房子出了。携儿带女流浪到遵化城南离城三里地的草甸去住。

草甸也容不下这一大家子穷人。他父亲又托他姨夫在四十里铺找了地主王维藩的一间半草房，离开了爷爷，叔叔领他们搬到四十里铺来住。

他们头顶着人家的天，脚踩着人家的地，房无一间，地无一垧。怎样生活呢？又托人说情搬到南山水家沟，给地主贼六子家看树。

人越穷，越添吃累。他有四个妹妹俩兄弟。老兄弟三岁的时候，母亲便死了。他十四岁上，便由爷爷介绍到遵化城南关，给人家扛长活。二十岁那年，家中借了地主几斗粮食，借一斗还斗三，越滚越多，实在还不起，把十四岁的妹妹梁秀英嫁了，使了一些钱，才还了地主的米帐。

七七事变后，兵荒马乱。贼六子躲到遵化城里去了。南山的树木都被贼六子的当家子砍伐了。

一天，他父亲到城里去赶集。在大街上碰上了贼六子。

“来了？”

“嗯的。”

“到我家去吧！”

东家吩咐，哪敢不听。父亲来到地主家中。

“那树怎么样？”

“都叫人家放了！”

“那你是干啥的？”

“人家要放，我也擋不住！”

“那不中。那树我都出給宪兵队长了，你等着！”

一会儿，他就把宪兵队长找来了。那家伙挎着洋刀，穿着大皮鞋，立眉横眼地在屋子当中这么一立。

“你是看树的？”

“嗯的！”

“你把树都看到哪儿去了？”

“都叫人家放啦！”

“那不中。这树都出給我啦！”

他哪是什么耍树的主，分明是賊六子請的打手。这家伙連踢带打，把父亲打了个半死，扔到草甸子叔叔那里。第二天，叔叔才把他抬回到了南山。

父亲一場好哭：

“这要不是穷，誰給人家看树……做长工，做月工，挨这样的揍……”

一九四七年冬天，土改工作组来到西鋪。梁近田腰板挺起来了。他参加了貧农团当选了委員，吐出了多年的苦水。地主賊六子虽然跑了，本村的封建势力却被推翻了。他一家分了两間房子三亩地。

爷爷、父亲所寻找的路，梁近田找到了。他于一九四七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轉正为正式共产党员。

革命的路越走越寬，当中也經過一番曲折。

有了房，有了地，沒有牲口、农具，缺少粪草、籽种，也是种不起。梁近田在这条路上也发生过动摇。他父亲死了，妹妹出了嫁。弟弟跟着叔叔去过日子。自己寻了个媳妇又离了婚，一个人越过越沒来头，便想把房子地出了，到唐山去下煤窑。这时候，王国藩同志出来劝他了：

“你从老辈子就搬来搬去，搬到哪儿算一站？好好务作，也成个家，立个业。”

梁近田在王国藩劝导下参加了互助组。他們的互助组共有九戶。其中有一戶寡妇拉扯着三个孩子，日子过的也很凄惶。穷人向穷人。他帮助她家挑水、苫房；她給他縫縫綫綫。日子长了倒也有一番情意。

一九五三年，梁近田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里担任了生产股长。这年他分了一千六百斤粮食，生活翻了一个过。

人往高处走，鳥往高处飞。那个寡妇在办社的第二年，也相跟入了社。二人的爱情，更深厚了。

瓜熟了就落蒂，有一个叫王凤仁的看准了这步棋。他悄悄地对梁近田說：

“你俩合一了算啦，她家缺劳力，你連个做飯的人也沒有！”

窗戶紙一捅就破。梁近田心里甜滋滋的。他跟王国藩同志一說。国藩同志說：

“中！”

“她让我招到她那儿去？”

“招到她那儿去，中啊！”

梁近田就搬到她那一间半草房里去了。

高级社，人民公社，更上一层楼。一九五七年，他两口子把劳动的积蓄支出来，在建明大街盖了三间新房。一明两暗，又宽敞又豁亮，隔着窗子可以望见房后的青山，天上的白云，后院的菜圃。靠东边的一间住着梁近田夫妇。西边一间住着儿子和过门不久的儿媳妇。东屋里墙上挂着有线广播的小喇叭，桌上摆着暖瓶、水壶、大镜子；西屋里地上放着自行车，炕上爬着小孙女。

他的大闺女已经高小毕业了，二闺女正要上高小。真是一幅美满的幸福家庭图。

谁说世上没有穷人的路？看，梁近田找到了互助合作通天路。普天下农民是一家，梁近田投入了人民公社大家庭。

邵氏弟兄

邵庆林和邵庆昌是叔伯兄弟。他俩一般大的岁数，邵庆林今年（一九六三年）六十六岁，邵庆昌去年死了，享年六十五岁。

串房檐

——记邵庆林

邵庆林是个大骨架子老汉。身材瘦瘦的，头发稀稀

的。胡子倒挺茂密。两鬓两腮挂着胡子，嘴上嘴下的胡子把嘴埋得严严的，只有說話时，才露出一張紅嘴。

你別看他骨架子大，說起話來却是低言細語的，一对深眼窩一动一动的，两眼直直的，象回味着过去的苦处。

“父亲、叔叔，长年给人家扛活、放羊。七七事变前，我們搬到南山桃树沟給东鋪村的地主看果树，看青場。七七事变后，抓壮丁的挺多，兵荒馬乱的，在山里不能住了，才搬到村里来串房檐。先到徐福挺家住了一年，后来又搬到地主王文屏的房子里住。王文屏的房子成了維持会，又把我們撵到后院里来住。直到平分时，才把这三間房子分给了我。还分给了我九亩地。

“有了房，有了地，才算有了家业。一家六口过日子。春种秋收，到了冬天割柴禾，夏天割垫脚。一天我正担着一担垫脚在王国藩門口过，他和王荣他們正吵吵着办社。我把扁担在那儿一放說：‘要成社，算我一份。要我不？’‘咋的不要，你回家去商量商量！’‘我还跟誰商量？我算入定了！’入了社，真是心滿意足哇！我沒給孩子們說嗎？这会儿，吃不愁，穿不愁。牆上挂着小喇叭，屋里放着自行車。老三小子还開了个高小毕业……一天比着一天强呀，人不知足还行？”

老人吸了一口烟，两个深眼窩不住地震动，两只眼睛閃着深邃的光芒，好象在向誰反問着。

貧農的遺囑

——記邵慶昌

邵慶昌死了。他臨閉眼前囑托他的老伴和孩子們說：“好好地出工。把社當成自己的家。要不是共產黨，要是不入社，咱沒有今天。”

他說出了一個農民要說的話。

邵慶昌是經邵慶林介紹才搬到四十里鋪給地主看房子的。東鋪地主王進清在西頭開了個駱駝店。他一直給看了十幾年。

平分时，分了七畝地，三間房。一九五二年底和邵慶林一塊入了社。現在他的大兒子邵海三十七歲，已經頂門立戶。二兒子邵坤十五歲，高小沒畢業，也主動參加了農業勞動。一個女兒已出了嫁。姥姥已經抱上了外孫。

現在他們的屋裡還擺着平分的火盆、小櫃，桌上放着平分的大花瓶，牆上又新安上了公社化後的小喇叭。我相信他的子女一定牢牢记住他父親的遺囑：

好好地出工，把社當成自己的家！

杜家兄弟

天上地下

——記杜春

杜春、杜星、杜亮是親兄弟。杜同和他們是堂兄弟。

我到杜春家去时，他才吃晚饭。太阳早落了，月亮藏在云彩里。院里的光线有点昏暗。也许是因为习惯，也许是为了节约，他们没有开灯。只在院里放着一张小低桌，坐在矮凳上喝粥。

我一进院，他连忙招呼老伴拿烟筐，招呼孩子点火绳，当他知道我不会吸烟时，连连称赞说：“连烟都不吸，那你真省啊！”

从各方面看，他是一个省吃俭用的人。

他匆匆地吃了饭，装了一锅烟，在火绳上凑着火，慢慢地吸了一口，谈话开始了：

“你做啥活计来着？”

“放羊羔来！”

“你过去放过羊吗？”

“没有，我呆了两年工啦！王主任看着我身子骨弱，为了照顾我，让我放羊羔。”

“你过去干过啥？”

“赶车！当过几年场头。”

“赶啥车？”

“赶花轱辘胶轮车。嘿，打一成立社我就赶车。他们打柴禾，我往回拉嘛！”

“你咋入的社？”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组织到了十八户，我听说了，找到了国藩要求入社。他说：‘你入中啊？可要跟家里商量好。’我说：‘我跟谁商量？我不光我自己入啊，

連我兄弟他們也要入啊！’我們四戶加入了進來，變成了二十二戶，後來戴存又加入了進來，這便成了二十三戶。”

“你趕車出過遠門嗎？”

“很遠的地方沒出過，就是到過唐山。”

“拉什麼？”

“拉果木，那是社里的副業股，組織了四輛大車。經常外出。”

“啥算場頭呢？”

“那時候社里分六個隊，在一個大場里分攤打場，我的總管。照料着不讓糟蹋東西。”

“你覺得入社後怎麼樣？”

“那還不是天上地下，過去跟人家扛長活，租種地，吃了上頓沒下頓的。你就算這兩年吧！我起不了炕，她隔長不短的鬧病，要不是入社，早把孩子賣着吃啦！”

“你就這倆孩子嗎？”

“就這一男一女呀，大的十一啦，跟社同歲。起了個大名叫杜振喜。”

“早先生了七個呀，一個也沒成！”這時候沉默在一旁的老伴突然發了言。

“生了七個？”

“可不！大兒子活着，這會二十五歲啦！”

“那可不！大閨女活着，也十八啦呢！”

“都是害啥病死的？”

“唉！”老伴嘆了口氣說，“大兒子活了八歲，生疹子死

的；大閨妮肚子疼，老三，老四，得的四六瘋……”

“咱福薄水淺，養不住喲！”

“這會兒怎麼養住啦？”

杜春兩腮一動，笑了：“那是封建話。要不是入社，這兩個孩子也保不住喲！”

“那可不行！那時候連吃的都沒有，哪還有錢給孩子請先生！”

我沉默了。誰能想象呢？在過去他們生了七個孩子，都一個一個被疾病吞掉了，不，應當說被舊社會吞掉了。只有當他們入了社，才保住了這一男一女。這還不是鮮明的對照嗎？

我告別時，杜春熱情地送我到大門口。我握住他的手，勸他回去休息。他又悄悄地跟在我身後，送到我下坡。我走了一段路，扭回身看時，他仍然立在那裡，目送着我。在這個五十七歲的農民心裡，埋藏著多少熱情啊！

草 窩 窩

——記杜亮

杜亮是老三，和杜春隔着一條道。他門前有一道水溝，溝上架着一座小橋。我到他家訪問時，杜亮正攜着孩子在街上耍。一聽說我要找他，便隨後跟了進來。這是新蓋的三間平房，西里間的隔山牆還沒有刷抹。他媳婦是一個和他差不多年紀的中年人，正扒着鍋台合面。

“怎么，你们还没吃晚饭？”

“吃啦，赶明天，老娘子过来呀！给她发点面。”媳妇回答着，又找补了一句：“赶明儿到我家吃饭吧！”

这一番话使我想起杜春说过的，他弟兄仨抬着一个老娘子，一个一天管着饭。看来，儿媳妇要想法给婆婆改善一下生活呢！

媳妇干净利落地拌好面，盖在锅里。伸手接过孩子来坐在东里屋的门槛上和咱们拉起呱来。

“你们几个孩子？”

“四个呢！头大的是个闺女，十一啦！跟社一般大！”

“也跟社同岁？”

“那可不！打入了社才添的孩子呀！下边是三个小子。一家大小六口人呢！”

正说着，两个小子都从街里跑回来了，活蹦乱跳的活象两只小老虎。

我把老大拉到我的跟前问道：“放猪去来吗？”

他母亲却回答道：

“就那么一只猪，老二就放啦！他拾柴禾拾粪。大闺女会做饭啦！下学回来做做饭。”

“噢，大大小小都能帮忙啦！”

“嘿，指着他们还行！”坐在我身旁的杜亮笑了。他今年三十一岁了。少言寡语的，露着一身酱紫色的筋肉。是一个好劳动力。

“几年，你这把子人就起来啦！”

“要不是盖这几间房子，哪用着他们娄！”

“盖这房子花多少钱？”

“八百多块呢！”接着他又找补道，“嘿，要不是入社，可盖不起这房子呢！”

“可不！你没见俺那间草窝窝呢，一下雨漏得站都站不住的！”媳妇补充着说。

一提新房，两口子喜上眉梢。从言谈话语里，流露出来自内心的喜悦。

我们要去访问杜星。杜亮自告奋勇领我们去。媳妇抱着孩子送过了小桥。两个“小老虎”也跟了出来。在月光下，他们扬着小手：

“大爷，再见！”

“大爷，赶明儿还上我们家来呀！”

孩子的感情是珍贵的。因为他们都是贫农的儿子。

下 放 干 部

——记杜星

山村的夏夜，显得格外宁静。月光照在街头，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路旁里乘凉。杜亮领我们大踏步地在街上走着，突然停住了脚步，对着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喊道：

“二哥，他们正要到你家去呢！”

这就是杜星吗？我听说杜星是个下放干部。也许是干部这个字眼，在我的头脑中僵化了。我总觉得他不该

是目前这个样子。他光着头，赤着脚。穿着一条半截裤子，肩上披着那件制服褂子，就象过去老和尚穿的那“百家衣”一样，补着各式各样的补钉。我不禁对他画了个问号，他回来后劳动不好吗？生活有困难吗？

他本来是到队里开会去，听说我们要访问他，扭转身来，就往回走。光脚板打在地上，叭达叭达的，两只半截袖子随着身子晃荡着。

进了家，媳妇已经躺在炕上睡了。屋里的电灯还亮着。三个孩子分躺在母亲的两边，发出了甜蜜的鼾声。为了礼貌的关系，媳妇坐起来躲到院里乘凉去了。

“这房子原来是吴秀英家的。我那房子小队里借住着。”

“你多会回来的？”

“回来两个年头了！”

“多会出去的？”

“头办社出去的！在公路运输局工作。先在唐山，后来分配到昌黎、灤县。我打灤县回来的。”

“入社时跟你商量来吗？”

“商量来呀，那还不正好。正愁那些地没法种的。”

“回来后过的咋样？”

“不错呀！”

我沉默了。又拐着弯问道：

“你们哥仨数谁过的好点？”

“哼！这会儿还属着我过的好呢。老大关了两年病，

老三新盖了房子，我去年挣了三百多劳动日，家里的挣了二十多个。除了吃的、穿的、花的，还存着五十多块！”

我审视着他屋里的摆设，暖瓶、水壶和蹲在小柜上的那个的的答答的马蹄表。的确日子过的不错。

“我一天工不脱呀！”在回来的路上，他主动地向我们介绍道，“今年我又挣了二千多分啦！我没下地劳动呀！我掏大粪呢！别人不愿意干，我干！”

我忽的一下子全明白了。我仿佛看见他穿着那件“百家衣”，光着头，赤着足，担着一挑子大粪在街里走着，我对他肃然起敬了。

他不愧是二十三户的老社员。他不愧是党培养的好干部。

杜同也是个下放干部，他比杜星早回来一年，现在也在社里参加劳动。

佟家叔侄

烈士的儿子

——记佟印

佟印是烈士佟瑞明（景文）的儿子。今年三十八岁，家中六口人，有母亲、妻子和三个女儿，大女儿十三岁了，在上中学。

佟印十四岁上就到遵化城里粮店里跟人家当伙计。一直干了八年，直到遵化城解放前，才从城里回来。

父亲在抗日战争时候，是村里的办事员，汉奸王树仁告密，一九四一年旧历腊月初三，被日本鬼子抓去杀害后，扔到河里，到现在连尸首都没有找到。那时佟印二十一岁。

汉奸的心是黑的。他梦想斩草除根，在害死爹爹后，又逮捕了佟印，把正在炕上养病的佟瑞恒（佟印的三叔）也吓死了。

佟印靠着有城里当伙计时的身份证，才脱了险。可是不久，在被服厂工作的二叔又牺牲在芦家峪了。

佟家，只剩下佟瑞芝（他四叔）和佟印叔侄两人了。

佟印的母亲，经受住了这个打击。她控告了汉奸王树仁。王树仁被人民政府逮捕，未来得及法办，便碰死在白薯窖里了。

土地改革后，他四叔佟瑞芝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一直打到广西。一九五一年转业回来，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佟印、佟启、佟春都参加了。一九五三年佟印、佟瑞芝、佟启、佟春都参加了“穷棒子社”。如果说佟春在技术革命当中大显身手，那么佟印在文化革命当中却立下了一番功劳：

二十三户农民当中，有个要了多年饭的王生，他媳妇在扫盲当中，认识了一千多字，一年，给公社团书记写了一封信，还编了几句快板，表达自己的身世：——

飄飄蕩蕩象走船，飢寒二字最艱難。
人要无食无主張，更怕數九下雪天。
盼望一天又一年，和夢方醒一樣般。
翻身解放住新房，毛主席來了見青天。

這些成績是和佟印分不開的。進了他的屋子，在他的牆壁上貼着兩張醒目的獎狀。一張寫着：

佟印同志在掃盲工作中積極負責，獲得了顯著成績，被評為掃盲模範，特發給獎狀給以獎勵。

另一張寫着：

獎給

掃盲積極分子 佟印。

他還告訴我，他們得過很多獎旗。就是桌子上放着的那個馬蹄表，也是那時候的獎品呢。也就在一九五六年，佟印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轉業軍人

——記佟瑞芝

在瓜鋪里，我們遇到六隊副隊長佟瑞芝。

這個轉業軍人，是村中最早成立互助組的發起人。

他們的互助組一共有十幾戶，上山打柴、磨豆片、養豬積肥。這一年他們組里的莊稼特別強。

一九五二年底他們響應黨的號召，參加了“窮棒子社”，在社里擔任組長，一九五四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

社里担任队长，一直到現在，說起来也算个老队长了。

“整風时，我让大伙儿跟我提个意見，大伙說，对你提啥意見呢？你不摆队长架子，起早貪黑，一样的跟大家一起干，要提，就有一样，下地扣的大家太紧，歇畔歇的小……歇畔歇的小，还不是为了让大伙多干会儿活。”

他双足蹲在地上，吸了一口烟，額上的皺紋一閃一閃的。

盖房的故事

——記范玉林

一提起范玉林来，人們都傳誦着他盖房子的故事。

第一次訪問他时，他下地劳动去了。王国藩同志指着他院里的一段断墻說：“你看，这就是他原来的屋子，进門时，还得弯着腰钻进去，到了里边連个轉身的地方都没有……”

可是現在范玉林住着的，却是临街三間大穿堂屋。墻壁刷得白白的，屋子里安着电灯，我迫切知道他这一轉变的經過。

第二次訪問他时，他到大队开代表会剛回来。原来他还是个六队的貧下中农代表。

他今年四十七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全家六口人，一个七十七岁的父亲，一个老婆，三个孩子。

父亲范春扛了三十多年活。范玉林十八岁上下过一

年金場，二十二岁上下关东去修铁路，一直修了三年。平分时，全家分了十三亩地。一九五三年参加了“穷棒子社”。提起他盖房子的事来，他兴奋地说：

“嗨，那真跟吹气似的。那还是入社头一年，一伙子人在‘出’（刨）落花生，拉起了闲篇。国藩说：‘范玉林，你现在没有不遂心的事了吧？’我说：‘就是那间房子不遂心，进门出门先弯腰，屋里连个酱菜缸也放不下，象一个“圈”似的。’

“‘那你重盖几间呀！’

“‘嗨，我连棵树毛毛都没有，还盖得起房了！’

“‘嗨，你没有，别人还没有？树不够大伙凑！’

“王国藩这么一说，大伙儿乱说：‘我给你凑两棵，我给你凑两棵。’

“国藩又接着说：‘也不能白让凑，多少得让他出个钱。’

“上午说的话，下午就号树去了。号了杜春两棵，温自礼几棵，梁近田几棵，我自己又找了几棵。那时候还迷信哩，看了个好日，九月二十九上梁。

“一说盖房，甭说街坊，连家里人们也不相信。等社里的大车拉来了木头，石头，才轰嚷动了。秫秸、草都是社里的，牲口车又不要钱。还借给了三十块钱买椽子。从九道沟邀来了木匠。木匠一进村就打听：‘你们西铺有个叫范玉林的？’

“‘你找他做啥？’

“‘听说他要盖几间房子!’

“‘嘿! 他穷着个棒棒子, 连个树毛都没有, 能盖上房子!’

“‘那, 人家捎讯让来的嘛!’

“‘那, 不信你就看看去。’”

.....

房子就这么盖成了。转成了高级社, 范玉林又把三间草房改成平房。一九六一年找了个老伴, 还带着两个小子、一个姑娘。

有人问: “范玉林, 你这会儿遂心了吧?”

他说: “嗨! 要不是入社, 一辈子也遂不了心!”

搬到南山

——记王金平

王金平在南山和尚沟住。

他为啥搬到南山去呢? 原来有这么一段故事。

南山是个好地方, 高山上种满松树, 山坡上布满了核桃、栗子、黄梨。梯田里还栽了千把棵苹果树。满沟庄稼满坡树, 南山是个宝地。

去和尚沟要过一个小梁, 小梁上有个瓜铺。瓜铺里有个小姑娘在看瓜。有人说, 她是王金平的女儿。

“你是王金平家的人吗?”

“嗯的!”

“你叫啥？”

“我叫刘××。”

“你怎么姓刘？”

“我爸爸不是死了吗？他搬到俺家来的……”

我恍然大悟，原来王金平也和梁进田一样，是被招到女家去的。

第二天，我在瓜铺上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媳妇。梳着黑油油的头，坐在窝棚的床上做针线。我想，这大概是小姑娘的母亲了。

“你是王金平家的人吧？”

“是啊！”她笑了。笑的那么甜蜜。“你们到我家去吧！到我家去，烧口水喝。王金平，在大队里开代表会哩！”

我找到了大队部哩，会议还没开始。三三两两在门口蹲着说闲话。

“王金平在这儿吗？”

王荣老汉拍着一个中年汉子的光脊背开玩笑说：“王金平不在这儿！”

原来那个中年汉子就是王金平。

他今年三十八岁了，但从额上的皱纹来看，他好象还要年纪大点。

他十岁上，父亲就死了。一个兄弟也死了。母亲急瞎了眼。他拉着母亲讨饭吃。

家里仅有一间房子塌了，被治安军拆着烧了。他

长到十四岁，連穿的衣服都沒有，一冬一春因在炕上不敢出屋。后来他到魚儿岩金矿上背毛，晚上只盖一条麻袋。平时，他分了一間半房，五亩地。一九五三年和邵氏弟兄一起加入了“穷棒子社”。

一九六一年，王金平带着老母亲搬到南山那个寡妇家去了。那个寡妇拉扯着四个孩子，頂大的才九岁。他們合在一块一共七口人，又盖了三間新房。

“你分的那房子呢？‘出’了？”

“哪能‘出’了！房子現在免費借給队里用着呢！”他好象受了很大侮辱，連忙分辯着說：“政府分給我的房子，我要是出了，那我还对起誰了？怎么对得起共产党。唉！要不是共产党，我这一輩子哪还敢想有老婆孩子！”

一 杆 秤

——記溫自礼

溫自礼是个共产党员。他死了。

人們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忠誠老实。

他在村里担任稅务委員，誰想偷稅漏稅那算不中。过年时，他叔叔杀了猪，找到他来商量，他說：“过年，咱认猪不认人！”就这样，他工作积极，大公无私。

他虽然死了，人們仍念念不忘他的忠誠老实。

王生家史

張 朴

旧社会，有錢的地主立家譜，为的是“光宗耀祖”。新社会，我們要为受苦的穷人写家譜。穷苦人的家譜分两段，一段是黃連鋪成的路，一段是蜂蜜写成的书。

昨 天

——昨天是黑夜漫漫

王生是二十三戶“穷棒子”的苦头头。王生怎么样苦？有人說：他的苦处象山澗的流水，弯弯曲曲說不到头。王生怎么样穷？有人說：他穷得象荒山河滩的一块石，全身光溜溜，啥也沒有。在旧社会，人們說穷是王生的命，苦是王生的身，穷苦纏着王生家四代人。

三 条 活 命

王生的祖父叫王玉，是个受苦的庄稼人。所生三男一女，王生的父亲王凤山排行第二。全家十口人过生活，

日子虽然困苦，倒也过得去。到了光緒二十一年，剛交头伏，天下起連阴雨，一連四十七天沒开晴。山洪暴发了，庄稼冲跑了，河滩里的大水翻着白花，村里的茅屋漏的漏倒的倒。受苦的穷人藏沒处藏，躲无处躲，做工没人雇，討飯没人給。王玉老汉家十口人病倒了七口。旧話說：“穷人生病閻王討債”，糊口尙且不行，哪有錢来治病。就这样，七个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一場天災家破人亡，只剩下王玉老汉和两个儿子三条活命。

父儿仁慈饥挨餓，熬过了殘冬，盼来了春天。山坡上露出了野草，树枝上钻出了綠芽。王玉老汉决心要重整家园。父子們打短工、做零活，白天上山割草，夜晚在村拾粪。沒黑天沒白日地苦扒苦曳。

这样挨过了許多年。

这一天，本村地主王家老掌柜的，看見王玉老汉家的粪堆，心眼里乐了。他慢悠悠走进王玉老汉家，这看看，那瞧瞧，对王玉老汉說：

“老玉呀，你們家这么多的粪肥，不想租点地种嗎？”

土是庄稼人的根，地是庄稼人的命，王玉老汉早就有租地的念头，只是担心家里太穷，没人租給。今几个老掌柜一說租地，他心里通地一跳，可又一轉念說：

“想是想呀，可誰又租給咱？”

“那好說呀，”老掌柜嘿嘿地笑着，“亲不亲老乡亲。我租給你一点吧。”

“真的，老掌柜？”王玉老汉赶紧问。

“我什么时候说过笑话！可就是……”老掌柜更仔细打量着院里的东西，“你拿什么作抵押呢？”

王玉老汉一下子泄了气，他垂下头，蹲在院子里，说：“是呀，要钱没钱，要东西没东西，还是租不起呀！”

老掌柜嘿嘿一笑，两眼盯着王玉老汉的三间茅屋，说：“咱们乡里乡亲，好说话。用你这三间房子作抵押吧！”

王玉老汉突然抬起头来，两眼直呆呆地看着茅屋，说不出一句话来。

老掌柜说：“这也是咱们这一带的老规矩，租地总得押点东西。其实，你不愿意也就算啦，房子是你的，地是我的，两不相干。”他看着那堆粪肥点着头又说：“可惜这堆好东西！”完了，迈开方步子向门外走去。

王玉老汉突然站起身来说：“地，我租下了！”

只因为租下了地主的地，又惹来一身灾祸。王玉老汉过日子的心胜，决定让两个儿子在家经营租来的土地，自己给地主去当长工。

这一年，秋庄稼快熟的时候，地主怕穷人偷庄稼，让王玉老汉睡在地里看守。这一带常常闹土匪，王玉老汉总是战战兢兢的。这一天，天刚摸黑，王玉老汉在窝铺里升起一堆柴火，烧他那当晚饭吃的两个窝头，这时山头上忽然响起枪来，有人喊道：“土匪来了！”王玉老汉钻出窝铺撒腿就跑。跑了一程，忽然想起自己的被子还在窝铺里。

一条被子对于穷人来说，可非同小可。他拚着性命又奔回窝铺，这时柴火已经把窝铺烧着，他心里一急，一头扎进窝铺，窝铺倒塌了，把王玉老汉压在下面。他抱着被子，挣扎着钻出来，就昏迷过去。直到第二天下午，东家不见他回来取饭，打发人一看，原来他被火烧得躺在地里，才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王玉老汉回到家里，昏昏沉沉躺了几个月，他舍不得叫儿子拿一个钱为他治伤。临死的时候，他还对儿子们说：“地是根，没有地……就会死在……财主……手里……”话没说完就咽了最后一口气。

爷爷王玉死后，日子更加困难。这一年王生已经八岁，赶上夏旱，热风吹得天象个干锅一样，几十天没下一个雨点。租种地主家的沙滩地，正好种的打瓜，瓜秧被太阳晒焦了，王生父亲的脸色也象是晒焦了似的。他不怕辛苦，又赶种上了晚豆子。幸好赶上了一场小雨，豆子出来了；可是到了阴历八月初，又下了一场早霜，豆子被打死了。辛辛苦苦的一年劳动落了一场空。王生父亲正焦虑一家人的生活，突然飞来一场横祸，大安庄舅家二娘子在王生家服毒自杀，舅舅是恶棍，被蛮不讲理地讹去了一笔钱。地主又来收租。地里颗粒未收，哪有粮食交租。就这样，地主收了地，又把王生家的四间茅屋（后来又接了一间）顶了租子。王生父亲一气之下，得了气结病，卧床二年就死去了。

两个苦命人

王生的父亲死后，家里的全部财产，除了发送父亲，一无所剩。当父亲入土之后，母亲哭着说：

“孩子们，你妈没有能耐，再也养活不起你们了，你们各自逃命去吧。”

全家抱头痛哭，难舍难离。

王生给地主扛活挣一点钱，帮助母亲养活两个弟弟。这一年王生整二十岁，个子虽然不高，长得却象个铁打的汉子，再加上他为人忠厚，少言寡语，干活牢靠，不怕受苦，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有些人常和他开玩笑说：

“王生，二十岁的大人了，该成家立业娶媳妇了。”

王生有时笑笑，有时就回答一句：“谁肯把闺女往火坑里送。”

天下真有这样奇巧的事，正当人们这样开玩笑的时候，有一个姓樊的“花子”，愿意把闺女送给王生作媳妇。人们笑着说：“这可真是门当户对。”是呀，除了王生这样的人，谁又愿意讨要饭吃的闺女作媳妇呢。

常言说：不爱金，不爱银，穷爱穷心内亲。樊家的闺女是个有心人，一定要亲眼看看王生。王生剃了剃头，洗了洗脚，走进一座破庙里去相亲。樊家的姑娘一见王生，看了看头，瞅了瞅脚，把头一低，打心眼里喜欢上他。可是王生头不敢抬，眼不敢看，活象个泥胎站在那里。樊家

的姑娘心里想：

“你說句話呀！只要你說句話，我就跟着你走，就是天涯海角我也不怕，只要是离开这人罵狗咬的日子。”

王生心里想：

“只要你不嫌我穷，我保險对你好，就是把我这身力气使尽了，也让你受不了屈。”

姑娘心里想：

“怎么他不說話？莫非是个哑巴？”

王生心里想：

“一切都由你决定，你說中就成，你說不中咱就走。”

姑娘实在憋不住了，心內着急，可一个姑娘家又不好問什么，只好說：“你老站着干啥？坐下吧。”

王生說：“庄稼人站慣啦，不累。”

就这样一句話，这門亲事就定了。

王生要結婚了。有錢人結婚有酒席，有鼓乐，有洞房。王生結婚連个住处也找不到。难道說新婚夫妇还象花子似的去住破庙？婆家的姑娘坚决反对，她說：“我住破庙住了十几年，从嘎啦一声住到这么大，結婚出門子——人家都說这是人生大事，就不能換个地方嗎？”說着滾下泪来。王生想来想去，忽然想起西鋪西头有个大車店，王生夫妇就在这个大車店里入了洞房。

按王生当时的說法是，人不該死总有救。过了些日子，东鋪的地主要找个看院場的，院場里有一間破茅屋，茅屋的草頂实在是太破烂了，地主答应只要院場看得好，

轉年給換一個新草頂。王生夫婦就搬進這間破茅屋。誰知道，這間破茅屋就成了王生全家悲慘生活的開端，就成了多年討要生活、一件一件血淚史的“見證人”。

王生夫婦尽心尽力地替地主看院場，出力賣命地為地主干活，可是換屋頂的事地主再也不提起。一年、二年過去了，王生夫婦生下第一個孩子，頭頂上還是那堆破爛草。王生夫婦又生下第二個孩子，那正是陰曆五月間，刮著急風下著暴雨，屋頂漏著水，有的地方眼看著往下塌，王生用樹枝棍子頂住架住，可是風越刮越大，雨越下越急，閃電雷雨震得茅屋直搖晃。忽然，有一塊屋頂塌下來，風雨一下子撲進茅屋，王生的大兒子哭叫著，王生急忙抱著茅草去堵窟窿，雨水、泥土、爛草順著王生的頭頂滾下來，爛草泥水糊住了他的眼睛，……

一場暴風雨躲過了，第二天，王生的眼睛腫起來。他以為關一兩天就會過去，誰知道越關越厲害。想治治沒有錢，地主卻催著上工，孩子老婆又需要人伺候，王生心裡火燒火燎地著急。眼睛越腫越厲害，直關了一個多月，才漸漸地消下腫來。王生睜開眼睛一看，啊！天地怎麼變了樣？到處是一片昏暗，看不見南山，看不見樹木；只聽見鳥叫，看不見鳥飛；河里的流水嘩嘩响，看不見河水往哪邊流。他伸手揉了揉眼，用力把眼睛睜大，可是什麼也看不見。“難道？難道……”他不敢想下去，一屁股坐在地上，閉起眼睛，只覺得天旋地轉，一切心事都涌上心頭：上有老母，兄弟年幼，下有老婆，孩子更小，都需要他养活。

他不能瞎！他不相信自己会瞎，站起身来，磕磕絆絆地奔到河滩，摸到小河旁，他捧起水来洗呀洗呀，直洗得眼睛发酸，睁开眼睛一看，眼前还是一片昏暗。山在哪？树在哪？村在哪？河在哪？他分辨不清楚。王生一下倒在河里。从此，这个铁打金不换的汉子，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了。

王生瞎了眼睛，全家哭得象泪人儿。母亲可怜儿子，就拉起棍子，带着两个兄弟沿村讨要起来。这五十多岁的老人，怎么经得起这跋山涉水，东村跑西庄奔，人骂狗咬，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整天价唉声叹气，泪水洗面。有人见她可怜，就劝说她：“趁着不算太老，往前走一步吧，也救救两个孩子的命。”起初，王生母亲听了这话只是摇摇头，当作耳旁风。后来日子长了，眼看着儿子的眼睛没有指望，再不愿意给儿子添更多的烦恼，年纪又一天比一天老了，讨要也一天比一天难啦，就起了嫁人的念头；可是一想起另归别姓，心里就象刀搅。这一天，王生的母亲奔跑一天，没要到一点东西，小儿子哭着叫着喊饿，王生妈心一横，就把王生叫到面前说：

“孩子，不是妈心狠，是妈的命不好。世界上千条道，万条道，哪条道妈也走不通。别怨恨妈，妈知道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们，可老天要妈这样作，妈又有啥办法？将来死在九泉，你能在爸面前替妈说句话，证实一下妈的心，就算妈没有白养活你一场。妈……要……”

王生妈再也说不下去。

王生跪在媽面前哭着說：

“只要媽不走，兒子就討着要着也要讓媽吃飽……。”

媽低下頭，再也沒有說什麼。

活，活不成！死，死不得！

媽媽改嫁，媳婦生病，孩子要吃，家里無糧。幾根繩把王生的心絞得象條麻花。無奈何只有自己拉起棍子去討要。可是一想，自己乍瞎夫明，路不平。腳無根，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庄在哪方？門在何處？如何要法？左思右想，愁思千萬，無路可走。忽然兒子跑來說：“爸，我領你去打水。”這句話提醒了王生，要是讓兒子坐在自己肩上，他的眼我的腿，不是可以出去討要嗎？兒子聽說和爸出門，高興得跳起來；王生卻不覺落下淚來，心想：“小孩家，怎知道這樣出門的難處！”父子倆拉着棍子走出庄來。碰到高崗，兒子就喊上坡，碰到坑洼石頭，兒子就喊繞路。就這樣，走村串庄，東西要的倒是不少，直到日平西，兒子要回家，王生也結記家里的病人，就肩起兒子奔家走來。一天奔波，兒子勞累了，坐在父親肩上直打瞌睡。王生不見兒子說話，以為是路好。可是覺得腳下坑坑坷坷不平，剛想問兒子，腳下一空，父子倆順着陡坡栽下去。兒子大聲地哭叫，王生雙手和磕膝蓋流着血，父子倆抱在一起痛哭起來。王生心里想：“天呀，你叫人怎麼活下去！人到了這一步，不如死了好。”可是孩子一面哭一面喊：

“爸爸回家，想媽媽。”

王生心如刀絞，只好爬起来拉着孩子奔了家。

儿子再也不願意跟王生出門討要，一家人只好餓肚腸。

这一天，天下着小雪，到了中午一家四口还水米沒沾牙。大人还可忍耐，孩子却不停地哭叫。正在这个时候，要飯的老徐珍搖搖晃晃地走进門来。老徐珍也是靠討要过活的，这几天臥病在床，今天实在忍受不住飢餓，才勉强爬起来。他問明了王生家为什么哭叫，叹口气，搖搖頭說：

“唉！一样的命呀。好，我也正想出門要口吃，我領着你，你扶着我，一块去吧！”

雪已經把山路盖住，北風卷着雪絲在山坳里尖叫旋轉，山路溼滑，行人稀少，在灰蒙蒙白茫茫的山路上，只走着一老一瞎两个要飯的。

常言說，下雪要飯最不是时候，有的人家关門閉戶，圍爐取暖；就是不关門閉戶的，任你再喊再叫，他也不肯冒着風寒給你送出一点东西来。老徐珍領着王生奔走了一天，只要到几口冷湯，几把猪食。肚內无食，身上寒冷，北風越刮，大雪越下。眼看着天气漸漸地灰暗下来，老徐珍搖搖頭說：

“看来，今几个这根腸子又得閑起来。好，这近处有个破庙，我領你去过夜。”

两个人走进破庙，觉得比外面暖和多了。老徐珍哈

哈手，把庙門关上，怕風吹开，搬过供桌来頂上門，两个人背靠着供桌坐下，誰也不說話。过了一会，老徐珍因为由冷乍暖，突然咳嗽起来，王生赶紧給他捶背。一陣咳嗽过后，两个人又默默地坐起来。忽然王生叹了口气，心想：老婆孩子不知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老徐珍好象看見王生心事似的，就对他說：

“睡吧，別瞎想啦，老天給咱穷人安排的就是这样的命。”

飢餓燒腸，千思万慮，加上身上越来越冷——才进来时那点溫暖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怎么能睡得着！老徐珍又咳嗽起来，王生不断地为他捶着。老徐珍喘过一口气來說：

“既然睡不着，咱爷儿俩說一会話吧。”

“中！”王生急忙答应着。可是心里想，有什么話好說呢？

老徐珍說：

“我小时常听奶奶說，南山有个仙人会种葫芦，葫芦种在最高的山頂上，每天日头出来第一个照見它，葫芦要长一百零九天，要用一百零九眼泉水来澆它，少一眼也不行。仙人养着一对金鸽子，每天夜間，下山含水澆葫芦。澆到一百零九天上，不要等日头出来，就要把葫芦摘下来，这个葫芦就成了宝葫芦，要什么只要一拍它，就来什么……”

“大爷，你說这个干什么？”王生奇怪地問。

“孩子，你不知道，”老徐珍停了一下說，“今天白天咱們路過燒餅鋪的時候，你可沒能看見那油炸的麻花，我已經三十年沒吃過那玩藝了，要是有個寶葫蘆，能要個麻花來吃吃，我就是死了，也心滿意足了。”

王生心里一陣難過，趕緊說：

“大爺，明天咱想法去買一個麻花。你干什么老說死呢？”

“不，孩子，我是吃不上麻花了！”說着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王生趕緊替他捶背。老徐珍繼續說：“聽說死了比活着好混，不用吃東西。不過還得穿衣服，還得要錢，聽說三十六道鬼門關，關關給錢才能過得去……”

奔跑了一天，王生不知跌了多少跟斗，已經够勞累的了，雖然身上寒冷，可還是漸漸睡去了。等他醒來，天已經亮了。他覺得身上有個東西，一摸是老徐珍的破棉袄。再摸摸徐珍，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渾身冰涼，早已經死了多時啦。王生哭着從村里喊了人來。村里人問明了徐珍家里沒人，就對王生說：“你走吧，我們把他埋掉。”王生一定要等着埋了再走，村里人怕他再死在這裡，兩個人架着把他送出村去。

王生一路走着，徐珍的影子老在他眼前晃，徐珍的話老在他耳旁響，好象這些話句句是在說他，將來他老了就是徐珍這樣下場。想到這裡不覺渾身打了一個冷戰，直覺得天轉地旋，心內一陣酸痛。他忘了朝哪個方向走，也忘了走的是什麼樣的路，磕磕絆絆，高一步低一脚，忽然

脚下一滑，整个身子直栽下去，咚的一声，被水呛了一口。他急忙抓挠着爬起身来，用手摸了摸，有溜腰深的水，周围是圆的砖墙，他这才明白是掉在井里。他大声喊着：“救命呀！有人掉到井里啦！”喊了几声不见有人来。他慢慢地靠在井边上想：“喊人干啥呢？这不是死的好机会吗，把头一扎，人不知鬼不觉地就完了。”他刚要把头扎下去，忽然想起老婆孩子：“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呢？谁来照管他们？他们怎么活下去？不能死，为了孩子，说什么也不能死！”他抬起头，大声喊着：“救命呀！救命呀，有人掉到井里啦！”他一面喊，一面围着井帮转，用手摸索着，想找到一点什么东西攀登上去。可是井帮上长满藓苔，非常光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他喊得筋疲力尽了，就站下来休息。水浸湿了他全身的衣裳，阵阵冷风从井口吹来，冻得他瑟瑟打战。他心里想：“完啦，看来今天是非死在井里不行了！”这样一想反倒安心起来。觉得这样死了倒对得起孩子们，他自己叨叨念念地说：

“孩子们，孩他妈，别怨我，不是我心狠，抛下你们不管，是我命该如此。以后你们怎么活下去，全靠你们自己啦，一百斤的担子，你们自己去担吧！”说到这里，泪珠刷刷地滚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脚步声，咚地一声，两只竹筒顿在井台上，王生急忙喊：

“救命吧，有人掉到水里啦！”

“你是什么人？”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要饭吃的！”

“要饭吃的没长眼，为什么单往井里掉？”

“我是瞎子，看不见。”

“瞎要饭的，你把整个井都弄脏了，还叫人救你！”说着担起竹筒走了。

王生急忙喊：“行行好，救救命吧！”

可是脚步声越来越远，已经听不见了。

王生一阵心酸，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过了一会，又来了几个人，他们系下一只筐，把王生拉上去。一到上边，北风一吹，王生浑身的衣服马上冻得硬梆梆，象铁板一样，冻得他得得打战。这时候那个年轻人站在旁边大声对王生喊道：

“你个臭要饭的，把整个井都弄脏了，你不给掏井你走不了！”

一个老汉对年轻人说：

“也不能怪他，他是个瞎子，愿意自个儿掉在井里？”

“你们都是一类货！臭要饭的。”

老汉急忙把王生扶到自己家里，一进家门，老汉啐了一口，骂道：

“有钱的崽子，说话也不怕缺德！”

老汉生上一盆火，让王生烤着衣裳，又问他吃了饭没有，王生说：

“不吃啦，哪还有心火！”

老汉給王生端来一碗高粱米飯，澆了一点热水，让他吃。王生吃了一点飯，觉得身上暖和一点，衣裳也烤干了，就趴在地下給老汉磕了个头，說，

“你老人家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老汉急忙拉着他說，

“別說这話，我也要过飯，唉！这要飯——受罪、挨罵，一句話，比死了强点。別說了，你赶紧回家吧。”

老汉把王生送到村外，指給他路，王生又再三謝过老汉，就順着山路走下去。

离开猪狗生活，过着牛馬日子

一九三五年，大汉奸殷汝耕把冀东二十二个县出卖給日本帝国主义。随着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日本人的軍帽、皮鞋和刺刀也来到遵化县一带。人們到处傳說着，八路軍中有个叫老包的（当时冀东軍区的副司令員包森同志），帶着一支神兵，到处打击日本鬼子和伪治安軍，吓得鬼子和治安軍修起崗楼，蹲在窩里准备挨打。

四十里鋪也来了八路軍，收了地主王維平的枪，王維平全家老小收拾东西夹着尾巴，跑到遵化城里去了。

这一天，王生出門討飯，被伪治安軍捉住，硬說他是八路軍的探子，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王生渾身血糊淋淋地闖进家門，一头扎在炕上。老婆問他是怎么回事，他只說了一句話：

“不打走鬼子汉奸，連飯也要不成了。”

王生在家养伤，老婆带着孩子出門討要；在閻屯村小儿子又被地主家的狗咬伤，娘儿俩哭哭啼啼轉回村来。村里人們看着他們娘儿俩可怜，就紛紛地議論起来：

“看，这媳妇年輕輕的多可怜！”

“是呀，跟着瞎子要飯吃，还不如自己走个主呢。”

这时候有个叫王兴的走过来，对王生媳妇說：

“这样兵荒馬乱的年头，怎么能要着东西，还不如找地方侍候侍候人，混碗飽飯吃。”

王生媳妇叹口气，說：

“哪有那样地方，就是有，人家也不願要咱这要飯吃的。”

“遵化城里有，就怕你不去。”

“能带孩子嗎？”王生媳妇是离不开孩子的，再說，帶出孩子，就帶去一張嘴。

王兴想了想說：

“帶一个孩子，白吃飯，不掙錢。你回家跟王生商量商量。”

晚上，王生媳妇把这話一說，王生想了想，叹口气說：“你們娘儿俩逃活命去吧！”

王生媳妇来到遵化城里，王兴把她領到一家。进門一看，原来是四十里鋪地主王維平家。王維平自从离开四十里鋪跑到城里，就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区团长。王維平的媽得了尿癆（慢性腸胃炎），全家人誰也不願意

走近她一步，在城里雇人侍候，人家一听說是这种病，没人願干，这才把王生媳妇找了来。

王生媳妇一看是地主王維平家，从心眼里不高兴，可是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王維平的母亲是个尖嘴猴腮的老婆子，因为长期拉肚，臉色发青，两腮深陷，脑袋活象个落干了的瓢葫芦。她整天象猪似的哼哼，怨天恨地，不住声地罵着人。不住气地拉着屎，說拉就拉，一时盆子拿不到，不管被上炕上，一拉就是一大片。可是她吃起飯来，还能頂个小伙子。王生媳妇每天要为她刷五六次被褥、六七次炕席。因为王維平家买水吃，不准用家里的水，刷被褥得跑到城外护城河边去。刷炕席只給一点点水，却要刷得非常干淨，不准留下一点味。每次刷完，老婆子都哼哼着象狗一样，把鼻子伸到炕席上嗅起来，要有一点味，就抓起拐棍，不管脊背脑袋一顿乱打，祖宗三代地一顿臭罵。王生媳妇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王生媳妇每一次到城外护城河边刷洗被褥的时候，眼望着家乡的山巒，总会滾下泪来，心想：“躲开了猪狗的日子，过上了牛馬的生活！”

母子俩每天吃的不是橡子面就是豆腐渣；偶尔吃一次玉米面窩窩，还有限制，母亲两个，孩子一个。就这样王維平的老婆还常常罵街：“吃，吃，吃！象猪一样，就是知道吃！吃起来沒完。”

大人挨餓尚可忍耐，孩子可怎么受得了。小儿子整

天圍着母親哭着喊餓。媽媽只好把東西給了兒子吃，自己餓着。

有一天，王維平的儿子拿着一个白饅頭在院里玩，王生的儿子吃着手指头，不停眼地看。王維平的儿子撇撇嘴，掰下一块饅頭，喂了他家的小狗。王生的儿子使劲咽一口唾沫。王維平的儿子又掰下一块饅頭，丢在地上，对王生的儿子說：

“你来学狗爬，就让你吃了那块饅頭。”

王生的儿子越想越恼，就抓起饅頭，投在王維平儿子的臉上。王維平的儿子哭叫起来，說王生的儿子打了他。这一下可闖了大禍，王維平的老婆闖出屋来，千花子、万穷鬼地罵着，硬逼着王生媳妇打孩子。王生媳妇被逼不过，就举起手来，輕輕打了儿子两下。这一下可惹火了王維平的老婆，她轉身走进屋去，提出王維平的馬鞭子，沒头沒脑地抽打王生媳妇。抽得她自己沒勁了，才把鞭子拋在王生媳妇面前說：

“我看着你，你給我打这个小臭要飯的！”

王生媳妇无奈，拾起鞭子，一看儿子——儿子两眼射着哀求的光，手象提着千斤的石头。

“打！打！”王維平老婆逼迫着，吼叫着。

王生媳妇把眼一闔，举鞭向儿子抽去，每抽一鞭，比抽在自己心上还痛，儿子每哭一声，就象錐子扎她的心……

沒娘管的孩子

母子俩离开家，王生心里难过得不行，可一想他們能吃上飽飯，也就心平气和下来。

这几天王生的伤势渐渐地好起来，就带着大儿子出門討要。他們走一庄过一村，天到晌午的时候，来到小寨。时令已是中伏，天气炎热。王生直觉得头晕脑脹，老想嘔吐。就对儿子說：

“我們在树蔭里歇歇脚，睡一会，等凉快一点了再进村討要吧。”

王生躺在树下，不一会就睡着了。

等他一觉醒来，用手一摸，不見了儿子，叫了两声，也沒有回答；正在納悶，一班孩子領着个六十来岁的老奶子，气汹汹地走过来。說：

“你們要飯吃的怎么也禍害人？我家剛做好的一鍋黍米粥，你的孩子把一个黎鸡窩給插在鍋里，叫我們那些受苦的回来喝西北風？”

王生赶紧賠礼道歉，說一定好好管教他，抓住他要狠狠地揍他一頓。

本来老奶子气头很大，見王生瞎目失明的，带着孩子討要，也怪可怜，又一个勁地向她說好話，气也就消下去了。她叹口气說：

“你知道这鍋粥的米，来的多么不容易呀！”

王生央求走了老奶子，就到处找儿子，东喊一声，西叫一句。其实儿子就在旁边一棵树上，他听父亲说，要狠狠地揍他，不敢下来。

日头平西了，听不见儿子回答一声，王生心里有些焦急，他想也许是他自己跑回家去了。摸到家一找，没有儿子。这下他可急了，围着村到处喊起来。

这时太阳早已经下了山，鸟儿入了林，家家都吃过了晚饭，有的在院里乘凉，有的已经入睡。村庄山谷静悄悄地回荡着王生喊儿子的回声：

“大……有……子……”

不知是因为夜静，还是因为他声音的哀伤，使人听了非常凄凉。老人们磕磕烟袋说：

“没娘管的孩子，多可怜！”

黎明的时候，西铺的武委会主任杜奎同志出差回来，走在村边上，看见一个树窟窿里有个人影一晃，他怕是坏人或敌人的密探，就举起枪来，对准树窟窿喊道：

“什么人，赶紧出来，不出来开枪了！”

一个小脑袋探出来晃晃说：

“是我。”

杜奎一看是大有子，就问：

“你怎么在这儿？”

大有子眨眨眼，不敢说实话。杜奎说：

“走，回家吧。”

王生一见儿子，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从心眼里感谢杜

奎。把杜奎送出門去，待轉回屋來，兒子又不在了。他心想：“這次走不遠，過一會他自己就會回來。”可是，一天，兩天過去了，兒子踪影皆無。他吃不下坐不穩，圍着村到處找着。後來，聽村里傳說，有人在鷄鳴村看見大有子放豬。他就趕緊奔到了鷄鳴村。

鷄鳴村有個叫賈廣發的，是個比較富裕的戶。這天傍晚在村邊樹下看見躺着一個小要飯的，面黃肌瘦怪可憐的。賈廣發問他是什麼村的，為什麼不回家？小要飯的說怕爸打。賈廣發說：

“你給我放豬吧，讓你吃得飽飽的，比要飯強。你願意嗎？”

小要飯的跳起來說：

“願意。”

這就是大有子。

王生看見兒子很好，心想：放豬比要飯強，反正能吃飽。就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過了一些時候，一天中午賈廣發慌里慌張地走進門來，見了王生，為難地說：

“大有子出了事。”

王生象晴天霹靂，趕緊問：

“出了什麼事？”

“摔壞了。”

“怎麼摔的？”

“他去放豬，”賈廣發摘下草帽一面擱着一面說，“我

們村的治安軍正在修崗樓，被狗日的馱子撞下山去，头和腿都摔破啦。”

王生一听不知如何是好，在屋里轉了两个圈，抄起要飯棍子，拉着賈广发說：

“走，我去看看。”

儿子的头和腿都摔伤了，血糊淋淋地躺在炕上，昏迷不醒。王生用手摸着儿子，連声地叫着，他睜了一下眼，馬上又闔上了。急得王生沒抓沒撓的，扎撒着两只手連連地說：

“怎么办？这怎么和他媽交代，他媽要看見孩子摔成这个样，要心疼死了。”

這句話提醒了賈广发，他叹口气說：

“王生大哥，咱是有啥說啥，孩子摔成这个样，我看还是把他媽叫來好，万一要有个好歹哩。”

王生說：

“我馬上去叫，”說着他摸起要飯吃的棍子向門外走去。賈广发从后面趕來塞給他两个餅子。

王生來到遵化城里王維平家，把孩子摔伤的事和老婆一說，老婆馬上落下泪來。两个人去和王維平老婆請假。王維平老婆手夾着烟卷，眼望着窗戶，听完他們的話，又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着說：

“你走了，誰侍候老太太？”

王生是个老实人，遇事沒主見沒办法，只会心里着急。王生媳妇和他可不一样，是个能說会道、办事利落

的人。她一听王維平老婆的話，气得臉都白了：

“太太，叫你这一說，我們孩子的命还不如老太太的屎要紧呢唄？”

王維平老婆一听王生媳妇話里有刺，气得把眼一瞪，把烟头往地上一丢，說：

“一个臭要飯的，死一口子两口子的算得了什么！”

“是呀，”王生媳妇气得嘴唇打着顫，“穷人的命，路上土，任人踏来任人踩，誰叫他們穷呢？可太太你也有孩子、也有老人呀！……”

“什么？……”王維平老婆气得說不上話来。

王生怕老婆說出更难听的話来，就赶紧拉着她，向王維平老婆哀求說：

“太太，你行行好吧，就算你积了阴德，孩子好了一定来給你磕头。”

“給我磕头！”王維平老婆用鼻子哼了一声，“我还不見呢。一句話，你不能走，吃了我們家的飯，就是我們家的人，叫走，你走；不叫走，你老老实实地給呆着。”

王生老婆气得眼前直冒金花，轉臉对王生說：

“好，你带着这个孩子回家吧，孩子死了，是他的命。你回家要好好地照看着这个孩子，千万别……一定要叫他长大成人……”說着掉下泪来，“他們既然不让我的孩子活，我也要在这儿死給他們个样儿看看！”

正在这个时候，王維平瞪着虾蟆眼走进門来。王生媳妇的話他听了一清二楚。这个煞神在这些小地方是慣

会耍弄手段的。他一面脱衣服，一面张口说：

“既然孩子病啦，就回去看看吧！”

王生赶紧转过身来说：

“谢谢王先生，谢谢王先生。”

“谢什么，咱们一村一土的。”他脱下衣服，点着一支烟继续说：“王生呀，现在我是困难呀，等我闹好了，亏待不了你们。让你媳妇回家看看，就叫她很快地回来。”

“好吧王先生，只要孩子好了，就叫她回来。”

王生媳妇一句话没说，转身走出屋去。

当他俩领着孩子出门的时候，上房传出王维平和他老婆顶嘴的声音：

“你叫那穷婆子走了，谁侍候你妈！”

“你他妈的，眼睛光看到鼻子尖，眼下是什么时候？咱对穷鬼不两面三刀行吗？”

王生携着孩子，老婆领着王生，一路跌跌撞撞地来到鸡鸣村，鸡已经叫了。王生媳妇闯进门去一看，孩子已经好多啦，也睁眼啦，也说话啦，虽然她落下泪来，可是心眼里安稳多啦。

贾广发给王生夫妇做了饭吃，天已经明了。王生媳妇说：

“还是让孩子回家养伤去吧，我再也不回遵化啦，在家守着孩子。”

贾广发也怕再出事，就赶紧说：

“好呀，亲妈守着比谁也强。家里困难，在我这携斗

粮食去。唉！我家的日子也是困难，在这人死鬼活的年月，有什么办法，要不他撞了咱的孩子，甭说你们，我也和他拉倒不了。这会，你不找他，他还想找你呢。唉，熬着吧。”

死，也要死在一起

一斗粮四个人吃，能吃几天。王生只好出门去讨要。

这一天，天摸黑了王生还没有回来。王生媳妇心里焦急，孩子们不住连声地喊饿。王生媳妇只好到本村去要点。她走进屈福亭的家里（屈福亭是本村地主贼六子的狗腿子，过去凭着地主的势力，想尽办法欺侮老百姓），屈福亭的媳妇见她领着孩子进来，就赶紧说：

“咱们本村本土的这是干什么，来，快坐下。”她把王生的儿子领过来，上下仔细地打量着说：“这孩子多精神，看饿得这样子。”说着由篮子里拿出一个饼子，塞给孩子说：“吃吧。”

她让王生媳妇坐在板凳上，说：

“唉，这个年头可真不好混呀！”说着她用眼瞟着王生媳妇。

“唉，谁家也比我家强。”王生媳妇低下头。

屈福亭媳妇眼球转了三转说：

“我说大有妈，现在的年月是自己的道自己走呀，你不能太死心眼了，放着鲜菜不挑，光溜着道边走。”

“唉，我可有什么办法！”王生媳妇叹口气說，“守着一个瞎子，两个不懂事的孩子。”

屈福亭媳妇脏了脏吃餽餽的孩子說：

“咱們乡里乡亲，我說句不系外的話，这样下去大人受罪是小事，要把孩子糟蹋了。就說你們老大吧，要真摔个腿断胳膊折，你們能要着吃养他一輩子嗎？”

“是呀，那可有什么办法呢？”王生媳妇觉得这話說的也对。

“办法是有呀，就看你走不走。”屈福亭媳妇紧接着話茬說，“要我說……算了吧，这話說出来叫你伤心，还是不說好。”屈福亭老婆故意把話头停住。

“你說吧，我不伤心。”王生媳妇平时也常为这些事伤心，今个有个人說說，心里也敞亮敞亮。

“要我說……咱們亲近我才說这話，要系外的我才不管呢。”

“你說吧，我不怪。”王生媳妇急于要听她的話。

屈福亭老婆故意把声音放低：

“叫我說，你們把二小子出給人，让他逃条活命，你們的日子也緩緩肩。”

王生老婆吃惊地瞪着两眼，說不出一句話。

“要是不对你的心思，就当我沒說。”屈福亭老婆用眼瞟瞟王生媳妇，見她沒怪罪的意思，又补充說：“你想想，这世界上卖儿出女的多着呢，想不开是个难受事，想开了是条活路。你想他将来长大了，还能忘了你們是他的生

身爹娘？还能亏待了你们？这又是一个靠山！”

王生媳妇虽然心里难过，可生活逼得她无路可走，觉得这话也有点道理。就抬起头来说：

“这事我自己也拿不了主意，等他爸爸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再说。你的好意我领情。”

屈福亭老婆见有活口话，满脸喷笑地说：

“这个事你可得拿定了主意，他们瞎的瞎小的小，全靠你养活他们呢，你不救他们谁救他们！”

王生媳妇告辞了。屈福亭老婆满心高兴，觉得今儿个这个事真凑巧，正想找她，自己送上门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屈福亭有个朋友想买个孩子，出的价钱不小，屈福亭夫妇就把这笔买卖揽过来。那个朋友来过几次，曾看见过王生的二小子，说象这样的就行。

王生回来，媳妇把出孩子的事和他一说。王生听媳妇的口话并不反对，就叹口气说：

“我瞎目失眼的，全家就靠你养活，孩子也是你拉把大的，你如果愿意，我不拦挡。”

王生虽然这么说，心眼里可非常难受，晚饭他一口也没有吃。王生媳妇也象失魂掉魄似的唉声叹气。有心不卖，怕养活不成孩子；有心卖了，这心头肉真难割呀！

第二天屈福亭老婆来催她，王生媳妇说：

“我们还没商量好，商量好了去找你吧。”

其实有什么可商量的呢！王生倒在炕上唉声叹气，他明明是不同意，可不愿意说出来。自己又拿不定主意，

可真难呀！王生媳妇趴在炕上痛哭起来。哭着哭着，她忽然想起大嫂子——王荣家的，去和她商量商量，也许大嫂子会给拿个主意。

王荣家的把王生媳妇让在炕上，王生媳妇未曾说就先落下泪来。她把卖孩子的事先后后说了一遍，最后说：

“大嫂，你替妹妹拿个主意，这也是咱王家的骨肉。”

王荣家的想了想，说：

“家贫、路窄、日子不好过，这是真的。可儿到底是儿，他是娘身上的一块肉，怀胎十个月不容易，一把屎一把尿，费了多少心血才拉扯这么大。为了一时的方便，就把他卖了。文书一写，更名改姓，任人家骂，任人家打呀，到那个时候，你心疼你难过，你有多少眼泪流不完呀，你就是抬个银山去也换不回来啦！……嫂子，你还是死了这个心吧，咱王家再穷、再苦，也不能把亲骨肉往火坑里送呀。”

王生媳妇一面听着一面呜呜咽咽地哭起来，等王荣家的把话说完，她一头扎在王荣家的怀里说：

“嫂子，是我一时糊涂，你算是救了你侄子的命；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屈福亭老婆的买卖没做成，就咬牙切齿地在街上咒骂：“王生这家穷鬼，不依好，放着活路不走，再要饭谁也别给他，饿死这窝穷鬼！”

今 天

——今天是阳光普照

王生沒有餓死，他不会餓死。要按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人不該死总有救。不过，过去是从这一个火坑中被救出，又走进另一个火坑；今天，是永远地跳出火坑，是受苦人自己救自己，是受苦人組織起队伍，在共产党、毛主席的率領下，打下了天下，彻底地翻了身。

春 雷 第 一 声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区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土地改革开始了，千年的封建制度要消灭，受苦人的穷根要拔掉。遵化县四十里铺也象其他解放区的村庄一样，敲起春雷般的大鼓。这鼓声召唤着人們，鼓舞着人們，受苦的人站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夺回祖祖辈辈的劳动果实。

王生这个被旧世界压倒的人，在鼓声中抬起了头，挺起了胸，站在自己的阶级队伍里振臂高呼，“打倒封建地主！”王生的眼睛是瞎的，可是他的心突然亮起来，他好象看见，受苦人的黑夜过去了，东方升起一轮红日。

在全村诉苦大会上，人們要王生诉苦，可是他站在台上却說不出一句話来。他的苦处太多了，是語言所表达

不出来的，他只有痛哭流涕，人們就跟着痛哭；他只有热泪双流，人們就跟着他流泪。王生的眼泪，不完全是悲痛的眼泪，是悲痛和欢乐混合起来的，是告别昨天迎接今天的眼泪。就在这种眼泪和欢笑声中，他家分得了七亩八分土地和一些家具。家具他并不怎么喜欢，可是土地，当日宣布这七亩八分土地属于王生的时候，他止不住热泪盈眶，滚滚流下。土地呀土地，爷爷不是为你而死的嗎？爸爸不是为你而亡的嗎？全家人不是因为你才流离失所、东奔西跑地討要嗎？今天你到底回来了！

王生有了土地，就计划着生产。一想起生产，他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到底种上了自己的地；难过的是：自己是个瞎子，孩子又小，光靠老婆一个女人家，能把地种好嗎？

这一天，王生和老婆来到自己地里。老婆看看这么一大片地，又没有牲口又没有农具，怎么个种法呢？就又悲又喜禁不住落下泪来。王生說：

“哭什么，有了媽媽还怕生不出孩子来！毛主席既然把地分給我們，我們就是用手刨，也要把它种上，就是用眼泪澆，也要让苗长起来。”

王生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种上了第一年的土地。苗儿出来了，长得还不错，他乐得闔不上嘴。可是到七月間，蔣介石匪軍由长城退下来，路过四十里鋪的时候，把他的苗子割去喂了馬。王生媳妇为这大哭了一場。

第二年种地就更加困难了。一方面天旱，再加上缺

勞力少肥料，這一年王生的七畝八分地並沒有打多少糧食，日子還是不好過。這個時候王生才明白，光有土地，沒有勞力肥料，還是打不出糧食來呀！加上這年秋後，村里出賣土地的很多，他心里慌慌的想：“這還了家的土地，真個的就保不住了？”

這一天，村里有個叫張讓的到王生家來串門，說了幾句閑話之後，就對王生說：

“聽說了嗎？咱村好多人出地啦，你有意思嗎？白馬峪有人想要你的地，出的價錢可不少呀。”

王生一聽，頭頂轰地一下，就象天塌下來一樣。他驀地站起來說：

“我的地是毛主席分給的，是窮人翻身的地，是打倒地主的站腳地，是窮人的心，是窮人的命，他就是給我萬兩黃金我也不賣，想買我的地是瞎了心，瞎了眼！告訴他們吧，讓他們黑天白日想着去吧！”

王生躺在炕上，心里比燒上一把火還煩躁，左思右想，覺得過去的日子又在眼前晃哩。正在這時，王國藩走進門來，見王生愁眉不展，就問：

“二哥，有什麼發愁事？眉頭上結着疙瘩？”

王生嘆口氣說：

“唉，甭提啦，國藩呀，有人想買我的地。”

王國藩說：

“是呀，聽說了嗎？咱村出地的可不少呀。”

“聽說啦，這得請上級想個辦法呀。”王生着急地說。

王国藩嘿嘿笑起来。

“上級早想出办法来了。”

“什么办法？”

“互助合作，組織互助組。”

“什么是互助組？”

“就是大家在一块干活，你少农具，我缺牲口，互相帮助，就能克服困难多打粮食。”

王生高兴地喊：

“那太好了！”

“好，你願意参加嗎？”王国藩問。

“那还用問，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提出来的办法，我都干！”

“問还是要問，”国藩笑哈哈地說，“因为这互助是自願的！”

“我举双手自願。”

从此王生参加了互助組。

参加了二年互助組，粮食比过去打得多了，可是还不够生活。王生每年除了領取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和寒衣之外，有时还不得不拿起他的討飯棍子和破铁筒，到远的地方去要一些。

最后一次討要

到了一九五二年，村里出卖土地的更多了。互助組

虽然好，可是抗不住天灾人祸。

这一天王生由外面回来，王国藩和杜奎正在家里等着他。王生一进门，王国藩就说：

“我们组织农业社，你参加不参加？”

“这农业社是干什么？”王生问。

“农业社就是把土地归在一起，牲口车辆是大伙的，大伙在一块种地，打了粮食地一半劳一半。”

王生想了想说：

“这农业社能叫大伙不卖地吗？”

杜奎一听哈哈大笑说：

“哥呀，农业社这个药正是治卖地这个病的，不信你吃付看看，保险你这辈子再也卖不了地。”

王国藩也笑着说：

“不但保你这辈子，它能保子孙万代。”

王生说：

“要是能保不卖地，就是跟着农业社要饭吃，我也走在前头。”

逗的王国藩和杜奎又笑起来。国藩说：“这农业社是引导大家走向幸福，再不受穷的道路，怎么能要饭吃呢？”

王生也笑了。

“我是打比方，表表我这心。”

就在这一年，王生参加了全国闻名的“穷棒子社”。

晚上，“穷棒子社”在王荣家开全体社员大会，大家讨论了土地、牲口和农具问题。计算来计算去，二十三家只

有三条驴腿，最后大家討論明年种地的种子，有人說：

“咱們办起了农业社，国家还不貸給咱們种子呀！”

王国藩說：

“咱不向国家伸手。我打个比方，咱办社好比一家子过日子，日子刚一过就向人借錢，那样的日子能过好嗎？”

又有人說：

“可咱們这二十三家是全庄最穷的，大家拿不出种子来呀。”

杜奎說：

“头年大家是怎么种的地，种子是哪来的？”

大家嚷嚷着說：

“那还不是亲戚家要点，朋友家借点，凑合着种上啦。”

有人說：

“有的还是討要来的呢！”

王国藩說：

“对，我們就是討要，也要把种子弄来。要沒有这种精神我看社办不好。有人不是罵我們是穷棒子嗎？我們就是要让他看看这点穷棒子勁。”

王生心里想：“着，要按这样办社，这样过日子，社还能办不好？明天我就去要种子。”

第二天王生起来，换了一身干淨一点的衣服，拿起要飯棍子，提起铁筒，对媳妇說：

“我去替咱社要种子去啦！”

王生媳妇笑着說：

“哪有要种子的？”

王生說：

“看，要来千家粮，种咱社里的地，这是个吉庆事儿。旧社会那娇生的孩子，不是要穿百家衣，长命百岁嗎？咱社里种上千家粮，幸福万年！”

說的王生媳妇也笑了。

王生今天出門討要，和以往二十几年的討要心情完全不一样。过去是饥寒交迫，如赴法場；今天象是赶庙会，走亲戚，总觉得象有点喜庆事在等他。他在山坡上不知不觉地哼哼起“皮影”来。

傍晚，王生回到村里，他要来了不少的种子，其中最多的是瓜子。那年建明社种了不少的瓜，每逢社員吃瓜的时候，都說：“这还是王生要来的瓜子呢。”說着大家哈哈大笑个不止，此是后話。

吃过晚飯，王生拿着要来的种子，找到王国藩和杜奎，他把种子往地上一放說：

“这是我要来的种子，交给你們。”

王国藩和杜奎一看各种种子都有，就哈哈地笑起来，笑得王生不知道咋回事，就問：

“怎么，太少呀？”

杜奎說：

“我的哥哟，你真去要种子去啦？”

“你們不是說就是要种子，也要把咱社里的地种上

嗎？”

“那是我們办社的精神，不向国家伸手的决心，不是真让你去要种子。你可好，給你个棒錘，你就当‘針’认。”

国藩也說：

“你入了社，就是社里的人啦，出門討要走陡坡过山梁，要出个差錯，咱社里要担心，外人也笑話咱。”

王生說：

“看，我要了半天种子，倒受起批評来了。”說完他哈哈大笑起来，又接着說，“国藩，杜奎，你俩知道，我要了二十多年飯，以为我还没要够嗎？可是为了咱的社，你叫我干什么，我都干。不过話又說回来了，这次討要，是我此生此世最后的一次討要了。”

討种子这件事，直到现在，在建明社还傳为笑談。

第一年丰收

春天到了，社里开始种地，这可愁坏了王生。自己瞎目失明，能干什么活呢？王生已經二十多年沒正式干过庄稼活了，在互助組的时候，組里的人都不要他換工，一方面是可怜他，再一方面怕他把苗子糟蹋了。現在入了社，还不是和在互助組里一样？

街上人喊牛叫，下地的人們象赶庙会，好象是故意向王生示威似的。他在屋子里唉声叹气，愁眉不展，象是丢了魂一样，坐下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正在这个时候，

杜奎走进門来，

“二哥哟，社里給你分配活啦。”

王生驀地一下站起来，結結巴巴地說：“給……給我分……分配了活啦？”他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接着問，“我……我能干什么呢？”

杜奎說：

“別問啦，到地方你就知道啦。”說着把他拉起就走。他們来到一个羊圈的旁边，杜奎交給他一把铁鍬說：

“这是一把铁鍬，这是除出来的羊粪，”他拿着王生手中的鍬拍拍，“这是筐，”他让王生用手搖搖，“你把粪装在筐里，我們就往山上担。”

王生本来就是干庄稼出身，装粪这活又算不了什么，虽然他眼睛瞎，他的耳朵和感觉是灵敏的，他装得非常好，就是有一点半点撒在地上，他都听得见，等筐挑走了以后，他再用鍬撥拉回来。

一筐筐的粪挑走了，只剩下王生一个人。他双手拉着铁鍬，心里想：“我到底又能干活啦，我到底又回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啦，大家干活我也干活，大家說笑我也說笑，这有多好，多叫人高兴！人們不是常說幸福嗎，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王生激动地流下泪来。

送粪的人們回来了，他們担来上圈的垫脚，倒在羊圈旁边。王生又为他們装上。人們又挑着走了。王生剛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他忽然想起来，我要是把垫脚撒在圈

里，不省得他們再垫嗎？他攥着羊圈門，走進圈去，用脚摸着量量羊圈多寬多長，就站在羊圈外面撒起垫脚來，他撒得非常均勻。

王生的活路越來越寬，他不但能裝糞上圈，還能出圈、鋤草，不過這些都是家裡的活，他總想干干地裡的活。這一天，他找到國藩和杜奎說：

“二位主任，你們看地裡的活這麼多，大伙都忙不過來，能分給我一點嗎？”

國藩向杜奎擠擠眼，意思是說：你看這沒眼的人干勁都這麼大。就对王生說：

“地裡的活杜奎是總管，让他給你分配吧。”

杜奎想了想說：

“對，咱們正在耕地，咱們那‘三條驢腿’拉耩，還需要一個傍耩的，你要駕耩，让驢拉套，这不省下個傍耩的嗎，你看行不行？”

王生駕着耩，凭他的感觉和精心走得非常直，如果后面一喊停，他馬上把套一拉，驢馬上就站住；这样他們配合的非常好，拿耩把的說：“比有人傍耩还好呢。”王生听了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象是飞出籠的鳥，能随便地在廣闊的天空中飞翔了。

晚上回到家里，王生拿过扫帚来扫扫院子，整理整理柴火，这些活做得非常利落快当，好象他的眼睛根本不瞎似的。王生媳妇有点奇怪地說：

“这老头子怎么啦，真象是越活越年輕啦。”

不錯，王生的青春正在恢復着。

經過一年的苦戰，建明社得到了大豐收，平均每畝產量二百五十四斤。全村轟動了。這是四十里鋪的坡地從來沒有過的最高產量，全社所有的人都像晚鳥鬧林似的議論着，異口同聲地說：“這農業社就是比互助組优越！”

這一年王生全家做了二千八百多工分，共分現款八十多元，分糧三千二百斤。各種各樣的糧食都有，破茅屋里盛不下，就堆在院子里，王生象喝醉了酒似的，守着糧食坐着。晚飯做熟了，老婆叫他吃飯，他說：

“不知為什麼，我不想吃。”

王生老婆也笑着說：

“我也是吃不下去。過去要飯吃的時候，一天餓肚子餓；現在有了糧食，倒吃不下去了。”

月亮升起來，孩子們都睡了，王生還是舍不得離開。過一會，他抓起碎石般的白馬牙玉米，從這個手里倒在那個手里；過一會，又抓起大粒黃豆，從這個手里倒在那個手里。他總是喜歡不夠，總舍不得離開它們，心里想：

“過去全家的糧食就盛在要飯吃的破鐵筒里，破鐵筒就是全家的倉庫。全家人的生活，要看鐵筒。鐵筒滿着，全家一天的日子好過；鐵筒不滿，一家就要餓肚子。如今社里的地，從南山到庄西，從北河灘到庄東，面積是這麼大，收的糧食是這麼多，光我一家就分了几千斤，要用那個破鐵筒來量，那得量多少筒。過去唯一能保護全家的

是那條要飯吃的棍子，那條棍子也不過能擋一擋地主家的狗。如今保護全家的，是全社，是全國，是社會主義！”想到這裏，他微笑着滾下眼淚，眼淚落在白馬牙玉米上，映着月亮，閃發着光亮。他又想到過去常聽見人們說：受苦人的眼淚是苦的，享福人的眼淚是甜的。他趴下嘗了嘗自己的眼淚，笑着說：

“我的眼淚是甜的，我渾身上下都是甜的，我全家，我們全社都是甜的。”

重見光明

近來王生的眼睛總是發着光亮。人們都這樣說，王生自己也這樣感覺。

這是為什麼？是因為日子好過啦？還是因為生活痛快啦？恐怕這兩樣都有。有的時候，突然一下王生覺得眼睛亮起來，眼前的人影、樹木，社的牛馬、羊群、車輛，都在他眼前晃動起來；然而，就是那末一下，馬上又模糊起來。他心裡想：“這大概是自己太想看看社里的東西了吧！腦袋里想出來的，不是真的看見的。”

這天清早，他起身時天還不甚亮，他要到南山去辦一點事。走到山坡上天漸漸亮起來，他無心地抬起頭來，啊！在他眼前出現了綠油油的莊稼，河灘的楊樹閃着白光，彎彎曲曲流水的小河……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舉起雙手揉了揉，莊稼、樹林、小河仍然顯現在眼前。他睜大

了眼睛，可勁的看着，可是这些东西越来越模糊，最后完全消失了。

王生回到家里，把这情况对老婆一說，老婆劝他說，“你到医院去看看吧，万一要能治好呢？”

王生一笑說：

“治什么，都快五十岁的人啦。”

“看你这个人，”他老婆有点不滿意地說，“你平常不是常說，我們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們越活越年輕，怎么今儿个倒卖起老来啦？”

王生搖搖頭說：

“我不是卖老，我总觉得是我的心看見了，不是我的眼看見了。治也治不好，何必費那个事。”

“有枣沒枣打一杆子，治得好治不好去試試。馬上去，和社里說說去。”

在老婆的督促下，王生找到国藩，把治眼的事一說，国藩說：

“前两天我們在社委会上也議論了一下这个事，准备放你的假，让你去治眼，医药費由咱們社担負。去，让佟启先給你开个介紹信，到区卫生院去檢查一下。”

王生来到鸡鳴村区卫生院，把介紹信交給張院长。張院长一看是建明社的王生，知道他在旧社会受了不少的苦，就特別关心仔細地为他檢查了眼睛。檢查过后，張院长說：

“你这眼睛要动手术，需要住院。”

王生一听要动手术，心里想：“眼睛怎么能动手术呢，弄不好会瞎得更厉害。再说，社里的活正多，过一阵再说吧。”于是就对张院长说：“我回去商量商量，要是治我就再来。”

王生走的时候，张院长再三嘱咐他，不能再耽误，一定要很快地回来。

可是王生一去再没有回来。

又过了一些时候，卫生院搬到四十里铺；张院长专门到他家去动员他治眼睛。王生只是笑笑，既不说不治，也不拒绝。他媳妇和张院长也熟，就打趣地说：

“你这治病的先生，都找上门拉买卖来了。我们治病没钱呀！”

张院长笑着说：

“国藩主任早说啦，社里包起来，不用你们拿钱。”

王生媳妇也笑了。又说：

“你三趟两遭动员我们治眼，你能保好吗？”

“你看，”张院长说，“我们都找上门来了，还不想治好吗？”说的大家都笑起来。张院长又说：“这次治眼，你不用住院，把你送回家来，我每天来给你换药。”

王国藩和杜奎也几次劝说王生，就在大家督促之下，他的眼睛动了手术。他躺在家里，张院长每天到家里来给他换药。一个星期过去了，张院长取下他眼上的纱布，让他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看见东西。王生睁开眼睛一看，眼前一片明亮。人、房屋、窗外远处的山峰，都清清楚楚

楚显現在眼前。可是他不相信这是真的，用手揉揉眼再看，这些东西越来越清楚，再也沒有消失。他感动地抓住張院長的手說：

“旧社会让好人变成瞎子，新社会让瞎子又长出眼睛来。”

一次現身說法的宣传

一九五五年秋末。地淨場光，王生媳妇要带着二儿子到薩河桥去看王生的三弟。

清早起来，娘儿俩换上了新衣服，穿上了新鞋袜，收拾得渾身新鮮，上下光亮，真象个走亲戚的客人。他們又提着一个籃子，籃子里装上点心、白饅头，就动身了。

薩河桥在迁西县內，离四十里鋪四十五里。娘儿俩走过几条河滩，爬过几道山梁，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的地方，正不知道走哪条路对，那边走过来一个卖泥娃娃的。王生媳妇問：

“借光問一声。上薩河桥走哪条道对呀？”

卖泥人的一看这娘儿俩穿得这么新鮮，就說：

“你們上薩河桥呀！同路，搭伴走吧。”

三个人一路走，就拉起話来。王生媳妇問：

“你是哪庄的？”

卖泥人的說：“我是迁西县人。”

“你們村成立农业社了嗎？”

“成是成立了，我还没参加。”卖泥人的怕问，自己先说了。他接着问：“你们是哪庄上的人？”

“我们是遵化县四十里铺的。”

“四十里铺的？”卖泥人的重新打量一下娘儿俩，“你们庄的农业社出名呀，你们的主任王国藩，不是还进过北京，见过毛主席吗？是真的吧？”

“是真的。”王生媳妇笑着回答。

“好，正好。”卖泥人的换一下肩说，“我正想问你一件事，你们村有个叫王生的吧？”

王生媳妇笑了，心里说：“你算问着了。”就马上回答：“是有个叫王生的。”

“听说他要了许多年饭，家里苦得不行，还是个瞎子。入了农业社第一年就分了几千斤粮食。这是真呀是假呀？”

“是真的，第一年分三千二百斤，第二年分了三千七百斤。”

“我不信，农业社再好，一个瞎要饭的，一年就能分几千斤粮食，那除非是作梦，要不就是吹牛说大话。”

“是真的，不是吹大话……”王生的儿子想和卖泥人的争辩，妈妈向他摆摆手，儿子还有点不高兴。王生媳妇说：

“这一说你不信，是吧？”

“我不信。”卖泥人的摇摇头，“几千斤粮食，那得多大一堆，得多少布袋盛？要叫我一个人吃，得吃好几年。”卖

泥人的羡慕地摇摇头。

“怎么样才能叫你信了呢？”王生媳妇问。

“除非我亲眼看见。本来我想到四十里铺去看看，因为道远，最近身子骨也不结实，就没去了。”

王生媳妇笑了笑说：

“叫你亲眼看见也不难，咱可要赌点东西。”

“你说赌什么吧？”

“不用赌别的，你要看见了，就把你这泥人给我们两个，我们拿回家去给孩子玩。”

“那还不容易，大的小的你随便挑。”

“一言为定。”王生媳妇低头笑了笑，用手掸了掸衣服上的尘土说：“那么先请你看看我们娘儿俩这个穿着打扮，还有我们走亲戚拿的这些东西，”王生媳妇说着，掀开篮子上的毛巾，让他看看点心和白馒头。“我们家象个什么主呀？”

卖泥人的不解其意，更仔细地打量着他们娘儿俩。王生的儿子抿着嘴不敢笑出来，站直身子让他看着。卖泥人的说：

“你们家呀，最少也得种它个二三十亩地，养着一头牛，也许还有个小毛驴子，十几只羊。”

“要按成份俺象个什么农？”王生媳妇问。

卖泥人的想了想，说：

“中农吧，新社会中农比过去也高啦。”

“不再高点吗？”

“高不了啦！”

王生媳妇噗哧一笑說：

“现在就让你亲眼看看吧，我就是王生的媳妇，这就是王生的儿子。”

卖泥人的惊得站住脚步，上上下下地看着娘儿俩。忽然噗哧一声笑了。

“你真能逗呀，这样的事还能开玩笑！”

王生媳妇郑重地說：

“开玩笑有願作人家媳妇当人家儿子的嗎？”

卖泥人的一想，也是呀，就問：

“你們真的和王生是一家子？”

王生的儿子驕傲地說：

“真的是一家子，王生是我爸爸。”

卖泥人的順手把挑子放下說：

“好，我信了！我认輸了！你們挑泥人吧。”

王生媳妇說：

“那只是說說笑話，哪能真要你的泥人。”

卖泥人的拣了两个最大的泥人放在地上，挑起挑子就走。王生媳妇赶紧說：

“我們不要你的泥人，赶快挑着卖去吧。”

卖泥人的回过头來說：“我不卖泥人啦，回村参加农业社去，泥人算我送給建明社啦。”

新房旧屋

四十里鋪分东西二鋪，中間相隔一条道。这条道，南去上长峪山谷，北来下河滩树林，是东西二鋪的中心。全村有什么集会、娱乐、庆祝的事，都在这里集合。这里常常停放着社里的拖拉机、胶輪車，或其他的新式农具。东西二鋪的社員們，每天上山收拾果树，下地拾掇庄稼，都从这里走过。去建明公社参观的人，也必须經過这里。

就在这样一个显要地方的东北角上，有一間破茅屋。那真是破得不象样子——屋頂的茅草，好多年以前就发了朽，有的地方凹下去，有的地方凸出来，茅草变成酱黑色，活象多年的陈馬粪，如果走近了，还会嗅到一股朽酸的霉味。再看那牆壁，簡直象乱石堆，有些地方还有点牆壁样，有些地方窟窟窿窿的，用乱石堆堵着。整个茅屋活象个干癟的狗尿台，上面濺着稀泥。这样的茅屋不用說人住，連猪狗都不让进去，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險。这就是伴随着王生全家要了多年飯的那間破茅屋。

就在这間破茅屋的西北面，也不过相隔十步远，盖起了五間寬大的石头新房。这房真是又坚固又漂亮，青石垒的根基，白石作的牆壁，白灰灌浆，青灰抹縫，石头的楞角对得非常巧妙，构成了自然的花紋，远远看去就象古代图案。屋頂是石灰抹的，三年五載也別担心会漏。就連屋頂的烟囪，也是亭樓式的，烟不是从上面冒，而是向

四面出。再看看那焦黄的窗戶，已經上过两遍油，閃閃發亮，衬得窗上的玻璃都分外清亮。屋里面的墙壁是白灰亮过的，鏡明雪白，尤其是太阳照在窗上，屋内显得又豁亮又寬敞。这就是王生参加农业社四年后盖的新石房。

那間破茅屋和新石房并排地站在那里，显得它那么縮气，那么难看，石房是那么高大，那么雄偉有气魄。对比之下是那么不相称。路过这里的人，都会这样想：在这样漂亮的房子旁边，为什么非留着这样一間又破烂又陈旧的东西呢？拆了它，垒上一道新墙，再种点瓜瓜菜菜的，不是更好看更合适嗎？对，这新房旧屋的主人——王生也是这么想的。

新房盖好的那一天，王生让老婆做了頓肉餃子，外加二两燒酒。吃完餃子，王生驀地跳下炕去，伸手抄起一把铁鎬，对老婆和两个儿子說：

“走，拆那間伤心的破茅屋去！”

茅屋沒拆了。为什么？咱們話分两头說。

近来王国藩看到一些現象，使他很伤脑筋。比如，有些青年人过上了好日子，却不知道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一年，全村有二十几对結婚的，这是很大的喜事，可是这些年輕人結婚后，不說好好鬧生产，让地里出产更多的粮食，却都摆起闊气，讲究起穿戴来。今天这一对請假赶集，明天那一对請假进城。下地晚，收工早，队长教育他們好好干活，他們却說：“忙什么，有吃有穿，銀行里存着錢，少做点沒啥。”就連戴存这个受苦的孤儿，也穿起买的千层

底鞋上山干活計。这些事总是在王国藩脑子里轉游。

那天，开了个支委会，决定对这些年輕人进行一次新旧生活对比的社会主义教育，請区委选一些教材。区委来信說：“光书本上的教材还不够，最好是活的真人真事，西鋪这样的教材是不少的。”

王国藩和杜奎一个个地盘算着，看看哪个最合适。这个时候正赶上王生的新房剛盖好，王国藩看看石房，再看看破茅屋，灵机一动，手拍大腿，心想：“这不就是最现成最好的教材嗎？这不就是新旧生活最好的对比嗎？”

說来也巧，就在这个工夫，王奎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拿着鍬鎬走来。王国藩一看，赶紧迎过去問：“你們干什么？”

王生說：“拆了这个伤心的东西！跟着它受了一輩子罪。”說着叭嚓就是一鎬。

王国藩上前抓住鎬把說：

“这間茅屋可不能拆！”

“为什么？新房盖成了，出来进去的看着它，就想起过去，想起过去就伤心，不如拆了心淨，把过去的苦日子忘它个一干二淨！”

王国藩笑了，說：

“嗨，就是为了你說的这个，才不能拆它。”

王生眨眨眼，不明白王国藩話里的意思。

王国藩看看那間破茅屋，說：

“咱們上了几岁年紀的人，吃过旧社会的苦，尝过苦

日子的味，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才懂得今天的好日子来的不容易。那些年轻人，吃水不知道井怎么挖。不知道过去就不懂得现在，忘了过去就是忘了根，忘了本。天长日久，就象没根没本的树，风一刮雨一打就倒下了。这间破茅屋就是过去，这五间新石房就是现在，让他们看看茅屋，讲讲过去，想想现在，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你说这间破茅屋拆得吗？”

王生听了这一番话，感动得把镐一扔，说：

“好，叫你这一说，不只年轻人，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也不应该忘了过去。我把它留着，出门看看它，进屋想想它，闲着没事说说它，让子孙万代记住它，知道我们的日子是由什么道上走过来的。”

说得王国藩笑了，王生夫妇和儿子也笑起来。

过了几天，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建明社的纪录影片，正好拍到王生夫妇过去讨饭这一段生活。拍电影这是个新鲜事，全村男女老少，尤其是年轻的小伙子、姑娘和媳妇都来看热闹。王生家的院子里闹闹嚷嚷，风雨不透。这时候王生夫妇穿着过去讨饭的衣服，拿着破铁筒和棍子（这些东西是特为保存下来的），走出屋来。大家一看，挺新鲜，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拍摄工作还没有准备妥当，王国藩看看是个机会，就把王生夫妇叫到破茅屋跟前，指着破茅屋问一个小伙子：

“笑半天，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小伙子撇嘴一笑，说：

“誰不知道，这是王生叔过去要飯时的房子。”

王国藩又問：“他們是怎么要的飯，为什么要飯？跟这間破茅屋有什么关系？他又是怎么瞎的？”

小伙子被問住了，直楞着两眼答不上来。

其他年輕的小伙子和姑娘們也直了眼，他們心想：“是呀，过去只知道王生叔他們要飯吃住这間茅屋，王生叔他們是怎么要的飯，又是怎么瞎的眼？跟这間破茅屋有什么关系？象也听老人讲过，当时沒仔細听，日子长了，模模糊糊地也記不清了。”

有些才过門的新媳妇，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心急地問：

“是怎么回事，主任，你給讲讲吧。”

“还是让他自己讲吧！”王国藩指着王生說。

王生就把他們夫妇如何結婚，如何瞎了眼，怎么样討飯，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有些人听呆了，年輕人的臉上表现出憤怒。

这时王生臉上两行热泪，刷刷地滾下来。他是为过去的苦日子伤心呢？还是为今天的幸福生活所感动呢？恐怕两者都有吧。

就这一天起，新旧生活对比的社会主义教育开始了，課堂上讲，实生活里看，王生的“新房旧屋”就成了有力的活教材。

直到現在，全西鋪的人每逢走过这間破茅屋的时候，总是看它两眼，想想过去的苦日子。他們把这間破茅屋，

当成新旧生活的标志，每逢看见它，就想起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无形中身上增添了新力量，不管干什么活，劲头都好像用不完。

尾 声

《王生家史》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也许有人要问：王生家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我可以简短告诉大家：一步比一步好。因为他们正沿着人民公社这条康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幸福，走向人类的希望——共产主义。但是，王生深切地知道，幸福的取得是多么不容易，需要付出多少痛苦、眼泪、斗争和劳动呀！王生全家现在常说这样一句话：“要不是共产党，我们哪有今天。”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然而出于王生之口，这其中包含着多浓厚的感情和切身体会呀！新社会旧社会，一字之差，生死之别。有谁比王生全家体会更深刻呢？

王生不会讲理论，但对新旧社会的深刻体会，使他的话总是能让人信服、尊敬。他常说：“过去的日子是过去了，可给我们留下的痛苦要永远记在心上，永远不能忘本。”

王荣家史

古 草

王荣是一九五二年秋王国藩和杜奎组织的二十三户穷棒子社里边的一户。但入社前后生活变化很大；走上这条新路很不容易；在建明社、在西铺村、在二十三户里，他成了个典型户。这里记下的，就是王荣一家的过去和现在……

排行老大

王荣排行老大，老二王生，老三王福。老四叫十丫头。父亲王凤山，祖父王玉，都是扛活出身。他家祖祖辈辈受穷。光绪二十一年，一场水灾，十口人饿死七口。后来家中劳力慢慢增多，扛了多少年活，才混上了五六亩地，六间草房。不久，王荣又娶上了媳妇，得了小子来泉，又租上东铺地主王瑞清三十亩地，一年中借借找找，日子还能勉强着过去。

一九三〇年春，王荣二十四岁时，家中婆媳不和，时常发生争吵。王荣心想：“单过比伙过上算。”就领着老婆

和來泉分出另過。這一年他糧食打的不少，除交租子，足夠三口人吃喝。再加上起早睡晚，倒弄小買賣，拼着命去割荊棵，還有點剩餘。父親王鳳山早看出：老大最好，和外人來往從不吃虧，是過日子能手。他離不開老大，托人說合，死乞白賴把王榮又叫回來伙過。從此王榮在家庭中占了重要地位，一切都由他掌管，代替父親理家。他打發老二下林西礦，叫老三去打短工，自己和父親經營那點地、磨豆腐、養豬、賣粉……王鳳山想：“有老大，就放心了，不下十年，日子就會變樣。”沒成想，第二年，災禍卻來了。

禍 從 天 降

王榮舅家日子過的挺旺，時常放債，王榮家一時倒不開，就常跟他們借些錢。王榮二十五歲那年，借的大部還清，只剩個零頭五十吊。這天上午王榮正耨地，看見二姪子一扭一扭朝西鋪這股道走來，王榮好納悶：我媽在大安庄住娘家，二姪子為啥一人來了，莫非出了什麼事？興許又來要賬……，就走上前問：“二姪子來啦？”二姪子笑嘻嘻的，像沒事似地說：“你爸爸在家嗎？”王榮一看不是正常笑，就說：“二姪子有事跟我說吧！”二姪子還是往前走，他就放下鋤，把她領到家。一進家，她就放起賴：“他大姑夫，我活不成啦，你給我們掃門坎子去吧，我活不成啦……”話還沒說完，就打擺。這才知道：她吃了信子^①。

^① 信子，是一種極毒的藥。

王凤山着了急，赶紧去大安庄問究竟。王荣見二妗子摆过来摆过去，像耍死，就想：“不管为啥，人要是死在我家，事情就大了，別的不算，光請人說合吃飯，就得不少化銷……”他赶紧找人硬把二妗子往大安庄抬，抬到大安庄，就死了。

二舅叫苗进治，在大安庄是个恶棍，他的日子就是靠放債、雇活、耍无賴发起来的，是新起的一戶富农。这次原是儿媳妇媽家想借錢，沒借給，媳妇就恨上了二妗子，說二妗子养汉，家里的日子是靠她脊梁骨賺来的。并說这是由王荣媽嘴說出来的。二妗子心路窄，听到这些，吃不住，就服了毒，发生了这件事。苗进治想：如果追王荣媽那句話，不清不白，傳出去名声不好听。他思謀了一会，就打了个歹毒的主意，編了一片謊話說王凤山欠他家一百一十五元，連本带利二百三十块。这回他叫家里去要賬，因为不給，打架、被侮，才吃信子死的。这样王凤山爷儿三个就被他們扣起来了。

动了很多說合，不中；求了很多情，也不中。王荣代他父亲分爭：“你說欠一百一十五块，都是啥呢？”苗进治說：“借的錢，粮食錢，……哪月哪日借的这都有。”王荣上前把眼一立，大声說：“我們原来就欠你二十八块零五十吊，今年春上給你两馱子缸，三百斤花生，七百斤蘿貝，二十八块都还清了，就差这五十吊，你就不认賬了？”苗进治說：“你們有恩不报，反来为仇，欠錢不还，反倒跟我們打架，害了我們家的人，还敢强嘴？”說完，伙同一批流氓，不

分青紅皂白，把王榮媽綁在上門坎上，把王榮爺倆吊在枣树上……王凤山服軟了，說认了吧，王榮劝他爸爸：“不能认，至死不能认！他这里詛人！……”但不过两个小时，王榮就被打昏过去了。他們把王凤山解下来，叫他按了手印，承认欠他們一百一十五元，本利二百三十块，答应很快出地还上，写了单据，这才了事。

那五亩半地就这样沒了。王榮爸爸王凤山一下就病倒了。

仇 恨

老人倒在炕上，一病不起。王榮总是劝：“爸爸你把心路放寬些，别为这件事把自己命白搭了。这个仇反正咱們得报，今个报不了，明个报，明个报不了，后天报，今年报不了，明年报……整天愁，憋这口气，頂啥呢，管啥用呢。咱們地沒了，可是地也是挣来的。有我們哥几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能挣回来，你整天这样，我們当小的該咋好呢……”不管怎样劝，老人还是順不过，总說：“我活不下去了，活不久了，我咽不下这口气，长这么大，沒挨过綁沒挨过詛呀。”王榮說：“他綁人，他詛人，那是他的罪，反正咱們沒偷人家，沒騙人家，丢人的不是咱們，是他們。他們得受报应啊。”就这样劝，老人还是不見好，病一天天重，也不吃也不喝了。王榮一看不好，就从衣袋里摸出一把票子，送到老人跟前；

“爸爸，我这有錢，咱們还可以买驴，可以跟脚，再租点地呀……”

老人一看是五十块钱，就笑了，問：

“你哪还有錢呢？”

王荣說：

“这五十块钱是我自己单过时积攒的。”

老人一听又难过了，落着泪，說：

“我不該叫你回来，要是单独过，你也落不到这地步，那二亩地也白搭不了。”

王荣心勁却挺大，第二天就买了一个驴，滿心想翻个身。不料这年秋天，又飞来一桩橫禍。原来他家租种着东鋪地主王瑞清三十亩地，因为年年交不够租子，欠下一百九十多块，王瑞清就把三十亩地收回，把王凤山六間草房也給圈去了。

地沒了，房子也沒了；王荣家一下变成赤貧。王凤山病勢越来越重，不过两个月，恨恨連声地死了。那年王荣二十七岁，老人死的那天晚上，驴也被人家偷了去。

謀 生

吃沒有，燒沒有，住沒有，日子实在不好过。不久，母亲带着十丫头出了門子，到斗岭子改了嫁。一家人四分五碎。王荣心爱的儿子米泉也餓死了。好在第二年又添了个小子，起名叫庆海。王荣抱着还上饥荒（債）恢复家

业的希望，又开始租种另一家地主的地。头一年，一下租了十几亩，打算种花生，收入大。同时，还计划和别人合股赶脚，又计划打荆棵，以此收入做为生产垫本，来支持着种那十几亩花生。但到秋后，这希望完全落空。这年秋旱，年景不好，花生打的有限，粮食也没剩多少，赶脚割荆棵赚的那六十多块钱都搭进去，还不够，反倒又拉下三十块饥荒，赔了二十多块。这一下王荣情绪低落了。

但他还不死心。秋后，他又找了个门路：借钱做小买卖，由白马峪村拉栗子，驮到破城去卖。破城栗子是七分钱一斤，他估摸着一趟可以赚两块多钱。那天他起了个大早上路了。谁知头一天就不顺利，走到接官厅村东边那个土岗子上，就被人给截住了，有三个穿官服模样很凶的人要他起税。王荣说不给，穿官服的不让他走。王荣说：“我凭什么上税？我是头一天做买卖。”穿官服的說：“做买卖就得上税。”王荣說：“我就是不上。”穿官服的說：“不上就是不行，赶一驮栗子两毛钱，我們在早就看上你了，今个才把你截住，你說头一天做买卖，誰信呢。”王荣急了，說：“我不管你們相信不相信，反正我不給。誰知道你們是干啥的？起税还有在这起的？你們这純粹是打杠子的。”越說越火，最后还是沒給，打了一架走了。到了破城，已晌午歪。先到的都卖七块钱一百斤，赶王荣到了，奸商一看是杀价的好机会，硬說栗子不好，給五块钱一百斤，其实栗子都是一样的。王荣把栗子都倒出来，分爭。奸商不得已加到五块五，六块，王荣还不答应，并且爭竞

說：“七块钱一百斤。少一个也不行，还得給脚钱，……”鬧得很晚，奸商不收了，王荣也不卖了。他一肚子气又馱着栗子往回走，剛出破城，就变天，下了一场大雨，混身給淋透，栗子也澆坏了。

剛到家，村里就打发人来傳他，說是稅务局来人，叫他去。王荣被推着到村公所，一看，还是早晨那三个穿官服的人，正在喝酒。他們拉着架子橫着眼，問：“你为什么交稅？”王荣分辯道：“我头一天就买卖，栗子还没卖，凭啥就交稅？”穿官服的說：“誰知道你是头一天，还是做一年买卖了，今个得罰你一回，你把这一年的稅补齐，交四块钱！”王荣火了：“凭啥？还讲理不？”穿官服的說：“官家就是理！”胳膊擰不过大腿，刀棒在人家手里，末了王荣只得拿了四块钱的稅。栗子全賠进去了。

气、急、又被雨淋，混身不好受。可是当村里有人来联络他到遵化城去赶脚，給商号馱紅高粱时，他还是爬起来去了。他在路上走一段，就在地里躺一会，还没到遵化城，就发高烧，病倒，抬回家来，一病躺了三个月。

又向几处借了外債。債上加債，越来越多。从此一年不如一年，景况一直倒下去，越穷越翻不过来。这当中，他曾給一家地主扛过活，因为得了伤寒，被辞退了；也曾搞过副业，磨豆腐，因为死猪，一年工本都白搭了。王荣冲天长叹說：“我哪辈子沒修好，倒楣的事都让我摊上了。”又对庆海說：“不是你爸爸沒能耐，你爸爸不傻啊，这是命啊，是时运不好啊。”

他再也想不出門道来。租地，怕种不起；做买卖，又没有本錢；生活逼得他无路可走，每天只好扛着个鋤，去給人家做“工夫”。

一 把 鋤

給財主家做一天工夫，除去管一天飯外，还給一升紅高粱。三口人，再加上点野菜，也能活下去。但王荣还有一屁股外債，同时他又得了个小子庆河；隔了几年，又相继得了两个閨女：珠子，庆齡，六口人靠一口人，生活就紧上加紧了。

这当中，王荣曾和范永祿、范永如、范永义一起，联合上七十多个穷人，自发地向西鋪的地主阶级做过斗争——吃大鍋粥；但这并没解决什么问题；由于沒有党的领导，斗争結果也只能是失败了。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逐步侵入华北，抗日战争爆发了，阶级压迫又加上民族压迫，王荣一家的生活更加困难。庆海稍大以后，虽然能帮替点，还是經常揭不开鍋，三天两天沒吃的。

王荣扛着一把鋤，整天带着庆海到西鋪庄东大槐树下——“工夫”市上去等，但做工夫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經常有几百人扛着鋤等在那里；人越多，叫工夫的人越刻薄，被叫上的可能性就越小了，三天五天也碰不上一天。生活越来越难，几乎天天靠吃野菜活着。

有一回，餓的實在沒辦法了，王榮在“工夫”市上等了好幾天也沒人叫，就對慶海說：

“走，咱們爺倆到外邊轉轉去。”

兩人一人背着一把鋤，夾着個破被（做工夫的標記），起了個大早，到大寨去了。到大寨時天還沒亮。但在大寨一直等了半天也沒人叫。本來從昨天就沒吃上飯，這天早晨連口水也沒喝，又等了這半天，實在不行了。怎麼辦呢？這麼等着也不行啊，王榮爺倆又把鋤一扛，往西轉，一直又奔到遵化城南西溜村。到這村一找，有個要叫工夫的，可是這戶訛詐他們說：“你們要做工夫可以，不過爺倆做一天只給一升紅高粱。”王榮說：“兩人應該是兩升紅高粱嘛。”那家地主說：“我不管別人，我這里一升，做不做由你。”王榮求告半天，左說右說不行，後退一步想：“既走到這，認了吧。”但慶海卻不同意：“給一升紅高粱，連媽也养活不過來，更不用說還賬，不行……”王榮又一想：“是呀，一升紅高粱够做啥呢……”他听了慶海的話，沒有做，就又沿着村往北轉、往回走。走一個村，不行；走一個村，又不行。走到後半晌三四點，快到西小寨時，就走不動了。王榮看見眼前有片樹行，就倒在那兒歇着。慶海在他旁邊坐了一會，見离家還有三十里地，說：“總歇着也不行啊，走吧，爸爸！……”連叫了幾聲，王榮才坐起來，一坐就昏了，說：“這是嚙回事？我嚙悟迷三道的？眼前覺得直晃搖、發黑……”慶海見他爸爸臉色都變了，扶了一會，說：“這不是別的，就是餓的啊！”慶海見十几步遠有

一眼泉水，就去弄了点水来，给王荣喝了，清凉了一会，这才好些了。爷俩起来又走。

赶到高各庄西，到一个坡底下，就又走不动了。歇了一会，王荣说：“这离你姨家不远了，到你姨家看看去吧！”庆海说：“做啥去呀？”王荣说：“我们两天没吃饭了，得吃点饭呀。”庆海说：“跟人家要着吃去？”王荣说：“过去他也吃过咱们啊，就算要着吃去——”庆海说：“我不去，人家现在过好了，咱不伸那个手，我嫌寒伧，走吧！”虽这样说，王荣还是不动。他抬头看见道那边有几疙瘩曲曲菜，说：“二头^①，你到那边捋把曲曲菜来。”庆海说：“这时候曲曲菜老了，麻嘴，又扎的慌，吃不得了。”但王荣还叫庆海去采。庆海到那边采了一大把，先放在自己嘴里一棵，嚼了嚼，说：“吃不得，老了，又麻又苦又扎嘴。”王荣好像没听见二头这话，接过来，一大口一大口的连泥带上边的刺都吃了。吃了，爷俩起来就又走。

但走不远，就听见西北方向枪响，而且枪声越来越密，从那边逃过来的人说：最近出现了一股新军队，与过去一切旧军队都不同，抗日很积极，这回就是他们在城东和鬼子开火了……

王荣原想从木家庄那边往回转，听到这消息，就只好由庆海搀着，紧一步、慢一步的由庄户沟直接回到家，到家已大黑了。

家里人盼了一天，一看爷俩饿的这样，红高粱也没赚

^① 王荣为了纪念死去的大儿子来泉，给庆海起名叫二头。

来，庆海媽就抽抽嗒嗒哭起来，她已三天沒吃东西了。

没办法，庆海媽拿着个瓢，到已要上飯的老二王生那里，借来了半升紅高粱糠。借回来到家就做，从开鍋起，一家子圍着鍋就喝——实在等不得了。一直喝到熟，熟了，也喝完了。

喝完糠粥，六口人躺在炕上，伙盖着一条被子，都在想：“完了，怎么办啊，明个怎么办？完了……”

第二天，爷俩又白跑了一天。

到第三天，王荣没办法，才忍无可忍，第一次偷偷地开始向老二王生学习——要上飯了。

賬

这以后，王荣就每天扛着一个鋤出去，遇上有人叫工夫，就给人家做工夫；遇不上，就要飯。虽然当別人問他討，他总說做工夫去着，但实际上他常常是扛着一个鋤，要了一天飯回来了。

但做工夫也好，要飯也好，仍然不能維持一家六口的起碼生活，更不用說还賬。賬——过去因为給父亲治病，自己治病；因为发送父亲；乘吃的；做买卖；租房子……已經达到三百五十多块。从父亲死后这十多年中，他經常在借賬、还賬、又借賬、又还賬的日子中滚过。結果不是越滾越少，而是越滾越多。

王荣算了一下，三年本利平，如果不想別的办法，照

这样下去，过不去三年，就得达到七百块。可怕呀。

他翻来复去，做了各种设想。首先，他想托人把庆海庆河打发出去，庆海可以做小活，庆河可以放猪。这样，不仅减少家中吃饭人口，还可增加收入，最低两人一年也可交他十来块。其次，他自己除去做工夫和偷着要点饭以外，整个夏季可以打荆棵，冬季可以打柴，同时秋后可以抓着跑点小买卖——对此营生，他虽赔过钱，吃过亏，但生活逼迫他还得从这上面打主意。做工夫、要饭、打荆棵、打柴、做小买卖，这些办法一齐来，一年至少可以收入百来块。这比给地主扛长活上算。

决定后，他就这样做。他里外又一算：用自己赚来的除养活四口人外，剩下可交利钱。两个儿子赚来的，可以还本。三五年后，两个儿子长大，工钱一长，七八年就可以翻过来。

但事与愿违，王荣这套账又算错了。

首先，虽然把庆海庆河打发出去，但庆海一年工资只得一小斗棒子，合四十二斤，不到两块钱。庆河人家只答应管饭，没工资。其次，他自己折腾了半年多，所得收入只够维持四口人生活；后来他眼睛在一次打荆棵时受伤，躺了多日，连四口人生活也不能维持了。刮风下雨，天灾病痛，处处不顺利。他汗满流水倒弄了一回烧瓜卖，两天赚的钱才合一升红高粱，还不如做工夫上算，还不如要两天饭来的多。

这还不算。紧接着，旧历九月初一屈福亭又替人要

賬來了。一年半以前，王榮托他從遵化城一商號借了十五塊。去年九月初一和今年三月初一，屈福亭來要了兩回，王榮都沒給。現在，又來要，一天來三回，非給不行。而且最使王榮想不到的是：這十五塊利錢的算法很特別，去年九月初一沒還上，把本利加在一起算，今年三月初一沒還上，又把本利加在一起算……，一般三年本利平，而這十五塊錢，一年滾三回，一年半本利三十一塊零四毛。

怎麼辦？王榮愁的一天沒吃飯——實際也沒飯，家里又一天沒揭鍋了。天黑後，他在窗戶跟前蹲了一會，想：這筆賬無論如何得想辦法還上，否則這樣滾下去，這一筆就得要他命。

他起來，到西頭找屈福去了。一進屋，正趕上人家吃晚飯，一家子圍一桌，是小米大爬豆粥，熬豆腐，稠稠糊糊，熱氣騰騰的。屈福見王榮進來，就說：“還沒吃吧？”王榮說：“還沒吃。”屈福說：“那就上炕在我這吃吧。”王榮說不，屈福卻給他盛了滿滿一大碗，硬揣給他，說：“今個你要不吃，咱們就不是哥們，這碗飯就是藥死你，你也得吃了。”這一說，王榮更不吃了，屈福原來和王榮家是一樣的日子，可是現在人家過的这么好，他却到了這份上，難過得要掉淚了。但王榮硬憋住淚說：“這飯我不能吃……我只求你一件事，你想法給我借三十塊錢……我王榮早晚還上……”屈福說：“啊，……你是想借三十塊錢？做啥用？”“還賬，屈福亭幫我借的那十五塊，一年滾三回利，一年半本利三十一塊四，我欠不起了……”屈福一听，發沉

了，半天才說：“眼下借錢实在为難，找保也不行，你去找王凤春試試。”

王荣从屈福家出来，又去找王凤春，不行；又去找了三四家，都不行。半夜时，他回到家，这才跟老伴商量，咬着牙，忍着心，把七岁的大女儿珠子送到西山，給老佟家当了童养媳，换来两石棒子，对付着把这笔賬还上了。

珠子走后，来要賬的并没停止，一进腊月，接二连三的又都上来了。王荣这时觉得他欠的饥荒，象泥虫似的，都末了脖子，忽拉不开了。为了躲賬，他不敢再进家……

历史的轉折

春去秋来，燕子飞去又飞回，又过了好多年，突然霹靂一声，冰河解冻了。在共产党的領導下，这个地区經過艰苦的战斗，打退了日本鬼子的侵略，又击败了国民党反动軍队的进攻，終于一九四八年进行土地改革。

王荣站起来了。在土改中，他担任了貧农团委員，和王家地主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土改以后，不但旧債廢除，还分了十一亩半地，三間草房。日子就完全变样了。

开初两年，王荣仍然走的旧路。和怀抱着曾經破灭了的希望，靠他自己单干，靠他爷儿的努力，要把这个家业过好。現在，不是又和二十年前父亲在世时一样了么？那年他和父亲分家另过，不是弄的很好么？現在儿子閨女都长大了，有共产党保护着，凭他王荣，日子沒有过

不好。

但实现这愿望并不容易。一九四九年，一场大水，把他的庄稼冲去了四五亩。其他在山坡子上种的，产量也不高。一年的收成不够维持一家全年的生活，更谈不上养猪和买牲畜了。而且旧债废掉，新债又有了一一借了十几块钱买下几个月吃的。一九五〇年，由于底薄，没牲口，地没垦过来；同时由于没猪，粪少，大部分种的白点地，这年产量也不高。还了十几块，不够，又借了十几块。再加上给庆海娶了一个媳妇，生活还是很紧巴。一九五一年，王荣采取了一个措施：叫庆海和庆河出外做短工——这时一些老富裕中农又开始雇工了；他自己带着闺女、儿媳、老伴种这十一亩半地。王荣计划：这十一亩半地维持他们五口人生活，积攒庆海、庆河的工资将来买驴买猪。头两年，虽然不顺利，但往前看，还是满有信心啊。

今年春天党支部号召组织互助组。国藩杜奎一次再次找王荣参加。王荣对这互助组兴趣不高，碍于面子，同时又是共产党的号召，他是老翻身户，不好意思拒绝，勉强参加了。不过，身虽参加，心却在外面。与王荣一个组的组长常找国藩杜奎反映：

“王荣不讲理呀！”

“怎么回事？”

“别人帮他干活，他没意见；轮到他帮别人干活了，老是推三阻四。说什么‘管饭不管饭？’别人说大伙一样都

不管飯，他就說：‘不管飯那等以后再說吧，我今个還沒吃的呢！’末了他不是出去打短工，就是到自己地里干活去了……”

國藩听了，一笑說：“老王榮就是这样，慢慢來嘛。”

結果，由于王榮三心二意，左右打算；又由于这年春澇秋旱，所以产量也不高。到一九五二年王榮正想找理由退出，國藩杜奎就找他來了：

“王榮大哥，咱們成立一个土地社怎么样？”

王榮开始不通。國藩和杜奎两个就劝：“共产党領導咱們翻了身，分了地，咱們不能忘本，这回走合作化，是党的号召，是光明大道，过去为啥受穷，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小农經濟，階級分化，出現了地主富农，剝削咱們。現在虽实行了土改，分了土地，原来的地主富农沒有了，但这并沒解决根本問題。如果不走合作化道路，还会出现新的地主富农，还会走上过去受压迫受剝削的老路。”并联系西鋪村的具体情况，說：“实际也是这样，土改后，咱們村的貧雇农，很多人日子沒有过好。你也是一样。这两年就有十几戶卖地的。現在有些被打倒了的地主富农又兴風作浪，諷刺咱們，說咱們嘎啦一生，就是穷命鬼，靠割別人的肉貼在自己身上，胖不了；一些富裕中农还叫嚷要买咱們的地——連炕头都給买去。你想想，咱們是这样单干下去，变成和过去一样；还是长志气，走集体，把社办好，靠大伙的力量，共同富裕？”

一片話，反复讲了半天。王榮似乎听了一半，耳旁風

給刮走了一半。他說：“共产党領導窮人平分土地，平分完了，又歸社，要回去——”杜奎說：“這不是要回去，共产党要這干啥？這是咱們自己成立社，歸集體，也是咱們自己的。”國藩說：“入社自願，出社自由。以後你覺得不合適，還可以出去嘛。”王榮鬆動了一下，說：“你們說了半天，到底這土地社政策是怎麼回事，我還不明白哩！”國藩說：“土地社就是土地歸集體，大家集體勞動，地五勞五。比如打一百斤糧食，土地分五十斤，勞動力分五十斤。”王榮一算計，自己不吃虧，也不會占便宜。最後沒辦法了，便說：“你們哥倆對我素來不錯，叫我入社，我可以入，可是話得先說在頭里。憑我們四口人入，最多加上慶河，我大兒子慶海還得去扛長工，我們還欠十幾塊飢荒。”國藩說：“入社了，兒子還扛活？”王榮說：“要是不扛活，比如到明年二三月社散了，到那時我們這活找不出去，以後賬怎麼還？我們一大家子生活怎麼辦啊？”杜奎說：“咱們這社也不會散啊。”國藩說：“既然入社，最好還是不出外扛活，要是將來你們有困難，沒吃的，我們給你想辦法解決。”這樣又勸了半晌，王榮才无可奈何答應了。

一條新路

清明節過後，二十三戶社員開始種地。這時王榮因為生活開始緊巴，又動搖了。他心裡嘀咕：“不入社時，慶海慶河可以給人家扛活，雖說一年才掙一石多糧食，可連

嘴帶出去了，現在一顆米粒也沒人給，還得張着嘴吃家裏的。到大秋還有五個月，這以後吃的可怎麼辦？”他進一步又想：“這玩意兒……生說要組織，親哥弟兄親爺倆還分家呢，這回把好幾十戶湊在一起，哪能干好。地都得荒了，非餓倒不行。”他想了又想，想出一個結論：“這社維持不長。”

一天上午，國藩杜奎領着大伙到南山去種玉米，有人提議把地界石扔了，他立刻嚷嚷反對：

“別動吧，動了將來是麻煩，秋後這社還不知怎麼樣呢，要是一散，各找各的地邊，得打亂仗。”

把地種完後，社裏為了發展養豬積肥賺點錢，國藩杜奎叫他搞副業給社磨豆腐片（因為他過去磨過），他都沒有信心。多次動員，才勉強答應了。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這五個月他們不但沒有餓倒，而且地始終收拾得很好。過去單干，一到莊稼正需要人工的時候，沒吃的了，就得先顧眼前糊口，去做短工、割荊棵，換點糧食。這樣地就受病，莊稼就受了影響。可是現在社裏有組織有計劃了，開始沒吃的，大家就互助互濟，你的吃完了，吃我的；我的吃完了，吃他的。大家的糧食都吃完了，就專門組織一部分勞力去割荊棵，賣成錢給大家換糧食；另一部分勞力仍然照常經營莊稼。同時，過去單干，一到青黃不接又無處去割荊棵時，一般都吃青，這樣損失就大了；現在他們正在吃緊之際，區委給貸了點款，集體買了糧食，一棵青棒子也沒吃，一塊白薯也沒刨。

所以，这年他们二十三户不但同舟共济，把最艰难最困苦的日子渡过来了；而且还以一种穷棒子精神，管理庄稼，二百三十亩地一壟没扔。各种作物均及时施肥，及时锄耨，有的甚至耨到五六遍。夏季地里一株杂草也没有……。副业生产在大伙的帮助下，也搞出了成绩。起初他们这家一升、那家半升共凑了二斗豆子、六口猪，交王荣经管。他一个人破豆子、磨豆汁、做豆腐片，带卖、带喂猪。今天磨，明天卖，后天又磨，大后天又卖。总是这二斗豆子来回倒。结果，不到三个月时间，猪由六口发展到十八口，钱也赚了不少，粪也积了不少。……

王荣一个人干这些活儿，再加上做猪食、垫圈，本是不够紧张的了，但他还经常抽空到地里去看看，甚至抓弄着干点活。看一回，出他所料，很好。看一回，又出他所料，很好。庄稼长得一片油绿。以他自己南山那五亩半地为例，单干时，种啥啥不收；现在那棒子长得真叫好，到秋后，眼瞅着整整拉了七大车。这样的大丰收，他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了。

而且他更没想到的是：秋后一分配，国藩杜奎跟大伙一样分，没一点多占；对他却有照顾，别人每天一般都记八分，单给他记九分。再加上他家劳力多，一家大小都出工，结果这头一年他分的粮食最多。屋里、屋外、箱子、柜、盆、罐、大小口袋、地下、炕上、房上……一堆一堆的都盛不下了。盛不下了，门外还一口袋一口袋往他家扛：

“大孀子，还有地方吗？”

“有……”

王荣大娘连饭也顾不得吃，颠着个小脚，急忙的满处找家具。她半辈子也没见到过这么多粮食。一家子兴奋得彻夜睡不着觉。

到末了，分得差不多时，王荣暗算了一笔账：已经分到手的，纯粮食二十八石，花生六百多斤，钱一百多块，外加棉花、柴禾……如果把物都折成钱，大约九百多块，如果把钱都折成粮食，整合四十一石，超过在单干和互助组时的五倍。

“兴得听了两个主任的话，没让庆海庆河去扛活，”王荣一边算，一边后怕，“要是扛上活，庆海一年最多一石七，庆河一石三，折成工钱不过三十多块，比在社里劳动就差多了。”

他把欠的饥荒都还清了，还买了十一个土布，做了三条新被褥、几身新衣服，一下就翻过身来。

秋后堡地，王荣对两个主任说：

“把界石刨了吧，留着又挡道又占地，碍手碍脚的，没用。”

两个主任故意打趣地说：

“别动吧，动了将来麻烦，以后这社还不定怎么样呢！”

王荣脸一红，知道主任跟他开玩笑，说：“别提啦，这回我一辈子也不入社了。”

扩社前后

丰收以后，社里又扩大了公有财产，新买了牲畜和农具，社外很多农民看到社的优越性，纷纷要求入社。但要求几次，二十三户社员谁也不同意，最不同意的就是王荣。

他说：“这玩儿，头一年真叫苦啊，一年就顶十年过，当时那样困难，紧着裤腰带干活，他们社外的不但不说好话，不帮助不助威，反而看笑话、讽刺——甚至打击；这回咱们苦干了一年，弄好了，把江山打下来了，家业治下了，叫他们享现成的？高低不行，一户也不吸收，谁也不发展，咱们就关着门、闷着头，干他十年八年再说！”

当时国藩和杜奎两个虽也有这思想，但不好明说；王荣就没顾虑了，他不怕这个那个的，可以横推直挡，不叫吸收。有一次国藩杜奎召集开小会，王荣说：“以后他们再要求，你们两个主任不好答对时，就让他们找社员，找我。”结果，有一个上下月，一户也没吸收。

正这时，县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国藩去一听报告，是传达党中央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批判关门主义。散会后，县委曹寿山同志带着许多人，连同区委赵涌兴书记、李继增书记都到西铺这穷棒子社来了。王荣一看来了一大帮人，出出进进，听说来的任务是贯彻总路线，帮助扩大社，解决思想问题，心里就结了个疙瘩。

会开了好几天。开始二十三戶社員誰也不同意扩社。大伙都看王荣，王荣就代表大家把不同意的理由跟曹書記說了。

曹書記一听，就笑了，說：“你們还怕人多？扩社是件好事嘛，人多力量大，越多越好办事。你們土改以后分了房子分了地，为啥单干时沒弄好，入社头一年就干好了？——就是因为是集体化的优越性嘛。現在你們把社扩大，以你們二十三戶为基础，再吸收一批新的力量，有啥不好呢，这既对你們有利，也对大家有利。你們二十三戶头一年干的是不錯，新衣服新被子做上了，兄妹团圆了，旧債还清了，一年生活不发愁了，你們說：这就滿足了嗎？这就到头了嗎？就不能更好了嗎？咱們革命是无止境的，說老实话現在这样距离真正的幸福生活还远的很呢！你們現在穿的是啥？吃的是啥？使的用的是啥？你們这二十三戶初級社也不过就是一辆铁輪車、一辆花轎車、二头驴、一头牛，又新买了一匹馬，……将来我們还要使拖拉机嘛，使汽車嘛，还要电气化嘛，吃的不但要飽，还要好，穿的住的还要讲究嘛……路还远的很呢。你們剛办了一年初級社就想停下来，这对不对？关门主义應該不應該？”

曹書記这一片話，說得大家心窍大开，于是不通也就通了。

这以后王荣就处处留意，看他們怎么登記，怎么作价。当时二十三戶把来年的种子、肥料、家具、牲口車輛、

飼草飼料……，一切都准备得足足的，留的种子两年也种不了，飼草飼料一年半也够吃了，特别是那一堆粪——在社址那个大院积攢着，更是充足。王荣估摸着有二百車，如果使在二十三戶的地上，粮食管保比一九五三年打的还多！

那天王荣照往常一样，正看豆腐片房，听见院子里有一个人說：“这堆粪不过五十車。”

王荣一看，来了一撥人，給那粪堆做价登記来了。說話的是高明成——新入社的社員代表，财产处理委员会委員。他正洋洋得意，指手划脚。

王荣又恼火了，就把柴火填了滿滿一灶，走出去，問高明成：

“你說这堆粪有多少？”

“五十車！”

“五十車？二百車我也不給你。”

“光我說你說不中啊，还有大家呢！”高明成还是洋洋得意的。

“这么着，”王荣横在人群当中說，“这堆粪要是不到二百車，我把眼珠子挖出来，踩个泡，給你頂上！”

底下大家就噲咕起来了。說多少的都有。噲咕了半天，县里有一个干部就給估了个数：一百五十車。

“一百五十車也不中，”王荣始終沒离开这人群，“不信你們就用車拉起試試；再不这堆粪就种在我們二十三戶的地上，你們新入进来的戶，自己帶粪，咱們各种各的

地，个使个的粪！”

大伙说：“那样还行？既然是一个社，还能分着使粪。”

最后李继增书记说话了：“王荣大爷你得明白：咱们做价、估数，只是大体合理，差不多就行。不管估多少，这里也有你的一份，估五十车也是你们的，二百车也是你们的……，你说的那两个办法都不合适，既然扩社，成为一个社，就不能你种你的，我种我的；你使你的粪，我使我的粪；要合，就都合起来。同时，用车一车车拉，也不是办法，也没那个工。……我大体说个数，算一百八十车，你们看中不中，钱是两块七毛一车，怎么样？……”

李继增同志是区委副书记，区委分工是由他负责领导和帮助穷棒子社的。半年多的体验，王荣最佩服这个李书记。他一看，既然李书记说话了，还说啥，也就不再坚持了。

等到这场争论结束，王荣回到豆腐片房，一看，坏了，因为时候大，火也大，豆汁都流出来了，把一锅豆腐片糟蹋了——末了只好落价卖了十几斤。

事后国藩看见王荣说：“看看，你脱离职位，本行不管，这耽误多大事，多大浪费，赔多少钱！”

王荣理直气壮地说：“赔多少钱——也不过是一车多粪，最多不到两车粪钱，由五十车粪变一百八十车粪这是多少啊！”话虽这样说，但他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结果后来实际一拉，这堆粪是二百七十多车。

扩社一报名，一下增加了六十户，连原来的共八十三

戶。王榮當時心里不大痛快，可是見干部們這樣高興，也不好再提出別的。末了他還是往前看，在一次會上，向縣委保證說：“以後領導上放心吧，我們心里亮堂了，保證把新社員團結好。原來是二十三戶，這回是八十三戶，零兒還是三，行，二十三戶干好了，八十三戶也一定能干好，咱們還得發揚窮棒子這股勁呀。”

王榮這一說，大伙都笑了。

後來有人提出社的名稱：“咱們社擴大了，車輛牲口也有了，也丰收了，總叫窮棒子社也不中啊，總得起個名啊！”

大家異口同聲的說：“對，是得起個名。”

王榮思謀了一會，說：“我看咱們這個社叫黨中央總路綫的燈塔一照耀，就照亮了，咱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前途越照越亮，越走越好，就叫建亮社吧。”

大伙說：“好，這個名字很適合，也對大伙的心意。”

會計佟啟這時插言了：“我也提個意見，依我看，得改個字，‘亮’不順耳，‘明’字好聽，就叫建明社吧。明也當亮講。”

大伙說：“中，還是‘明’好。”

王榮一半認真一半開玩笑的說：“這個‘明’字要不當亮講，佟啟你得負責任。”

佟啟說：“行，到啥時候我也敢負責任。”

從此，就叫建明社。

荣 門 喜

由初級社到高級社，生产年年发展，社員的收入也年年增加。老王荣笑得合不上嘴。这一年，秋收分配又下来了。六百五十块里扣去三个劳动力生产垫本——应该交納的股份基金二百五十元，王荣純拿到手的是四百多块。两口子乐得躺在炕上睡不着觉。老伴說：

“三头还没媳妇呢。”

王荣說：“是呀，該給庆河說媳妇了。”

第二天，他就托这个托那个：“給我們庆河保个媒呀！”但別人提了几处，王荣都沒相成。一九五七年正月，屈文又給介紹了强庄子高凤的閨女高玉芝，貧农成份，品貌年龄也相当。这回是庆河自己相的，双方一見面，就成了。王荣虽然不大遂心，但在大伙的說劝下，也答应了，于是他带上礼品到强庄子下了礼，回来就看日子，准备旧历三月初八娶媳妇。

王荣想：自己苦了半輩子，結婚时連腥味都沒动过，我爸爸娶我媽、我爷爷娶我奶奶时更不用說——連小米干飯都沒吃上，这回共产党領導翻了身，入了社，日子过好了，庆河是最小的儿子，虽然現在享了福，但在旧社会里也熬克过，这回手里有了錢，还有一口肥猪，不如趁这机会让全家人欢乐欢乐，賀賀喜，也叫別人看看我王荣現在到了什么份上了……

他算了一笔，分到手的錢和糧食，除了維持一家全年生活外，娶个媳妇——即使坐上一二十桌也足够。計劃好以后，他就去找国藩和杜奎。一进社址，見乡里張書記正和国藩杜奎研究事。

“大爷有事嗎？”張書記先开口了。

王荣說：“我請示点事，想給三头——庆河娶媳妇，定在三月初八。”

国藩說：“娶呀，这是喜事。”

王荣說：“可是，我家里的米不够了。”

杜奎說：“国家不是有供应嘛，娶媳妇供五十斤大米。”

王荣說：“五十斤不够啊。”

張書記国藩杜奎同声說：“五十斤还不够，你想怎么办啊？”

王荣說：“我想坐个十桌二十桌呢，——我苦了半輩子，这是最小的儿子娶媳妇，現在入了社，弄好了，我想让亲戚朋友們也替我高兴高兴，也請請乡亲們。”

国藩杜奎說：“那不用！要打算娶媳妇，你就打上一斤酒、称上半斤糖疙瘩，买几盒烟卷，再买上一張毛主席像，晚上大伙給你一道喜，一哈哈就中了。”

王荣說：“那不中，咱不是軍隊，若是軍隊就中了。”

張書記說：“不是軍隊也不應該鬧大罗，还是新事新办吧！現在上級正貫徹勤儉持家，我們这正研究呢，咱們是建明社，你又是二十三戶的，更应注意勤儉節約。国藩

杜奎他們說的有道理啊。”

王榮說：“咱勤儉節約，咱有道理，可是娘家的人來了，也得坐上几桌啊。”

國藩說：“就是娘家的人來了，坐上几桌，五十斤精米也夠了。”

王榮還是堅持：“那不中，我爸爸娶我媽、我娶我媳婦、我二兒子娶我二兒媳婦，都沒辦過，这回娶三頭媳婦，怎么着也得坐几桌。”

國藩杜奎還是不答應：“那不能照你这么办。咱們是建明社，得勤儉節約，現在正往下貫徹这精神呢，你应当带头。”

說不到一起，王榮只好暫時放下了。

正好这时县里一个負責同志到西鋪來，國藩杜奎把这事一汇报，这个負責同志說：“坐两桌就坐两桌吧，几輩子受窮，这回弄好了，也有意义，別鬧大了就中。”王榮听到这消息，就大准备起来了。他怕自己喂的那口肥猪不够，又买了一口；除买来国家供应的五十斤大米以外，又从市場上花四毛錢一斤买来二百斤，共二百五十斤大米；还买了四十一斤白酒，三十一塊錢的烟卷，糖、粉……搭了席棚，找了两个會計（管收礼錢和記賬），买了不少紅紙，在王生家王广家号的房子，向親友們也都送了信，还准备了其他的一切……

响門那天（娶的头日、三月初七），把猪一杀，女客都到了，三月初八那天早晨，男客也陆陸續續不断的來了，

两天内先后到的有：庆河的斗岭子村四叔家、奶奶，洒河桥的三叔家，高各庄大妹子家，迴龙峪村叔伯姑姑家，鸡鸣村大姑家，附马寨村二姑家，安乐庄的三姑家，东旧寨村的老姑太太家，缺庄姥姥家（来了四家子），破城的四姑家，丁家岭的大姨家，曲福村二姨家，许儿庄的表姐家，另外还有好多家……，王荣没来得及一个个去数，但粗看一看，就知道来的客人比他原来估计的要多得多，有些没有给送信的，亲戚一串亲戚，听到消息，也都赶来了。而且每一门亲戚，都不止来一个，至少都是两三个甚至六七个、七八个。王荣这次没算吃饭的细眼。他带着礼帽，满脸闪着红光，穿着崭新的黑华达呢衣裳，里里外外，远接近迎，分别把这些来客安置在自己家、王生家、王广家、王林家、王海家……，然后就去照看烟酒、茶水、酒席，和几个劳忙的商量事，并且一次再次的去请干部、请书记、请国藩和杜奎。本村相好的，沾亲的，也都来了，另外，一个队还来一个队长，一个社员代表。里三层外三层，贺喜的，看热闹的，足有几百人，把王荣小院都挤满啦。

上午十一点，只听得外边一片呐喊和响声，夹杂着几发鞭炮，一辆带篷的新胶皮车，把媳妇接来了。随着媳妇来的，还有娶门客、介绍人、送门客、妈家的人。媳妇穿着一身红红绿绿花衣服，胸前带着一朵大红花，被搀下车来后，和新郎庆河并排站在一起，按新旧结合的办法，简单举行了仪式，给毛主席像鞠了躬，就开始入席。

入席，更是热闹，让这个让那个，坐了这桌坐那桌。

从厨房来的掌勺的声音，从席上来的划拳的声音，从妇女桌上来的笑闹的声音，……这真是王荣有生以来第一次啊。

到下午三四点，席才坐完了。末了一算，庄上的和外村客人共坐了二十七桌，本村家里的也不下四桌，共计三十多桌。

第二天是回门，妈家派车来接闺女和姑爷。按理说，这天外客都应该走了。但这些外客都是什么人呢，不是老姑奶奶，就是少姑奶奶，再不就是姨娘，亲姐姐亲妹妹的，多少年不见面，这回团圆了，不愿走了，她们爱图个热闹，恋个伴儿。除去赶上红白喜事这个好机会以外，平时不容易碰到一起呀。“你们是建明社，闹好了，有粮食。”有许多女客说着都自动留下来，只走了少一半人。王荣见这些人不走，也不好撵，想：这是看得起我，都是穷亲戚，入社都翻身了，在一起乐乐吧，顶多也不过两天。他没说话，一看肉不够了，就叫劳忙的去集上买来几十斤肉。这天又坐了十好几桌，光媳妇妈家来随礼的就坐了好几桌。

庆河随媳妇在丈人家住了一夜，到第三天，丈人就跟车来送。但没想到这天忽然变天，从早晨就开始阴，到中午正坐着桌吃着饭的时候，就连雨带雪刷刷地下起来了。下着雨雪，又坐了十几桌。这回王荣可真着急了。见雨雪不停，他一会出去望望天，一会出去望望天，但越望天越阴沉，雨雪下的越大。最后沿照老例，妈家的连人带车顶着雨雪，都回去了（不能过夜）；但其他外客，却都给

截住了。而且由于气候反常，这次雨雪下的又大又持久，一連就下了七八天，把外客截了七八天。那些老少姑奶奶和表姐表妹們这回可高兴极了，她們理直气壮地吃了七八天，住了七八天。她們不挑剔，大米、肉吃完了，就吃粗粮……，到第九天，客人最后走的时候，还坐了四桌，有三十三个人呢。

王荣这下苦了，末了他一算，收賀喜錢总共不到四十块（一家有給四毛的，有給六毛的，还有不給的），但支出却花了五百多块。不但分紅錢都賠进去了，原来在信用社存的那点款也都搭进去了。末了，还缺两个月吃的。

到青黄不接时，王荣没办法，找国藩杜奎去了：

“我借点粮食。”

国藩杜奎說：“沒有。”

王荣为难了：“沒有也得想法給我弄点啊，我沒吃的了。”

国藩說：“沒吃的也沒法解决。你娶儿媳妇要鋪張嘛。你把粮食、錢都糟去了，这时候伸手要那有啊，当初那么劝你，你都不听，現下找我們，我們没办法啊。”国藩还生着气呢。

底下杜奎也批評：“咱們是勤儉办社，你又是二十三戶的，你想想，你那样做，影响多不好啊，真不应该！”

正說着，張書記进来了。他一听，也插嘴說：“这件事大爷办的不妥当，以后可得注意呀。”但末了他又把話拉回来，对国藩杜奎說：“王荣大爷既认錯了，我看你們就先

給他解決點吧。”

國藩還帶點氣的說：“咱們這兒正貫徹勤儉持家，你却把糧食給浪費了，起了不好的影響。現在有幾戶娶媳婦的，也要求了幾次，想跟你學呢。你想要糧食，那好辦，可有一宗：你得給我做做勤儉持家的工作，做好了，我就給你解決糧食。”

王榮一聽有門，就說：“那怎麼做呀？”

國藩說：“開群眾大會，你當着大伙給我讲讲節約，宣傳宣傳勤儉，把你娶兒媳婦當個教訓。”

王榮說：“中。”

於是當天晚上，就開群眾大會。王榮在大会上就說他過去怎麼怎麼苦，他爺爺他爸爸結婚怎麼樣，他結婚怎麼樣，這回在共產黨領導下，入了社，覺得日子弄好了，給庚河娶媳婦，就想大鬧一鬧。當時兩個主任叫簡辦，他怎麼也不聽，買了多少大米多少肉，多少烟多少酒，來了多少客人，坐了多少桌，後來沒成想又下雨，八九天糟了五百多塊，末了差兩個月吃的……。他足足講了一個多鐘頭，最後他說：“以後大家誰要辦喜事，千萬別跟我學，咱們是建明社，要勤儉，要注意對外影響，要細水長流，日子要往長遠里過……”講完了，他這才心裡明白過來：“這哪是叫我做宣傳來呢，這明明是叫我當眾檢討來了。”國藩看王榮是真的認錯了，氣也就消了。那幾戶要娶媳婦想大鬧一鬧的，也簡辦了。第二天，國藩就給王榮解決了一石棒子。

人民公社社員

王榮從主任那里解決來一石棒子，這才對付着接上大秋。一九五七年，王榮分紅又不少，經過給灰河娶媳婦這件事，他很知道勤儉持家的重要了。這以後，不但勤，而且儉，不怕拿自己當鏡子，總在大会小會上宣傳。只要思想一通，他走的又很穩。

但到一九五八年秋，王榮情緒又波動了。

這時正當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左近幾十個高級社要聯合起來，以西鋪建明高級社為基礎，成立一個人民公社。開始王榮聞風打聽：“轉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後來在一次會議上，聽說要把他們原高級社四個村的公共財產全部歸入公社，他心里一下涼了半截。

他又算了筆賬：他們四個村的高級社，除去土地和果樹不算，其他公積金、公益金和社有財產就是四十七萬，光膠皮車就有十四輛。而別的高級社，哪個也不如他們積累多，有的還欠着國家貸款。他想：“要是各高級社的公共財產大体差不多，那也沒啥說的；可是現在他們的財產比我們的財產差太多了，跟這些社合并起來，這不是拿我們的錢去給別人還賬么。”

他嚙想嚙不通，不通又去找主任。一進社址，見國藩正在屋，就說：“國藩哪，咱們今個也勤儉，明個也勤儉，勤儉了這些年，開半天白給別人勤儉了唄，早知道這個樣，

咱們为啥还少分多扣呢。——咱們还是把那現款分了吧！”

国藩問：“这是你的意見还是大家的意見？”

王荣看出国藩不同意，估摸着說：“也是我的意見，也是大伙的意見——大伙都願意这样。”

国藩說：“不見得吧，还是再听听吧！这件事也不由你，也不由我。”

从社址出来，王荣就不由自主地去到各戶串連，找了佟启，找戴寬，找邵庆昌……，社員里有的同意分，有的不同意分，經王荣一“商量”，同意分的比不同意分的就多了。王荣这时勁更足了，他打定主意想再和国藩杜奎說說，只要他俩一同意，就好办。

这天早晨，王荣还没有去找国藩，国藩找他来了。一进屋，国藩就說：“老三荣，这两天活动的怎么样啊？同意分的多还是不同意分的多？”

王荣一听有門儿，赶紧回答道：“同意分的多。”

国藩說：“你說說，都同意怎么分？”

王荣說：“大伙是这么个意見：咱們的胶皮車、騾子馬……都不动，頂咱們的数入公社，这比別的高級社也不算少；可是那十几万块钱現款，不如走笔賬，給大伙分了。”

国藩說：“理由是啥呢？”

王荣說：“理由就是咱們的积累多，分了，給社員寬裕寬裕，也說的过去，这也不算剝割別人，是咱們流血流汗

掙来的。要不，就给人家还了饥荒，这些年白勤儉了。”

国藩一听，笑了，說：“老王荣啊，你还是当初办社的二十三戶中的一个哩，你不带动群众起积极作用向前走，怎么今天比别人还落后了？办人民公社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群众的要求提出来的，分掉公共财产是你串通少数社員提出来的，是你說的对还是毛主席說的对呢？”

这一說，打到老王荣心坎上了。

“我是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公社的呀！”

国藩說：“可是你这种打算却是在反对人民公社哩。你想想：如果別人都照你这种想法，他为他，我为我，你为你，人人計較个人私利，把公社财产一分，咱这公社还办成办不成？”

老王荣臉紅了。

国藩又接着說：“再說公社是咱們自己的組織，参加公社的积累多少总有不齐——就如同当初二十三戶入社时，有的有地有的沒地一样。但参加了，就是一个集体，怎么能說把财产給別人还了饥荒呢？”

一片道理，王荣无話对答了。底下国藩又对他讲了不少，末了見王荣低着头好象轉过一点来了，就給了他一个任务：“这么办吧：这工作是你开始做的，你还得再回去給大伙解釋。誰同意分，你就去說服誰，告訴他：咱們是建明社的社員，是毛主席表揚过的社，咱們應該走在头里，积累不能分，还要把生产搞好，財物保护好。”

国藩走后，有几天王荣坐立不安。他想：“莫非我又

錯了。”他想了過去又想現在，“……從二十三戶到八十三戶，從全村到高級社，每次我都擔心別人分走我們的東西，可是每次社擴大以後，我的收入都增加了。每次我都没想對。這回轉人民公社，莫非我又錯了。我想的怎麼和毛主席指示的不一樣了？……”最後按照國藩給他的任務，他就去做工作，找了佟啟，找戴寬，又找邵慶昌……一個個去說服：“咱們不能分，咱們想的和毛主席指示的不一樣了。”

結果公社成立後，一大二公的優越性，充分顯示出來了，生產大幅度增長了，不到一年半時間，他們增置了幾部汽車，新添了不少拖拉機和各種農業機具，並且電燈也有了，粉碎機、吹風機、鋤草機、電動機也使上了。在水利方面，除建明水庫以外，還修建了揚水機站、三泉合一、南北干渠。也有了自己的社辦工業。同時，經過了各種嚴重的艱苦鬥爭和考驗，公社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組織日益完備，經驗日益豐富，制度日益健全。從王榮個人來說，這時不但自己買上了收音機，給慶河買上了自行車，而且到一九六一年春，又蓋上了第二層新房，秋天又分了三千多斤糧食（平均每人得六百多斤），年終又得五百多塊紅錢。王榮高興地說：“這還差不離！”對公社也就更通了。

以後他講到這一段思想發展過程時，不怕拿自己做例子，在黨的幫助下，在一次群眾大會上，他還做了回檢討。聯系到自己的病根，他說：“入社這麼多年了，為啥每

一次社会向前发展，我都老怕吃亏不敢迈步呢？——原因就是我在旧社会里过穷日子过怕了。在旧社会，人不为己，就要吃亏上当。凡是和别人来往，就先得算计一下吃亏不吃亏。其实，那时候，任凭怎么算计，总是穷人越过越穷，富人越过越富。我这遇事为自己打算的毛病，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有社会主义思想，我为大家，大家为我，不应再打个人小算盘。要是大伙一心一意，按照党的政策，把社办好了，我个人自然也就好了。我的毛病就出在这‘我’字上。”

新老队长

西铺大队原来是两个生产队，每队八十多户。王荣是二队副队长，搞生产一向风里雨里，带头苦干，种地耨地就象绣花一样，群众是信得过他的。只是因为队过大，生产管理都不方便，领导上经过研究，决定划为六个生产队，每队三十上下户。一划队，社员就争着挑选好队长。原来两个队的八九个正副队长再加上大队下放的几个干部，适当搭配，变为六个队的正副队长候选人。一二四五六队社员大体都满意，但三队社员却有意见了。

一天晚上，有十几个社员自动凑在一起，私下议论：“咱们队两个队长比别的队都弱啊。”“杜金太主观，王凤雨也拿不起来。”“队长当一半家，生产领导不好，别人吃干的，咱们得喝稀的啊。”有的社员想跳一队——屈环那

队，有的社員想跳二队——王荣那队。情緒很不穩。

这时屈福常也在場，他說話了：“跳队那就打乱了，不是个办法，我倒有个主意，不知中不中。”

別人說：“你說說，啥主意。”

屈福常说：“咱們可以眼睛朝下，从社員里选拔选拔，再补个新队长啊。杜金、王凤兩年岁都大了，也应该培养培养新人。”

“这倒是。选拔誰呢？”

屈福常说：“依我看，王荣的儿子王庆海不錯，只要大伙把他选上就中。庆海大公无私，对生产也有經驗，人又細心又有魄力，还知道勤儉过日子，从早我就看上他了。”

大伙一听，說：“对呀，庆海不錯嘛。”

“又是二十三戶的。”

“中。庆海当过生产組长，还当过模范。”

“人确实公正无私，办食堂时，他当过一年多炊事員，一个粮食粒沒往家拿，社員都願意，就是他爸他媽去打飯，也一样看待。他还知道節約，咱們食堂从沒亏过。”

“不仅过去在食堂，这回人家領導那組墾地，那叫多好啊，起早貪黑，工分多少一点不計較。”

“庆海立場还穩，遇事也不爱动摇。入社这十年，人家在哪个关口都跟党走在前面。”

“行，补选个新队长是个方儿，庆海合适，說实在的，他比他爸爸强，我也打早相上他了。”

經屈福常一提，大家发现了一个新人，很高兴，都議

論起庆海的好处来……

第二天杜金、王凤雨把三队社員召集在一起，正式选举队干部。一投票，王庆海就当选了。出席二十一名劳力，庆海得二十票（自己沒选自己），王凤雨得十八票，杜金得十七票。庆海本来提出几次說：“选別人吧，我干不了。”但一真当选，也就不再推辞，但坚持一点：“正队长还得是杜金，王凤雨和我年青，先当助手吧。”大家也就同意了。

庆海一当上队长，不是在地里，就是在队里，再不就去开会，忙得連飯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而庆海爸爸——王荣老大爷这时也更加忙了，因为他当选为二队正队长，队里大小問題他要管；二十三戶开会、参加座談、到外边做报告、应酬参观訪問的……也都要占去一些時間。父子两个在會議上、在大队里見面的次数，比在家里見面次数还要多。

庆海是新队长，他很虛心。在經驗方面，他很注意向各队老队长們学习；也很注意傾听社員意見；对于公社和大队布置下来的工作，他一絲不苟，小心謹慎地按政策办事。

但庆海爸爸——王荣老大爷却不同了。他是老队长，凭着老資格，不大虛心，也不大征求社員意見。很多事，他常常离开了原則，个人說了算。

有一天，庆海发觉他爸爸那队的粮食分配有問題：縮

小了照顾部分，加大了按劳部分，以劳七人三比例往下分，使有的户没有达到最低标准。庆海知道这都是他爸爸的主意，吃过晌午饭，就劝他爸爸：“你们那队这样分粮食不符合政策，还是应掌握原则，按大队布置办事，别光由着个人。”

王荣说：“什么地方不符合政策呀，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有好几户社员提出的。”

“提意见的都是劳力多的户，我看最多也不过三家。”

说了一会，王荣不听，庆海就把这件事向大队汇报了。

杜奎就跟国藩商量，决定召开个队长会，解决二队的粮食分配问题。

晚饭后，别人都到齐了，就只缺王荣。大伙等了半天，也不见他来。国藩很着急：“他到哪去啦？他不来这会怎么开呢？”

有人说：“供销社送来奖售品，他必是又不放心呗！”

国藩说：“庆海，找找你爸爸去，叫他快来。”

庆海一进二队队部，看见他爸爸——王荣老大爷正坐在炕当中，两只胳膊和两只大腿弓着，搜着一大堆奖售品呢，什么：糖、胶鞋、布头、绒衣、手巾……花花绿绿，一色新货。会计屈祥坐在地下桌子旁边，在看账。只听王荣在问：

“屈祥，看看，赵凤祥多少分啊？”

屈祥说：“八百四十分。”

王荣說：“不行，他不够三千分，沒有他的。再看看，杜亮多少分啊？”

屈祥說：“一千八百分。”

王荣說：“还不行，他也分不到。再看看，我多少分啊？”

屈祥說：“五千二百分。”

王荣伸手拿了一双胶鞋，放在旁边說：“这是我的！”又回过头来問：“屈祥，再看看，張鎖子多少分啊？”

屈祥說：“还不到五百分呢。”

王荣說：“更不行，他不用指望。再看看，屈保成多少分啊？”

“两千二百一十八分。”

王荣說：“还不行，再看看，我多少分啊？”

屈祥說：“你还是五千二百分嘛。”

王荣又伸手拿了一包糖，說：“这是我的！”放在旁边后，又繼續問：“屈祥，再往下看，杜衡多少分啊？”

正說到这，庆海就插进来，以队长对队长的口气大声說：“別乱出主意乱分啦，这叫啥分配方案啊，你这样規定不合理，照这样分，都成你的了。”

王荣一看是他儿子，很沒好气的說：“啥分配方案？这是根据上級指示，按劳分配！”

庆海說：“你这样既不是按劳分，也談不上照顾，上級不是这样指示的。別的队都是先把这些东西交給队委会，根据政策在队委会上先討論出个原則：按劳分多少，

按人分多少，定出个比例来。你规定三千分以上才分，这叫啥按劳分配呢。”

这一下扫了王荣的兴。儿子一說，爸爸一想，也明白过来自己实在沒了理，这确实不是按劳分配，更沒“加照顾”，因为三千分以下的一点也沒有。

庆海又說：“把这双鞋和这包糖都归到一堆吧，粮食你們分的就不符合规定，奖售品这样分更出圈了。这样做，社員对你更得有意見，明个你支配生产就支配不动罗。你要不听，就拿到大队去討論——大队正等着你开会，正要討論你們队的分配問題呢。王主任是让我叫你来了。”

王荣这才想起晚飯前通知他开会这碼事。

王荣父子先后进了大队部。

會議一开始，庆海不仅把二队的粮食分配，連剛才見到的奖售品的分配，全給捋出来了。庆海一說，大伙都笑了。

一队队长說：“依我看，王荣老大爷对按劳分配政策还缺乏全面認識。公社不是传达了嘛：咱們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不是绝对按劳分配，这就得有‘加照顾’，得保证大家富裕啊。”

六队队长說：“当队长的就得照顾整个队，不能光考虑个人。要是考虑个人，庆海只一个小孩，绝对按劳分对他也有利，可是庆海那队沒这样做。”

庆海說：“依我看，二队的分配不合理，要怪我爸爸。

他淨打个人眼前小算盘。”說到这儿，他面向他爸：“你現在劳力多，可是将来你动弹不了时，庆河再养活几个孩子，你也会变成劳力少的戶；反过来，現在人家劳力少，可是将来人家孩子都长大了，也会变成劳力多的戶；那时要都像你現在这样，都不要‘加照顾’，你会怎样呢？現在你照顾別人，別人将来也照顾你，这里外是一样嘛！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是保证大伙富裕，你总打个人小算盘，那是算不清的。当队长的，别光看自己合适不合适，咱們应听听大家意見，看到全面，掌握政策啊！”

庆海这一說，大家又哄哄笑了。

杜宝說：“別人不敢这样批評王荣老大爷呀，还得王庆海呀！”底下你一言我一語，都同意庆海的，把王荣的分配方案給否了。

第二天，王荣就开始糾正自己的錯誤。思想通了以后，他又愉快了。他不怕拿自己当例子，为了教育那些劳力多的戶，在一次社員会上，他还做了回檢討：“这个‘我’字要是不丢掉，的确不中啊！”逗的大伙又笑了。

戴存家史

葛文

一

孤儿戴存入社以前叫二满。二满上有哥哥，下有弟弟，本是张德峪村贫农温福魁的孩子。不幸，这一年爸爸得了重病，去世了。

三个儿子贴在身边，只要有一分活路，当妈妈的哪里肯舍下儿们走哩！娘儿们生着法儿过活呀！哥儿仨数殿保岁数大，那时已经九岁，经人撮合，去给地主放牛。放牛的空儿，殿保便拾些柴禾背回家来。东家看见了，伸手挡住说：“吃的是我家的饭，拾柴禾却往自家拿，是啥理！”听着这些蛮话，九岁的殿保敢怒不敢言，回得家来，望着妈哭。妈有什么法子呢！一家四口，统共只有炕大米块地，娘儿几个用给子给，不到一早晨就给拉完了，能打几颗粮食呀！莫非真的携儿带女的讨要着过活吗？夏天好过，秋冬也好胡弄，到春天，日子长，满坡白草，娘儿孩娃们真是度日如年呵！到三月，实在熬不下去了，妈妈便把殿保留给本家，小三送给官厅村一户穷人，自己带着五岁的二满来在西铺村戴老八家。戴老八是谁呢？二满依偎

在媽媽身邊，轉動着黑眼珠，怯生生地望着立在面前的這位高大的漢子。

“二，叫！這是你爸爸。”媽媽輕推着二滿。

“爸！”二滿怯生生地走過來。不想這位高大的陌生人一下抱起自己，高高舉起，又輕輕放回地上，撫摸着自己的頭說：

“我戴老八命窮，幾個兒女全沒養活住。往後，你就是我戴老八的一根苗呵！”

戴老八又抱起一個光腳的小閨女，送在媽懷裡，高興地說：

“來，咱這娃和咱們一樣命窮。她爸叫王鳳德，本是西鋪村人，房缺地少孩們多，靠打短工、做月工糊不住口，看咱缺孩，就把刁兒送給咱。咱就是她的爸媽！”

戴老八和叔伯弟兄排行，共是弟兄八個。和戴老七、戴老五是親弟兄。哥兒仨一樣，從父親戴貴手裡接受下來的是個“窮”字。窮逼着戴貴打短工，找月工，日子是不好過，學會了殺豬的手藝。輪到戴老八這輩，老五窮的沒法過活，出關當了半輩子兵，臨了從東北帶回一個女人來，人家一看他啥也沒有，不肯跟他，走咧！戴老七和戴老八哥倆，也和他父親一樣，靠打短工、找月工掙扎過活。戴老八從小跟父親學會了殺豬。可是，在那種年頭，西鋪村常年討吃的就有三十四戶，能維持生活的只有十四戶，一年四季除王家地主外，誰家有豬可殺呢！

戴老八缺吃少穿，沒有女人願意跟他。有一年，一個

瞎眼的女人跟了他。戴老八欢喜的了不得。那女人能燒火做飯，补补洗洗，虽說生了几个儿女沒养活成人，有王凤德的閨女刁儿补了这个缺，戴老八也很滿意了。誰知一天黄昏，戴老八怀抱刁儿回家来，見屋里黑洞洞的沒声音，便朝着炕里的黑影子說：

“咋不点灯呢？”

沒回答。

戴老八又問：“咋不点灯呢？”仍沒回答。戴老八放下刁儿，摸出火儿点上灯。哎呀！苦命人臉朝牆角吊死了！她活着，跟着戴老八吃糠咽菜，她死了，沒有留下一句話。

如今戴老八的小草屋里，又是孩子又是女人，又成一家人了。知根的亲戚們都說二滿和媽跟上杀猪的戴老八，別看一碗糊涂面吃三天，也比在張德峪那头强！过日子就是过的人，有人就有指望呵！

二

一九四八年，西鋪村进行土地平分。戴老八这一戶貧农，已經是个七口之家了，戴二滿又多了三个妹妹，和刁儿共总是姐妹五个。望着这一伙子孩娃，戴老八欢喜地說：“嗯，咱过的就是人么！”戴老八分下土地十七亩、草房三間，心高气盛地指望着过好日子。春天，土地剛一化冻，就帶上十四岁的二滿下了地。东借西凑，好歹借够了籽种，播在土里，戴老八便病倒了，整天价昏昏沉沉，糊言

乱語。請个先生来治吧！几十里請上来，他进门不說看病，倒背起手往当地一站，四下里一望，說：“窗戶对着門，哪能不死人！宅子盖得不好，克人，得先改造宅子。”这样的先生，哪里是治病救人，明是坑害人嘛！媽哭着，不知該怎么办。另打听下一位先生，問問价錢，說是打一个药針，要五斗玉米。一家七口人，一罐玉米面糊喝三天，五斗玉米，哪里来呢？那年月，穷人有病，就得拿命抗，抗过去活啦，抗不过去死咧！

十来天的病，戴老八死了。死时四十九岁，留下五个孩娃，女人愁楚不过，不几天也病倒了，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

戴二滿守着媽一个勁儿抹泪。对門杜奎来了，看了看病人的神色，叫出侍候病人的王秀深媳妇，低声吩咐她：“不中呵！不能等死呵！再去抓付药去吧！”

王秀深急急忙忙去抓药，二滿陪伴着媽。

“媽，你喝口水不？”

媽不言語，也不睜眼。又等了好久，一个极其微弱的声音从枕边傳了出来：

“你妹子呢？”

“玩哩！”

“去，出去看看她，好好照看着你妹子！”

二滿巴巴望着媽那副蜡黄臉，眼窝里存着泪水，掉头走了出去。

二滿再走进草屋时，媽已經咽了气，直挺挺躺在破炕

席上，一块破被单遮住她的脸面，土炕上放着一包没解绳的草药。

爸死后不到百天，妈也死了。拿啥埋葬死人呢？戴老八的亲哥，戴老七来了，和几位当家人商量来商量去，只有走出房当地这条道儿。十七亩地，十一亩地留给妹妹，各人带着地份找活路去。余下五亩半地当给白马峪一家富农，三间草房当出间半去，共合佃当下二石五斗玉米。还完爸爸死时拉下的饥荒，埋葬埋葬妈妈，一颗粮食没剩，只剩下五张小口，大张着唧唧呀呀等食吃。

三

戴家草屋里冷冷清清，已经有三天没揭锅了。五个孩子痴呆呆地团在土炕上。戴老八的哥哥，戴七大爷抹把泪坐在炕沿边说：

“二呵！生法儿吧！别等着往死里饿呀！”

戴二满有气无力地抬起头来，企求地望着七大爷。爸妈都死了，靠谁呀？七大爷也是穷汉子，靠着给地主做活过日子，怎能拉扯起自己姐妹们呢！

七大爷又说：“你姐妹几个都来，大爷是养活不起。我和乡亲们合计了一下，小三留给我，刁儿归她爸王凤德。你戴满哥^①说养活上二闺女！”

① 戴满是戴老大的儿子。

二滿眨巴着細長眼睛，就象犯人听候发落似的，聚精会神地听着，不知道自己被发落到哪一方。

七大爷伸手摸摸团在土炕上光脚睡着的小四，慢悠悠地说：

“城北白家园有一户人家，想要她，就送她去吧！跟着人家好歹有口饭吃，兴许成人哩！”

戴二滿点点头说：“中呵！”

七大爷又说：“你比她们大几岁，又是个男孩，不难活！”

不难活，谁知道好活呀难活！一颗粮食没有，十七亩地当的当，随着妹妹带出去的带走了，活没活干，饭没饭吃，咋活呀？二滿拔起腿过了河，投到五间房舅舅家去了。

舅舅叫魏长胜。也是穷的有上顿饭吃没下顿饭吃。不管咋困难，吃糠吧，咽菜吧，没依没靠没爸没妈的亲外甥来了，舅舅端碗，外甥也端碗。日子一长，舅舅担不起了，说了话：

“二滿，你想个法儿吧！你看，我这也是瞎混哩，有今日，没明日的！”

二滿眨巴眨巴眼睛，点头说：“中呵！”

身上破衣裳，肚里稀菜汤，一个人说走就走，牵挂谁哩，二滿拔起腿从五间房舅舅家出来，无目的地走着。

四

此时，已经是严冬了。北边，连绵起伏的大山，山巒上罩着白雪。树木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迎着寒風呼叫。小二滿穿着政府救济的旧軍衣，光着脚丫，順着河槽的大路朝西走，不知不觉来到一个熱鬧去处。他想找人問問，見人家不理不睬，只得又朝前走。忽然看見街心有一座高樓台，樓台下有个小飯鋪，心里这才明白过来了：这大概是遵化城吧！

飯香吸引着二滿，他慢慢走近飯鋪。只見飯鋪的大炉灶迎着街，火苗苗子呼呼地，着的挺旺。二滿裹裹身上的旧軍衣，想靠近炉灶暖和暖和，猛听得头頂上铁勺子敲的叮叮当地响，一个人大声地吆喝着：

“远着点！远着点！”

戴二滿抬起头来，看那人肥头大耳的好厉害，扭轉头，悄悄地一旁蹲着去了。蹲了陣子，觉得身上嗦嗦的冷，肚里咕咕的叫，又立起身来，慢慢走近門边，靠着門板立着。座上吃飯的人，有人就把剩菜剩飯倒給他吃。夜晚，戴二滿身貼热炉灶，呼嚕呼嚕睡了。有时，戴二滿从飯鋪里討不到剩飯，便忽閃着綠色的旧軍衣，光着脚丫，在城里向人家要着吃。夜晚，仍然回到炉灶那里貼着身子过夜。过了一个来月，慢慢的邻近的人們也都认得穿救济衣討吃的这个小孩子了，可怜他沒家沒业的，便劝說

飯鋪宋掌柜收留下他，給他口飯吃，支使他干些杂活。宋掌柜也就答应了。

一上来，宋掌柜分派戴二滿扫地，洗碗，挑泔水，担淨水。从早到晚，脚手不閑。干多少反正戴二滿也不爭竞，只要給飯吃就足了。晚上，热灶台上一躺够了。哪知好日子沒几天，发生了問題。

戴二滿因为身个小，挑水打不起桶来，桶底常常碰着地。不几天，水桶漏了。

掌柜的提起水桶，反轉过来察看着，生气地責問：

“你就不能往起挑挑嗎？”

掌柜的腆起大肚，坐在长凳上，拍着飯桌生气說：

“正經八輩的养活你个閑人！不够飯錢哪！”

又湊合了几天，掌柜的把小二滿叫在跟前，不胜厌恶地說：

“干一月不够水桶錢，算了吧，我这儿养活不起你，你另寻飯碗子吧！”

“中呵！”戴二滿只有这一句話，从来不反駁，从来不愁苦，叫走嘛，一个光人从鋪里走在鋪外不就完了！

数九寒天，戴二滿光着脚丫，走出城来，踩着雪地轉游在邻近的村子里。見村里場上有个大草垛，便在草垛里扒个窩窩住，比貼着炉灶过夜既避風又暖和。餓了便进村要口飯吃，人們总是把剩飯和鄙視的眼光一起扔給二滿：

“那么大个小子啦，要着吃？懶貨！”

鄙視和責備，戴二滿都能忍受，心想：又不是我不干活，是沒人叫我干么！他只是不能容忍孩子們的无情的戏耍。

走在街上，孩子們一伙伙圍住，逗他：“小人！小人！”他憤怒了，掄起拳头打他們，孩子們逗的更凶了，四面包圍上來。戴二滿逃不脫了，便施展本領，一溜烟爬上一棵几丈高的楊樹，坐在樹杈上，晃悠着一雙細小的腿子，哈哈大笑。

一九五〇年夏天，戴二滿討吃走在遵化县沙河邊上，這正是雨季，剛剛下過一場暴雨，河水漲大了，一浪趕一浪地流的挺急。戴二滿坐在河邊上扔石頭玩。后邊几位赶路的人過來了，站在河邊上，搖著頭說水急過不去。

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二滿說：“不怕哪，我先給你們試巴試巴去！”說著，就撲通一聲下了河，一個浪頭打的不見影兒了。幸好其中有一個人會水，立即把他救了起來。

小二滿不服氣，心里盤算：“凍沒咋我，餓也沒咋我，莫非我倒怕你水不成！”從此，只要看見水坑，他就跳下水練習，終於學會了游水。

五

一九五三年初春，大地解凍，河里的冰塊已經溶化，河灘里的淺水潺潺流著。戴二滿的腳上，冬天凍裂的口子，一道道，一道道的，張著血紅的口，走路時，小石子灌

进去，热辣辣的疼。他就把脚放在沙石洼里冰着，一会儿痛麻了，又站起来赶路。从一九四九年起到现在，他有四年没有摸着鞋穿了，无论是暑伏热天，沙石地烫的象热锅，无论是数九寒天，冰雪盖地，脚踩着冰块如刀割，戴二满都是光着脚。这哪里是脚？脚底上磨起的厚茧比鞋底也不薄呵！

有一天，戴二满拐着脚，走到一个庄子外面。这里生长着大片小叶杨，树尖上，微微地刚放青。戴二满实在走倦了，就靠着树睡着了。醒来一看，日已偏西，四下里望望，不见一个人影，只见景忠山高高的立在不远处。“这是什么庄子？”戴二满心里一惊，翻身立起，站在进村的大道上细细了望。庄子东头那瓦窑似的一排一排瓦房，不是地主王家大院吗？那些瓦房在一九四八年土地平分时全分给穷人了。顺着往下看，戴二满看见街南台上属于自己的那间半草房。那草房，他一家人在这里生离死别，自己离开它流浪又流浪，眼看已经几年了。他怕见西铺，怕见那伤心的草房，怕见自己的乡亲……劳动有饭吃，他相信这理儿，可是上哪儿劳动呢？地是当出去了，给人家干活谁要呢？索性流浪着混吧，他想着，心里一横，扭头离开西铺村，顺着往南山的道儿，慢悠悠地走着……

南山的毛栗子树勾引着他，他记起他怎样在粗壮的栗树枝上跳来跳去，逗得妹妹欢喜大笑，没提防，招引得爸爸生气了，拿镰刀要拍自己，自己一个鹞子翻身从栗树上翻下来，几步便不见影儿了。

二滿尽量想找尋当年欢乐的栗树，可是栗树一棵棵长大了，变样儿了，沒有留下欢乐的痕迹。二滿失望地走着，走着，在猫儿莖的一块地里，看見一大伙人在干活，这是干啥哩？二滿好奇地站在地楞边上看。好多人不是过去的討吃戶嗎？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样精神抖擞热气腾腾起来？他懦怯地問：

“喂！你們这是打伙干活呀？”

“你，你是……”

一个細高个子的人，应着声儿朝二滿走来，二滿认得他，是西灘村一位好干部名叫王国藩。王国藩盯着看了一会，长方臉上露出了笑容，惊喜地說：

“哈！这不是戴二滿嗎？”

“是呀！”二滿說。

一听說是戴二滿，一伙子做活的人全拥上来，团团圍住。有人問：

“二滿，你这几年都在哪儿咧？”

“二滿呀！个儿还是沒长高呀！”

长高不长高，戴二滿觉得沒啥新鮮，吃不飽自然长不高。新鮮的是大伙在一块地里干活。

戴二滿又問：“你們这是打伙計干活嗎，还是給地主干活？”

“地主打倒了还能还阳嗎？我們这叫土地合作社。”温自礼說，“就是土地合伙一块儿种，一块儿收！”

“一块儿干活就叫土地合作社？”戴二滿一个一个地

看着这伙人，有王生，王荣，邵家弟兄，心里盘算：“你们这里头讨吃的也不少呵！”就问：“我也入社成不成？”

人群里站出一个人来说：“你入社咋算？你啥也没有，土地没一分，农具没一件！光不溜的比河槽的石头还光。”说话这人，戴二满认得他叫王荣，也是穷的光溜溜地，就对他說：

“没地是没地，可是我有一双手，能干活！”

“不一定，个儿那末点大！还没咱那三条驴腿的驴高呢！”

“成年讨吃在外，也不一定会干活！”

“按理說，也该要上他！”

一时间众人議論紛紛，有說要的，也有說不要的。社主任国藩拦住大家說：

“这么着吧！咱先干活。二满入社的事，晚上到社里，咱开会討論討論！”

晚上，草棚屋里，二十二戶社員全到齐了。二满也挤在人們中間坐下来。

社主任王国藩主持會議。他說：“共产党毛主席号召咱种地人成立社，是为的咱穷人过好日子。戴二满是咱穷人里头的穷人，他爸爸穷，他媽媽穷，他姥姥家穷，几辈子穷，穷的他讨吃在外。咱大伙考虑考虑，是让他入进来和咱們一块儿往好里过呀，还是叫他讨吃在外？”

国藩話巴儿一落，杜奎立刻表示态度。他通的一下子立起身来，揚起一双濃眉，眼珠儿一轉說，

“中呵！天下穷人是一家！何况他本是咱西鋪村人呢！咱要看着他受苦不管，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咱心里难受！”

杜奎一席話，說得人們悶声不言。是呀，掂掂两位主任的話，理直难駁。穷人的苦，穷人体会得深。悶了一陣子，王生說：

“入就入吧，啥叫乐意不乐意呢！”

王荣思謀了一陣子說：“十个和尚里头还夹不出个秃子来嗎？有他就当沒他，叫他入吧！”

“对！叫他入，咱千說百說有些人还不肯入，戴二滿千里百乡的回来入社，咱們欢喜！”又有人这样說。

国藩收起大家的話，痛快地說：“好啦，从今日起，戴二滿算咱社里一个后續戶哪！”

“中呵！中呵！”人們欢喜地喊着走散了。国藩拍着巴掌喊：

“哎！回来，別走哪！咱再商量个事儿！”

人們又坐了下来，悄沒声的听国藩說啥。

国藩望着二滿說：“得啦，这回留在咱西鋪算是走不了啦！我看呀，你就改个名字，叫戴存吧，存就是社把你存留住了！”

“中呵！中呵！戴存这名字好！”人們乐哈哈地望着二滿，二滿笑了。

六

孤儿戴存，做为一个后续户，在一九五三年的初春，参加了王国藩带头办的“穷棒子社”，二十二户社员，谁也不外看他，无论走在谁家，只要遇上饭时，自己不吃，也总得让戴存先吃饱。此时戴存已经十九岁了，人情道理也懂得些了，社员们越是拉着扯着的叫尽饱的吃，他就越不肯吃了。

春天，点种棉花的时候，戴存跟上大伙，在地里干了半天活，回到家来，揭开锅看看，锅里盛着早上添进去的凉水，没煮啥东西。国藩来了，见此情景，便说：“戴存呀！走吧，到我那里喝口粥得了，喝完你给咱招呼人去，咱得忙着下地去！”

对着社主任作假也不中。戴存踏一双破鞋，踢踢踏踏跟上国藩喝了几碗玉米糝粥，吆喝人去了。

清早，国藩家喝的粥，中午被杜奎拉家喝粥，晚上，杜奎又来叫，戴存推说在王荣家吃过了，不肯再去。心里盘算，他孩子多，也没富裕哪！再一看他那黄瘦的脸，戴存心里不好过，想着自己不去吃，兴许他还能多喝点粥。他这个带头人，千万不能累垮呀！戴存勒勒裤带，趴炕上睡下了。

第二天，二十三户社员，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在岭下地里点种棉花。年轻人有王庆河领头，从河沟里往上坎

地里挑水。水桶叮当乱响，人们有说有笑的，庆河担上水桶跑的飞快，戴存长的个儿小，身子弱，挑不起桶，不是洒少了，就是水桶碰在石头上。庆河看他力气不支了，忙迎上去，接住水桶说：

“戴存，去，一边歇会子去！”

“中呵！”戴存强挺起腰，不把水桶给庆河，反而跑得更欢了。

“戴存哪！咱干活不能舍命哪！日子还长着哪！”国藩接着说。

杜奎看他挑副水桶，脚步上显着虚软，心痛地想：“是从小没吃过饱饭的哪！这力气活儿，不能叫他多干！”想着，他便朝戴存走过去，想命令他休息。戴存机灵，绕着道儿又下河沟挑水去了。杜奎立在道边上等候他，看他挑副水桶，哼吃哼吃上来了，青黄的脸上，浸着汗珠，腿脚哆哆嗦嗦，几乎迈不开步。

杜奎伸过手去，说：“来，换给我挑！”

“中啊！”戴存一面回答，一面又想闪开。杜奎一把抓住扁担就挑。谁知这么一抓，戴存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一霎时，老老小小全围上来。摸摸戴存的头，不烧，摸摸肚子，呵呀！扁的前心贴着后心。

戴存慢慢睁开眼来，说：

“不碍的！”

国藩心痛地扶起戴存，难过地说：“是我的不是哪！快到我家吃口饭去！”

“干脆，往后就我那儿吃吧！”杜奎說。

“你們都不富裕哪！”戴存扑簌簌掉下几滴泪来。

王荣走过来說：“走吧！上我家吃口去，我还有两碗紅高粱哪！”

王生女人也赶过来，說：“上我家吃口去！我还有二升棒子呢！”

梁老汉乐哈哈地說：“走！上我那儿去！別看咱社眼下困难，到秋后，粮食打的堆成山，那就又該叫你們发愁了，愁粮食沒处儿放！”

老汉一番話說的人們又乐了。于是，水桶連着水桶，叮叮当当又响了起来。梁老汉悄声对戴存說：“他們干他們的，咱走咱的！咱吃饱肚子再上陣！”

七

一九五三年秋天，西鋪村“穷棒子社”二十三戶用自己的双手，赢得了第一个丰收！他們創造了西鋪村亩产最高纪录，平均亩产达二百五十四斤（比当地的中等戶多出三四十斤）。二十三戶社員，每戶分紅所得粮食，都是仓滿囤流。戴存既沒仓又沒囤的，只有土炕一盘，怎能放得下他分紅所得的二千五百八十九斤粮食呢？往日是没有粮食吃发愁。今日粮食多了，戴存又不知道該咋办了。說实在，也真发愁哩！

国藩笑哈哈地走来说：

“戴存，別愁！咱一樣一樣安排，先贖房子地，后接妹妹大團圓！”

戴存也樂了，說：“王主任，全山社安排吧！社就是我的家，共產黨就是我的娘！”

國藩幫戴存找來缸缸罐罐，座上席囤。村里人聽說討吃的孤兒戴存分下小山似的一堆糧食，多少人跑來參觀。這可真是個奇聞，窮棒子們一翻翻到天上去了。

依着國藩的安排，當出去的五畝半地，間半草房全贖了回來。寄養在戴七大爺家的小三，和戴滿家的小二也先後接了回來。

秋盡冬來，天氣一天天冷了，河灣里那片楊樹，葉子快落光了。社里也不忙啥活了，國藩幫着戴存買下几匹小布，做棉衣，制棉被，一切備辦的差不多了，國藩說：

“戴存哪，拉着咱們那‘三條腿’，到城北白家園村，把小四閩女接家來吧！”

戴存拉着驢，驢背上搭着新被子，串村過店，朝城北白家園走去。鄰近村莊的人，差不多都認得他。可是，僅僅多半年，叫化子變樣兒了，變得叫人難以相信了。這能是那個光腳丫穿破軍衣的叫化子嗎？不，他現在紅光滿面，穿的齊齊楚楚。是誰養活了他呢？鐵的事實活的人，替農業合作化做了有力的宣傳。組織起來的窮棒子社給孤兒戴存撐了腰。戴存來到白家園，人家一看他這氣派，就把小四讓他領回了。

小四快七歲了，騎在驢背上，淚眼汪汪。

“回咱家吧，家去了給你做衣裳！”戴存把自己的新褂子給妹妹披身上，哄她。

“家在哪儿呀？誰給做新衣裳呀？”小妹妹轉着黑眼珠問。

“家就是社！”戴存拉着驢，邊走邊哄妹妹。

“社是什麼呀？”小四騎在驢背上，望着那瓦藍瓦藍的天空問。

“社就是毛主席給咱窮人挂的一盞紅燈！”

“紅燈比星星亮嗎？”天已經墨黑了。小四看見天空中有一顆大星星忽忽閃閃。高興地叫着：“對了，毛主席我見過的！”

“你在哪里見過？”

“白家園我爸爸牆上挂着有毛主席的象！爸爸說他是窮人的救命恩人！”

“是呵！是共產黨毛主席的恩情，咱才能回老家哩！”戴存哄着妹妹，不知不覺地進了西鋪村，走到自家門口，立住驢，指着階台上的草棚屋對妹妹說：“到了，這就是咱的家！”

聽見街門口戴存說話，屋里候着的兩個妹妹和一些社員一齊迎了出來。二妹淑蘭這時已經十三歲了，看見小四，一把抱起，不知道說什麼好，對着小油燈，不由得想起自己那苦命的爸爸媽媽，竟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三妹淑琴也跟着哭，戴存忍也忍不住，一把把抹淚。招惹得那些先後來祝賀的社員也都跟着掉淚。一個個感嘆

着說：

“咳！这一家人，亏得共产党的好主張，办土地合作社哪！不的話，怎能团圆呢！”

“是呵！办社只有一年，光景就翻过来了！新被、新褥、三面新的棉衣。戴老八活一辈子，不准穿过一件三新的袄！”一位年老的人不胜赞叹地说。

“哼，別說他戴老八，就是老杀猪的戴貴，他也不准穿过呀！看来，人还是长寿好，福全在后头哪！”

人們正这么贊美着，国藩进来了，他睜眼一看，姐儿几个眼紅紅的还在抹泪，只有小四淑华睜一双大眼，怯生生地望着。心想：姐妹久別重逢，哭哭啼啼也难免，只是兄妹几个年岁都还不大，戴存更不会过光景，往后的日子还得社里多操些心。

第二天，戴存又牵上驴，去接大妹刁儿。刁儿是經她亲爸王凤德童养給大余家沟的一个农民的，此时已經結了婚，听說姐妹三个都在家团聚等她哩，也忙赶回西鋪来，帮弟妹安排过光景。

八

一九五五年秋天，由杜奎等介紹，戴存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在紅旗面前，戴存举手向党宣誓。他說：以前我是孤儿，現在我是党的儿女了，党是我的爹媽！以前我流浪，討吃，受欺侮，我没有理想，沒有希望，爬高上树，

钻山捉蛇，头发不剃，手脸不洗，不知道啥叫冷，不知道啥叫热！我单知道一点，人活着要吃饭！一九五三年我回到西铺，经过党的实际教育，我心里亮了，我看见我们穷人只有一条道——那就是革命，往共产主义走！

九

西铺河湾有一条六里长的防洪林，钻天杨长的密密麻麻。远看象一座绿色的长城，把西铺村擋了个严严实实。这个林子，是一九四九年遭水冲以后造起来的。有了这个样版，党支部年年号召青年植树造林。戴存担任着团支委，每至春秋便和一伙青年，上南山植树，东一坡，西一片的，种树不少，几乎全都成活了。

一九五六年，戴存被派去张家口，参加华北五省青年植树造林模范大会，会议上，戴存听了许多植树模范的故事，心里由不得一阵阵惭愧，觉得自己还做得太少。

这一年秋天，戴存约了杜振炎、杜振焕、王庆贺、王玉兰、屈桂清等五位团员，在南山坡种树三天，下了八十斤松籽。小松树绿油油的长起来了，遮盖住秃山坡。西铺村的社员，坐在炕上，端着饭碗，便可望见青葱浓郁的南山坡，人变了，山也变了。

穷山变成了宝山。

一九五九年，戴存被派去迁西，出席唐山地区的植树造林会议。这一次，全国知名的植树模范袁士珍也去了。

袁士珍家住遵化县君子口。君子口是唐山至遵化一条必经的道口。戴存来来回回走过几次，记得君子口道边那两座青山，一山青松，一山花果，人家的院墙用青松筑起，村庄被花果遮住。

“四十年前，这里也是荒山秃岭来着！”袁士珍总爱拿过去和现在相比。他慢慢告诉戴存，说：有一年，他背一口袋核桃上了山，爹妈说他是糟害东西，……

“你种够有多少棵树呢？”戴存敬仰地望着这位老人，想起这两大山的树木，密密森森地数不清。

袁士珍一笑说：“我不过是起了个头，后来都是生产队集体栽种的！”

“起了一个头！”袁士珍老人的话，戴存掂来掂去，永不能忘。

十

一九六〇年，唐山建筑公司请戴存和他妹妹淑琴去给青年工人讲讲他的翻身史。经过党支部批准，兄妹俩去了。

兄妹俩坐在一间屋子里，感觉到任务重大而又光荣。戴存思谋着问妹妹：

“没有带笔吗？”

“没有！”妹妹淑琴说。

“去，到办公室借支笔来，再要上张纸！”

妹妹淑琴借来了笔和紙，瞪眼問哥哥：

“咋！写啥？”

“我說，你到这儿做啥来啦？”戴存問。

“做啥？不是叫咱做报告嗎？”淑琴为难地說。

“报告啥呢？”戴存又反問着妹妹說，“要是想着自己去做‘报告’，准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来。来，我說，你記！”

戴存說，妹妹記，不大会儿，一張紙上，写滿了字。戴存拿起紙来看了又看，說：

“去，送到党委会去，請書記审查！記住，走到哪儿，党委也是咱的領導。听党的話，当好党的助手，是咱們的光荣任务！”

十一

新的房，新的人，新的家庭成立了。孤儿戴存在集体的大家庭中，完全变了样，土改时分下的三間草房，在一九六三年春，已經翻盖成洋灰瓦的屋頂，高高的立在西鋪大街南阶台上。屋內院牆粉刷一新。屋內摆着一对大紅油漆板柜、鏡子、壺碗、电灯，一个人家应有的应用物件全有了。一九五八年，經人介紹，戴存和鸡鳴村的高小毕业生賈桂芝結了婚。

四个妹妹，除大妹刁儿因結婚早沒有回来念上书，三个妹妹，都先后在本村小学毕业。二妹淑兰自由对象，出嫁在余家沟。三妹淑琴，一九六〇年和齐儿庄的一位社

員結了婚。四妹淑华，今夏考入初中。戴存說：“如今念書，花錢不多，只要妹妹考得中，就讓她念！不管你在哪兒，聽從黨的分配是頭一條！”

返回來，咱再說留在張德峪的戴存那位溫殿保哥哥。自媽媽改嫁在西鋪后，殿保因為無人扶養，也曾流落城鄉。後來在城里一個小飯鋪里端盤子，挑泔水，侍候人。那孩子也乖巧，聰明，手脚利索，慢慢地學會了廚師的手藝。先在遵化飯店打雜。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建明公社擴大，溫殿保下放在鷄鳴村公社飯食鋪當大師傅。一九六〇年飯食鋪結業，溫殿保便來在西鋪村落了戶，成為西鋪大隊一戶社員。今年，溫殿保蓋下洋灰瓦屋三大間，前後大窗戶，孩娃女人，成家立業了。

1963年9月改于西鋪

佟印家史

刘 真

生活，每年每年都给人留下新的记忆，有些事，永远站在你记忆的最高处，不管什么新鲜事来了，不知不觉，你总和它去联系。

佟印最小的女儿，今年也上三年级了。大女儿燕秋，今年是初中二年级，每天骑着新买的自行车，到十五里外的鸡鸣村上中学去。望着女儿活泼的身影，听着她们快乐的声音，三十八岁的佟印，今年特别怀念自己的父亲。父亲就是在这三十八岁的这个年纪，在西铺村最早的一场斗争里，被敌人杀害了，尸首被扔进了河里的。每到清明节，别人给亲人坟上添上几铤土的时候，佟印只能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父亲。

佟印和六十多岁的母亲，包下了小队的副业、磨豆腐。国庆节前几天，在队部的小南屋里，这劳作特别紧张，两个节都一起来到了，社员们都在等着吃豆腐哩。小毛驴拉着石磨，精神勃勃地一圈圈走，走。那笨重的石磨，掺着水的豆儿倒上去，不发出声音，只是默默地转，转。雪白的豆汁流下来，一桶又一桶。在这母与子面前，那

磨碎了的，仅仅是豆儿嗎？那流下来的，仅仅是豆汁嗎？不！不！这平凡的劳动，却告訴我們多少不平凡的事情。

佟印六岁那一年，穷得没法儿过，父母亲就租种了地主的十五亩地。有一天，他們夫妇俩在地里薅草，小佟印跟在他們身后一面哭一面說：“餓咧，餓咧！”

餓咧家里也沒有餽餽，有什么办法呢？父亲佟瑞明抬头一看，旁边有块甜瓜地，就对孩子說：“你去要个瓜吃吧，爸爸以后想法給人家錢。”

佟印去了，可是那看瓜的，是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她一看見佟印从高粱地里钻出来，那样子又黃又黑又瘦，肚子很大，胳膊和腿却細得怕人。那女孩子慌忙跑到佟印的父母面前，害怕的哭着說：“死孩子精来咧，跑到我們瓜地里去咧，吓死我咧！”

那女孩子哭着跑回家去，佟印却摘来两个大瓜，坐在地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恨不得一口把整个瓜都吞下肚去。父亲望着他那样子，想起“死孩子精”四个字，一串串的泪珠，撒在土里去。真的，这活孩子比死孩子还难看呢。

父母亲苦掙苦熬，买了一套做豆腐的工具，磨起豆腐来。卖了豆腐，一家三口吃豆渣，掺野菜，勉强餓不死。

佟印九岁的时候，有錢人家的孩子正在念书，任意玩耍、打鬧。瘦弱的小佟印，天天抱着个大木棍，推着笨重的石磨，一圈圈的轉，轉。他心跳，流汗，困难地喘着气，多么沉重的脚步哇。这愁悶的磨道，什么时候才能轉完？

走到哪里算一站？什么时候也能有一头小毛驴呢？

这小小的孩儿，迈着艰难的脚步，一直在磨道里走了五六年，抗日战争的枪声响了，父亲才有了笑模样儿。有一天，悄悄对他說：“孩子，再使一把劲儿，困苦的日子有头了，共产党八路军来了。”

一九三九年，在这四十里铺，父亲第一个当了八路军的办事员，作起抗日工作来。这磨豆腐的日子，也就暂时停止了。

有一天夜里，父亲领着人去破坏公路，被敌人捉住了，他藏起铁铤，硬說是走亲戚从这儿路过的。敌人不信，一連打了他几个死，勉强回到家，他躺在炕上不能动了。佟印从南山拾柴回来，一看父亲浑身肿了，臉也肿了，还有一道道的血印，他扑在父亲怀里，痛哭起来。父亲抱着他的头說：“孩子，別哭，这算不了什么，不受苦中苦，甜日子就不能来。”

佟印和母亲懂了这个意思，都帮助父亲作起工作来。

部队上东西要得急了，等不到夜間，白天就得送，母亲就去担任这种工作，她送粮送鞋送信。有一次，敌人查住了她，翻了半天，什么也沒翻出来，她骑上小毛驴儿，又高兴地走着。那許多的錢票子，在棉鞋里装着呢，她特意借了双大棉鞋。敌人翻遍了各处，就是沒叫她脫那大棉鞋。等送到了，包森司令的队伍接过錢，都高兴地圍着她說：“大娘！你真勇敢，真有办法，可辛苦了。”

这时候，十四五岁的佟印，在城里一个大地主家当长

工，城里的伪警长，是他东家的干儿子。就为了这一点，别人出城进城都要受到严格检查，只有这一家的人，包括长工在内，出城进城不受检查。也就为了这个方便，父亲不叫佟印回家，他经常拿些钱去，买大批的胶皮底鞋，布匹，药品，手电，叫佟印送出城来。佟印问：“这是给谁买的？”父亲说：“是给人捐的，你什么也不要说，不要问。”

有一次，佟印回到家，家里有很多拿枪的人。一个个都那么可爱可亲，又唱歌又看书本。佟印问父亲：“这就是八路军吧？”父亲说：“对咧！咱买的那些东西，就是给他们的。”佟印撅起嘴说：“爸爸！我不扛活咧，我也要当这个兵去。”父亲说：“不行，现在还不能离开城里，以后，我一定送你去。”

佟印笑了，天天盼着，等着，奴隶牛马的日子，可有个头了。

在佟瑞明的心里，虽然苦日子有了盼头，可是穷苦弟兄眼前的苦难，他怎么也看不下去了。有一次去送公粮，他问区长：“我们村有几户很贫的人，几乎要饿死了，能不能用公粮救济他们一下？”

区长说：“当然可以。”

佟瑞明回到家，就背上十斤小米，给要了多年饭的王生家送来了。这时候，王生的妻子正在炕上生病，半月起不来了。那双眼睛的丈夫，每天要来一点可怜的东西，再放上些水和野菜，煮一煮一家四口人吃。孩子和夫人都饿得不象样子。王生媳妇一看佟瑞明送来了小米，这是

从来没有过的事，她又难过又感激立刻哭起来。佟瑞明也含着满眼的泪说：“这是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照顾你的，吃吧，好好的养身子，等咱们胜利了，这苦日子就过去了。”

佟瑞明走出王生的家，半天还激动得流着泪，他觉得，他第一次有权利照顾自己的苦弟兄了，就是死，也要沿着这条路干下去，走下去。

八路军要的钱粮和军鞋，都是按地亩派的，那些地主富农，当然要的多一些，这就大大得罪了他们。这时，村里王家大院这一伙地主，大部分都逃到遵化去了，只有个别留下来。有一次，老地主交来三双军鞋，佟瑞明用手轻轻一弯，那鞋底就断成两段了。佟瑞明又气又恨地说：“你们家那么多财产，把鞋做成这个样子，人家在前线不顾死活地抗日，你们就没有一点人心？不行！重做。”

那地主老头横鼻子竖眼地说：“你叫我重做，咱就上城里。”王家大院的狼崽子王维平在城里当伪团长呢。

佟瑞明是个强悍的人，象桑木扁担宁折不弯。为了他的信仰，他死都不怕，还怕谁？他一把抓住老地主，一定拉他见抗日区长去。那老头子也拉着他，叫他上城里。两个人又拉又推，打到大街上来。街上的人一听，个个气红了眼，都说老地主不对，叫他重做军鞋。这时候，八路军的势力很强，那老地主怀着恶毒的仇恨，不得不重做军鞋。

到了一九四一年，敌人更猖狂起来。有一天，从破城

来的鬼子汉奸，突然把村子围住了，佟瑞明家的前门后门，都架上了机关枪，谁不指出佟瑞明，就把谁打死。

佟瑞明自己站出来，说：“不要打别人，我就是佟瑞明。”

“你是八路军的办事员吗？”

“对！我是八路军的办事员。”

呼噜上来一群敌人，把他捆起来。没有来得及向家人说出一句告别的话，他穿着一身稀破的单衣，从此就永别了这四十里铺村。

佟印的母亲——我们的佟大娘，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只眼睛也哭得完全瞎了。从十七岁来到佟家，她和丈夫泪一把汗一把地苦熬，还没有看见丈夫有过一天的好日子呢。他给人当长工的时候，自己不敢吃饱，偷偷拿块饽饽回来，给孩子吃。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小女儿，就是因为有了病没钱治，眼看着孩子死去了。实指望，她和丈夫共同革命，早一天把苦日子熬过去。现在，她只有一条路，求村里的老办事人员把丈夫保出来。

富农王树仁，是多年旧村政权的秘书，他满脸笑容，满口答应，说是一定想法把佟瑞明保出来。其实，就是这个笑面虎，受了黑心地主王维平的唆使，一再向敌人密报情况，陷害了佟瑞明。

这天傍晚，佟大娘坐立不安，只好跑到大门口站着，好象能看见什么希望。忽然，王树仁从一家门口探出头来，一看见她，又急忙把头缩回去了。佟大娘的心，好象

被一只冰寒的手挖出来，扔到烈火里去，她想：“不对，这情况不好，一定有坏点子。”

这时候，天也黑下来，她紧紧跟踪，在一家的墙头外边，她听见屋里王树仁的声音说：

“誰去保他！快写黑呈子，这一次，一定不能叫他活着回来。共产党要是胜利了，就没有我们活的了。只要把他弄死，就是挖了共产党的眼睛，割了共产党的耳朵。”

另一个人的声音问：“这黑呈子上写什么呢？”

王树仁的声音：“写他给八路军送粮送钱，写他破公路埋地雷，再造他一条，活埋过五条人命……”

亲人的生命啊，被这些人紧紧抓在手心里了。不！佟大娘抹去了满脸的泪，要死全家人一起死，要活一起活，就是有一个会喘气的，也要跟他们斗到底。

佟大娘一阵小跑跨过了院子，嘩啦一声闩开门，伸出她有力的胳膊说：

“拿来，把你们那黑呈子拿出来！”

那几个家伙目瞪口呆，知道自己的秘密被她听去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佟大娘高声嚷着说：“八路军的眼睛和耳朵，可不在瑞明一个人身上长着，佟瑞明要是死了，你们谁也别想活。”

有一个被王树仁硬拉进来的富裕中农乖乖地把呈子递给了她。佟大娘举着那黑呈子说：

“我知道，你们可以再写，你们就再写吧！”她三步两

步跨出了門。

回到家，她才真的明白过来，这一家三口人的生命，全放在刺刀尖上了。他們如果再告，就不会只告佟瑞明一个人，他們的心会更毒，他們会斬草除根。如果不是这样呢？他們就不怕八路軍？不管怎样，不能依靠他們，他們是不会把亲人給保出来的，再想些别的办法吧！

这样想着，佟大娘就不怕死活的来到了丈夫被押的地方。找到两次，敌人不让見面，第三次，她来到了破城。可是她举目无亲，沒有一个認識的人。她就問旅店的人，看这城里能够找誰。旅店的人給她指出一个綫索，叫她去找一个人。結果，那人回来对她說：“你們村已經递了五次黑呈子来了，你那人算是沒法保了。”

佟大娘又气又恨，这沒有办法解开的仇恨，以后再給他們算賬吧。她整个身心都颤抖着，哭一陣，罵一陣，这又有什么用的呢？她只好把自己所帶的一点錢，給丈夫买了两包点心，一条烟，他是爱抽烟的。往日，他只抽过自己种的烟叶儿，临死，让他尝尝紙烟吧。可是，沒有人敢給她去送这些东西。正好，給死囚犯送飯的一个老头儿来了，她給了人家最后的两块錢，人家接了东西，也让她跟进去了。

在牢獄的后面，他听見那老头喊：“誰叫佟瑞明？”

一个声音回答：“是我！”

啊！这亲人的声音，剧烈地震动了佟大娘的心，泪水一串串地涌出来。

那老头又说：“給你，有人給你捎来的东西。”

又是那亲人的声音：“誰捎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佟大娘不顾死活地哭着回答：“是我！”

“是儿他媽嗎？”

“是啊！”

“这会儿，天有什么时候？”

“中，中午了。”

“那你快回家去吧，別惦记我，好好拉着孩子过，記住这些日子，日后有了甜水吃，也永远別忘挖井的人。”

佟大娘沒有答上話，她出来了。一路上，这母亲的心，这妻子的心，全被伤痛、仇恨塞滿了。

回到家沒过三天，有个亲戚从破城回来說：“你那人，昨天下午三点，叫敌人枪杀了，連打了三枪，他人死了，尸首也不倒。是他們把他搬倒，拉到河里去的。”

沒过几天，白馬峪有个人从破城出来了，他是和佟瑞明关在一个铁蒺藜籠子里的，他又來告訴佟大娘說：“他死的时候，你給他买的東西他沒用完，都給我了。敌人一喊他的名字，他笑着說：明年这个时候，是我的周年了。他还說：你如果能回去，告訴我家里的人，就是有一个会喘气的，也別忘了共产党。”

佟大娘哭死过去几次終於又活了。十六岁的佟印，从地主家扛活回来，母亲在門口站着，他納悶地問：

“媽！你怎么啦？你好像是哭过？”

“儿啊！怎么不哭呢？你的爸爸沒有了。”

佟印一听，立刻躺在大街上，一面哭，一面喊：

“爸爸呀，爸爸……”

母亲說：“孩子，別哭咧，咱那禍害還沒有完呢！”

当真，沒过几天，敌人又圍了村庄，又来捉佟印和佟大娘。佟大娘沒讓他們捉住，一排人捉住小佟印，用枪把活活把他打死过去。病在炕上的三叔，也就这样心痛的死去了。

整整一年多，敌人一次次来圍，一次次来捉。佟大娘黑天白日躲在树林里，山洞中，挨冻挨餓，过着非人的生活。这时候，痛苦完全变成了仇恨，变成了复仇的力量。佟大娘天天去找八路軍，找抗日政府，終于，把王树仁逮捕法办了，别的坏人也害了怕，这母子俩才活过来了。

是啊，在最早的这场生死斗争中，我們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生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們又失去了多少宝贵的生命。可是最后的胜利，永远的胜利，是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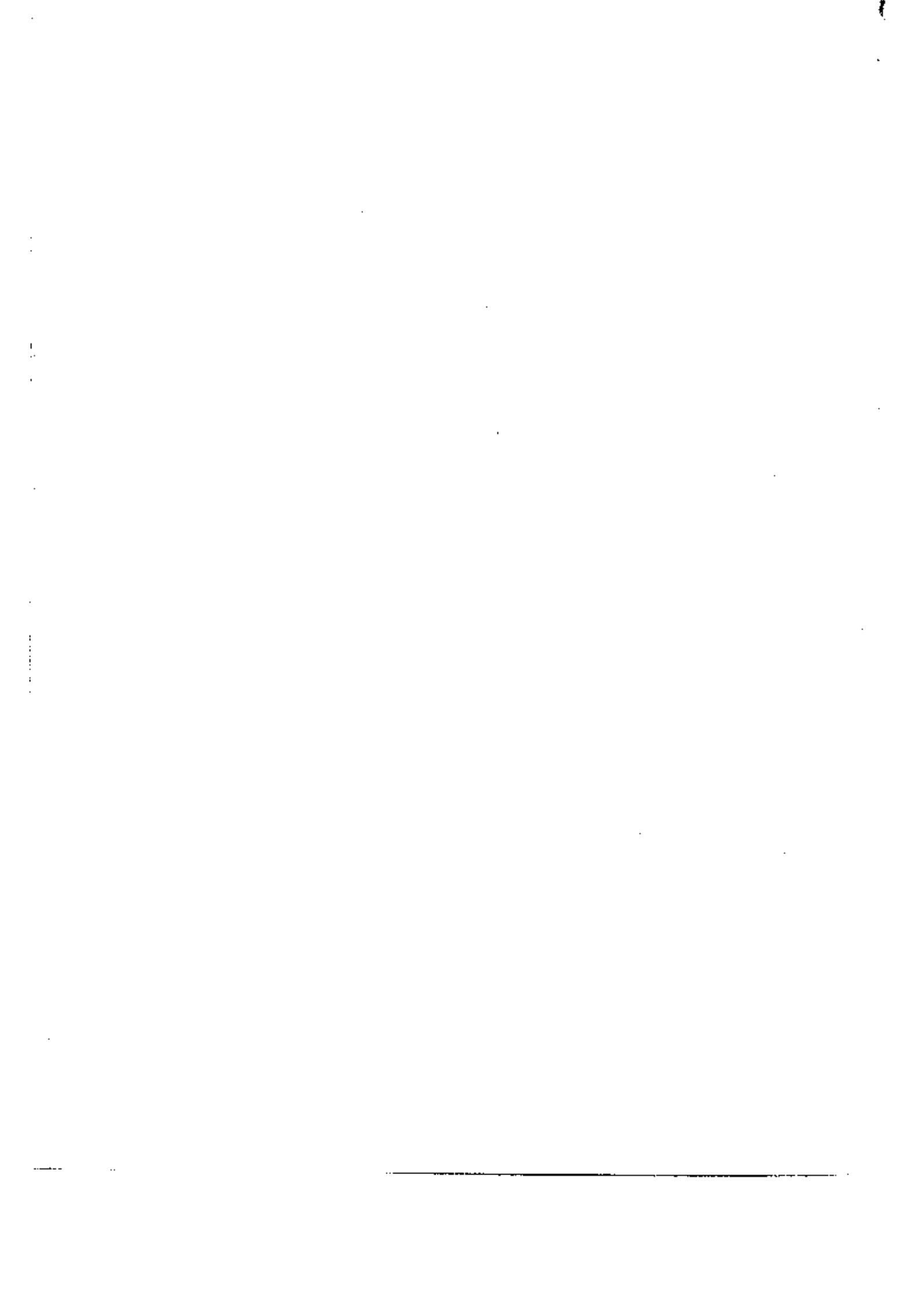
佟印的父亲死时三十八岁，現在佟印又是三十八岁，这整整二十二年，生活，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佟印已經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員了，他的童年完全消失在愁悶的磨道里，現在他的大女儿天天騎着自行車，那車輪在这光明的天地間，飞轉着。沒有上过学的佟印，可也是一个模范的民校教員了。那“穷棒子社”的二十三戶社員中，就有他們一家人的名字。只有三条驴腿的时候，他和母亲用那头驴，給社里搞副业，磨过豆腐。

現在，公社里有了汽車，有了磨粉机，压面条机，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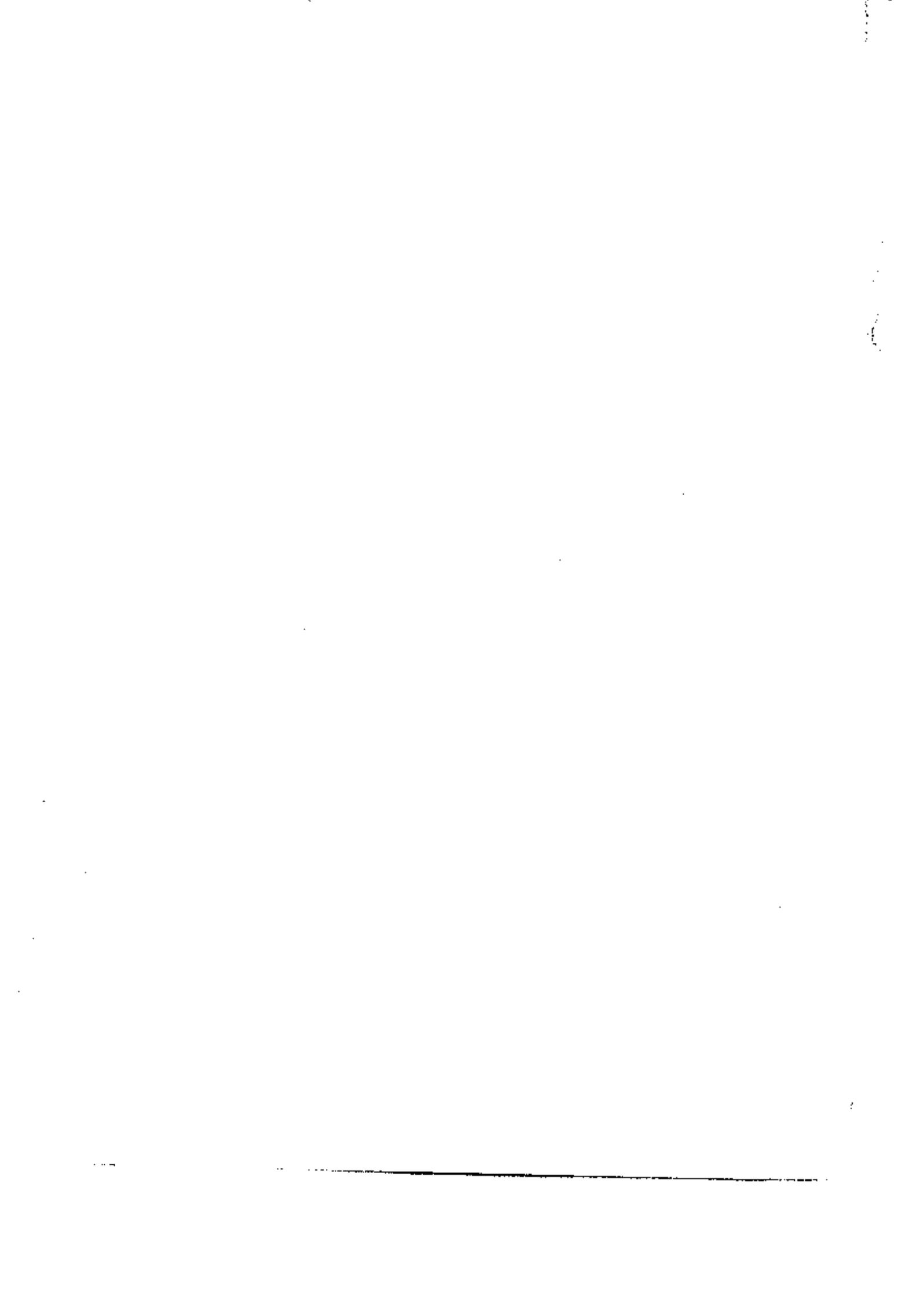
多少的大車和牛馬，有了多少个小毛驴。可是，他和母亲还在搞副业，还在做豆腐。別人看起来，这是多么平凡的劳动。可是，在这母亲与儿子的心里，那磨碎了的，不只是黑豆和黄豆，那磨碎了的，是苦难，是眼泪，是那些永生难忘的仇恨。那成全了的，不只是一块块的白豆腐，不只是一張張的豆腐皮，而是老人的欢笑，青年的干劲，孩子們朗朗的讀書声。

在后代更幸福的果实里，永远有那父亲的血，有那母亲的眼泪，和他們滴滴的汗水。

在这长峪山下，水更多，树更密。往年劇烈的战斗，今日平凡的劳动，都是永远不朽的。



第三部分
王家大院



分 家

东 木

旧社会里，哪家地主不是靠穷人的血汗哺养大的？哪家地主不是忘恩负义把穷人踩到了脚底下？王家大院这伙牛鬼蛇神只是一个缩影。他们父子、兄弟、夫妇、妯娌之间，为了巴掌大的一丁点利益，象群狗一样大咬特咬，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这个阶级剥削成性，贪婪、残忍、刻毒、阴险，灵魂里已经没有什么好东西。

现在我们就把这伙黑心贼的画皮剥开来，让大伙来仔细瞧一瞧。

一九二〇年，王家大院的老爷子王思善已经快六十了。

老爷“思善”思了这么多年，是大有收获的：首先，他认为“善门难开”，对穷棒子必须要狠，老话说骨头里熬髓，米糠里榨油都是有道理的。因此，他对收租放债什么的一向十分认真严肃。这个山乡偏僻地面，原来每亩地的租粮是七十斤到八十斤，在他手里就逐渐提高到八十斤到九十斤。而且交粮时升合不让，颗粒必争。放债原

来是按月二分到二分五的利錢，在他手里也逐漸提高到二分五到三分的利錢，还不起賬，圈房圈地片刻不延。穷人家被債迫得卖儿卖女，投河上吊，哭声震天，老东西的心象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其次，他又认定“善門要开”，这个幌子是必須要装的。这样，不但衙門里吃得开，地方上兜得轉，就是在穷人面前，也好装成笑面虎。因此，家里挂起了“乐善好施”的大匾，凡是和尚、道士、尼姑之流来化緣什么的，多少要打发一星半点；叫化子上門，发餽的冷粥，也会拿出一碗半碗。

正因为老狐狸修出了这一身道行，他的日子象扯起滿篷帆，几十年里从二頃（每頃一百亩）来地，翻到四頃来地。王家大院前后三个四合院套在一起，整整占了一大截街的規模，也是在他手里定下来的。如今儿孙滿堂，五个儿子都是村里头面人物，自己又是紳董，怎不舒心！

可是不舒心的事，偏偏跟着来。

第一件，里山肖士峪金矿上的股子，被一个姓耿的恶棍蛮不讲理的吞沒了。打官司又打得大輸特輸。老爷子气得三天沒吃飯。过后，他发现有錢无势还是不行，因此，忍痛拿出一百元銀洋，托人在遵化城里为自己仪表出众的二儿子王文照，买了一个“巡警”的官。“巡警”，虽說是个芝麻綠豆的角色，但乡下人哪分得清，儿子当官，老爷子自然更加煊赫了。誰知“二巡警”上任沒几个月，把辮子鉸了。这本不是大事，况且那时已經民国，不时兴留辮子，但山乡地面，旧風气深得很，沒有辮子的人还是被

叫作“假洋鬼子”，是見不得人的。“假洋鬼子”一回家，他媳妇立即气青了臉，哭天抹泪地解下褲腰帶就要上吊；上吊不成，披头散发又要跳井。二儿媳妇这样一鬧，老爷子急得团团轉；老婆子本来就有心口痛的病，一气一急，瘫在炕上起不来。

第二件是一块好坟地又被旁人外姓占了去。王家的祖坟，按照眉毛上有一撮白毛的張半仙的說法，叫做蓮花坟，发得快长得茂，可就是缺少富貴气。老爷子越想越对，自己家吃亏，不正是吃在缺少一个“貴子”嗎？于是，他又狠心拿出三十元銀洋，托張半仙为自己另找一块好坟地，让下代能够“高官及第”。張半仙拎着罗盘攀山越岭找了个把月，終于找到了一块土饅头一样的地方，据說做了坟就成了“宝珠坟”。“宝珠”自然比“蓮花”要高貴了。老爷子心头痒痒的，一手就想占过来。誰知半路里忽然伸出一个張家地主的手，用高价搶先把“土饅头”买了去。老爷子这回气得三天沒下炕。他恨透了这个不讲信用的“張白毛”。

第三件是儿子大了，各家各戶已經开始拦門放賬，把有房有地抵押的借債戶，都拦了去；而把无房无地抵押的借債戶却推出来，让老份为难。这等于儿子喝肥湯，老子喝刷鍋水。老爷子怎不恼火！再說，儿子和儿子，儿媳妇和儿媳妇之間說不尽的罗嗦事，叫他操心也实在操不过来；而自己又年岁大了，腰背駝了，精力一天不如一天。

老爷子为这些事日夜焦思，象瘦猴一样的臉上渐渐

灰暗起来。一天，他坐在太师椅上不得不重重叹了口气说：“‘树大分枝，儿大分家’，还是分掉算啦！”就这样，老爷子积极筹备起分家的事来。

老爷子手下有个专跑“地渣子”的狗腿叫范泰；有个专管拉絙放債的女牙婆叫闊嘴嫂。老爷子要分家，狗腿子自然内外跑得更勤快了。

老六王继亭，在王家是最小的儿子。他不但在长相上很象老爷子，瘦脑袋，尖下巴，就是在心地上，也大部分象老爷子。老爷子除去“善門难开”以外，有时还装点幌子，他呢，连这点幌子都舍不得装，为了多占一个铜子儿，是什么心計都使得出来的。他媳妇和他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一天，闊嘴嫂又进王家大院，老六就多了个心眼。他对他媳妇悄悄一咧嘴，他媳妇一笑全领会了。

一会儿，闊嘴嫂到老六家来了。

“六兄弟在家嗎？”闊嘴嫂口里象拌了蜜糖一样。

“在呀，請进坐会儿吧！”六媳妇口里也象調了糖蜜一样。

两个快嘴女人凑在一起，絮絮聒聒，真是用楔子都尖不进去。等到闊嘴嫂提到村东头有一家产妇难产以后，病得人事不知，想借三十块钱看病，願出月利三分，用房产抵押时，六媳妇忽然一反往常哭起穷来了：

“嫂子呀，本来嘛，救人一命也是行善，但眼下咱家自

己也是鸡皮包不过象腿呀！”

闊嘴嫂心里着实一楞：怎么回事呀？上次不是明明吐出口風，說有小份子錢要往外借嗎？如今又改口了！但闊嘴嫂毕竟老于世故，只稍一捉摸，就捉摸出其中原委来了。她于是赶紧繃起老臉，扁扁嘴說：“敢情是，咱王家大院这几家数起来，六兄弟还不是嫩水娃娃！人年輕，手头也紧巴些！”

六媳妇一看，老驴已經轉入磨道，于是步步进迫：“可咱老爷子手掌心不平哟，这回分家听說挺克扣咱那老六！”

闊嘴嫂这头老驴是沒有便宜不走路，她心里想：“你这个刁钻女人，想要我老嫂子在老爷子老婆子面前灌米湯哪！沒那么容易！”于是拿腔捏势地主持公道：“六媳妇，話不能这么說，同是自己的亲骨肉，做老人的哪有偏袒哪一家的！十个手指有长有短，可咱还不是一样疼呀！”

六媳妇早看穿了眼前这头老驴的花招，于是很机灵地从身后取出一件青布短褂說：“老嫂子，天凉了，你身上也单，这件短褂你将就着穿吧！”完了，一下子就塞过去。

闊嘴嫂本来想装模作样推上三推的，可是东西都塞到怀里了，有啥法，只得客气一下算了：“六媳妇，都是自己人，你这是为的啥！真劳你費心了！”

于是，两个快嘴女人又絮絮聒聒起来。这回，中心明确了。最后，六媳妇低低而又急切地提示：“你和咱老爷子和老婆子說說，村西头河滩那边那四十亩黄土地，一定

分給咱老六！”

同一天晚上，老六把范泰也偷偷請到了家里。兩人對坐在炕頭上盪盪喝起來。老六也是先哭窮：“咳，咱二哥三哥這幾年都鬧得不錯呀！二哥當官，三哥在遵化‘德聚興’糧店當掌櫃，小日子都火紅……”

范泰外號“老牛皮”，愛捧愛吹，可心卻有點粗。他並沒有一下領會老六的意思，只是鼓起兩個深凹進去的腮幫，翻動兩片薄薄的嘴唇皮說：“六兄弟，不怕的，照我看，大院里論人才，論能力，論待人，還是要數小兄弟你！分了家，過不幾年還不一樣發起來！”

“老牛皮”的吹捧，並沒有使老六滿足，他只得再進一步點清主題：“咱老爺子這回分家，四只桌腳沒有放平，高的高、低的低哪！”這一下，范泰完全領會清了。他，這個跑“地渣子”的老手，是最懂得在緊要當口怎樣摺住一個人的喉嚨口的。老六的奸，他雖然已領教過幾次，但是象這樣罕見的機會，怎肯輕易放過！他於是有意隨韉放馬地跟着扯：“平不平，要看怎麼說羅，從這頭看，高在那頭；從那頭看，高又在這頭了！”這種說等於不說的混賬話，老六根本不願聽。他心裡一個轉磨，知道在這個當口不使點餌，是釣不住這條活泥鰍的，於是不得已從懷裡掏出了一個紅紙包。這個紅紙包，本來下午準備時是包了五元錢的，後來一想多了，抽出一塊；在屋裡轉了一圈，覺得還是多了，又抽出一塊，只剩下三塊。他還想再抽，考慮再三怕餌少了，不起作用，才算定了。紅紙也是包了一層又

一层，包儿大，他认为人家摸在手里心甜呀！

老六一手把紅紙包塞过去，一手装做加酒：“大哥，这点小意思你先領下，兄弟和你商量件事！”范泰这下受寵若惊了，慌慌忙忙的推辞，把拿在手里的酒都潑了，推辞是假的，最后还是收下了。

这个紅紙包，眼下象一座桥，把两个魔鬼的心接通了。他們开始吐出实情。老六提出，要范泰在老爷子跟前为自己多說好話，把村西河滩那边那四十亩黄土地写在自己名下；范泰表示，一定尽力照办。

过不几天，老爷子、老婆子的耳朵根，果然塞进了不少过去很少听到的話話：“老六家是困难些，分家时應該多照顾点！”“老黄牛还护小呢，哪一个老的不是这样！”

說实在的，老婆子对自己的刮肚子老六，一向就有点偏爱，更何况这些日子六媳妇不仅跑得勤，候得殷，而且特別听話。老婆子剛說了句脑袋瓜子痛，六媳妇轉眼間就把一条嶄新的、軟綿綿的包头紗孝敬上了。“待上一分，待下十分”，老婆子暗下已拿定了这个主意。

这四十亩連片黄土地，在村里，不，就是在邻近也算是上好的地了。这回分家，老爷子本来是打算把它劈开的，但过后一想，好地劈得七零八碎，对儿子发家有影响，不如不劈，固定給一家，在别的方面搭配一下。正在二心不定的时候，屋里屋外的人全替老六說話了。老爷子想想也有理，就把这四十亩好地，写到老六名下，但又怕別的儿子有意見，清单还在自己手里把着，不肯一下公开。

老話說，隔牆有耳。老六和媳婦奸，老五早死不算，其他的兒子和媳婦難道傻嗎？不是的。他們也一樣是算盤精，對怎樣損人利己，剝削起家，全從老爺子那邊學會一套。他們在這個緊張的日子里，全是貓眼睛狗鼻子靈着呢！

老二媳婦首先覺察出來了。一天，老六媳婦剛從老爺子那邊晃出來，她就躡手躡腳摸進去，站在老爺子窗戶外偷聽。老婆子正在叨叨要給老六好處，老爺子不耐煩地表示，不用再操心了，已把那四十畝好地寫在老六名下了。

老二媳婦是有名的潑辣貨，她敢拿上吊和跳井把二巡警治得服服貼貼，對這號事豈能善罷甘休。她一回家，趕緊把正在午睡的老二從炕上轰起來，如此這般著實訓了一頓，說他是窩囊肝、窩囊肺；完了，又趕緊到院子里把幾只雞婆子轰得咯咯亂飛。雞婆子一飛，她就潑口咒罵：“這婊子雞，成天飛，不知想尋占啥便宜！我打斷你這婊子雞腿！”

六媳婦一聽，就知道是咒自己。她心里的火苗立刻就往上冒，但人家在咒雞，自己又不好接茬，只得怨在肚里。一会儿，一只鬼雞咯咯咯飛到自己這邊來了，二媳婦跟着也咒過來。這一下，她忍無可忍，不得不回敬了：

“二嬖子，說話干淨點，你不怕下世變啞巴！”

“干淨？這婊子雞還會干淨！”

“你打撞誰？”

“誰認就打撞誰！”

这一下，两个女人全豁出来了。一个针尖，一个麦芒；一个生姜，一个辣椒；一个粗嗓，一个细嗓；一个拍手，一个打掌，直吵得昏天黑地。

同一个时候，二巡警急急忙忙去煽动另外三个兄弟。

老三王凤宣新从遵化来，白白胖胖，正在一支接一支的抽着“强盗”牌纸烟。老二如此这般一說，老三带点感慨地表示：“老六真是奸滑！”但他心里想的是：算盘一响，黄金万两，何必为这点土疙瘩争得面红耳赤。眼下要紧的是如何拼凑王家哥儿们的财力，趁秋后粮价便宜，吃进几百石，开春以后，青黄不接，在穷鬼们身上杀上几刀，还不很快能翻上一番！“德聚兴”粮号里这点外股应该想法挤出去，自己独家来经营，逢一进一，岂不比二一添作五强！这样，第一步也不宜和兄弟们反目。所以，当老二提出要 and 老六争时，他却象老练的射手一样，有意盘马弯弓，不肯立即就射：“二哥，老话说‘和气生财’，咱们找人对老六说一說，叫他不要这样斗心眼就是。”

老四王俊原是个大烟鬼，这时正躺在炕上吱啦吱啦抽大烟。他听老二一說，赶紧放下烟枪，瞪起眼睛表示：“这可不行，贼六子人小鬼大，这样分家咱们不认账！”但因为烟瘾没有过足，对这件事实在无法认真。再说，前几天二巡警家拦门放债，把原来说好由老四家放的四十元钱拦了去，债户老佟有五亩好地抵押。这种挖墙脚的做法，大烟鬼气得摔烟枪。如今要他共同对付老六，他也有点不愿意，于是说完仍躺下喷他的云吐他的雾了。

老大王玉书是有名的大棒子，一年四季手里提了根黑漆棍。老爷子生了气，要惩办佃户啥的，往往是他出面。他很会劈程咬金的三斧子。当有些佃户，由于歉收交不足租子，向王家求情时，老爷子照例摸胡子不吱声。大棒子却在一旁举起了黑漆棍：“他妈的，你也短，他也欠，咱王家一年到头喝西北风！”如果有些佃户不知进退，还要说情时，他的黑漆棍就会狠狠把石头敲得冒火星：“走，别罗嗦了，哪怕揭锅出屋，也要限三天以内交清！”如果有些佃户实在家里空空，清汤淡水，他是不管什么远亲近邻的，立刻就会翻脸不认人：“这几亩地明年我另租了！”说完，一扬黑漆棍，头也不肯回一下。王家的发家，他是有汗马功劳的。眼下他听老二这么一煽，立刻抖抖他那长子的威风说：“老爷子老糊涂了，能这样分家吗？我去说去！”

就这样，老大和老二联合起来到老爷子那边提抗议了。

老爷子看到儿子们这样真刀真枪，有点心慌，只得说：“那么大家拈阄吧！”

分家那一天，四亲六眷都到了。

老爷子长袍马褂，忙着应付客人。

狗腿子范泰颠着屁股跑东跑西，末了捧着阄盘，请五位兄弟拈阄。在这个节骨眼上，三元银洋起作用了。范泰是预先知道哪个阄分哪笔产的，他走到贼六子身边，一个咧嘴，一个示意，贼六子伸手一拈，果然拈了个好阄，分到

了他日夜梦想的那四十亩连片好地，和别的三十来亩地。这一下，兄弟們自然沒有話好說了，但是心里还是明白，这中間有鬼。

二巡警气虎虎的回到家，一看，老爷子为各家特意准备的一只大斗，一只小斗，一根大秤，一根小秤，齐崭崭的放在炕沿上。这也是王家剝削穷人的傳家宝。大斗和小斗从表面上看，相差不大；其实一个板薄底深，一个板厚底浅，相差准有六、七合。小斗是官斗，卖出粮食和别的公开場合用的；大斗是私斗，向貧苦农民收租粮用的，收的时候加上狗腿子一摇晃，再冒个尖，准有一斗一升。小秤是十六两官秤，公开場合用的；大秤是二十两私秤，也是向农民收买什么东西用的。老爷子怕分家以后，各家規格不一，才想出了一个这么刻毒的絕招。二巡警正在火头上，一手拾起大斗，一看，口張得大大的，象对自己傻笑，生气地“扑篤”一声把它反扣在炕上；一手拾起小斗，一看，里面黑漆漆地象对自己瞪眼，生气地“扑篤”一声，也把它反扣在炕上。

賊六子回到家，一看大斗、小斗，大秤、小秤，更乐了。他拿起大斗左看右看，上量下量，总觉得哪儿好象还不够一些。末了，拿起一只小圆凿，在底边上又挖下一溜深坑。坑坑虽小，但賊六子已計算到它的大作用了。

二巡警父子

幼 江

一

分家以后，王文照那巡警官也不当了，一意創家立业。可是人們还都叫他二巡警。

二巡警是个算盘精，吊在口头上的一句話是：“吃不穷，穿不穷，算計不到一世穷。”也就是：刮一分，是一分，不刮穷人不甘心。他家里有文房六宝，除去紙笔墨硯以外，还有一个烏黑发亮的十三档算盘，和一本青布面紅小格的賬本。每天晚上，他都坐在炕头上，就着煤油灯撥算盘，翻賬本，一直到深夜。

其实，二巡警还只是个外掌柜，光管要粮索款，記賬銷賬；大宗的銀元鈔票却归他的內掌柜——那个两头小中間大，象个“大枣核”的媳妇保管。“大枣核”有一只鎖着黃銅大鎖的紅漆小木箱，里面专门貯藏錢財文契。紅漆小木箱放在大板柜里，大板柜外面，又用一个特号的黃銅大鎖鎖着。所以，錢一落入內掌柜的手里，想再挖出来比登天还难。

有一年，又到腊月二十三了。这是灶王爷上天的日

子。灶王爷管人間烟火，按照旧風俗，人們要用粘米和糖稀做的“糖瓜”供献他。为的是粘住他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穷人家自己的嘴都顾不上，哪有这笔“額外負担”，只是花几个銅子买几个現成的糖瓜，在灶前供一供，应付一下。富人家則另是一种景象，他們对灶王爷除去使用糖瓜粘嘴这点强迫手段以外，还按照自己的猜度，用七碗八碟，糖果点心，上供賄赂。二巡警是当过官的，更懂得“賄赂”的重要，所以这一天，他家的“大枣核”里里外外，灶上灶下，忙得顾不上洗臉梳头。

腊月二十三日又是过小年，是催賬討債的緊張关头。二巡警翻开他的賬本，撥起他的算盘。他数着已經勒榨到手的錢財，暗暗为自己的催討有方感到高兴；也为好几笔賬連日追索不到，鎖起了眉头。

当二巡警翻到佃戶老山头一笔賬时，不由忆起了那天討債的情景：老山头病在炕上，臉象一張黄叶，上气吊不起下气，求他寬限；他粗声大噪，紋絲不让。末了，老山头被逼无法，只得說：“树要皮，人要臉，我老山宁願冻死餓死，这笔賬也要我大小子出屋还你！”

猛然間外屋炒鍋里吱啦一声，油烟直冒，一股肉香扑鼻而来。不知怎的，这突然的响炸，使他心头怦怦乱跳。他探身向外看了看，喊道：“孩他媽，你来一下。”

“大枣核”扭着肥胖的腰肢，到了跟前，問：“什么事？”

“老山家还来的錢，你都清点过了嗎？”

“沒錯，本錢五十五块，两年的利息三十八块八角，一

共九十三块多点，我都放在柜里啦。”

“你沒听說他家今天出屋，搬到破牛棚里去住？”

“你問这干啥？穷鬼們生就風扫地月当灯的命，有破牛棚住还怎的？你可怜他們啦？他們是你爷爷？是你奶奶？老話說：桥归桥，路归路，貧富从来不一家，你管这些閑賬做什么？”

二巡警被搶白了一頓，直翻双眼。“大枣核”可还大抖雄威：“我事情忙着呢，佛沒拜，香沒点，哪有功夫陪你拉长扯短！”說完，一扭身走了。

外屋的炒菜声仍吱啦吱啦地响着，二巡警繼續翻他的賬本，当他看到还有好多笔欠租和欠賬，象屈福善家的，屈福荣家的，杜宝山家的……等，至今还没有追到，心里就着急起来。他扳起指头一算，过大年已經沒有几天了，于是再也坐不住，抓起錢褡子就准备出門勒榨。

猛然間，他想起了他那独生独养的歪脖子儿子王維藩。儿子平常很听话，这点他是滿意的；然而那种筒起双手，只管吃喝，不会算計的毛病，他可不喜歡。他想，这回要賬正該让儿子也去“鍛炼鍛炼”，于是高声吼着，把儿子叫到跟前：

“錢褡子你背着，咱俩要賬去！”

“歪脖子”在遵化进的是教会学校，念的是洋书，会几句洋文，所以乡下人都习惯称作洋学堂生。当时，南方的革命星火早已燃起，許多有識的青年都說要革命救国。他一听說“革命”，两条腿就哆嗦。他瞧不起劳动人民，认

为肩上挑点、手里提点东西都是有失体面。一心想作官經商，有錢有勢，光大他那地主祖宗的門楣。老子要他背錢褡子去要賬，他有点不願意。但他是個“孬頭”，害怕和老子頂撞，只得採取了個軟拖的辦法：“爹，我今天事情忙着呢！”

“什麼事情？要賬不是事情！錢不要到手，你喝西北風！”二巡警生氣得只差破口罵了。

“歪脖子”只好順從地背起錢褡子，不遠不近地跟在老子後面。

這天北風很硬，黑雲壓壓就要下雪。屈福善家的破草棚里，三五個窮佃戶擠在一堆閑扯。他們雖然家家鍋蓋長在鍋沿上，粥瓢子吊起來當鑼敲，但是一扯起來，也忘了東南西北。

一個說：“灶王爺也是偏心眼，年年上天不言咱們的好事，下界不保我們的平安！”

一個說：“你還說呢，我他媽的今年連買糖瓜的錢都沒有，老伴愁得眉頭打死結。我說，甭愁，干脆供上清水一碗，高香三支，灶王爺要是嫌棄，拉倒；反正是窮，還會有別的！”

另一個忽然插進來：“你們知道灶王爺姓啥叫啥？哥兒幾個？”

這一稀奇古怪的提問，把許多人都問呆了，誰也答不出來。最後還是他自己開寶：“要我看，灶王爺姓白名吃，哥兒六個。你們想，他吃了我們的，喝了我們的，道過謝

嗎？付過錢嗎？都沒有。这不叫白吃！咱村王家大院哥儿六个，年年要咱們糧租，道過謝嗎？付過錢嗎？都沒有。这不也是白吃！……”

“哈哈，”人們全都笑了。

正在這時，二巡警迈腿進來了，後面跟着“歪脖子”，肩上背着錢搭。

他們這一出現，談話自然被打斷了。大部分人借着站起來打招呼的機會，一拍屁股溜了，只有屈福善和屈福榮兩人被堵在門里。

二巡警翻開賬本一指，說：“福善，你租我十八畝地，去年欠租一石六斗，今年欠租二石，合起來三石六斗。當時說定要滾利行息，現在折成錢，算起來已三十元挂零了。這筆錢怎麼辦？過大年已沒有幾天了呢！”

屈福善一向心高氣硬，象根桑木扁担，宁折不弯。为了租这点地，一家人无冬无夏，拼死拼活地干，滿以为交了租子，总能落个糠菜半年粮。誰知去年遭了水災，今年又是春秋兩季都旱，收成大減，租子却是铁帽子一頂，顆粒不減。为了交租，为了盼望明年，一家人勒紧褲腰带，把收成十之八九都送进了二巡警的粮仓。想不到一点尾欠，又被他折成了錢滾利行息。他真是滿肚子的气，但又不願低头求情，末了硬朗地說：“好吧，我家还有自創的几亩山坡地，卖了还清你这笔債！”

二巡警指着另一笔賬說：“福榮，你的欠租也差一石多沒有清呢！这回怎么办？要是滾利行息到明年，你更

要挑不动了！”

屈福荣心地老实，不会说话，象个没嘴葫芦。他家人多，劳力少，担子由他一个人挑着。今年收成不好，粮食绝大部分交了租子，还欠一石多。前几天，他走着走着，就跌倒在家门口，那是因为没有吃东西饿的。人家把他扶回家里，他老伴想给他熬碗米汤喝，都是借了几家才借到。现在二巡警又逼着要收欠租，叫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呆坐在炕沿上，说不出一句话来。

二巡警更是步步进逼：“要是这样，这八九亩地我可要抽回来另租了！”

地是穷人的命根子，有地还有个盼头，要是地都抽回去了，不更是死路一条！屈福荣急的憋出一句他自己也不相信的硬话：“好吧，你滚利行息吧，明年我一定全数还清！”

这两家子就这样被二巡警父子迫债迫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其实，这一天，四十里铺遭到同样命运的穷佃户，又何止这两家呢！

傍晚，二巡警父子回到大院，钱袋里装得饱鼓鼓的，里面有铜板，有银角子，也有银元。“歪脖子”把钱袋重重地往柜上一放，发出铮铮一声。这种金属的、清脆的响声，“大枣核”是最喜欢听的。她眉开眼笑地慌忙从锅里搬出了七碗八碟，热气腾腾，肉香扑鼻。

二巡警搓搓手，呵口气说：“嘿，外面太冷了，弄四两白干来暖暖和和！”

一会儿，热炕头上，一家人大吃大喝，又说又乐。

隔了几天，王家大院过年的气氛更浓了，二巡警家又宰猪又宰羊。越是离年近了，二巡警越是忙着到穷人家去死催硬迫。

二巡警家三个长工都回家过年去了，只留下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子杜钟给他家挑水、烧火、喂驴、推碾。“大枣核”是个不让手下人闲着的管家婆，分派活计就象流水一样不断头，一桩事没完，另一桩早就派定等着了。手下人喘口气，伸个懒腰，她都瞪你几眼。这一天早起，杜钟挑了十多挑水，扫过院子，锄好草，喂饱驴，劈碎了烧火用的老树疙瘩，正想歇一歇，“大枣核”就又吼上了：“咳，快把这两斗麦子抱去推碾！”

杜钟实在生气了，肚子饿得前腔贴后壁，哪还有劲！但又不能不去，只得慢吞吞地把麦子抱到碾棚里。他心想：反正驴也空着，就去把驴套起来。一会儿，驴在磨道上平稳地走动起来。

“大枣核”正在和面，一想，碾子不知推得怎样了，就把歪脖子招呼过来，说：“小藩，你快去看看，小杂种说不定又偷懒呢！”

“歪脖子”到碾棚里一看，可不是，驴拉着碾，人在一旁站着呢！于是他也学着他爹的样子，说话前故意咳了一个响嗽：“唔，怎么人站着叫驴拉呢？”

“驴不是就为拉磨推碾、送粪赶脚养的嗎？”

“这驴昨天干了一天活，今天又干，退了膘怎么办？”

“人就不退膘了嗎？我餓得路都走不動了呢！”

“歪脖子”沒話好說了，只得狠狠瞪了幾眼就去告訴他娘。“大棗核”吃驚地吼叫起來了：“小雜種真賤骨頭，你爹不在，不用棒棒揍，他骨頭就痒了，我去！”但她兩手一提起來，粘呼呼的面筋掛了半尺長，心想：要是洗掉，這面就白搭了，於是立刻改變了主意：“小藩，你也大了，不學點顏色將來怎麼當家？窮人都是賤骨頭，你不凶，他不怕；你不狠心，他不知情。這小雜種，你打他几下怕什麼？去！你叫他卸下驢來，用人拉！”

“歪脖子”經他娘這一教導，果然大開心窩，渾身是勁，拳頭都痒起來了。他又走到碾棚里，歪着脖子，橫眉豎眼地高叫起來：“快把驢卸下來，用人拉！”

“我不卸，沒有勁！你有勁，你拉！”

杜鐘正嘟囔着，“歪脖子”跳過來劈劈就是兩巴掌。杜鐘這下也是火苗直冒，什麼都顧不得了，立刻也跳過去劈劈還了他兩巴掌。

這一下可闖了禍了。“大棗核”兩隻小腳象鼓點似的敲過來，又是罵又是鬧，象要吃人似的。一会儿二巡警回家了，他們把杜鐘捆起來好一頓揍。

過年了，鞭炮乒乒兵兵連聲響。可是在四十里鋪這樣一個山窮土薄、被地主階級敲骨吸髓的農村里，能夠嘗到過年歡樂的，又有幾家呢！

二

時間飞过了二十年。沙河套上的幼苗已长成了参天的白楊。

这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年。日本鬼子被打走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攻被打退了，中国革命就要彻底胜利了。这个地区在一九四七年秋后陸續进行土地改革。

王家大院这伙牛鬼蛇神，已經五零十散。老一輩的地主大棒子、二巡警、三蛀虫、四烟鬼都先后离开人世，只有賊六子凭着他的奸滑，象賊一样潜逃他乡。新一輩的地主王維平和王維清在反动政权里卖命沒有落网，王維藩和王維田被追押回来就要进行斗争了。

“歪脖子”王維藩这时早已当家立业了。他除了从巡警老爹那里学会一套刻毒地算計穷人的本領以外，又在遵化城里跟着他那六叔賊六子学会了一套投机倒把，火中取栗的本領。所以，从表面上看去，他还是不起眼，其实已經成了一条不声不响就咬人的恶狗。

王家大院已換了主人。“歪脖子”一家住在大院左边的草屋里。就在这雷轰电閃狂風暴雨的前夜，“歪脖子”凭着他那恶狗的鼻子，嗅到了我方队伍里的一点異味。原来这时村里正是杜志当权，王国藩和杜奎两个老干部受到无理的排挤和打击。杜志表面上是党员干部，其实暗中已和敌人唐山特务組織挂鈎，手下搜罗的尽是他那

大佛教道徒中的三老四小。貧农团、妇女会也被他的势力控制着。

“歪脖子”共养了四个闺女，大闺女已經出嫁，三闺女不在家，身边还有二闺女和四闺女。

一天夜里，天黑風大。“歪脖子”一家早早就装做熄灯睡觉，他們擋严了窗戶密談起来。

“歪脖子”一声接一声地叹气，他那瘦驴一样的老伴一声接一声地喊怨。这一陣怨憤的教育，把坐在一旁的两个闺女的心弦繃得紧紧的。

“你們这两天在外面听到些啥？”“歪脖子”把談話轉入了正題。

“啥也沒听到，他們見到咱，眼睛就打橫了。”二闺女也有怨气。

“你不好暗下找杜志大表哥問問嗎？”

“他会认咱們？”

“不认拉倒！照我看，他眼下正要用人。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亲，一个闺女家說話总要方便些。”

“哼，亏你想得出！”“大瘦驴”发现“歪脖子”想用自己的闺女当釣餌，火上来了。但只一会儿，她就明白过来，除此以外确实沒有旁的好計策，于是也不再說别的。

二闺女那年正滿二十，长得虽不算漂亮，但是風風騷騷，十八岁那年，就曾在“歪脖子”的暗示下，跟国民党里一个下級軍官逛过唐山。如今已是第二回耍她显身露手。她低着头沒說别的，心里已有自己的算計了。

几天后，“歪脖子”和“大瘦驴”又积极活动，为十一二岁的四闺女在村西头认了一家贫农做干爹干妈。干爹是个老实得三天难说两句话的老头，干妈心眼好，就是爱贪点小便宜。四闺女早一声干爹，晚一声干妈，叫得亲亲热热。“大瘦驴”前半晌送过去一个小包袱，买住了干妈的心；黑夜间又寄进去一个大包袱，叫干爹不好对外张口。这家贫农就这样上了“歪脖子”的大当。

杜志这些日子正是野心勃勃，一心想当土皇帝，恨不得把王国藩和杜奎两人掀下井去。但是他群众基础差，几回想发动签名告状，都没有搞起来。如今他正东门串西门，跑得脚不沾地。好几回，当他一个人从村口路过时，王家二闺女都送过去挑逗的眼神。开始他还不介意，但一而再，再而三，秋波终于送进了他的心坎里。有一回，杜志到西头那户贫农家商量事，刚在炕头上坐定，王家二闺女穿得漂漂亮亮的也进来了，故意羞羞答答地坐在对面。干妈烧好水，她就跟着捧茶，声音脆得象黄莺叫：“看你们一天忙的——喝点暖和暖和吧！”随着送过去的，还有袖口的花露水香和脸上的雪花膏香。杜志这家伙本来就想沾花惹草，又受到二闺女的引诱，早已晕头晕脑的了，接茶时，一摇晃，半碗茶泼在二闺女的花短袄上。

“格格格——没啥！格格格——没啥！”笑声就象银铃一样。

二闺女的笑声把杜志撩拨得不知太阳是从哪方出来了。

当杜志說到眼前工作难做，自己顾了东顾不了西时，二闺女随着就表示，自己願意和地主家庭划清界綫，可以帮着办点事；当杜志說到眼下正缺少一个会写报告做记录的人时，二闺女又随着表示，只要不嫌她成份不好，她願意学着做。总之，二闺女充分表示了自己的热情和主动。

杜志却是要吃肉，不沾腥。他一方面会心地微笑着，肯定了对方的請求，另一方面也挂出了遮遮掩掩的牌子：“这个，这个咱們再研究一下吧！”

这天晚上，二闺女就被杜志派人找去抄填什么表格了。一日长二日短，二闺女就这样悄悄的成了杜志的私人秘书。

一天晚上，“歪脖子”和“大瘦驴”又坐在炕头上，一个唉声，一个叹气。

这回，二闺女有話說了：“爹，他們正打算到县里去告王国藩和杜奎哩！”

这个風声“歪脖子”早听到了，他打心眼里高兴。但他还是假装吃惊地問：“都告点啥？”

“告他們打人、罵人，还有賬目不清啥的！”

嘆地一声，“歪脖子”把豆油灯吹灭了，他赶忙叫“大瘦驴”到門外看了看，見确实沒有人了，才擋严了窗戶，又点起豆油灯，从一只板箱的角落里，摸出了一个黄布小包，里面有一本灰扑扑的青布面賬本，和一本四四方方的小书。他先把賬本拿在手里翻了翻，只見許多紅小格上

一笔一笔記的尽是他家过去的地产房产和銀錢出入的眼目。有許多还是已死的老巡警的手笔，也有不少是他自己用蠅头小楷后加进去的。比如哪年哪月某戶租粮顆粒未交；哪年哪月某戶欠款本利，拒不归还……等等。他恨恨地想：哼，穷棒子們，不用看你們眼前抖得凶，一旦变了天，咱王家照样抽你們的筋，剝你們的皮。他翻了一陣，又把灰賬本放起来，随后撿起了一本四四方方的小书，就着灯光，“六法全书”四个字很显眼地突了出来。他歪着脖子，匆匆忙忙地翻起来。

“爹，你看这个干啥？眼下共产党不讲这个！”

“嘿，你閨女家不懂！你爷爷在世时，常恨我廢铁不成鋼，又訓又罵，这些我都忘了。有一句話我是死死記住了：‘打蛇要打七寸上，打人要打要害上。’王国藩和杜奎两人，一个能文一个能武，是村里共产党的两只臂膀。要是他們当权，卡得紧、管得严、斗得狠，咱們准沒有活路了。只有帮着你杜志大表哥把这两人狠狠掀下井去，才有咱的路。走一步看一步，这批穷棒子我就不信真个能坐天下。‘六法全书’是大书，咱們要掄刀动笔，就得傍着它。嘿，你杜志大表哥还是粗心，在紧要当口抓不准，咱們暗中要多提醒提醒他……”

“爹，听說区里还支持王国藩和杜奎哩！”

“不怕，只要咱們捏住‘七寸’打就行！什么打人罵人都是小事，要紧的是告他們貪污，告他們枉法，只要有点影子，还可以告他們危害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歪脖子”说到这里，气粗了，声也大了。“大瘦驴”赶紧用手肘碰他说：“这是什么时候？咱说话还高声！”

“歪脖子”只得又压低声音，继续向坐在一旁的闺女指点吩咐。反动的毒焰在二闺女心里更加火旺旺地烧起来。

约摸过了半个多月，一天夜晚，二闺女回到家，满脸放光地说：“爹，今天下午杜志等人把王国藩和杜奎两人扣起来盘问啦！”

“喔！”“歪脖子”的灰脸也放光了，“问出啥来没有？”

“啥也没问出来！两人还反驳呢！下午大表哥要我悄悄坐在人背后当记录，你看，这不就是两人的口供！”

“歪脖子”接过了两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白光纸，从头看到尾，脸孔又灰暗下去。这上面承认的哪有一句能成罪状呢？只差一点就是起诉书了。但他只稍一思索，就有了新的阴谋：

“上次告王国藩和杜奎的，都有哪些条？”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一共十二条，主要是贪污，耽误公事……”

“老话说，‘笔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提醒提醒大表哥，王国藩、杜奎两人的口供，咱们得改一改。”

“嗯！……”

父女俩就这样在阴暗的角落里，幕后参与了杜志这个叛徒一手掀起的变天活动。

斗争的矛头一转移，各种各样的谣言都起来了，什么

“王家地主早已搬到遵化，家里哪还会有啥！”“人家‘歪脖子’是个‘孬头’，从小吃饭不管事，斗争他也是罪过！”“斗不出啥来，白费工，还不如上山摸柴火上算！”

“歪脖子”听到这些谣言，心里象蜜一样甜。他原来象死灰一样的脸上，这几天又发出了亮光，一家人进进出出也不再锁起眉头。

正当“歪脖子”做着好梦的时候，暴风骤雨来临了。不久，上级领导派来了干部，发动了群众，对“歪脖子”和他的兄弟王维田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他二闺女那“私人秘书”的职务，自然也被革掉了。只是这时候，杜志的漂亮外衣，一时还没被人们识破。直到隔了半年多，邻近高各庄等地由大佛教等反动会道门组织了“红眼队”的暴动，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烧杀，杜志等人也密谋响应暴动的阴谋暴露以后，才被逮捕。“歪脖子”煞费苦心想抓住的这根救命稻草，也被革命的浪涛淹没了。

三

时间又飞过了十五年。沙河套上的白杨，已长成绿色的长城。

“歪脖子”和“大瘦驴”都已经老了，但是心中的怨恨都没有消。

“歪脖子”变得越来越阴沉，每天垂着头、歪着脖、挎个粪筐，在大道上缓慢地走着，村里事不问不管，见人不

打招呼，不串邻，不走亲，象死去一样。“大瘦驴”变得越来越多嘴，为一点小事就打鸡骂狗。

在这十五年里，“歪脖子”好几次预言要变天，而且作好了准备，结果一次一次全落空了。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时，他想：这是鸡蛋碰石头，准完蛋！一天晚上，他又抖抖索索地翻他那虫眼累虫眼的陈年老账本，第二天借口拣粪，在自己的几块地上直晃悠，查看地界。谁知过不多久，全国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吓得他赶紧又低下头。他那个在伪军里当过团长，重债累累的堂兄弟王维平，被押回来枪毙了。一九五三年，王国藩和杜奎领导办起了二十三户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又想：穷棒子们不用抖，抖得欢、垮得快。但由于接受了上一回的經驗教训，这一回，他更加谨慎了。王悦等反动分子千方百计企图把社搞垮时，他只冷眼站在一旁察看，未敢轻易沾手。谁知穷棒子们充分发挥了坚强勇敢、一勤二俭的精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社办好了。王悦等反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再一次使他大失所望。紧接着，生产一年一年的发展，生活一年一年的提高，山区面貌一天一天的改变，社的规模一天一天的扩展。在转高级社的第二年，他也成了社员。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庆幸自己伪装得好，没露马脚；另一方面又十分悲哀地想到：变天的希望愈来愈少了。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全国高举起来时，建明公社更是日夜沸腾。“歪脖子”眼花撩乱，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望山前和山后，到处

滚动着歌声和笑声；望望村头和村尾，到处人喊马嘶，钢铁大軍和水利大軍正在日夜奋战。他感到这一切都象对自己示威，連粗气也不敢出了。

一九六二年夏天，“歪脖子”忽然感到他的預言这回真的要实现了。因为这两年碰到了自然灾害，市場上比較紧张，人民生活也比较困难。被中国人民赶到台湾去的蒋介石匪帮，看到有机可乘，吵吵嚷嚷要反攻大陆。“歪脖子”这时又一心想着：变天，变天，变天！天天晚上做着变天的好梦。他叫回了在外地闺女家的“大瘦驴”；又指定在遵化某行业工作的二闺女，經常回家傳报消息。

一天清晨，“歪脖子”忽然早早起来，繞着王家大院，莫名其妙地察看起来。

“大瘦驴”在家看啥啥不順眼，前門罵完了母鸡不生蛋，后門又罵葫芦不上架。一会儿，“歪脖子”回来了，鬼鬼祟祟地把“大瘦驴”招呼到屋角里說：“我昨夜梦见王家大院屋頂开紅花，这是物还原主的大吉兆；今早还看見有紅光紫气呢。这回变天是一定的了！”

“真的？”

“这哪会假！咱俩合計合計，眼前怎么办？”

“哼，照我看，把咱屋后那片菜园地先圈起来，誰也不让走！”

“你是眼光短小！”

“你大？你大？大得連个响屁也不敢放！”

“看你！你以为我真这么膿包嗎？嘿，咱是块老姜，

不到时候不显辣味！别看这批粗脚杆子抖得欢，又是队长，又是委员，头上长角，身上带刺，到时候，一个个还得倒地啃泥丸。老实说，咱也不为别的，闺女们都成家了，跟前又没小子，咱就为王家大院争这口气！……”

“歪脖子”正这样满口白沫地嘟囔着，想不到“大瘦驴”偏偏扯起衣角擦眼泪了。“歪脖子”立刻感到自己失言，犯了老母驴的禁忌。要在平时提起“没小子”的话，她准老尸首长、老尸首短地骂上三天三夜；如今幸好“喜事临门”，老母驴总算大赦了一回。但余怒仍在，只一会儿，她立即拼凑起脸上横七竖八的皱纹虫，哭丧着脸回敬：“争口气？你这老尸首有多大能耐？”

“大瘦驴”的眼泪和骂声，终于象冷雨一样，把“歪脖子”心里的一盆热炭浇退了火苗。他冷静下来一考虑，老虎爪子要一点一点伸，先从圈地做起，也确实没有什么不可。于是点点头说：“就依你，咱们先圈菜地！”

上午，他粪筐不挎，粪杈不拿，背了把镐上菜园了。菜园后面是二队的队部，社员进进出出要走过他家菜园的一角。这本来早已习惯了，谁也不介意，他本人也没有意见。可是今天，他的意见就大了，歪着脖，抡起镐，一下一个深坑，很快把踏平了的一条小道全刨开了。接着，又用棘针密密麻麻地围起篱笆来。这条道就这样堵死了。

中午收工时，队长老王荣看见了。他火苗八丈高地找上门说：“王维藩，你怎么路都不让我们走？”

“歪脖子”开始不吭气，接着就反攻说：“你们学过政

策嗎？這算不算我的菜園地？”

“算又怎的？不算又怎的？”

“政策上不是明明白白說過，社員可以自己處理嗎？”

一句話把老王榮頂得張口結舌。他心裡想：好！你他媽的尾巴又翹起來了！

大隊部研究了這個情況，明知這老東西又在磨牙練爪，等待變天，但既已被他鑽了空子，也只得容忍一下。

試探性的進攻勝利以後，“歪脖子”臉上放光了，老兩口一天到晚唧唧噥噥，有說有笑。

夏末，汛期到了，山區沿河各村都忙着防汛。春天時，村里為了確保河西的一片保家好地，特意花了二千多個勞動日加固了一道河堤，堤外豎起了密密麻麻的柳樹桩子。

一天下午，“歪脖子”又冲着“大瘦驢”咬耳朵，末了只听“大瘦驢”扁着嘴輕聲告誡說：“小心着點，窮鬼們長八只眼睛哩！”

太陽滑進了西山，社員們大部分都收工回家了。“歪脖子”還沿着河堤撿糞。撿着，撿着，河堤上再也看不到什麼行人了。忽然，“歪脖子”緊張地東張西望起來，望了一陣，看不見人了，猛然丟下糞筐，跳下河堤，使勁搖起護堤桩來，一面搖，一面喃喃自語：“他媽的，丰收、丰收，我要你們丰收個屁！……”他動作敏捷，真不象是一向裝病的六十來歲的老頭子。只一会儿，就拔出了一棵樹桩，一下丟進了水里；又一会儿，又拔出了一棵樹桩，又丟進了

水里……

“你要干什么？”社員赵連春象豹子一样，从堤旁树林里冲了出来。

这一下，“歪脖子”沒啥好說了，只得抖抖索索地强辯：“我，我寻思这些树桩子……沒有用了，想拔几棵生火……”

“你甭强辯，这些树桩子是沒有用的嗎？拔了它，河水冲垮了河堤咋办？你这不是存心破坏！跟我走吧……”

赵連春平时是个悶着头干活，不大爱管村里事的人。最近听了村支部关于目前形势的传达报告，要广大社員提高警惕，当心阶级敌人的破坏，从这儿，他就多了个心眼。每次上工下工，人前人后，山头水边，他都睜大眼睛多看几眼，竖起耳朵多听一听。这天，他們小队里几个人耨地耨晚了，他又因有点事，收工更晚，正急匆匆地往回走着，猛抬头，見“歪脖子”背冲着自己象在干啥。他心想：怪呀，平常太阳两三丈高他就收工了，今天怎么这样积极？准是搞什么鬼把戏！于是，故意不走正道，繞到了“歪脖子”背后的楊树林子里，見他真是搞开了破坏，于是跑回来抓住了他。

赵連春把“歪脖子”带到了大队部。“歪脖子”立刻又装出一副窩囊相，嘴扁着、头垂着、腰弯着，就象要倒下去似的。等到王国藩和杜奎一盘問，他結結巴巴檢討认錯了，并狠狠罵自己是老糊塗。

王国藩說：“你一点也不糊塗，清楚着呢！你是盼变

天盼得急眼了！”末了，他意味深长地提了个问题：“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你有啥意见？”

一提到反攻大陆，“歪脖子”的六神七窍又还魂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不觉说出了：“我没啥意见！”

“你当然没啥意见！”杜奎吼上了，“蒋介石来，是抹我们的脖子，你们又可以骑到劳动人民头上喝血了！告诉你，天变不了！一生一世，再生再世都变不了！死了你这心吧！从今以后，不准你乱说乱动，由生产队监督你劳动生产，再不老实就法办！”

“歪脖子”的脸又象死灰一样了。

賊六子

陳青山

老六王繼亭，是有名的尖刻鬼，人們便都叫他賊六子。

賊六子和人共事，挖空心思占便宜，對待家里的長短工，更加吝嗇苛刻。人們提起他來都恨的咬牙切齒！

半碗炒倭瓜

這年夏天，兩個長工在南院的榆樹蔭涼下吃午飯。賊六子走過來，假笑一聲說：“今天干的啥活呀？”

兩個伙計哼了一聲，暗罵道：“甭他媽的假裝親熱，哪天你不到地裡偷瞅着我們！嗯，我們一不偷，二不摸，你白來這一套！”

賊六子的兩隻賊眼，早盯上了桌上的菜碗，用鼻子聞了聞，馬上皺起了眉頭，生着氣，匆忙地走了。到屋裡便大喝大叫地質問老婆：

“誰把炒倭瓜給他們吃啦？”

他老婆看了看炕上的飯菜，陪笑說：“大米飯燉肉不

想吃，又想吃炒倭瓜啦？”

“我不想吃就給了他們嗎？”

“嗨，那半碗炒倭瓜是昨天晚上剩的，都有味了，不給他們吃了，也得扔在泔水缸里喂猪，这还值得上这么大火。”他老婆解釋着。

賊六子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用力甩了一下胳膊，說：“真混賬！扔在泔水缸里喂了猪，不多长肉嗎！平白无故地給了伙計們，成什么体統！”

他老婆見他越說越气粗，也瞪起眼睛，將腮幫子鼓了鼓，想同他吵一頓，但想起这碼事情的經過，却又胆小了。因为她把这半碗炒倭瓜給長工們吃，也并非慈心善舍，是她出于这样一种打算。前些日子，他娘家的哥哥趕着車到三屯营集上去卖粮食，走在村东的大道上，渥住了。正在愁的不知咋好的时候，两个長工遇上，帮她哥哥把車攔出来。她知道这事以后，甜言蜜語对長工們說了很多好話。她想：哥哥常年赶集卖粮，說不定还許遇上啥难处，若是再把車渥住了，来找爹时，他这翻臉不认人的东西，能帮忙嗎？免不了还得求伙計們去出力。在这种打算下，才把半碗炒倭瓜給的他們。今天她見賊六子气得眼里直冒火，就随机应变地說：

“往年活忙时，你不也常給他們加点菜嗎？我給他們这半碗炒倭瓜，也是为了多讓他們干点活！”

“你这是胡說！”賊六子眼睛瞪得更大了，“現在既不是春种，又不是秋收，給他們加菜有啥用？”

他們在屋里这样吵鬧着，被做飯的費大娘聽見了，抽身走出去，告訴了長工們。長工老常，是個暴性子人，將筷子往桌上一摔，說：

“這是他們給的，又不是咱們要的！好，我找他們去！”

長工張老漢性子穩，攔住老常说：“先別着急……”

老常哪听劝阻，光着油黑的脊梁，端起盛倭瓜的碗，便大步闖進賊六子的屋里，把碗往賊六子面前一墩，說道：

“我們是凭力气吃飯，不是凭臉色吃飯。这半碗烂倭瓜可是你們願意給的！”

賊六子嗖地站起来，撇着嘴問：“誰給你們的？”

“你家里人唄！”老常瞥了他老婆一眼，“这陣又不承认啦！你們嘴里几个舌头？”

賊六子立刻把鼠眼又盯向他老婆，想把气恨出在她身上。但又一想，在長工面前鬧起来不大好，另外也不該使自己的老婆太难堪；于是把一肚子的气又憋回去了，把威風轉向了老常：

“按規矩是不該給你們吃的，你們吃了，还不許說說嗎！”

老常挺了挺胸脯，又要开口，張老漢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插嘴道：

“就算我們不該吃，賠你們一个倭瓜还不中？”

“对，吃你們半碗，賠你們一个！”老常也賭气地說。

“你們賠——”賊六子拉着長声說，“說的倒好！菜是

用油炒的，賠我多少油？”

这一下可把老常老張两个长工气坏了，朝賊六子跟前湊了两步，拉开了动武的架式。賊六子老婆一看事情不妙，便立刻装出笑臉說：

“你們哥俩快消消气，丫头她爹的脾气你們还不知道嗎？有嘴无心，說过轉身就忘了。咱們吃在一块，住在一块，就是一家人……”

賊六子的老婆假仁假义地，連推带哄把老常他們俩劝走了。轉身回到屋里，对賊六子笑着說：“和臭长工們生什么真气！”忙着給賊六子端飯，直勁地說好听的。

飯后，賊六子把孩子們和他老婆叫在一起，以事后胜利者的神态說：

“你們剛才都看見了吧！把菜給了他們，他們还不領你的情……”他狠勁地噴了两口烟，旁若无人似地接着說：“我剛記事的时候，老人們就常說——財主和穷人，是水火不容的。这話不假啊！”

两个閨女听了爸爸这些治家銘言，不断点头敬佩。媽媽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不示弱。她繃起臉，以教訓子女的口气，但却冲着賊六子，說：

“这些老道理誰不懂，可也不能叫人家用一勺換咱一鍋呀！春种秋收，都得經人家的手，惹激他們，到时候給咱們一手，也够咱們受的！”

賊六子眼角頓時揚起了几道笑紋，称贊他老婆的話有道理。

两缸酱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天上的月亮，照得賊六子家的南当院里明光光的。老常和張老汉正在吃晚飯。

賊六子坐在屋里的炕上，查着他那蓋皮的租粮賬。一边在賬本上写着，一边隔着窗戶玻璃看两个长工吃飯。这是他从那半碗倭瓜事件得到的启示，认为对待长工，不光在干活时要留心監視，在吃飯上也要注意。可巧，真的事情又来了，他見他們两个一边吃着飯，一边叨咕什么，吃完了还把筷子一摔，大声說：“馋死他媽的也不吃你們的东西！”賊六子一听楞了，忙放下笔走出來，一看桌上没什么意外的东西，除了两双碗筷，仍是一碗咸菜一碗酱。他仔細查看了一下，那碗酱一点也沒有动，端起碗仔細一瞧，是他家的好酱，立刻又勾起了气火。因为他家的酱是两缸，一缸是粗酱，用杂八豆子和粳糠做的，专給长工們吃的；另一缸是細酱，是好黄豆和芝麻做的，专供自己家里人吃的。現在长工們竟然也吃上了好酱，这比上次吃炒倭瓜还不應該。想到这，又用鼻子嗅了嗅，便气呼呼地去找他老婆，指着酱碗問道：

“这酱又是你給的吧？”

“不是我！”他老婆臉一沉，“不信去找他們來問問。”

賊六子沒吱声，忙上厨房去找做飯的費大娘。

費大娘早已惶恐了。因为这酱是她偷着給老常他們

的。当时，老常老張不在，就放在桌上急着到后院去抱柴禾去了，忘了告訴他倆。老常老張呢，吃飯時見是好醬，認為又是賊六子的老婆來收買人心，便賭氣沒吃。

“這醬不是我故意給的。”費大娘見賊六子來問，便按已經想好的主意回答，“是我舀醬時記錯了缸，舀差了。”

賊六子呼哧呼哧地喘着氣，剛要開口，他二閨女趕上來嚷道：

“你這是胡說，你天天舀醬還不知道哪缸是啥醬？不說實話不饒你！”

“老費，”賊六子忽又轉變口氣反問道，“我問你，你在我家做飯給工錢不？”

“給。”費大娘不安地答應着。

“既然我們不白使你，為啥給我們糟蹋東西？”賊六子提高了嗓門，“你吃着我家濕的，又拿着我家干的，還禍害我，就是養條狗，還吃誰向誰呢！你們這群窮棒子，吃上三天飽飯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照這樣明天給我滾！”

“爸爸，揍她！”賊六子的閨女一旁幫腔。

賊六子縮了縮袖子，真的上前要打，手還未落，他老婆趕來攔住，氣鼓着胸，哼了一聲，拿眼斜着費大娘說：

“老費，我們要你這麼個老婆子做飯，是為的可憐你，若單憑花錢雇人——嗯，比你好的還不是用鞭子趕嗎！這個年頭，三條腿的蛤蟆沒有，兩條腿的窮人可有的是。我告訴你，不說實話今天不饒你！去，好好想想去吧！”

費大娘已五十多的人了，被他們全家這一咋唬，連害

怕帶难过，心里就象刀剗一样难受。眼含着热泪，仄仄歪歪地走回自己住的厢房里。手握着嘴喔喔地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眼泪把破炕席浸湿了一大片。

午夜已过，月亮西沉。老常起来喂牲口时，听见費大娘在屋里哭泣。走进屋問清原委，气得直咬牙。回到馬棚里，便和張老汉商量起以后对待賊六子的办法来。

費大娘清早起来，照常做好飯，然后端着碗給賊六子他們去舀醬。她一走近两个不同的醬缸，不由地想起昨日的事，心里又难受起来，差一点沒栽倒把碗摔了。她扶着門框，平靜了好大一陣，当她把缸盖掀开一看，嘿！醬里有一大块猫屎。她楞了一下，解恨地說：“好，也叫你們地主尝尝猫屎什么滋味！”正要舀，心里又怕起来，心想，要叫他們吃了，以后知道，还饒的了我？无奈何，回到屋里实說了。

賊六子一听，气得綳起臉：“你是管什么的，为什么叫猫进去？”他大嚷大鬧着，朝門外瞥了一眼，見沒有人，便又低声地說：“去吧，把猫屎扔掉，把猫屎周圍的醬都舀在碗里！”

費大娘照办了。

过了一会，賊六子見老常他們从地里回来吃飯，便端着这碗沾有猫屎的醬，走到他們桌前，奸笑着說：

“嘿，上次为了半碗剩倭瓜，我不該和你們吵，惹你們生气，我的脾气你們知道，有嘴沒心，鬧过去就后悔，昨天我特意給你們舀的好醬，可是你們不吃，我寻想了半宿，

估摸着你們准是还生我的气，我看忘了过去的事吧！”說着把端的醬碗放在桌上，“我又給你們舀来一大碗，吃吧！”随后吩咐費大娘：“老費，把咸菜和粗醬端走，今天叫他們哥俩光吃好醬！”費大娘把咸菜端走，回来看看賊六子不在屋了，忙把这碗醬的原委告訴給他們。老常老張听了，并不惊慌，也不生气，一边大口地吃着醬，一边乐着說：

“我們比你知道的早，那不是猫屎。嘿！好香的醬！”說着每人又吃了一大口。

这一下把費大娘鬧蒙了。

原来，那猫屎是假的。是老常和老張为了給費大娘报仇，夜里用粘泥做好，天亮前，偷偷放在醬缸里的。

“要不，凭咱們这样的怎么能吃上这么好的醬！”两人吃着又乐起来。

費大娘噴地一声，也笑了。

买 和 卖

賊六子滿以为老常和張老汉吃了他那碗好醬，在干活上会有新的起色呢。可是一連观察了好几天，也不見效果，并且連个領情的話都沒听见。心里很生气，不住地罵道：“他媽的，还不如把那碗醬喂了猪呢！”

这天早飯后，他想再到地里看看他們干活怎么样。剛下炕，二閨女慌忙地跑进来，說：

“爸爸，你不是爱吃瓜嗎？我給你买来啦，你看看好不好？”

說着把两个大香瓜放在炕上。

賊六子不光爱吃瓜，而且还很会辨认瓜。他拿起一个，用手指先彈了几下，又举到耳边用手捏着听了听，說道：

“这瓜不熟，快送回去！”

“你怎么知道？”閨女执拗地問。

“論办事你还差得远呢！”賊六子說，“若是熟瓜，捏着发脆，听着发空；这生瓜捏着棒硬，听着声死。快送回去另换换。”

他和閨女一同来到大街上。

正圍着买瓜的人們，一見他家父女来了，便都忙让开道，有的还忙打招呼。賊六子怠答不理地走到跟前，把手里的瓜往筐里一扔（差点沒摔裂了）說：

“瓜不熟就卖呀，我們要再挑一挑！”

大伙看他来挑瓜，便都不再买了。因为誰都知道賊六子挑瓜的办法，最少也得挑一袋烟的工夫，非把人家筐里的瓜全摸遍不可。卖瓜的是外村人，不知道底細，认为王家地主亲自来买瓜，还是个大主顾呢，滿臉迎笑地答应着把筐挪了过来。

賊六子把长衫往上提了提，蹲在瓜筐前。举起一个来，到耳边捏一捏，放下再拿另一个。一个一个的連捏带听，又搖又晃，把全筐里的瓜都挑完了，也沒挑妥一个。

于是直起腰，要挑另一个筐的。这一下卖瓜的可吃不住了，炸着胆子說：

“先生，你这样挑法，往下我怎么卖呀？”

“怎么，不許挑哇？”賊六子两手拍着泥土，歪着脖子說，“你做买卖得懂做买卖的規矩，常言說，‘褒貶是买主，喝彩是閑人’，我們花錢买生瓜呀！”

卖瓜人見他要翻臉，只好改口說：

“挑是可以挑，不过你这种挑法……”

狗腿子范泰一旁插了嘴：“你要把眼珠放亮点，抬眼看看是誰在买瓜！六先生城里开着‘德聚兴’粮店，成百石的卖粮食还管挑管拣呢，別說你这挑子烂瓜！”說得四外的人們嘆地一声都笑了，因为“德聚兴”粮店是賊六子三哥的，范泰为了帮虎吃食，瞎吓唬卖瓜的罢了。

賊六子繼續挑瓜，好半天挑了两个，正要走，范泰嘻皮笑臉地上前說道：

“六先生，王凤山家想求你借点粮食……”正說着，王凤山走来了，范泰瞪了他一眼，“还不快和六先生好好說說！”

賊六子一听说有人借粮，馬上就是另一副神气，瞥了王凤山一眼，随后掏出烟卷，給范泰一支，自己抽一支。这才慢絲絲地吐着白烟問道：

“借我的粮，指着啥还呀？”

“指着地中不？”王凤山害怕地回答。

“哪块地？”

“南山梁三亩坡地！”

賊六子哼了一声說：“就凭你那兔子不拉屎的地？白給我也不要！”

賊六子往外放賬，是要看对象的。你的房和地，他要看不中，死活不借給你。王凤山对这点是清楚的。他于是想了一下，轉口說：

“用东西換中不？”

“你拿啥換？”范泰一旁插問。

“用猪糞，俺家养着猪呢！”

賊六子不光对放粮放款精通，对种地也有一套，他知道地里要多打粮食全靠着多上糞，特别是猪糞，和金子一样宝贵。于是把烟卷头从嘴里拔出来，扔在地上，冷笑說：

“嘿嘿，你也知道，眼下离大秋还有两个月，缺粮戶多着的呢！我二斗紅高粱放給誰，秋后他不还我四斗！你說对不？”沉了一下說：“你既然找来了，就換給你二斗吧！可是得說清楚，怎么个換法呢？”

“按市价唄。”王凤山說，“昨天三屯营集上，是一斗半紅高粱換一車糞。”

“怎么，按市价？”賊六子眨巴一下眼睛說，“常言說：救急如救火，你要換，咱就一斗紅高粱一車糞，不換就拉倒！”說完，抽身要走。王凤山气得渾身发抖，真想說不換了，但想到眼前的困难，就又强把气勁压下去了。沒等他再开口，范泰早向前拉住賊六子，說：

“六先生，別走，王凤山是求你的，还不是說了算！”回

头又大声吆喝王凤山：“你还发什么楞！快按六先生說的价答应了吧！”

凤山只好点头。贼六子这才站住，对范泰說：

“好吧！你到南山把老常找来，先把王凤山的粪拉出来！”扭头又对凤山說：

“你回去准备粪，跟着粪車取粮食。咱們是粪到粮走，手續要清。”

傍晚，家家正在吃晚飯的时候，凤山跟着拉粪的車到王家大院。贼六子叫范泰和老常卸粪車，他自己进了粮食屋。凤山站在門外等着他，他順贼六子的背影往里一看，嘿！一个挨一个的大粮囤，都頂着房頂，啥粮食看不见。只見囤脚前放着两个大籬筐，里边盛着滿滿的高粱。贼六子拿起一个木鍬，往籬筐里攪和什么。凤山想上前看个究竟，但贼六子拿了两个斗走了出来，把斗放在門前又进去了。凤山一見这斗，不由暗想：都說他家买粮食用大斗，卖粮食用小斗，莫非就是这两个斗？这时他顾不得再看粮囤了，只顾歪着脖子打量这两个斗，但看了半天看不出大小来。他奇怪：两斗的高、寬都一样，柳条的顏色，边沿上的木板也一样，上边都写着“德善堂”三个大字。难道人們說的那大小斗不是这两个？他正发疑，贼六子又走出来，弯腰提起一个斗，說：

“走，屋里过粮去！”

凤山不光是沒弄清斗的大小，屋里高粱的好坏，他也沒弄清。原来贼六子这两籬筐高粱，一籬筐是成实的，一

籬筐是糝粒的，那成实的是专在市場上卖的，那糝粒的是专准备村里缺粮戶来买粮时往成实高粱里搀的。剛才賊六子为給凤山搀糝高粱，故意叫他认斗，避开他的注意。这时，他把粮食过好，将凤山領出来，还故意假装近乎地說道：

“若不是你，誰买粮食能到我粮房里来挑呀！……”

凤山背着粮食剛走出几步，迎头老常和范泰来了。老常心眼实在，最同情和自己一样的穷苦人。他上前小声問凤山：“剛才过粮食，你看清是用的哪个斗？”

賊六子正在鎖粮食屋的門，老常的話都听見了。他嘎叭一声，将門鎖好，回过身来答道：

“还用問嗎？給凤山过粮食，还能用小斗？剛才两个斗都让他看了，是他挑的。”

凤山本来就对賊六子信不住，一听这些話，就觉出有文章来了，忙問老常：“这大小斗，到底咋分辨？”

老常皺着眉头反問：“你沒看見斗边是咋样嗎？”

凤山楞住了。因为他看斗时，光看的外表，共不知秘密却在里边哩：大斗沿薄，小斗沿厚，比大斗多一层板，……这些，不光凤山看不出来，村里好多人都摸不透底細呢！不想今天被长工老常说漏了，賊六子气得肚子崩崩脹，当下真想踢老常两脚。他拍拍身上的尘土，一手提着长衫大襟，一手叉腰，拉长声音說道：

“嗯——說明了也好，这二斗高粱是用小斗过的，你該把我怎么样吧？这大小斗是我家多年来的規矩，难道

因为过給你这二斗高粱就另改章程嗎？再說，是你赶着来求我的，嫌吃亏就放下！”說完擦了擦前額上的汗。

狗腿子范泰見主子擦汗，把脖子一歪，对王凤山說：

“你老大不小的了，別不識抬举！六先生为了周济你，累得出了一身大汗，要算工錢的話，你該給多少？”

凤山气得青筋直跳，想放下口袋和他們拼命干一場。不过又一想，在人家掌管的天下过日子，胳膊擰不过大腿去。再說家里正等着吃粮食呢，无奈何憋着滿肚子的气恨走了。

謀 田 記

傍年根是賊六子最忙的时候。債戶們有的交本，有的归利；还不起債的托人來說情，过不了年的找人来求借。他們大院从早到晚总是人来人往。

一天，賊六子正在眨巴着眼皮，翻賬本，打算盘，思謀着如何吞占穷人家的产业，王玉老汉还錢来了。别人来还錢，他眉欢眼笑；王玉老汉来还錢，他心里可打了死結，頓時就同霜后的野草那样蔫巴了。賊六子沒心拉腸地数着錢，不住追悔着这几年在这块地上所費的心机。自从把王玉老汉西大道这七亩好地的文书存放到柜里之后，虽然王玉老汉还种着，他却早已作好了种种打算，要把这七亩地和自己两旁的二十多亩地連成大片，耕种方便，外人說来也排場闊气。春天地里苗出不全时他暗中担过心；

夏天雨后誰的大車从地头軋过去，他曾吩咐长工們平过車轍。想不到老汉一家沒命地苦熬苦掙，利錢年年清不說，如今連本錢也归还啦。但他的賊眼皮眨了一陣以后，立刻有一个阴險刻毒的賊主意出来了。

“好吧，你信用還不錯，往后缺錢时再来取，”說完就将数好的銀元和銅子“嘩啦”一声收起来。打开他那油漆堂亮的板柜，拿出那張借契遞給了王玉老汉。

王玉老汉用干硬的大手打开一看，吃惊地說：“六先生，这光是借契呀，我那地契文书啊？”

“嘿，王玉大叔。”賊六子湊到王玉老汉跟前，冷笑道，“我这几年事情忙乱，不小心給你丢了，等找着給你送去，好不好？”

“啊！”王玉老汉急了，挺了挺胸說：“这不中，我連利带本如数不欠你的，你不給我文书，不中！”

賊六子被債戶这样的頂撞，大約从他生来还是第一次。可是人家为什么叫賊六子呢，就是因为这样狡猾。他不但不觉得难堪，反而装得比剛才更老实了。他又低声下气地叫了声大叔，說：“这文书我是不該丢，可是常言說：‘杀人不过头沾地’，咱們是一个王字沒掰开，就算这地契文书找不見，我能亏待你嗎？我三頃多地的文书由你挑，可以不？”

賊六子这軟一套硬一套的办法，就把王玉老汉应付走了。他閨女惊惶失措的打听：

“爸爸，你怎把文书給他丢啦？”

“丟就丟唄，窮棒子他能把咱怎的？”

“不如賠他一块地，在他跟前說小話！”

他老婆心里可有底，一边往头上抹着桂花油，一边答茬說：“你們这群傻东西，心眼可倒实，”冲賊六子一撇嘴，“是真丟了嗎？”

賊六子得意地微笑着点点头，从一只精致的小木盒里把那張陈旧的地契文书拿出来，在子女們眼前晃了晃，高傲地說：“成事在天，謀事在人。天下有王继亭在，西大道这块地是跑不了的，嗯，这文书嗎，它永远不能登他家的門口啦！”

年后的正月初五这天，賊六子就把狗腿范泰找来，商量謀算王玉老汉西大道这块地的办法。一是把王玉家欠錢的戶都串通好，一律縮短他还債期限；二是留意王玉家发生的事情，不論是天災人禍，凡是他借錢的时候就插手，宁可降低利息也要爭过来。可是王玉老汉一家呢，仍然是开荒的开荒，打柴的打柴，全家老少更加勤勞起来，很快就把外債还清了。生活上虽然缺吃少穿，可是吃糠咽菜也沒借外債。一晃过了三年。

这年时局很不稳定。长城一带，一会說归东三省管，一会又說归直隶省管。上边动蕩，下边自然不安定，今天十村为一乡，明天八村为一保的乱改动。各村的地主虽然掌握着各村的大权，但他們怕时局的牵連，都不願出头了。賊六子就借这个机会，鼓动着把王玉的侄儿王凤歧用上当傀儡保长。为了进一步陷害王玉老汉，还叫王玉

当他侄儿的保人。然后又叫腿子范泰等同王凤歧鬼混，第二年冬就差了不少的官款。贼六子这回有机可乘了，立刻把狗腿范泰等一伙人找来商量。

李順說：“按着差官款的罪过，准叫他蹲大獄。”

“光蹲大獄对咱有好处？还是叫他賠款！王凤歧是穷光蛋，王玉是保人，賠款得冲他要！”范泰給李順解釋。

“对，我看六先生明天你就进城！”李順也贊同了。

賊六子連抽了好几袋烟，末后說：“事情不象你們說的这么容易，这事比不了收租放債，非經县衙門不可！”

“按六先生說，事还能办成嗎？”

“嗯，”賊六子点点头，說：“当然能，光我办有难处，得求老爷子抄手，他老是全县的紳董，只要他給县长写封信，或者拿上張名片，管保易如反掌。”

他們正說着，賊六子他爸爸来了。一伙人立时都站起来，毕恭毕敬地打招呼。王思善这家伙坐在椅子上，捋捋花白的胡子，朝賊六子問道：

“剛才我听你們丫头媽說，你要同王玉他家打官司？这好說。一会我給县长写封信，明天叫范泰送去。不过……要鬧就得鬧个样子，无声无响地犯不上，事情不在王玉他那块地上，这有关咱王家的名声，知道不？”

“是，是……”賊六子連声答应着，他爸站起来又吩咐了几句，往外走了。

第二天早晨，范泰带上信騎驴上城里了。第三天，从城里来了两个班头。进村先打听王凤歧。有人說他和李

順趕集去了。兩班頭就直奔王玉老漢的家里。王玉老漢正在當院干活，一見兩個班頭來找，立刻吓得不知咋好，張口結舌地把人家讓到屋，一面打發家人燒水，一面給人家裝烟。兩班頭開口問道：

“你叫王玉嗎？”

“是。先生。”

“王鳳歧當保長你是保人嗎？”

“是，他還是我的侄子。”

兩班頭擠了擠眼，從腰掏出一條鐵鏈，“嘩啦”一聲，套在王玉老漢的脖子上，“嘎”的一聲鎖好，說：“王鳳歧吞食官款應依法辦理，你是他的保人，走！”

王玉老漢立刻面如土色，嘴唇顫抖着說不出一句話，只好被班頭牽走了。

王玉一家人有的哭叫，有的去找親朋近鄰幫忙說情。不大会院裡就擠了個人山人海。幫忙的人擔心王玉老漢胆小嘴笨，把官司打輸，所以就叫他另一個侄兒王鳳明到縣衙去幫王玉說話，隨後又找說合人，準備進衙去保。

賊六子吃了早飯，聽范秦叙說了進城的經過之後，早料到這一着。他高高兴兴地準備起第二步來了，穿上一件深灰色的長袍，外套一件黑馬褂，褲角上扎了一副黑色的新緞帶，腳上穿上一雙沒沾塵的云子幫棉鞋，戴上他專為走南闖北戴的紅疙瘩緞帽盔。混身上下換好之後他手扶門框吩咐閨女：

“二丫頭，你把狗叫到南當院，待會來人找我的話，先

告訴一声，再叫他們进来。”

賊六子一切准备好后，就守着炭火盆抽起烟来，不大会，他們的大黄狗汪汪地咬起来，一群人来找賊六子，被他閨女擋住在当院。半天賊六子才发話，叫大伙进去。

“六先生，庄上这老几位为王玉的事来求你啦。”范泰先开腔。

賊六子哼了一声，沒有回答，眼瞅着火盆“叭嗒叭嗒”抽烟。

大伙有点着急了。“老乡亲摊上事，还是六先生管管吧。”有的說。

“王玉这事，得經县衙，非六先生出面怕不中。”有的补充。

“对，六先生帮一把吧。”末后又有人央求。

賊六子扭过臉来，朝大伙哼了一声，仍沒言語，两只鼠眼睛紧盯了会王凤山，才說：“按众位的請求，我当然要帮忙的，我王继亭也是向来以助人为乐。不过……这事情是王玉他們家的，他家人不說話，別人說了算嗎？”

人們这才明白——他是嫌王凤山沒有开口求他。几个人忙圓解說：“六先生，他年紀小，又沒处过事，我們临来时他媽一再告訴，叫六先生看着办。”

“若这么說，还象話，不过……”賊六子仰臉瞅了会屋頂，接下去：“不过得糟一笔錢啦，他家認可嗎？”

人們又捅了捅王凤山，王凤山才叫了个六先生：

“只要我爸爸回来，花多少錢都中，或房子或地，众位

看着办。”

“好吧，”贼六子这才露出一副假笑，“事情既然这样，我立刻进城，就算蹈火坑我也不辜负众位的情面。”

贼六子叫人套上车，带着范泰、李顺进城了。到城后先到他三哥“德聚兴”粮店落脚。午饭后买了一些礼物就到县衙去拜望县长。县长一见绅董的六儿子来了，又拿了礼物，自然亲自出见，寒暄一阵之后，告诉他：王玉在狱押着，他侄王凤明散押着，只要把官款算清，什么时候出去全可以。按这案子本可就此了结，可是贼六子有三个想法：一、案子若完的这样快，花钱太少，王玉西道那块地不能到手；二、今天来明天回去，庄里人们认为这官司好打，显不出王家的威风；三、自己常年钻在账本里，来城里的时候不多，若趁这个机会逛荡几天不但花不着自己的钱，还显得事情重要。他就根据这三个道理大干起来了。从县衙出来的当天晚上，就联络一批狐朋狗友，有衙门里的，有商会上的，有左近村的，白天在北街“北平饭店”的小楼上，肉山酒海，划拳行令。晚间有的去看戏，有的去赌钱，有的抽大烟，有的去逛妓女院。贼六子因为和城根一个外号小白鞋的妓女有点旧交情，所以就住在那里。他这次由于不花自己的钱，手头大，比过去住的更热呼了。一连几天，连屋都不出。腿子范泰催他，他推托事情没完，叫李顺先回家照料一下家务。

李顺这个狗腿虽然坏水不少，但比起范泰来水平还是显得很低。他回家见了贼六子老婆便大吹起来。他叙

說吃喝排場还不要緊，把賊六子住小白鞋也夸耀出來了。賊六子老婆呼地一下瞪起眼睛，冲李順的臉“啐”了一口，罵道：

“怪不得你們总不回來呀，原來讓那個女妖精迷住了，走，咱們找他去！”

李順鬧了一臉唾沫，又惹了一身禍，抽身就往外跑。“站住！”賊六子老婆喊住他，吩咐道：

“快把驢牽出來，跟我進城！”

李順没办法將驢收拾好，賊六子老婆騎上，他跟着，一同往城里去了。他們主僕二人走到半路，碰上了賊六子和范泰這主僕二人回來。他老婆二話沒說，見面和麻雀鉗架似的一陣亂吵亂鬧。賊六子見事不好，跳下車舉拳要打，抬頭一看，來了很多過路人，不由暗想：在這場合打起來，有失自己的體面，于是便又跳上車一聲不吭地往家走。范泰和李順都你一言他一語地勸解，從半路一直勸到家，看了看日頭，已經平西了。

晚上，當人們都睡覺的時候，賊六子將門關緊，然後脫掉他的馬褂和長袍，換上貼身的小棉襪，鼠眼一立楞，說道：

“我為交朋友完事情，嫖娘兒們，你敢怎的？”

他老婆一看賊六子惡狠狠的凶相，立時把醋勁吓跑了半截，沉了半天，才小聲說：

“你為辦事和娘們好，我不嫌，可，我怕你……”沒說完便臥在櫃上喔喔地哭起來了。

賊六子一見老婆哭聲不止，勁頭也小了，為難地啞了啞嘴，想上前去勸，剛走兩步，復又轉回來，打開剛從城里帶回的小布包，拿出一雙粉紅色的女襪和一瓶長脖細嘴的香水精，往他老婆跟前一放，拉着長聲說：

“你看看，我走到天涯海角也惦着你！”

他老婆當即止住哭，慢慢直起腰，向兩樣東西瞥了一眼，又扭過臉，埋怨說：

“誰叫你買這個，不知道花錢？”

“嗨！要不說你糊塗，”賊六子湊近她耳旁，小聲說，“若花自己錢那還叫辦官事。”他老婆一把抓起襪子和香水，在燈前擺弄着小聲夸贊了一陣，醋氣也就消了。

這一夜下了挺厚的雪，第二天賊六子還在被窩里，范泰就領一群人來了。

賊六子老婆將人們讓到西屋之後，便到東屋來催賊六子起床。賊六子故意不慌不忙地洗好臉，吃好飯，才招呼人們來見。這仍是上次找他進城的那群人，所不同的就是少了個王鳳山，換了個王玉老漢。大家進屋後，先向賊六子道了一陣辛苦。接着還是范泰先說：

“六先生，今天王玉老叔親來向你致謝，另外也來算這次的花費。”

賊六子守着炭火盆，邊喝茶水邊說：“這官司，真叫棘手啊！差不多我把全县的朋友都求遍了。”

這群人明知道賊六子奸滑，但人保出來了，總得說幾句好話。有人贊嘆道：

“哎，打官司就是玩命，沒听说官法如炉！”

“六先生的心意我家永远記着，不知这回花了多少錢，請算一算吧。”王玉老汉結記着錢的事，等不及，先提出来。

范泰上炕坐到賊六子旁边，拿起一張紙单念了起来。什么給县衙里这个官送礼，給那个官买东西，請这个紳士吃飯，請那个紳士打牌，还有什么說合人洗澡、抽大烟、看戏，再加上賠官款等等，最后大声說：“共花大洋二百元。”

王玉老汉长出了一口气，耳旁“轰”的一声，头就昏了，身子晃了晃就要摔倒，大家忙扶住他，劝道：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

“財是死的，人是活的，財去人安嘛！”

“……………”

賊六子說：“你們看，当初我就怕有这难处，你們一定叫我去办，結果他还是怕花錢吧！”

王玉老汉强打精神往前走了一步，对大家說：“諸位看着办，我有房有地！”說完，老泪花花地涌出来。

“你打算先卖哪块地？”范泰問。

“哪块都中。”王玉老汉答。

賊六子伪善地又叫了声大叔，說：“你別上火，咱既然站在一个王字上，我还能叫你餓着。你卖地或者卖房由你的便，这二百元錢得尽快归上，因为这是我从城里‘德聚兴’摘借的，不过，你西大道那七亩地，最好还是給我。一来我不少給你錢，二来前几年你借我的錢时我把地契

文书給你丢了，为这事我觉得怪对不住你。你看咋样？”

大伙又說了一阵，王玉老汉不同意也只得同意了。王保仁写好了文书，又叫王玉老汉在贼六子这黑紅明亮的炕桌上，擦上了手印。事情就这样算办妥了。王玉老汉搖搖晃晃走出王家大院时，大雪被橫風卷得到处乱飞乱滚，嗆得人出不过气来。

贼六子見人們都走了，便从柜里找出四年前王玉那地契文书，連新写的文书一起压进小木箱里，对着窗外茫茫的大雪，伸了个懶腰道：“啊，真是瑞雪兆丰年！”

烟 酒 宴

贼六子通过这次进城，更觉得出人一头高人一等，认为我王继亭不仅是守着算盘子发家治业的能手，对于进县衙混官面也不落下风了。这个阴險狡猾的家伙，办完这碼事，得意非凡，到他父亲那边討好去了。

他老婆通过这一夜追根問底，知道贼六子并没有真正的喜欢小白鞋，醋勁便一消而散，美勁便增加了，拿起她那脂粉和香水，重又装扮起来。她正对着大鏡子左擦右抹哩，他大嫂来了，撇嘴长声地訕笑說：

“汉子剛买来就擦起来了啊？”

“哦，嗯……”贼六子老婆扭过臉，“誰擦呐，我是試一試！”

“咋不好呀，我有这么个好汉子的話，也擦。”

“得啦，你那汉子賴？”

“唉，別提啦。”

賊六子老婆見他大嫂說的不愉快，便鄭重地問：“我大哥又惹你啦？”

大棒子的老婆先落了坐，沉着臉說：“前天有东村老王家托人来卖地，你那大烟鬼哥哥哼唧哈地不紧办，結果鬧的人情也远啦，地价也高啦。”

“你說了半天，这是什麼呀？”賊六子老婆問。

大棒子老婆又說：“你这快嘴娘們耳朵这么聾啊，东村老王家在咱們村西不是有四十亩地嗎，因为和我們的地挨边，說卖給我們二十亩。你說这有多好，可是你那廢物大哥沒有上紧，叫咱們老二知道了，他也沒和你大哥商量，暗中給人家每亩加了十元，誰知事情都沒办妥呢，老三又从城里派人来，又給人家每亩加了十元。人家卖地的戶一看咱搶着要这地，就开口閉口要卖高价。按理說这地我們就不应再买了，可是你那烟鬼大哥也上火，认为他們不仁我們也不义，說啥也要买。六孀，你看鬧得这象話嗎？唉！”

賊六子老婆边听边着急，我們为王玉西大道这七亩地，費了多么大周折，又打官司又告状，連汉子險些都被別的臭娘們粘住了。他們却不声不响得了个二十亩地的卖主。她把腮幫子鼓了几鼓，想要插嘴，但一想賊六子主意比自己多，就不敢过分逞能，只說了句：

“嘿，大嫂，可甬生这份气，发家置产的大事情，还是

多听男人們的好，再說亲哥們爭斗也不應該。”

大棒子老婆还以为是老六家同情懂理，又扯两句別的，走了。她出去不大会，賊六子气冲冲地回来了。到屋噉着嘴說：

“糟啦，咱这趟門出的丧气。”說完“咕咚”一声躺在炕上。

“你这是又生誰的气？”他老婆問。

“听爹說，东村老王家要卖地二十亩，大哥二哥和三哥都要买，唉，这样咱們沒指望了。”

他老婆一听他是为这事懊丧，故意在柜上拾掇了会东西，然后坐到炕沿上，把他大嫂剛才說的話，全倒了出来。賊六子原以为这二十亩地非落在他大哥手下不可，但听老婆这一說，知道自己还大有指望，嗖的坐起来，吩咐他老婆：

“你赶快操办一桌酒菜，我去請客人。”他老婆还在楞神，他匆忙地跑了。

他老婆只得同两个閨女和作飯的老費，立时張罗开了，一直忙到晌午，酒菜总算备好。賊六子領着大棒子哥哥和东村卖地的破落戶老王来了。賊六子让客人落了上坐，自己坐在側手，把着大底細脖的錫酒壶作陪。大棒子是烟鬼又是酒簍，东村这卖地的老王更是吃抽如命。这三个湊在一起，真是狐狗相会，他們既沒划拳，也沒行令，推杯換盞地死喝起来。喝到八分醉的时候，賊六子有意先說起他这次进城，遇到有的朋友怎样爱抽大烟，抽足大

烟后又怎样肯慷慨帮忙别人等等。一下子把大棒子的劲头提起来了，他撇着大嘴说：

“老六，我当哥的可不是愿叫你入大烟这个嗜好，不过抽大烟的人确有这个特性，只要为朋友，真敢说两肋插刀。”东村卖地这破落户也劲头上来了，他端着酒杯朝他俩让了让，一饮而尽说：“我这次卖地，”用手指比了个抽大烟的手势，“若不为此，为啥先卖给大哥呢？”

贼六子抿嘴冷笑着又让了一杯后，便从腰中掏出他刚准备好的一个小纸包放在饭桌上，“格支”一声打开说：“大哥你们看，这是我这次从城里大烟馆特意给你们买的。”

“啊，这是多少？”大棒子惊讶的问。

“小意思，二两。”贼六子又补充两句，“我是外行，好的话还有改日。”

大棒子同这卖地的破落户忙放下酒杯和筷子，用舌头在大烟上舐了舐，滴着馋涎同声说：“嗯，纯膏！纯膏！”

贼六子见他俩拉出馋涎，便又发动了一阵劝酒的高潮，话就归正题了。他用为难的样子说：

“大哥，我地虽比你多，但大部分是山坡河套，真正土质肥壮的没多少，老王既然要卖地，先给我怎么样？”

大棒子没吱声，放下酒杯忙抽烟。卖地的破落户忙显示说：

“村西我那是祖业四十亩，不管卖给你们哥俩谁，挑一半给我留一半就中。”

賊六子見这人总夸他的地好，大哥又沒慷慨地吐話答应，从心里有点反感，但还不死心，随口便說：

“你那地是不錯，可正因为好才卖給大哥婆，不过我知道大哥你俩的脾气，都是舍己为人的人。”說完又把三个酒杯斟滿。

大棒子喝下这杯酒，用手背擦了一下嘴巴，酒意不清地說：“好，老六你——既——提出來了，就让給你！”

賊六子心里“咚”的跳了一下，又装作鎮靜的样子，問：“大哥的性气我知道，办事是个急性人，今晚上就写文书过錢，中不中？”

“可以，可以！”

这頓中午飯一直吃到日落西山，賊六子一面叫他老婆繼續操办晚飯，一面把大棒子的大烟家具端了上来，連大烟帶茶水，就来了个車輪战。賊六子又叫这俩烟鬼过足了烟癮，便謹慎小心地先向卖地的破落戶試問：

“你那块地共多少？”

“不多不少四十亩，卖給你二十亩，还剩二十亩。”

“你給我哪一半好哇？”

“南边頂大道，北边挨着你大哥的地，你要哪边都中。”

“是呀！”大棒子酒气渾迷的說，“那地我——知道，沒軟沒硬，很平，你挑哪边——都一样。”

賊六子一聳肩冷笑着想：抽大烟的人当卖家产，如开春化冰，他这回卖这二十亩，早晚还得卖那二十亩。我若

要了南半块的话，北半块和我大哥的地挨着，下次他要卖，免不了还要麻烦。我这次若先要他北半块，就等于插在他俩的中间，他不论啥时候再卖，我可就近水楼台喽。想到这里，对他大棒子哥哥说：

“大哥，我还是要北半块吧，我好和大哥的地挨着，因为大哥素常的秉性我知道，一向对种地不爱过问，我呢，操心惯了，你的地经营的有个到不到的，我照料方便些。”说的大棒子呲着满嘴的黑牙乐了。于是他又对卖地的破落户说：

“我虽和大哥的地挨着，可不是外道你啊，从今后咱俩就是隔壁啦，麻烦你的日子，嘿，往后还能少吗？哈哈……”

贼六子说笑完之后，他们三人同声又笑了一阵。在这笑声中，狐狗分手了。

这一席烟酒宴花的钱，贼六子自然不肯自己掏腰包。当天晚上，他就着煤油灯，打着算盘，阴险地计划着如何把烈粮增加，让穷佃户加倍偿付这笔额外的支出。

“狼崽子”

幼江

一

老四王俊原象一头困在陷阱里的狼。当他一个人抽足大烟躺在炕上默想的时候，是可以咬钢吃铁的。他会逐一的把几个兄弟都比得不值一文钱。老三算什么？米蛀虫！最多也只是一手投机倒把、高利盘剥的本领。分家以后十多年间买进了六、七顷地，成了这一带头号大地主实在不稀奇。要是换作自己，嘿，手段定还要高明。老六算什么？贼奸鬼滑，剔牙挖碎，实在小器。虽然买了三、四顷地，成了村里第一尊大佛，但毕竟是小和尚念经，道行欠到。老大和老二，自然更不在话下。可是等到大烟瘾一上来，就什么都顾不得了。大烟枪屁股象个无底洞，每年四五十担租粮，被悄悄地、无声无息地装了进去。正因为他家后面开了这个大口子，随填随泄，家业始终象老乌龟爬路，旺发不快，只有一顷多地。

狼窝里终于养出了狼崽。他的儿子王维平，眼看二十好几了。这东西横眉竖眼，蛮干霸道，超过他爹，内藏奸诈，蓄意害人，胜过他爷。

这是从小惯出来的。

好多年前，王維平还小，有一回，他暗下从箱里把他爹好几块钱偷出去花了。大烟鬼一发觉，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是家里的放猪娃小黑干的，把小黑剥光衣服，跪在石头砣子上，要他招认。小黑自然不认，尽管两膝盖上鲜血直淌，还是一口一个不知道。王維平站在一旁，瞪着小眼珠，忽然上去狠狠一脚，把小黑踢翻了。大烟鬼很欣赏儿子这一脚，认为踢得有力气。末了，小黑被赶走了，儿子却得到了加倍的信任。

又一回，老爷子请了一批和尚来念经，说是要超度什么上代人的亡魂。中午，这批老和尚正在张嘴唾舌大吃素斋时，想不到王維平溜到法坛里，举起鼓槌“蓬蓬”几下，把大鼓敲了个洞。等到老和尚闻声赶来时，人早跑了。有人指指点点说是他闹的，他却歪着脑袋，叉着两手，蛮不讲理的說：“誰亲眼看見的？真是我敲破的嗎？胡說！”老爷子站在一旁，很欣赏儿子的霸气，末了摸摸胡子說：“我那維平看来是不会！”老和尚找不到禍主，只好自认晦气。

地主家的子弟长成以后，飽食无事，哪有不寻花問柳的。一天，王維平正在村口閑逛，看見有个年青俊俏的媳妇迎面走来。她虽然衣着破旧，头发蓬松，一臉哀怨，脚上还穿着替丈夫带孝的白鞋，可是就象山上的刺儿花一样鮮亮。王維平立即迷住了，心想：这娘們不錯，比咱家那黄臉婆强多呢！就不远不近跟在了后面。

这个年青寡妇姓張，在东村住。她前脚剛进門，王維平后脚也跨了进去。張寡妇善良軟弱，抹不开臉，明知道这头狼崽进来不会有好事，但还是笑笑打招呼：

“大兄弟今天有空来串門？”

“嗯！”說完，他連鞋也不脫就跳上炕去坐定了。

張寡妇有意冷淡他，拿起針綫納鞋底。可是王維平却沒事找事，东拉西扯，眼看天快黑下来了。張寡妇有点着急：“大兄弟，家里怕等你回去了！”

“不碍事，就在你这儿吃吧！”

“我这里啥也沒有呢！”

“吃啥都行！”

張寡妇还是磨磨蹭蹭不想动手。王維平忽然死皮賴臉地几步跨上前去，夺下她手里的鞋底說：“怎么？吃頓飯都舍不得？明天加倍还你还不行！”这种拿錢势压人的話，立即象蝎子一样把她的心蜇痛了。她呆呆地站着不知該怎么办。

王維平看到有机可乘，不管有人无人随着就是个大摟腰：“不做飯，陪我坐会儿总可以吧！”

正在这时，他老爹王俊原掀动門帘进来了。大烟鬼正过足烟癮，兴高致濃，一眼看見这个場面，鬼臉立即气青了：

“他媽的，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王維平开始的确有点尷尬。他真想不到这么一个标致寡妇，居然被他爹搶了先。他想走开，但不服輸，偏又

站住了：“吃頓飯都不行嗎？”

“吃飯？家里吃去！”他爹隨手在門后拿了根頂門棍，眼看就要打過來。

王維平平時雖說還有三分怕老子，但在這個時候，怕字早挪到一邊。他搶先把一碗茶水潑了過去，潑得大烟鬼的新大褂上斑漬一片；跟着又把炕桌一掀，骨碌翻滾在地。等到大烟鬼神清志定真要動武時，小雜種早溜了。

這樁丑事過去不久，一個早晨，大烟鬼正在吱吱燒着烟泡，小雜種進來了。

“爹，前天賣谷子的一百二十元錢，你拿出來，兩頭老佟家二畝三分好地要出，說好由咱家買。”

大烟鬼不吱聲，因為這一百二十元錢里，他已經瞞着家里人買了四十多元錢的大烟，要全部拿出來不可能。同時他更知道這分明是小雜種故意找茬。

“爹，你拿不拿出來！”

“不用你管！”

“我偏要管！”小雜種已瞪起了蝦蟆眼。

“他媽的，你真要管嗎？”大烟鬼說着就把放在大烟燈旁邊的一個水碗拿起擲了過去。

小雜種把頭一偏，水碗飛過頭頂，把放在立櫃上的玻璃鏡咣啷一聲打個粉碎。

這一回，小雜種是有準備的。他趕緊退出去，一會兒就拿來一支大槍，咯嚓一聲推上子彈，對準他爹：

“你拿不拿出來？說！不說就斃了你！”

大烟鬼这回可怔住了。他手里有啥呢？只有烟枪！烟枪怎么能和大枪对打呢！他原来就蜡黄的臉，立即变成了死灰；原来就有气喘的病，眼下更是上气吊不起下气，挺在炕上象段僵尸。

幸好大烟鬼那瘦得象干藤一样的老伴，和王維平的黄臉婆全聞声赶来了。婆媳俩一个拉一个劝。

“你这还象个人样嗎？对自己老爹能这样嗎？”“干藤”显然袒护着自己的老伴。

“你别生气，老人不对，咱有話要好好說呀！”黄臉婆显然袒护着自己的老伴。

一家人拉拉扯扯把王維平拉到了屋外，但是王維平用力一挣把他媽和他媳妇全掙到一边，又冲到門口，对着屋里大声吼叫：“告訴你，再迷着你那臭貨，家里掏空了，把你老骨头拿去喂狼！”

从这回以后，王維平更加得势，把他爹踩到了脚底下。一两年以后，他爹連病带气，老命归阴了。

二

死了老爹，王維平自然更抖了。他家原来除去吃租子以外，还自种六十多亩地，雇了两个扛长活的，直接从他們身上刮油榨水。他一当权，又雇来个十五六岁的小子叫小吳，燒火、做飯、割草、喂驴、放猪、推碾……有时自己排排場場地出去，还得跟在后面拿皮包当勤务兵。活

計排起队来，比他的岁数要多得多。每天从鸡叫忙到鬼叫，工錢是每年六元，几乎只是白吃飯。

他是一心一意想当官的，瞧不起六叔一个銅板攥在手里打三拳不放的熊样，也瞧不起同輩份几个叔伯兄弟王維藩、王維田等的碌碌无能。要当官，就要建立起“威信”，他在这一点上开动了脑筋。

那时候，四十里鋪村百几十戶人家，除去少数富农、中农以外，絕大部分住的都是七倒八歪的茅草屋。只有王家大院灰楚楚的大瓦房蹲在中心，風不搖、雨不动，張嘴舔舌象只黑老虎。在它左边的一間破草屋里，住着王功一家。老两口都病着，三四个男孩女孩餓得哇哇叫。一天，王維平路过看到了。他脑子一轉，有了主意，一到家，放开粗嗓門，象打鑼一样吩咐长工打头：“老常，快把咱小米灌一斗，送給老王功家，老东西病得头浮脚肿不象人样了！”老常一向十分精明，主人家的一举一动，他都能察出耍的是啥花招，这一回，也鬧迷糊了。但向自己的穷伙計送粮，总是好事情，他于是量了滿滿一斗，装了一口袋背在肩上就想出門。迎面被黃臉婆拦住了，“老常，你慢点！”

黃臉婆是滴水不漏的管家婆，平时待长工連园里拔根大葱都舍不得，过年过节給长工吃碗肉，象从自己身上割下一样痛。如今一袋小米扛出門，她怎能不急！但她怕男人，不敢当面頂撞，只得在屋里轉了几圈，悄悄湊上去問：“送人嗎？穷鬼們口象簸箕大，你能填得滿嗎？”王

維平却瞪起眼睛：“你知道什么！”說完，向正站在門口的老常一揮手：“送走！送走！”老常立即一迈大步走了。

王維平是有自己的打算的，面子要掙，實利不丟。送走了糧食，他大步跨到賊六子家：“六叔，老王功兩口子病得快咽氣了，咱們不能見死不救，我已送去一大斗糧，各戶均攤吧！”

賊六子睜睜眼皮，倒抽一口涼氣說：“我，我自己這幾天都緊緊巴巴呢，哪有糧！”

“這鬼話騙不了我。你有，要攤；沒有，也要攤！”

他又跑到另外幾家，嗓門拉得很大，調子也唱得很高。誰知另外幾家也各有各的打算，都不願攤這筆“冤枉糧”。最後，他火了，站在當院，象訓賊一樣：

“你們這批王八蛋，操你媽，一個個只知道望自己腰包里裝，見死不救！”

那年，老爺子已七十多了，腰彎得象老蝦公，孫兒一聲聲罵到他頭上，不能不出來說幾句：“維平，為點啥？”

王維平自然理直氣壯地說了一遍。老爺子這點門面是不能不裝的，摸摸胡子說：“咳，小意思，別鬧啦，咱老份出！”就叫人灌了一斗糧，送了過去。

住在村東頭的茅屋里有兩戶貧農，一戶叫佟瑞和，一戶叫佟瑞明，叔伯哥倆。

佟瑞和的老伴病在炕上已個把月了，為了治病實在急需錢用。兩人商量着向誰告借。

佟瑞和摇头叹气地说：“咳，明知是刀山也得爬，油锅也得跳。咱老辈留下陈家湾还有七亩地，用地契托押向王家大院借吧！”完了，又补了句：“听说王维平最近给王功家送去了一斗粮。看来，这人就是脾气暴些，高兴起来还是肯帮助穷人的。我想向他家借。”

佟瑞明比较老练，他想了想说：“大哥，借钱自然只好向王家大院借。但要说王维平高兴起来肯帮助穷人，我不信。东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就不吃人吗？别的不说，单是前几天老范家挨罚的事，就叫人寒心。老范为了要脱坯换炕，自己没有半分土地，偷着在他家地里掘了半车黄土，被他看见，连铁锹都夺走不算，末了还罚了两块钱，这不是做绝了？这样的人，哪会安好心！”

哥俩商量到半夜，仍然没有好主意。他们把王家大院几家地主逐一数下来，不是太奸，就是太滑，或者是又奸又滑。结果只得依着佟瑞明托人向王维平家告借。

这一天，雨后新晴，打头老常带了好几个短工薅苗除草去了。王维平也跟着去察看。一到地头，他就生气了。原来这块地紧挨着他六叔贼六子的地。贼六子一向有个贼脾气，凡是他的地，地边上的界石总要尽量踩得弯到人家地里去，今年踩三寸，明年踩五寸，两三年下来一尺多地皮就占过去了。地边上的一两行庄稼，他一定要自己点种留苗的，为的也是尽量向人家地边上扩展。这对王维平来说，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他是不管什么六叔不六叔的，立刻起了个歹主意。那时候，高粱苗都一尺多高了。

他沿着地边的一行走去，随手把贼六子的高粱苗的心一株一株都抽掉了。从东头抽到西头，看看还不解气，回过头来又从西头抽到东头毁掉了第二行。这才得胜的走了。

刚走回到村头，就见黑压压一堆人围着瞧热闹。他分开众人挤了进去，只见一个小女孩牵着一个走江湖卖艺的瞎子，守着一个“号头戏”在唱（那时留声机很粗糙，上面装有一个很大的号头，所以群众叫它“号头戏”），咿咿呜呜的声音，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他感到新奇就凑上前去，来势又猛又急，把瞎子挤得几乎栽个跟斗。“号头戏”里有个小盘，嗞嗞嗞转得飞快，他越看越入迷，不觉说了句：“这盘怎么这样小哪？”

瞎子正生这个莽撞家伙的气，同时又看不见，也无须惧怕眼前站着的究竟是牛头还是马面，就顶了句：“锅盖大，能唱戏吗？”

“哈哈，”四周的群众全都大笑起来。

这一笑，把王维平笑恼了。他捋捋手臂想发作。可是一看四周这许多听众全愤怒地瞪着自己，就泄气了，只得又分开众人挤了出来。一路上，他越想越不是味，回过头来，又挤进了人圈。这一回，他是有意寻事了，站在“号头戏”前高声吩咐道：“声音太小，开得大一点！”

瞎子一听，又是刚才那个捣乱的家伙，心里也有气，就又顶道：“老黄牛叫声大，好听吗？”

“哈哈，”四周的群众又都大笑起来。

这笑声象是示威，使王维平气得眼里喷火。但是，群

众密密麻麻圍着象座城，他还是不敢发作，只得憋着气，冲出句：“好吧，你等着瞧！”就分开众人头也不回的走了。

其中有几个上了年紀的人，怕出事，冲着瞎子的耳朵如此这般說了一番，瞎子也吓住了，赶紧关了“号头戏”，叫小女孩牵起赶路。几个好打抱不平的小伙子主动护着他俩。

瞎子和小女孩剛走到村口，王維平手里提了支大枪赶来了。他举起枪想放，但看到前面有人保护，后面有人監視，手还是軟下来，只得虛張声势的罵了句：“操你媽！”

这天晚飯后，王維平不断生着悶气，直到范泰領着佟瑞和来借錢，嘴角上才挂起了笑容。

老佟家要借錢，說完以后，他早已想好了一个歹主意。等到写好了借据，要过了七亩地抵押的文书，才从箱里取出一包錢交过去說：“老佟，你当面清点一下！”

佟瑞和抖抖索索的接过票子，一張一張点过去，只有七十二元，他急了：“少先生，我不是向你借八十元錢嗎？”

“七十二元加上三个月的利息，不就是八十元錢了嗎！”

“利息也要到期才能付呀！”

“預扣三个月，这是我家的新規定，这叫‘出門三声炮’。”

佟瑞和顫声說：“少先生，我求求你，这回不要这样扣我！”

“什么这回那回，不行！”

范泰这头老驴也插进来了：“三个月转眼就到，先扣下不一样吗？”

“这样……我……不借了！”佟瑞和知道上当了。

“借钱是开玩笑的吗？现在你要不借也不行！”

范泰随即连拉带劝：“看，少先生生气了，钱拿到手就得了呗，走吧，走吧！”说着，把佟瑞和推了出来。

就在这一年，佟瑞和老伴病过以后，自己又病，庄稼又遭灾，象碾盘压在身上翻轉不得。本钱没法还，利钱清不了，本上生利，利上滚利，不上两年就变成了一笔大数目。他只好将这祖辈传下的七亩地卖给了王维平家。

三

王维平又凶又霸，他媳妇又尖又刻，不上两年果然买了好几十亩地，家业比他老爹在世时迅速旺发了。可是好景不长，抗日战争起来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成了八路军常来常往的游击区。王家大院这伙牛鬼蛇神立脚不住，全都决定搬到遵化去。

临走时，各家都挖空心思，对如何保住家业，继续剝削四十里铺的穷人，作了阴险的布置。王维平看中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家的打头老常，一个是老实巴结的穷要饭王生。老常对庄稼活计是一员能打会算的闯将。王维平对他就体体面面的商量：“咱一东一伙这么些年了，锅盆碗筷总有磕碰的地方，这些咱们一笔勾销。今后我家

地里租子啥的，劳你多照应着点，秋后我一次来取。我不会亏待你。你家租种的几亩地，今年租子就免了，以后再說。我家有搬不动的东西，你只管用好了……”說着說着，还是露出了狼性：“嘿，他媽的，誰要是动王家一根毛，我可不客气！”

王生是个被穷困压得吐不出气的人，王維平对他就再欺压一番：“你眼下住的是咱王家的窝棚，看的是咱王家的場园。咱王家拔根毫毛也抵得上你一条粗腿。以后看管經心着点，如有损失，不来报告，唯你是問……嘿，你張眼看看，土八路成得了气候嗎？”

王維平到了遵化以后，官癮更大了。在伪政权下是魔鬼的天下。誰枪杆子硬，就站得住；誰能无耻叛国，就爬得上去。这正对了王維平的胃口。沒有几年，果然爬上了伪治安軍区团长的职位。

臭水缸里翻来滾去，都是陈渣烂滓。

王維平手下，不久就象个大臭水缸。邻近村里的反动地主、流氓、地痞、浪蕩鬼、黑心贼，全都聞臭而至。他呢，只要来的人有狼形狗性，肯做日本鬼子的奴才，总是有求必应。反正区团里有的是名額，多补一名团丁，他当团长的就多一分油水。

但是他也有一套籠絡人心的手段，就是叩头拜把，大讲反动的“义气”。

他自己有个最要好的把兄弟叫王汉臣。王汉臣是环庄的恶霸地主，和王維平家是故交。但他俩所以把兄长

把弟短，好得象同穿一条裤子，倒不是因为故交，而是臭味相投。王汉臣有一手很突出的舔屁股的本领。王维平要迎奉上級，他会体情察意早把礼物准备好；王维平要出去“扫荡”，他会挖空心思提供情报；王维平要嫖女人，他会拉皮条；王维平要敲榨，他会当狗腿。一句话，他是王维平十分称心的侍从副官，加上他为人阴险奸诈，诡计多端，常常又是王维平得意的参谋。

一天，两人又在王维平的相好外号“白玉霜”的坏女人家喝酒。

王汉臣讨好说：“大哥，咱要是想法拔去两颗眼中钉，往东的一路就会太平无事了。”

“哪两颗？”王维平因为狗肉吃多了，直打饱嗝。

“一颗是你们四十里铺的办事员佟瑞明；一颗是咱姚家峪的办事员陈大有。这两颗八路军的钉子，一个安在山北，一个安在山南，咱南北的通路就被掐死了。”

“唔，有理！你不提倒也罢了，一提起四十里铺，我他妈的牙根都能咬碎。咱王家搬到遵化以后，开头一两年还好，租子什么的能收个差不多；土八路一来，搞起什么二五减租，合理负担，穷鬼们就变心啦！如今更闹起民兵武装，日窜夜扰，皇军头痛不说，咱王家就倒了血霉，租子挂起，祖山上的树也被砍啦；过去见到咱连气也不敢吭的长工、短工、穷看场、放猪娃，全都抖啦。我临走时这一番安排，心血全都白费啦。真正是他妈的……”

王汉臣这狗头一听，知道他那个团长大哥的气，全泄

在四十里鋪了。这不是他的目的。他日夜寻思要零刀碎割的，是曾經狠狠斗争过他的陈大有这一伙人。刚才同时提出来，不过想一箭双雕，既报了自己的私仇，又討得团长的欢心。如今眼看双雕不成，要变成单雕啦。他于是低头又一捉摸，有了新的阴谋。

“大哥，……小弟倒有个好計……”王汉臣有意說得很詭秘。

“什么好計？”王維平酒喝多了，两眼血紅。

王汉臣于是凑上去，冲着耳朵：“这两人啊，咱都要干掉。咱先把两人的罪状編得严重一点，就說他們活埋了咱多少团丁，破坏了咱多少公路，砍毀了咱多少电綫等，向皇軍上告，皇軍一定会暴跳如雷。然后咱們秘密偵察好两人的行踪，报告皇軍出其不意前去‘清剿’，一定能够大功告成！”

“八路軍神通广大，这些办事的人也象长就順風耳、飞毛腿一样，怕不容易偵察吧！”

“这个，大哥你不用担心。四十里鋪的事，咱要王树仁偵察。这东西自从被划为富农以后，一直和穷小子們在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咱們花上笔錢拉一拉，事成以后又答应发給他几百元奖金，准能听咱調度。姚家峪的事，咱要地主楊玉沛偵察，这狗头挨过八路軍的斗，咱只要答应給他伸冤出气就是。”

“好，你真想得周到！那么暗下联络誰来担任呢？”

“这个，大哥，我也想好了。四十里鋪的联络找王凤

春，这小子到咱团里不久，回去几趟不显眼；姚家峪的联络，小弟我暗下注点意就是。”

“好，好！你老弟真是‘智多星’！来，咱俩再干上几杯！”

这时“白玉霜”穿着花旗袍，扭着腰肢进来了。她娇声细气的说：“唷，你俩怎么老喝闷酒？咱来几段小曲吧！”

“行！”王维平、王汉臣同时叫好。

留声机打开了，咿咿呜呜唱出了不堪入耳的黄色歌曲。

随着高低抑扬的歌声，王维平拿起筷子狠狠敲着盆沿打拍子；王汉臣用皮鞋后跟蹬着地板，灰尘扑扑乱飞。

歌声刚住，王维平喊道：“再来一个！”王汉臣却油腔滑调的说：“眼前有花，大哥怎么不赏？死唱片哪有咱白大妹子的嗓子甜？”

“白玉霜”故意扭扭捏捏的骂王汉臣道：“死鬼，就数你爱嚼舌头！”但未了她还是喝了半口酒，清了清嗓子唱起来。

刚唱完，王汉臣赶紧递上一盅酒：“大妹子，慰劳，慰劳！”完了，他故意低头看了看戴在手上的破表，冲王维平嘻皮笑脸：“大哥，时间已经不早，我走了！花好，你俩的月也该圆了！”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王维平在团部里为新来的伪遵化新民会张特派员接风。伪新民会是他起家的靠山，特派员前来哪有不恭敬奉候的道理。酒席是山珍海味，

应有尽有。这和敌占区人民吃糠嚙菜都难填饱肚子，恰成鲜明的对照。

这一群狐狗凑在一起，臭味更冲天了。王維平刚敬过酒，張特派員晃着扁脑袋也举起了酒杯：“兄弟这一次来，多謝王兄雅意。这一杯，祝王兄指日高升！王兄为皇軍立了大功啦！四十里鋪的八路軍办事員佟瑞明，根据贵部密报，皇軍捉住以后，前几天已在城里枪决了。嘿嘿嘿，这是对当地八路軍的一次莫大的打击；敝会上下，还有令叔令弟等，在城里听到都非常的称快呀！嘿嘿嘿，干杯！干杯！”

正当杯盘交錯、划拳行令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被派出去刺探消息的团丁王凤春回来了。这小子衣服扯得稀烂，据說是从山間小路連爬带滾突出的。他几回晃到大厅前想找团长报告，又都不敢，及至酒散了，客人走了，才找了个机会。

“团，团长，大事不好了！”这小子到这时两条腿还在打顫。

“什么？”王維平酒被吓醒了，“你他媽的怎么这样着三不着两，詳細說說！”

“王，王汉臣大哥，被抓住，枪，枪毙了！还有四十里鋪的王树仁也被抓去，枪，枪毙了！四十里鋪新的办事員王国藩，武装班长杜奎上，上台了！他們要为佟瑞明报仇。两人好，好厉害哪！我，我也差一点儿完，完蛋了！……”

这个怕死鬼几乎連話都說不成句了，鬧了半天，王維平才弄清事情的始末。

原来四十里鋪的王树仁自从出卖了佟瑞明以后，立即被八路軍釘上了。他們在佟大嫂的协助下，終于破获了这个案件，把王树仁逮住法办。王汉臣因为邀功心切，偷偷潜到了环庄、灰岭子和姚家峪刺探，也終于被陈大有帶領民兵截获。由于证据确凿，他抵賴不了，也被八路政府处决了。

王維平在屋里轉了好几圈，酒全吓醒了。他想来想去，四十里鋪的穷鬼无疑是他王家的死对头，只是目前情况不明，无法再下手。叩头拜把虽說是句空話，但王汉臣一死，自己象失去一条臂膀，也实在痛心。为了拉攏下屬，討好上級，这件事不大干一下无法交代。他于是象很决断似地吩咐道：“你明天再化装到姚家峪去，限三天內把陈大有的活动情况弄清楚，回来报告！”

到姚家峪去要經過四十里鋪。王凤春今天出来时，几乎被杜奎帶領的民兵截住。他魂灵一半已飞上西天。如今要他再去，岂不是向閻罗王拜客。但他一抬头，团长的虾蟆眼已瞪上了，推是推不了，只得想法滑过去：“报告团长，我实在肚子痛，不能去！”

“他媽的，怎么剛才不痛，現在忽然痛起来了呢！爬着也要去，不去毙了你！”

这一回，王凤春連姚家峪的边也不肯沾，只站在远远的山上瞧了几眼，就钻进一个破鞋家里濫賭了三天三夜。

完了回去，却謊話編了幾籬筐，說自己如何如何深入去偵察，如何如何被民兵釘住，又如何如何机智地逃了出来等。結論是陈大有十天有九天不在家，要捉他难、难、难！王維平开始倒真信了，可是过后細細一分析，就觉得漏洞百出。他憤怒起来，把王凤春狠狠抽了几十皮鞭，关了禁閉，另外又派了两个狗腿，扮作小販去偵探。隔了几天，終于探得了确实消息：那晚，陈大有因为老娘病重，在家。这回，王維平什么也顾不得了，向远在遵化的上級，胡編謊騙了一通，就决定自己領兵去“清扫”。

半夜出发，天明以前灰鬼子果然包圍了姚家峪。

天一亮，灰鬼子就砸門搗戶，搜捕搶掠。王維平亲自領人搗毀了陈大有的屋門，里里外外，全搜尋遍了，就是找不到陈大有。他一手提着盒子枪，一手拿着馬鞭子，虾蟆眼气得血紅。看見陈大有只七八岁的小丫头抖抖索索站在門边，他上去狠狠一馬鞭子，抽得她嘴鼻流血，嗚哇直哭；看見陈大有的病老娘縮在炕头，上去狠狠又一馬鞭子，抽得她昏死过去。陈大有的媳妇急了，冲上去說理，被他狠狠又是三馬鞭子。咯咯咯，老母鸡被鬼子捉住宰了；蓬蓬蓬，酸菜罐子、豆酱缸子、煮飯鍋子全被搗碎了。只那么一頃刻工夫，这个家就被毀得所剩无几了。在同一时候，村里的其他各戶，也遭到了类似的洗劫。

原来陈大有这一晚倒的确是在家的，只是他警惕性高，早在后門布置了一条秘密退路。外面一有响动，他就逃走了。这时，正在村里一家貧农的地窖里藏着。

沒有捉住陈大有，王維平怎么也不解气。他要部下用刺刀比着，把村里男女老小驅集到村东的大坑里，四周架上机关枪，揚言不交出陈大有，要杀得一个都不留下。

这样的場面，村里人已經经历过不止一次了。尽管王維平咆哮着說这說那，大家却全都愤怒地瞪着眼睛。看来，要从他們口里挖出陈大有，和村里民兵的实况，断乎是不可能的。

这一招不灵驗，王維平真个下毒手了。他要部下把村东头的好几座草房点起来燒，揚言再不交出来，先燒房子，然后斬草除根，全部杀絕。

陈大有躲的地窖和外面是相通的，外面鬼子的活动，自有这家貧农的老大娘向他报告。当他听到許多老乡被圈到东大坑受罪，心里象針扎一样难受；当他听說鬼子已經开始燒房子，再也耽不住了。他立即爬了出来，老大娘怎么劝都劝不住。只听他斬釘截铁地說：“我大有是共产党员，不能叫人家代我死，不能叫人家为我弄得无家可归……”說完，戴上頂破草帽，大步往东走了。一到村口，就被两个灰鬼子拦住。

“干什么的？”

“我就是陈大有，怨有头債有主，你們不是要找我算賬嗎？这和別的老乡毫无干系，不能胡来！”

两个鬼子被这种正义的吼声怔住了，相互嘀咕了好一会，才把他帶去見王維平。王維平叫人一认，果然是陈大有，也怔住了。但只一会儿，他就发瘋般高喊：“捆起来！”

捆起来！”

被圈住的老乡目睹了这件事，全都轰隆轰隆发出了怒吼，由于机枪和刺刀擋住冲不过来，末了还是被驅散了。但大家的悲憤却埋得更深了。

陈大有就在当天被王維平带到了伪軍团部，受到了严刑的拷打；第二天又被押送遵化，受到了苦刑的折磨。但他始終表現了我八路軍工作人員高尚的品质，不向敌人低头屈服，保住了党的机密。

过不多久，陈大有就在遵化英勇就义了。

王維平就这样对人民再一次犯下血腥的罪行。

四

历史的车輪终于压碎了一切反动分子的梦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吞吃了胜利的果实，王維平搖身一变，成了国民党里的反动軍官。直到遵化解放前夕，王爹大院这伙牛鬼蛇神才都象热鍋上的螞蟻。王維平先逃到难民所，一看風头不对，又搖身一变变做商人逃到北京干起小买卖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污秽垃圾能藏得住嗎！

一九五三年，我严厉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間，由于烈士家屬的告发，也由于群众的检举，终于把这条毒蛇掘了出来。

同年秋天押回村里当众枪决了。



第四部分

建明社頌

1
2
3
4

5
6
7

建明湖

——建明公社山山水水片断

田 間

建明湖这条湖，又叫接官厅水庫。它是在群山的中间，在半山的上面。远看象一片碧綠的树叶子，近看又象从天上抛下来的一面大鏡子。

站在最高的峰頂，往下一看，这一面鏡子，又象是悬在半山。这一面鏡子，它不但反映出一部穷棒子社的历史，也反映出公社的未来，它不但可以看到群众的集体智慧，也可以看到党和公社不可磨灭的光輝。

一部穷棒子社的社史，充滿了多少斗争呵！正象湖中的波浪，此伏彼起，一串串，一朵朵，奔流不息，从烈士的胸中，到子孙的心窝，从志士的手中，到后代的道路，因此，我为这建明湖写一小記。

这一小記，与其說是写湖，不如說是写山，与其說是写山，又不不如說是写劳动者、建設者的汗花汗珠。一山、一石、一树、一湖，当它閃光的时候，当它穿过風雨的时候，总是山呼、石語、湖唱、树舞，在集体的道路上共同战斗下去。

这里有一条长长的弯弯的小谷，峪口有个村子，有接官厅、有白馬峪。

过去白馬峪，傳說有一对金鸽子，这一对金鸽子，穷人可是沒有誰見過。自从公社化以后，有人說，金鸽子飞来啦，飞到了建明湖。过去白馬峪之所以叫作白馬峪，說是村边的那座山，原来是一匹白馬，一直臥着不起，現在由于“三泉合一”（把山上的三条細泉，汇合成一条大的渠道），由于“引水过桥”（在山峽之間架起过水的木桥），由于“揚水站”（从山下“社会主义大井”引水上山），由于有了建明湖，我們看到，附近的群山，真的象白馬似的，仰着脖子想来饮水哩。

是的，山活啦，水活啦。紧靠在建明湖大壩前后的石头滩地，人們从远处担来土，要把它变为稻田。这不是空想，这是事实。峪上已有四十亩薄沙地种上了稻子。几千年的山区，种上稻子，可以說这是公社的产物，这是湖的貢獻。

白馬峪这个村子，有一戶要飯的，是村里第一戶盖起新瓦房。亮堂堂的几面白墙，多么象春天开的梨花瓣，开在村子的中間。当新瓦房初盖起来的时候，村里有些人都很驚訝，甚至有說他在路上拾到金条了，否則一个穷棒子怎的能盖上新瓦房。

这一切都說明：合作化、水利化的胜利；这一切又都說明：我們党的領導，以及階級斗爭、生产斗爭、科学实验三項偉大的革命运动，在我們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闲言少叙，話归正文。我們来簡單介紹一下建明湖建設过程中的一个片断。

走进山谷的峪口，我們就看到，半坡上、石头滩上，有一片栗子树，树枝上挂着黄色的长絨花。从这个大栗树林，再往上走几步，就是建明湖的一条大壩，橫立在两山之間。大壩上有斗大的三个大字：“建明湖”。

这座山湖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到七月开始建的。第一期工程，已有一定的規模。一九六〇年又加工，最后完成。这个工程是几个公社的一项大合作。中国历史上，村与村之間，上游与下游之間，水利糾紛，历年都有。如果不是人民公社，打破了地界的死視道，为发展集体經濟开辟了大道，不用說兴建水庫，就是上下水的糾紛，也不易彻底解决的。

今日的湖水，正从千家万户門前过，象大家自己身上的一条血脉，和自己的骨肉不分。因为它是一条大路，——一条集体的路。

一九六〇年，这里的麦子很好，因为澆了两遍水，小麦产量一百九十斤，比起那澆不上水的多一倍。其他的大秋作物和棉花产量，都提高不少。种稻田四十亩。下游一千四百多亩地免于水患，保证河道两岸接官厅、王老庄等七八个村子的安全。

一九五八年，水庫兴建最緊張的日子里，正当汛期雨季快要到来的时刻，当时大壩还没有落成，庫里的水，就逐渐上升，由十四米三，漲到十五米六，三万条麻袋堆在

大壩上。工程總指揮謝洪勇書記（當時是鷄鳴村區委第二書記），這時想，如果攔不了洪，問題就大啦，別的且不說，光是鄰近幾村就會被山洪掃平。

就在這時，縣氣象站預報，將有大雨來到，要連下兩天。謝洪勇就和他的助手張正民說，溢洪道落后一步，沒趕上去，此刻要發動合理化建議，鼓起更大的干劲。就在這時，在大雨之前，溢洪道完成計劃三分之二。天陰了。第三天的早上，大雨嘩嘩，河槽里積滿了洪水。

這時許多民工又都住在山口的接官廳村，被山洪阻擋了，過不來，河灘上，河溝里，幾十分鐘之內，水有三米深。有人提議，用一根大繩子拴到兩邊，好扶着繩子過河。可是流水太猛，也太涌，人怎麼能走過來呢？有一位年青的工人，是工地上的鍋駝機手，就在這緊急關頭，他面對激流，他身担風雨，他自報奮勇，恨不得一步跨過來，他第一個扶着繩子沖過激流走過來了。

水庫里的水，漲得更高了。瓢潑的大雨，從早上到中午一直沒有停過。大壩上，草袋垛到三層，並且還在繼續往上垛。

謝洪勇立在風雨里，大聲疾呼道：“不能停啊，繼續干。”又喊着：“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們要更勇敢，要保護接官廳村的生命財產。要不然，就前功盡棄。”這時他的助手張正民眼里激動得噙着淚珠說：“八百人的生命在我們手上，我們能不能保得住？”

“中。”工人們回答，“我們決不在困難前面后退，誓死

保卫大壩！”

草袋垛到六层。水庫里的水，漲到十四米三，多么緊張的一刻。几天以来，大雨昼夜不停，人們都筋疲力乏。大雨一連下了两天两夜。謝洪勇已通知接官厅群众搬了家，群众已搬到山上了。

就在这时，二十三戶的一戶，“穷棒子社”的好汉、得过多面紅旗的旗手——杜奎，帶領公社机关干部，东西四十里鋪、大于家沟村等来的一批精壯勞力，赶来增援，他們由炸糕店翻山越岭，及时赶到，突击开出溢洪道，大堤上，水已齐膝盖，人都站在水里，危險之极。他們来开出一米深、一米寬的泄水沟，水就沒有再往上漲了。

忽然之間，大壩塌了一块，有一米見方的窟窿。巡邏人一見，以为是决了口，馬上放了三声枪（事先規定的信号，如果大壩决口，就放三声枪）。群众一听見枪声，突然又緊張起来。謝洪勇以勇敢沉着聞名，这时他对他的助手說：“咱們俩亲自去看看。”一看，果然不是决口，而是塌方，原来是从側面渗透出来的透水的地方，塌了一片。于是立即組織力量就把它堵住了。群众安定下来。

水庫的工程，一共是一百七十二天。謝洪勇一百五十天都在大壩上，未离过大壩，这些忠心耿耿、脚踏实地、身在前綫、又肯动脑筋的指揮者，以及广大群众，終于筑成建明湖这座大壩，筑成一座新的銅墙铁壁，使它沒有一个暗洞，不漏一滴水。人民公社移山倒海的奇迹，于此可見。由此也看到，“真正的銅墙铁壁是群众”。

穷棒子精神——不穷！
长流不息的山湖——不穷！

一九五八年，我写过一首题名《赠穷棒子社》的小诗，我又补写了几句，把它抄在下面，表示我对这个社、对这个集体的一点祝贺：

一

穷棒子社山不穷，
穷棒子社手不空。
柴山原来是宝山，
上山就能攀彩虹。
西铺山上摘果子，
社红果红心也红。

二

河有源呵山有峰，
穷棒子精神向前奔。
革命才有幸福种，
跃进才能攀高峰。
“蜜蜂”我托你捎一首歌，
把它送给不老松。

英勇奋战到最后一刻的人们，敢于承担了劈山造海的大业，在大山里，在公社里造了湖，“穷棒子”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一句话说来，他们是新愚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的新愚公，这些人物美好的形象，将永远映照在青山绿水之中。

有青山为证，有绿水为凭，青山洋洋，绿水盈盈。小船系在湖边，鱼儿游在水心。

解放以前，这儿流行这两句歌：

穷人眼前路三条，
逃荒上吊坐监牢。

革命的激流，早已把穷人这三条路冲掉了。穷棒子们不但有了新的路，还有一座新的湖。

没有上天摘星星的本事，
就别想赶上我们。

阶级敌人他们唱的这种“高调”，也被革命的激流冲跑了。并且我相信它还要被冲到建明湖，最后把它冲到湖底。

1963年8月记

“老打头”

刘哲

閻家屯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繆海山，外号人称“老打头”。

提起“老打头”，他往往联想起自己十五岁上给地主扛小活的一段事。说是“小活”，实际干的是大活的事。人家榜一壠，他不能少榜半根；人家割一亩，他不能少割一分。这哪噲得了呀！累急了，他就小声嘟囔前边那个“老打头”，“这是抢丧呢！前边有你的棺材板呀？”可心里也知道这哪能怨“老打头”呀——你不見，老地主站在地头上，正賊眉六眼地瞪着长工們干活呢！就这样，他既恨透了抄着手不劳动的地主，也对那个“老打头”沒留下多少好印象。

到了新社会，他翻了身，当了干部：先是农会主任，后是村长；农业合作化以后，又当生产队长，又当村党支部书记；劳动，工作，处处走在前头。人們初呼他“老打头”，他还觉着怪扎耳，以后慣了，倒觉着挺順耳，心想：“当个人民的‘老打头’，不很光荣嗎！”

有一年夏天，正是榜二遍玉米的时候。那时，全村一

百几十户还是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分两个生产大队，老支书兼着一队的队长。有一天耨玉米，他听说几天预报有雨，心想：“这要紧紧手，把地麻利耨出来，大雨一灌，粪一吃劲，玉米就能呼呼地往上长！”在这个紧要的当口，他清楚地知道书记必须带头，话说千遍，不如动手一干。于是，上工后，他头不抬，腰不直，气不喘，脚不乱，霎时间，象匹善走的快马，刷刷刷，窜向前去。老支书正耨在劲头上，忽然听到身后一片嚷叫声。他猛一惊，直起腰回头一看，嗨哟，地里象撒了羊群啦，东一个，西一个，把人们拉了一地。

“老支书，你长了飞毛腿啦！”

“今晚上不去炕，找你算账！”

“拉垮咱们，明个让你一个人来干！”

老支书瞪着人们嗨嗨一乐，粗声粗气地说：“紧把手干完，明个下雨，咱批准你们放假一天！”

“下雨还要你放假！”

老支书不管后面人们说着闹着，一头扎下去，再也不抬起头来了。年轻小伙子们也来劲了，喊一声“追！”嗷嗷喊叫地就追赶开了。

这一天，三十多亩玉米，就在老支书的带头下，全耨出来了。

人民公社化以后，整个阎家屯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穆海山也就成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这些年，不管工作多忙，多累，他从来没有脱离过劳动。

夏去秋來，百草結籽，正是割墊腳（即割荊梢）、壓綠肥的好時候。長峪山這地方，沙多土少，石厚土薄，是出名的貧瘠地方。俗話說：“薄地怕富漢”，這裡的庄稼，純粹是用糞堆堆起來的。每年，除靠豬、羊、大牲畜常年積肥外，夏末秋初割墊腳，就是肥料最主要的一個來源。

這年，春大旱，夏少雨，近處山上的荊梢都沒長起來，要割墊腳，就得要到二三十里地以外的什麼秋花峪、馬蜂峪等遠山里去割。生產大隊早就開會作了布置，可是，各生產隊總是遲遲沒有行動起來。

說起割墊腳，這確實是件苦差使。每逢上山的日子，半夜起來做飯，雞叫就得起身，走上幾十里地到了山上，天才放亮。沒有經驗的，在那高山陡岩上，一蹶一出溜，別說割，站住腳跟就算是好的。太陽一上來，那就更苦了。夾溝里沒有一絲絲風，整個山溝就象一架大蒸籠，又蒸又烤，死水汗流。却找不到一滴滴水喝。所以，提起割墊腳，壯小伙子都懼怕三分呢！

老支書想了又想，覺得吃苦在前是共產黨員的本分，要迅速行動，不如自己掛帥。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上山的頭一天晚上，老伴擔心地說：“你這大年紀，老胳膊老腿的，上山能中呀？”兒媳婦也在一旁幫腔說：“爹，這樣的重活，還是讓年輕人去吧！”老支書扑搥扑搥眼睛，沒說什麼，只是重復囑咐了一句：“你們快睡吧，明天還起早做飯呢！”老伴和兒媳婦一看，就知道再說也沒有用了。

第二天清晨，人們走在道上，大隊幹部和社員們又議

論开这事了。大队长說：“老支书，你留家照看照看家里，多动员些人上山，不比亲自出馬强呀？”

“你让我癩子打圍——光坐着喊呀？”一句話把大队长頂得沒話說了。

有个年輕社員又搭腔了：“老支书，干別的你中，干这个怕不中委！你噲不住这累呀！”

“累？从前給地主扛活累不累呀？沒有享不了的福，也沒有受不了的苦！別看我老了，你們这伙小青年还不在我眼里呢！不信，咱們比試比試！”一片話把这伙青年人都說得臊上勁了。

这一次，沒有开会，也沒有动员，社員們呼呼地爭着搶着去上山割垫脚。沒有人喊累了，也沒有有人再找各种理由不去了。他們說：“老支书能干的，我們为什么不能干？”这年，閻家屯生产大队是历来割垫脚最多的一年。

連年丰收，农村生活变好了，有些人慢慢也变得嬌貴起来，早晨总想睡会懶觉，不怎么願意早起干活。开会动员了几回，情况也不見好轉。老支书还是用老办法，就同少数干部带头起早劳动。一天两天，時間久了，起早干一气活再吃飯，也就成了社員們普遍的习惯。

这天早晨，人們集合起来要下地的时候，有人突然发现老支书沒有来。

“等等老支书吧！”

“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迟到了！”

“昨天白天割垫脚，晚上开会散得晚，怕还在圓梦

呢！”

一队队长李德贵說：“快別等他了，今天他准不会来了。”

这样，大伙就下地了。正走着，忽然有人喊：“那不是老支书嗎？”大伙往远处一看，可不是，老支书早就在道口等着呢。社員們很受感动。有的說：“老支书，你就沒睡过一天懶觉呀！”有的說：“別說睡懶觉，連白天开会回来一丁点功夫，还忘不了就近干一气呢！”也有的关切地說：“老支书，你累了，就歇一天吧！扛长活还有个阴天下雨呢！”老支书笑嘻嘻一乐，眼睛扑簌扑簌，什么話也沒說，跟大伙一块下地了。这一下，可把李德贵臊得臉上通紅。

李德贵这个窘勁，是另有原因的。

閻家屯最近一两年生产大队干部固定到各生产队参加劳动。原来老支书分工不是在一队。后来，听說一队問題很多：社員鬧不团结，生产情緒不高，有些人私下唧咕着要撤換李德贵的生产队长……。可是李德贵脾气大，象个刺蝟，支委們誰也不願分工去抓一队，怕扎手。老支书就自告奋勇，来一队参加劳动。現在，正是剛来一队的头几天。

老支书来到一队，照例是“老打头”。一开始，他既不責备社員思想落后，也不批評队长领导无力。他一天早来晚走，跟大伙一块劳动，一块休息，一块讲故事。两眼看着队长的一举一动，两耳支楞起听着大伙向他亲热的談吐。

这可与李德贵成了个鲜明的对比。李德贵农活技术有一套，支派活计，有板有眼。队员们就因为看中了他这点，去年秋后把他选成生产队长。可是，他原是中农，私心重，仗着自己有点能耐，不愿同队员们一起劳动。每天到地里指划一通，别人干起来，他就借名检查庄稼，从东转到西，从谷地转到玉米地……踉踉跄跄，不成样子。赶到该歇歇了，他也回来了，同大伙一块歇着。歇起来，该干活了，他借口没检查完又走了。个别时候，还趁大伙看不见，捎带着干点私活。每天工分还不少挣。因此，队员们烦透了他，给他起个外号叫“查地边”。

自从老支书来一队参加劳动，社员们个个眉飞眼笑，不吵嘴了，不打架了，干劲也起来了，干多累的活，也觉着痛快。李德贵却受到很大的拘束。他只得硬着头皮同大伙一块劳动，可是心里揣着一腔牢骚和委屈，觉着这是社员故意同他找别扭，老支书故意给他难看。不过，日子长了，慢慢也就习惯了。这时候，李德贵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对他的态度慢慢变得亲热起来，眼神变得柔和而温暖；他支使旁人，旁人也听他指挥，再不那样别别扭扭了……这引起了他的深思。

一天晚上，老支书把李德贵叫到家里，长长地畅谈了半宿。老支书狠狠地批评了李德贵的错误，指出他的病根子就是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要在从前，李德贵准会冒火，准要以“不干了”来威胁。可是，这次，他服服贴贴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一定要学习老支书的样

子，带头参加劳动。

轉眼第二年春天来了。正是突击送粪的好时候。

有一天晚上，老支书刚撂下碗筷，李德贵就气呼呼地进来了。

老支书問：“有事呀？”

“有一点！”

“啥事呢？”

“張福元这几天往村南拉粪，挺近便的道，两人一天才拉七趟。太不象話了！”

老支书說：“你批評他們啦？”

李德贵更生气了，說：“我熊了他一頓，他还不承认錯誤呢，說旁人連七趟也送不了。老支书，你得好好批評批評他。”

老支书笑模悠悠地問：“你說能送几趟呢？”

“我？……”一句話把李德贵問得張嘴結舌，回答不上来。半天才低低說了句：“沒試过！”

“着呀！我批評他，不是一样不服嗎？”

李德贵抓耳搔腮地說：“那……那就这样任着他啦？”

老支书这几天也发现各生产队的送粪进度快慢不一，悬殊挺大。今年送粪的任务又大，不及时解决这个問題，粪送不出去，就要影响及时春耕。他沉吟了半天，扑擻扑擻眼睛說：“这么吧，明天我来試試！”李德贵一听就乐了：“那敢情好！”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第二天，老支书找了个老帮手。仍旧是那堆粪，那块

地，那套車馬。兩個人從早晨套車，裝車同裝，卸車同卸，勻勻和和，不匆不趕，該干就干，該歇就歇，人不累，馬不乏力，車裝的還滿，糞堆倒得還大……到下午太陽還老高的時候，李德貴來了，問：“送多少呀？”

老支書說：“十三趟。”

“差這麼多呀！”

因為牲口還要拉點飼料，所以就提前卸車了。老支書一邊卸車，一邊和顏悅色地說：“德貴，教育社員，不能光靠大話熊人，要有根有據，讓他心服口服呀！”

李德貴知道又說到自己的病根子上來了，慚愧地說：“我就是這脾氣！今個又向老支書學了一招！”

隨後，老支書找來張福元，指出他不該趕車不管裝車卸車，干活時候跑到樹行子里玩撲克，那一天能干多少活計呀！……張福元也是心服口服，表示一定改正錯誤。

有一天在地里勞動，老支書見貧農王永財愁眉苦臉，心里好象有多大的愁煩事。老支書問：“永財，你有啥難事？”王永財說：“房頂早就嘩嘩漏得不行了，想換個洋灰瓦頂子吧，一時半會又批不下洋灰呀！”老支書猛一驚，自責地想：“看我多官僚！人家屋頂漏得不行了，我還不知道呢！”他又一想：自個早就批下兩千多張洋灰瓦，只是沒得空，始終沒有上頂。好在現在自個的房子比他的還強些，就說：“我那洋灰瓦還不忙用呢，先給你吧！”王永財感激地說：“那怎中，你的房子也不比我的強多少呀！”老支書假裝生氣地說：“給你你就用唄！”大伙也給老支書幫

腔，三說两說就把王永財說通了。王永財很快就用这批洋灰瓦上了頂。

这样的事，一时半会是說不完的……

繆海山是道道地地的“老打头”。他打的是为群众締造幸福的头，为社会主义开路的头。

美好的青春

——記昆虫研究小組

張 庆 田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这段《雷锋日记》，是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日记本上抄下来的。她的名字叫张瑞琴，是建明公社刁庄子大队共青团支部委员。

一天上午，我跟随公社的一个同志到高庄子去参加一次除虫现场会议。到了高庄子，开会的人已经到齐了。会场就在大街上，人们坐在葫芦架下的阴凉里，聊天、打扑克和看书。

“我们来晚了！”公社的同志大踏步跨进了会场，突然向我介绍道：“这就是刁庄子张瑞琴同志。”

一个穿白衬衫的姑娘，立刻甩掉手中的扑克，跳起来和我握手。这是一个很大方的姑娘，束着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闪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鼻子微微向上翘着，说话时，嘴角旁的两颗黑痣，颤颤跳动。

我們的會見，驚動了她身旁的一群姑娘，她們都束着雙辮，穿着不同顏色的衣服，仰起青春的笑臉，向我們觀望。靠東邊坐着的，是一群男青年，在姑娘們面前，他們顯得很莊重，有的在看書，有的在拿着小本書寫什麼，有的在交頭接耳地談論。但，一眼可以看出，他們和她們大部分是回鄉知識青年，個別的是下放幹部，都有着一個美好的青春。

會議開始了，公社的同志用生動的語言講明了治蟲子的重要，他特別提到刁莊子青年昆蟲研究小組，如何用事實教育了村幹部，教育了農民的實例，來鼓舞大家向科學進軍，戰勝蟲害。這時候，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張瑞琴身上，張瑞琴低下了頭，一隻手撫弄着發辮，偷偷地與她的伙伴交換着得意的目光。

他們的青年昆蟲小組是一九六二年八月建立起來的。他們的成員是十個回鄉知識青年和一個下放幹部。十二個青年中有五個女青年，七個男青年；其中有十個共青團員。十二個人里除去兩個高中程度的外，都是初中畢業。最初，他們是從業餘教育開始的。張瑞琴是团支部宣傳委員，組織青年學習，是她的首要任務。可是，任何工作都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一九六一年，她剛從農業中學回來，她和團書記趙玉蘭去動員張翠花上民校。張翠花的家長說：

“俺們不上了！”

“你怎的不上了？”

“閨女，我問你，你今年多大了？”

“十八了！”

“念了幾年書？”

“念了九年！”

“念了九年書，還不是回家參加勞動！俺不念書的掙十分！你們念了書的掙七分！”

她連屋都沒有敢進人家的，靠着門框，滾下了幾滴熱淚。

勞動關也不是容易闖的。她們第一次跟着老農民薅粳子，人家薅，她們也薅，薅過了一看，老農民嚷道：

“這還中？”

“怎不中！”

“你們薅了粳子，留下稗子！”

她們在老農的教導下，又重新一棵一棵地薅。

“還是不中哪！把稗子薅了，留下了草粳！”

最後，她們一人手中拿着一棵草粳當樣子，邊薅邊比較，才漸漸地分清了哪是苗，哪是草；哪是粳子，哪是稗子。

困難是碰出來的，鋼鐵是煉出來的。她記住了一位公社領導同志的話：做工作要長着橡皮腦袋，不要怕碰釘子，要有頑強的革命精神，什麼困難也能戰勝。

張瑞琴不再掉眼淚了，她在工作中，勞動中，特別在向科學進軍中，鍛煉得更加頑強。他們的青年昆蟲研究小組一成立，便面臨着新的困難。首先是一些青年本身

缺乏信心。有的說：“学了一天是一天，能用不能用再說。”还有的說：“光几个青年起了啥調，干部不支持，群众不信任，那还中？”还有人怕学用不一致，不結合实际，白搭工夫。

他們为了获得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便相继召开了家长 and 老农座談会，虛心听取了他們的意見，为了学与用相結合，他們先从危害性最大的地下害虫学起。沒有教材，她和席瑞华、刘中青跑到离村二十五里的县城去找参考书。

席瑞华是張瑞琴上农中时候的同学。一九五八年被公社保送到北京昆虫研究所去学习，一九六二年重新回到自己的公社。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她被大家選为老师，亲自編纂教材，給大家讲课。这是一个比較文雅的姑娘，当我跟随着張瑞琴回到刁庄子时，同时会见她。她的身材比起張瑞琴略微高点，臉儿稍微长点，显得两只眼睛特別大，說話时，嘴角上微微挂着笑意。她是她們小组里的唯一沒有留着辮子的姑娘，从衣着和举动上，稍微带上了一种城市姑娘的風度。

“你們学习成績好嗎？”

“差不多。农作物害虫部分，大体学完了。”她微笑着回答，接着又补充道：“大家的目标是三年达到中专水平。学习内容政治、文化、技术。”

“政治課和文化課都由你担任嗎？”

“不，政治課和民兵一块学习，文化課由上过后师的

席坤担任。主要是学习語文。”

“学习当中还有什么困难嗎？”

“这会儿好多了，当初可不中。”張瑞琴接过来說。相对下，她比席瑞华显得爱說話，有魄力，她还保持着山村姑娘那种热情、純朴的性格，我到村以后，住宿，吃飯，怎样工作，都是由她安排。如果說席瑞华庄重（起碼在生人面前是这样）得像个老师，張瑞琴却具有政治風度，她的魄力，組織能力很象一个熟练的村干部。是呢！她是共青团的宣傳委員啊！她把搭在胸前的辮子向后再一甩，干脆脆地說：

“当初一說研究农业技术，一个叫張为的老农說：技术，技术就是一陣風。那年，专署在小南庄搞試驗，种的玉米不結穗，末了当甜棒拔了，你們几个毛孩子还搞啥技术？”

“最有意思的是棉花浸种。”席瑞华接过来說，“过去他們都用溫水浸，涮一下，就赶紧撈出来。这一次，我按书本办事。队长洪宝山問：‘得多少度？’我說：‘七十度左右！’他說：‘那还中？’‘中！’我咬着牙，把种籽倒进去了。他又問：‘浸多长时间？’我說：‘半个钟头！’‘那不中，快撈出来吧！’我心中也敲着小鼓，硬坚持着浸了二十五分钟。”

“二队队长赵可俊，看了你們队的浸种，回去說：‘咱們別学一队，溫度太高，保險他們出不来！’”

“誰不担心呢？我們四队队长說：‘这要浸坏了，她有

責任!’‘我負責!’棉花快出土的時候，我到地里看了三趟。頭一趟碰上農民劉振雨，他問我：‘出來了沒有?’我搖了搖頭。他的兩眼直勾勾地睜着我。好象在追查責任。第二次我去看時，有的棉花露了頭，我心眼里真高興。刨了刨那些沒出土的棉籽，看看它們也發了芽。第三次去看時，棉苗全出來了，就是一塊低地，出得不好。”

劉振雨却向我解釋道：“那不是浸種的過，那是地勢不好。”……

談到用顆粒劑治玉米高粱的鑽心蟲時，更是一場風波。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農民看見他們做顆粒粉劑，便說：“嘿，棒子蟲，年年有。你們做那個，白搭工!”第三隊撒了半天，隊長就跑去：“咱不白搭工了，別的隊上治，咱再治。燒毀了可讓你們賠!”一些社員更是七言八語。有的說：“你們想掙工分了，就送你們點工分，別費那個洋勁了!”還有的說：“那嫩嫩的尖，你們在上邊撒藥，還不活活地讓你們把它燒死?”這些風言風語直接沖擊着技術研究員的家屬。劉中青的弟弟說：“三姐，你快別治了!不干活你在家呆着，干么挨大家的反映。”二隊隊長孫玉生臥在一隊地里瞧，看見蟲子真的死了，他才調撥了四個男勞力和兩個“二不楞”(半大勞力)去配制顆粒劑。

農民是現實主義者。他們親身看到了治蟲的好處，對這些青年就另眼看待了。他們一發現蟲害，便主動向他們報告：“你們快想辦法治吧!眼看到了嘴的糧食，別讓蟲子都啃了!”

現在他們的二百畝玉米，已除治了一百七十畝，六十畝高粱也除治了一遍。在播種時，他們還用六六六處理土壤，用信石毒餌和滴滴涕拌種，毒殺和驅逐了地下害虫——螻蛄和地蠶。

當天下午，席瑞華去幫助大隊做定額種管理。張瑞琴陪我參觀了他們的試驗田和留地。她滿內行地跟我講解那是“一三八”、“四一七”紅薯，那是勝利百號，那是“五五三”號。那是農大四號玉米，那是英粟子玉米。在我的眼里却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好庄稼。就象看天空的飛鳥一樣，沒有科學的眼光，怎能鑒別它們哪是公、母。她把我領到一塊高粱地前面站下了。這塊高粱如果說和別的高粱有些兩樣的話，那就是它的葉子比別的高粱葉子黃，葉子上的虫眼好象篩子底，象患了癆病的人一樣，那麼沒有生氣。

“這就是三隊剩下的那一塊，沒有撒顆粒劑。”

“現在再撒不行嗎？”

“現在來不及了！虫子已經鑽到莖里去了。”說着她扳過一棵高粱，指給我看上面的虫眼：“留它當個反面教材吧！”

反面教材！這句話的意義多么深刻呀！

下面還是讓我摘錄她日記本上的一段話吧！

一塊好的木板，上面一個眼孔沒有。但釘子為什麼能釘得進去呢？這就是靠壓力硬擠進去的，硬鑽進去的。由此看來，釘子有兩個長處，一個是擠勁，一個是鑽勁！我們在学习

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的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我们办农村自学便是这样，坚持就是胜利。

要有“钉子”的精神，坚持就是胜利！这的确反映出这一代青年人的性格和意愿。青春呵，永远是美好的。青年们，愿你们青春常在！

开花结果

——記西鋪大队果林組

葛文

—

长峪山的山坡上，长滿油松、栗树。长串的白色栗花落滿地，栗树上开始生长出毛茸茸的栗子。整个山坡是翠綠色的，只有一个突出的山崖，裸露出紫紅色的山石。这里搭着一个就地窩鋪，用松枝搭成，松枝經過風吹日晒，完全变成棕紅色的了。崖畔上生长着翠綠的油松，松枝象云堆一样飄浮在半空。是誰住在这窩鋪里？是一位老人嗎？不是。他們是西鋪村的几个青年人。他們年輕的就象苹果花儿那样，公社、祖国刚刚把他們培养成人，送出学校大門，便奔回故乡来，决心在故乡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貧农女儿杜振兰，去年秋天在遵化念完高中，回到西鋪来，立即参加了秋收工作。等收完秋，一双手便磨起了血泡，渗出血来。媽媽看見这样，心疼得不行，便劝导女儿到城里找个工作干：“念书人拿不了镰刀，找个工作干吧！”

“这不叫工作叫啥？还用出去找工作？”振兰笑着和媽媽辯駁。

“庄稼活儿苦哪！”媽媽叹着气說。

“什么活儿不苦？不苦哪来的甜？就說咱建明社，現在是三輛大汽車，還有許多膠皮轆轤車，可是當初也只有三條驢腿呀！”振兰一串話，把媽媽說的笑了起來。

媽媽說：“那就由你吧！”

振兰接過來說：“由我，我就決不當逃兵！”

振兰天天出工，在勞動中，她發現一九五六年在南山坡里栽種的一千多棵蘋果樹，至今八年了，只是空開花，不結果。社員們議論紛紛，有的說是地土薄的過，有的說是品種不好，也有的說憑咱這窮山坡能長出大蘋果來？振兰想，不管怎樣說，這活儿得有人做，果樹得有人管理。於是她就向大隊領導同志建議，應該成立個果樹研究組。

國藩和杜奎也老早想到這件事，她一提出，就表示贊成。大隊幹部研究後，便選派下幾位有文化的青年，成立一個果林專業隊。這幾位青年是杜振賀、魏長順、溫玉貴夫婦、杜振兰、王慶忠。

杜振賀細高個兒，一雙臥蚕眉，眼珠黑而有神，不用人介紹，讓識杜奎的人，必定一眼就能認出是他的兒子，不同的是杜振賀白嫩，杜奎黑瘦。杜奎黑瘦是因為從小打柴、種庄稼、打鬼子鍛煉出來的；振賀白嫩，是因為從小念書，初中畢業後，又在家乡的農中教書，勞動少的緣故。

杜奎看見兒子這相，便語重心長地說：“別盡想着遠走高飛，定下心來做三年莊稼活兒，認認哪是稗子，哪是粳子再說。莊稼人的兒子不認莊稼能中？”他聽爸的話，種莊稼了。

王慶忠也是從小念書，念到二十一歲，去年在遵化師範畢了業，兜着一包包書回家來了。

老王林挺高興說：“好！咱祖輩窮，沒個識字長眼的，日子過到你這兒，這算是改朝換代了！可就是，莊稼活兒你得從頭學呀！”

過了幾天，老王林拿出一根扁担，一條繩索，把兒子慶忠叫到身邊說：“明天跟上大隊長杜奎打柴去！”

上長峪山，上煙筒山打毛柴，慶忠從小是老手，打六歲起，哪天不背上花籃上南山割個一籃半籃呢！可是跟上杜奎到深山里去打柴，一去要個把月，聽說那荊條粗的象棍子，密的象谷子地，山陡的一腳站不穩就能滾下去，心裏可犯了愁。慶忠皺起眉頭，笑看着爸爸說：

“那不中哪！我扁担不會使，繩子不會捆……”

“你……”老王林打量着兒子，板起臉：“我問你，你一進學校大門，就會寫字來？”

“不會哪！”

“怎麼又會來？”

“老師教哪！”

“着，這不對了！自个兒肯學，老師把着手教，會啦！哪個社員，天生是打柴能手，全是後來一点一点學的。這

回去，有杜奎大队长领着，不用担心没人教你。”

“嗯，那我去！”庆忠说着扭身就要走。

“回来，不忙，”王林叫住了儿子，又补充了几句：“你听我把话说透。咱穷棒子社起家，跟哪儿起的呀？”

“打柴起的家！”

“对啦！这就是咱的穷棒子精神，以后要靠你们接续呢！”

从柴山回来，十一月初成立果林小组，庆忠便被派到小组干活。

果林小组除以上三人外，还有温玉贵夫妇，他们是从唐山果园下放回来的。还有魏长顺，这个精壮的小伙子一向是个技术迷。学开锅驼机，别人要两三个月，他只一个月就学会了。后来在唐山学烧蒸气锅炉，也常得到老师傅的夸奖。这回领导上一研究，说：“小魏，果林重要，你到果林组研究去吧！”他说：“行！”第二天就钻研起果木来了。

人员配备得差不多了，国藩想了想说：“中啊，再给你们派个领头的！”

于是，王秀峰老大爷就来领这个头。

二

秀峰老大爷和果林小组的青年人，在崖畔油松下，边收拾喷雾器，边说话儿。这时，苹果园里一片春光，果树

正在开花。秀峰大爷思谋着,对青年人說:“看,花儿开的不少,可就怕黄盖子虫(金龟子)来咬,一咬又象去年一样空开花不长果。今年要再来个空的,咱們就对不起大伙了。”

正說着,杜振兰叫起来說:“大爷,你看,这几棵树上不是黄盖子虫起来了?”

温玉贵在这伙人中,是个小技师。他三脚两步跳过去一看,說:“不錯,起来了!咱們得赶快除治。”

秀峰大爷神情紧张地說:“这該死虫,說起就起,忽拉忽拉一大片,几天里就能把滿园苹果花的花芯咬得差不离……哎,真是……”

魏长順揮起有力的胳膊,插嘴說:“大爷,咱們多噴点药吧,把这該死虫全毒死!”

“不中!”温玉贵真象老练的技师一样胸有成竹地摇头,“药噴得太多,会影响結果,再說黄盖子虫外面有一个厚厚的硬盖,一星半点药它也不在乎。按照书上的办法,最有效的还是用人工捕捉。我在唐山果园时,就試驗过,捕捉最灵。”

“按照咱們老輩傳下的办法也是捉。只是那时一家种的是三棵五棵,現在是一千多棵……”

“这虫能捉得净嗎?”杜振兰提出了疑問。

“能!容易捉!”温玉贵又說上了,“每天早晨露水重的时候,这該死虫是不飞的,一受到突然的震动,就会掉在地上装假死。咱們早晨捉就行。”

“对，就这么办！”秀峰大爷已经拿定了主意，“我这就找大队部去，明天一早多发动一批劳力，打个歼灭战。”

第二天一早，当东方刚闪出一丝鱼肚白时，南山坡上已经人声喧闹。杜奎大队长亲自指挥六个生产队的二百多男女劳力“围剿”黄盖子虫来了。他们按照事先的部署划片包干，只一会儿就各就各位动手捕捉起来。壮劳力用脚狠狠在树干上一蹬，刷拉拉“黄该死虫”果然成片成批掉下来。周围的劳力就象拣黄豆一样，纷纷拣起来往瓶瓶罐罐里装。

“唷，装满了怎么办呢？”一个女孩子尖叫起来。

“死丫头，谁叫你拿这么小的一个药水瓶，你以为是上山玩来啦？”一个妇女狠狠斥责。

“装到我这瓶里吧！”佟大嫂子扬起了她手里拿的特号的白玻璃瓶。

“这是佟大哥的酒瓶吧！打破了，我看你准挨揍！”一个妇女小声开玩笑。

“他敢？打破了更好，省得他日夜寻思要买酒。”佟大嫂得意地乐了。

太阳从东方升起了，笑眯眯地把金光撒满整个山头。

收工的哨子响了，人们都集中在一片空场上。

“咱们统计一下今天的战果！”杜奎站在高坎上，敞开怀，十足是他当年指挥民兵打鬼子的神气。

“我的手就是秤，大家把捉来的虫交给我一掂，准知道是几斤几两！”老高头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行！”許多人都鼓掌贊同。

于是，大家把捉来的虫，交給老高头一掂，他一面报了个数，一面就把虫倒了出来。几只穿了爬山鞋的大脚，象压路机一样压了过去。

这一天共捉虫二十一斤多。

接連又捉了几天，黄盖子虫果然銷声灭迹了。

三

果林小組对这一千一百棵苹果树，一心一意經營，至伏天，全部挂滿碗口大的苹果。最早成熟的是“伏花皮”，接着成熟的有“国光”、“紅玉”、“紅星”、“朝日”……

人們看到这紅紅的苹果，不住的笑着說：“看吧，結下这么多好苹果，这回王秀峰走路該騰云啦！”

一天，我到松枝窩鋪看秀峰大爷。他笑嘻嘻地領着我参观苹果园，順手摘下两个苹果給我，笑着說：“尝尝，尝尝，苹果和苹果不一样，咱西鋪的苹果，甜！”

“就是甜！”我咬了一口，品出味儿不錯，便說：“你們还可以多栽植一些！”

“是要栽植呀！我們今年弄了一个苗圃，就在我房后头上坎。”

“秧苗也卖嗎？”

“不卖，也不买，咱是自給自足。”秀峰大爷傲气地立在崖头上，指指烟筒山，只見半山腰一片青松葱郁。他

說：“那也是這幾年栽種的，青松下面的坡里已經栽下棗樹。將來，那里是西鋪的棗園。再過去那個小山腦，起名叫做饅頭山，前年已經栽種下核桃數千棵。這兩處，現在都用石灰圈起，禁止放牧。”

掉轉身來，秀峰大爺又指着對面的長峪山說：“別看那邊是青松滿坡，空地還是有，今年春天，杜奎領人栽上千多棵杜李，計劃明年再栽種千棵柿樹和蘋果樹。再過十年你來看，這里又是一個樣兒了。”

秀峰大爺說得自己都哈哈樂了。他望望長峪山，看看煙筒山說：“這山上的樹木全歸我們經管呀，就連河灣那邊六里長的防洪林，也是！我們的任務，就是變窮山為寶山。”

“對，整治蘋果園，這不過是我們工作中的一小部分。”杜振蘭說。

“看吧，果樹有開花，有結果，我們年青人也要在這兒開花結果哩！”王慶忠掄起胳膊說。

山村讀書聲

長 正

晚上，我到西鋪去找國藩同志。在大隊遇見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上身的白背心，緊緊地系在褲腰里，下身的舊黑布單褲，褲腿高高的綰過膝蓋，一雙家做的山崗子大鞋，毛邊往四外飛着。他高高的鼻子，沒留發，一對不大的眼睛眯縫着，倆嘴角往上翹起，一個勁兒睨我憨笑。

“這小伙子是誰呢？”我一邊端詳他，一邊猜想。

國藩向我介紹說：“你不認識他？是王生的二兒子。”

啊！這是個生在黃連樹下，在苦海里跟着爹媽，抱瓢拉棍，東村討，西庄要，吃“百家飯”養大的苦疙瘩呀！

我緊緊地拉住他的手，問道：“你叫啥名字？”

“我！王慶宇！”他那雙又厚又硬的手滾熱。

“三橫一豎的王，慶祝的慶，下雨的雨，是嗎？”我恐怕記不結實這個名字，又釘問了一句。

“不！”他搖晃了一下光光的腦瓜兒，解釋說，“不是下雨的雨，是宇宙的字，一個寶蓋，下邊一個干勾干，就是天地很大的意思！”

我說：“這名字起得好。你念過書吧？”

国藩同志接过去說：“敢情。他长在福窩哩嘛！”說着，向我伸出四个指头，“初小毕业！过去从小要飯，他爹媽怕养不活他，差点儿沒把他送了人。要不是解放，上学識字，哪儿輪到他了哇！”

我問王庆宇：“是嘛？”

王庆宇低着脑瓜儿，嘿嘿傻笑了两声。这时，我見他胳膊窩里，夹着一本书，打开一看，是本小說《暴風驟雨》。我問他：“你能看下来嗎？”

他說：“对付着往下溜唄！”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到王生大爷家去串門，虽說进了二伏，可是大門上春节貼的对联，字迹还清清楚楚的呢。

王生大爷沒出門，他的老伴正和儿媳妇，还有串門的老大娘，正在忙棉衣。王庆宇光着膀子，趴在炕上，黑汗白流地正查字典，原来是他讲說《暴風驟雨》，遇上了“拦路虎”。

我見他嘴里不住地念叨，子、丑、寅、卯……“字典”东一本儿、西一本儿的攤了多半炕，这是一部古版“老康熙字典”。一問才知道，这是庆宇新近从集上花六块钱买来的。我說：“你为啥不买本新式的呢？”

他抬起光光的脑瓜儿，說：“那种字典里边的字儿，不如这个全啊！”

“你会使嗎？”我問。

“瞎捉摸唄！”他說着，两只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綫，傻

呵呵地笑了。这双笑咪咪的眼睛里，透着伶俐和自信。

王生大娘縫着棉袄，斜了儿子一眼，对我說：“你看他笨得老雕似的，心气可大呢！”

王大娘这话，誰都听得出来，她是正話反說，把儿媳们都逗得忍不住抿嘴笑了。她停下針线，偷偷地瞟了一眼北墙。顺着她的眼神，我才看见墙上，貼滿了一幅幅用紅、綠、黃、藍各色各样的油墨写的篆体民歌。字儿清秀、洒脱，看上去滿艺术。虽是小篆，我也认不大清，連蒙帶猜的，費了好大力气，也沒认全一首。最后，还是經庆宇指点，才把一首民歌勉强溜下来。

从王大娘的嘴里，我得知这首民歌，是庆宇的新作，特抄录如下：

幸福人來幸福天，
幸福不忘搞生产。
建明公社幸福园，
雄心壮志勁冲天。
毛主席的好领导，
咱們生活美无边。

你見了这首民歌，一定以为是用毛笔或者画笔写的。不，这是沒經過师、沒学过艺的王庆宇，用高粱秸瓢儿，沾着油墨，按照《康熙字典》，东拉一橫，西湊一豎儿，一笔一画地用心勁拼起来的。它使我想起建明社人，搞土改、打鬼子的那股狠勁儿，办組建社那股坚决勁儿，开山劈岭的

那股猛勁兒，植樹造林那股心切勁兒。今天，我又在建明社人身上，看見學習文化這股鑽勁兒。這不正是“窮棒子”精神的具体表現嗎？

我們的話題，很快就轉到學文化上面來了。王生大爺告訴我：他小時候，姥姥給他媽媽包了一包旱煙葉，叫他帶回來。日子不久，姥姥來追問：“我那張包煙紙呢？”

媽媽指着窗戶說：“我糊在那上頭咧！”

“哎呀！我的活姑奶奶，這不要了我的老命了嗎？”

“怎嘛？”媽媽見姥姥急得滿頭大汗，一時也嚇呆了。

姥姥叭叭地拍打着炕沿說：“那是地契文書呀！”

後來，只好擺酒請人，另寫文書，重新花錢“稅契”。

王生大爺的故事，把滿屋人都逗樂了。他眨着那雙不得力的眼睛說：“樂啥？這是實事呀！”

是呀！我早聽國藩同志說過，解放前，西鋪一百多戶人家，識文斷字的只有幾個富農、地主。窮人沒文化，開門過日子，為難受贅甬提，就拿抗日時期辦公來說，那時區里來個通知啥的，自己人不識字，只好藏起來，直到區上來人催，才知是叫人去開會，因為這個，沒少誤事。有一次武裝班長杜奎接到一封由南邊姚家峪轉來的雞毛信，他立刻派人按照老規矩，照例往北送到王市莊，人家不收，說信是寫給炸糕店的，送信人只好滿頭大汗地跑回來。

王生大爺說：“成立農業社以後，莊里一辦民校，我就說，咱們這一翻身入社，家里社里的事兒多了，非得學習

点字儿不行。如今毛主席、共产党给咱们办了大学堂，不花钱，不拿物，不用摆酒席请先生，再不能因为不识字受辖治了。我的眼不行了，你们一个不拉，全得去！家家有规矩，校有校章，到那儿要听老师的话，学习起来要一根肠子，不能三心二意。”

王大娘接过去说：“当时我问了他句：‘我呢？没牙笨口的，头发都白啦！还去吗？’你猜他说啥呢？”王大娘说着，学起王大爷的腔调来，“‘你耳不聩，眼不瞎，为啥不去呢？’你看他有多霸道？”说着，大笑起来。

“我那是为你好哇！”王大爷也笑了。

“这话不假，不叫人家王生催的紧，你能在全村报模范？”串门的老大娘也出来帮腔。

真的，如今这年过半百的王大娘，不但当了学习模范，还学会了作诗、写信、读报、看书、记日记。我在她家，读到她一九五九年记在袜底板儿上的一段日记，上边写的是：

今年过春节真好！各位党委书记，都到我家来拜年，成群结队，热闹非凡。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我过不上这样春节。记得有一年三十（日）晚上，人家地主家鸡鸭鱼肉，挂灯放炮，锣鼓喧天；我家清锅冷灶不冒烟，讨饭都没处去讨。那年月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如今毛主席来了，我们才过上幸福生活。

当她拿到扫盲毕业证书的第一天，她写了一封信，亲

自托咐一位从北京来的同志，帶給偉大領袖毛主席。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越过千山万水，用文字表达自己多年来，一直埋藏在心里的对党、对領袖的热爱和感激呀！

我发现屋里的瓶子上、罐子上、葫芦头上，都貼着小紙条儿，上边写着：菠菜籽、窩苣籽、蘿卜籽……

我以为这是为了使用时好辨認，經王庆宇一說，我才知道，这是“見物識字”。更新鮮的是，王大娘她不仅是儿媳妇的婆婆，还是儿媳妇的文化教員哩！

扫盲工作結束快十年了，可是这一家人，在学习文化上，不論老一輩的，还是少一輩的，都在一步俩脚印地前进着，追求着。

一个人的一輩子，最难忘的是他的領路人。一个文盲，摘掉帽子，睜开眼睛，怎会忘了她的启蒙人呢？

我和王大娘談天的时候，曾几次提到她的老师佟印。佟印是什么人呢？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見他，个头不高，粗粗实实，一張黑紅黑紅的长方臉，虽在二伏天，他还穿着袜子，这在乡間是很少見的；說起話儿来，嘻嘻哈哈，是个“乐天派”。他父亲被日寇杀害。佟印从十四岁就在遼化城里給地主扛长活，整整八年。土地改革以后，他和杜奎参加了互助組，轉初級社时，他是二十三戶之一。入社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跟随杜奎远征过王寺峪，进山打过柴。这个貧苦的雇农，是个精明好学的人，庄稼活路、副业手艺不論，单說看书識字，那真有点“魔气”劲儿。解放初期，

他家厢房住着个小学教员，名叫李坤，佟印整天围他屁股后头问天问地，问东问西。在上山打柴时，他成了这伙“穷棒子”里边的“土秀才”，学文化这一课，就由他来担承，连他叔父佟瑞芝（原来是他们互助组的大组长），也成了他的学生。

打柴下山以后，一九五四年政府号召扫除文盲，县里来了通知，叫西铺去人受训。国藩找到佟印，说：“佟印，要扫盲了，县里要训练教员，我看你去吧！”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佟印吓了一跳，他直眉瞪眼地说：“王主任！你可别拿我打哈哈，西铺谁不知道我这两下子呀？”

国藩说：“这可不是玩笑话！”

佟印说：“四条腿的兔子要能拉车，谁还买大骡子大马呀！”

国藩也知道佟印确实有他自己的难处，便开导他说：“人都是学而知之，哪有生而知之的呀？你不去，你看西铺谁中？”

佟印说：“没人去，我也不敢去！”

国藩说：“佟印啊！咱贫雇农不去，叫地主、富农去吗？”

佟印一听这话可急啦，他一把抓住国藩的手说：“那可中！”

就这样，佟印到县里受了半月训，回村来担任起扫盲教师。

头天开学，見台下一百二十四名男女学员，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他的心跳起来了，大脸憋得嫣紫，后脊梁热汗直滚，手里的粉笔，在黑板上跳起舞来。

当他从这一百二十四双眼睛里，看到的是对他的期望、鼓舞和热爱的时候，他想到从前坐在这里的是地主、富农的少爷小姐，今天坐在他面前的却是自己穷苦的伙伴——今后的江山，都要由这些人来保，来建设……觉得肩头上有点沉重，一颗狂跳的心，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民校办起来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整个西铺展开了。他们根据不同人的具体情况，办了集中班，干部班，小孩妈妈头组。采取了个别传授，送字上门，包教包学，互教互学，见物识字等形式。在雄鸡三唱的清晨，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直到星光满天的深夜，地头上、深山里、灶门前、井台旁、饲养处、果树下……朗朗的读书声，响彻着整个西铺村。

人多了，笔、墨、纸张、书本、灯盏、煤油，开支越来越大，佟印找国藩想办法。国藩说：“花钱现成！”他往村外四周大山一指说：“这都是咱们的摇钱树！”

为了给民校筹办经费，男的拿上镰刀，扛起扁担，进了深山，去砍柴；妇女提上锅头，挎着花篮，爬上断崖峭壁，去挖药材。有名的省三八妇女红旗手、共产党员赵美荣，那年刚刚结婚，听说有四个孩子的四嫂子韩玉珍，得了学习模范，一心要和她赛一赛，这个平川上来的姑娘，和小姐妹们一齐登上大长峪，去挖“知母”。头天晚上，村

里人就傳开了：“新媳妇的新鞋踩飞了，光着脚下了山。”这并没把赵美荣吓倒，第二天，她又上了山。

三天以后的夜晚，男女學員們用自己的汗水，点亮了西鋪民校里的大汽灯。白花花的光芒，照得屋里院内，一片雪亮，連天上的星星都羞得合上了眼睛。从此，民校里的大汽灯，长明不息，永放光芒。

現在西鋪大队的六个生产队里，个个队长，都摘掉了文盲帽子；当时的學員們有的担任了党、团支部書記，有的当了拖拉机手，果树技术員。建明社的人們，掌握了印把子，枪杆子，現在又敲开了“文化”的大門。全国聞名的“穷棒子社”，从此成了文化乡。

1963年夏二伏于西鋪

老 管 家

司 行

穷棒子社刚开办的时候，社办公室里炕上没个炕席，地下没条板凳，门旮旯连把条帚也没有。头一年办下来，天上地下地翻转过来了。小戴存自个分下两千五百来斤粮食，房子、地贖回来，四个妹妹接回家来。“轰”的一下传遍了山庄子，“组织起来”，这好比一步登天呀！大伙爱起这个农业社了，纷纷要求入社。一九五三年冬天，社扩大成八十三户，屈福常大爷进社里来了，这年他五十四岁。

这时候的社，不再穷得梆梆响了，社里已积累起了财富，院里院外，柴柴草草的，多起来了。

屈福常大爷干完活计，总爱一个人来到社里，和人说话，看看社里有啥新鲜玩意儿。一来到社里，他总是拔不脱脚：眼前几根麻绳头子，他弯腰拣起来；身后几根上了锈的铁钉子，他又弯腰拣起来；横七竖八的筐箩、簸箕，收拾起来挂在墙上；脚底下的毛柴碎草，归置到灶火洞里。每次来遛达，每次都不清闲，好象这些活儿单单留给他似的。

这些都被王主任（国藩）看在眼里。国藩心里思谋：

“咱们农业社正缺少这么个可靠人呢。”他就找到屈福常大爷跟前，对他說：“大叔，咱社里里外外满眼的东西，得有个人經管才行哩，我看这事交給你办吧，你就給咱經管起来吧。”

屈福常心想：“社信得过我，我就經管起来，东西損耗了是大伙的損失。”他噗哧笑了，說：“你看我行嗎？經管得了嗎？”

国藩說：“中！”

从此，老汉就当上了社里的保管員，用他自己的話說，当时沒起这个名儿，知不道啥叫个保管員。可是知道一样：东西絲毫不能叫虧損了。哪怕是一根毫毛，也全是大伙的心血换来的。从此，他更是兢兢业业，認真負責。八十三戶的財富就是屈福常的財富。

老汉从小，家里沒有一間房，沒有一壟地，沒衣服，也沒鞋袜。餓得支撐不住的时候，就溜出村外，捋点高粱粒，拔几棵大葱，垫垫肚子。孀子大娘瞧見了，心疼得不行，悄悄把他拽进屋去，給他点稀粥喝。他从小顾面子，第二次人家再让他喝粥时，就使勁挺起肚囊鼓圓气，挺着腰板，拍拍肚皮，对孀子大娘們說：“看！我这是吃飽的架式吧，肚子有多大！”这一說，人家也就当他真吃过飯了。

有一回，屈福常爹被債主逼走了。家里过不了年，孩子娘拆倒一座隱壁墙卖了，买回来三升紅高粱。剛說要捏几个大餃子給孩子們过过年，債主王凤春他娘討賬来了，坐在炕上不走。屈福常他媽悄悄把三升紅高粱藏在鸡窩

里，直到半夜三更，乡亲邻居們过来，好言好語把王凤春他娘央告走，才把这三升高粱拿出来。屈福常的媽一边捏餃子，一边掉着眼泪。

屈福常长到十九岁，給財主賊六子扛长工。扛了二十多年，越扛长工，越过不了。第二年的工資，头年就折成粮食吃沒了，身后还跟着三分的利息錢。要不减租减息，他可是永辈子也喘不过气来呀！减租减息政策下来时，屈大爷心里多痛快呀！三百八十吊錢的饥荒，一下子就清还了。土地改革，又分下四亩三分好地，自个创了几亩鎬头地，光景緩过气来。一九五三年冬天，屈福常参加了农业合作社，第二年就分下三千多斤粮食。

“这，这不是做梦都梦不到的事呀！”老汉心里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全身上下长了劲儿。

屈福常大爷不識字，当保管員沒文化困难真叫大，一天天經手的東西很多，光凭腦子記是有困难的。他不会写字，就在墙上画，借了一張犁，在墙上画个犁头；借走簸箕就画个簸箕，墙上滿处画的圈圈道道。后来他不画了，就請人家写个“犁”字貼在犁把上，“簸箕”貼在簸箕上。他就这样天天写天天认，学起文化来。

社扩大以后，社部搬到賊六子的老式瓦房院。牲口棚、猪圈、羊圈，全在一块儿。羊馆、猪馆、飼养員、車把式，也都住在一块。屈福常大爷只要騰出空儿，他就帮飼养員剉草。有一回，他发现干草堆里夹杂着一棵谷穗穗，就仔細挑檢起来。日子长了，谷穗子攢下一大堆，上碾盘

上一軌，一簸箕！哈，不多不少，恰好是一斗，交給了隊里。大家看着這一斗谷子，不住地贊揚起屈大爺來。

屈福常大爺憨厚地笑笑，說：“東西來的不容易，不能糟蹋呀。”

老漢不僅愛惜東西，手底下還特別勤快。他看見飼養員使壞了筲帚，就悄悄拾起來，從中挑出還能用的，再一捆綁，就又當成一把新的使用了。

社里人多手稠，屈福常雖時常提醒大伙愛護財物，小心使用，但家具總免不了要損壞。他看見打水的鐵桶子漏水了，不修理，壞大了，又得換新的，要花成筆錢。老漢就捉摸着自己修理，不會焊活，他就跑到鐵匠爐子上學。然後就拿該收拾的鐵桶子試驗，果然能成，还挺結實。老漢歡喜極了。往後，他就把全社所有漏水的鐵桶子都修補好了。大伙誇獎，老漢卻笑了：“這有啥？修修補補唄，窮家過日子，不能把東西不當東西。東西來得不易，心血呀！全是大伙的心血。”

牲口套壞了，屈大爺拿起一寸長的粗針縫補套包；麻袋破了洞，往外漏東西，老漢又把麻袋縫補好；羊圈門壞了，他學做木匠活兒，三斧兩斧修成個柵欄門子；驢棚漏了，他爬上頂棚，堆泥砌磚，把頂棚拾掇好。對待庫房，那就更不用說，該抹的抹，該泥的泥，保管室一嶄如新，不冷不熱，不潮不濕，不髒不亂，什麼時候都是整齊齊，有條不紊。

屈福常大爺經過刻苦鑽研，工作上摸索出一套辦法。

不論是保管籽种，还是保管粮食，他保证做到不霉不烂。玉米高粱入囤前，都是晒得干干的；他还向产麦区学来了经验，把麦子晒得滚烫，然后入库。为了节省，粮食囤的囤子不用席子，因为一领席子十几块钱，破费太大，他一律用秫秸囤子。为了避免潮湿和耗子咬，他在仓房地上先垫上一层细沙子，耗子爬起来滑脚；沙子上面再铺上一层荆条，用秫秸把墙给隔开，免得发潮，然后再编上囤子。

高级社那年，粮食堆成山，三十万斤交给屈大爷保管，没损耗一颗粮食粒；梨、杏、核桃、栗子、鸡蛋，交给他多少，出来还是多少，从来没霉过，也从来没烂过。他说：“不要说交给我这么多粮食，这么多东西，哪怕是一颗粮食，一样东西，咱们来得不易，也不能叫它损耗了。”

除了保管，他还兼任喂猪喂羊。大老克（老母猪）下了十三只猪娃子，屈福常看管了三天三夜，恐怕老母猪瞌睡劲儿大，一奶头堵死猪娃子。第三天头上，他刚回家休息一下，忽然半夜里下起雨了。他赶紧摸黑起来，跑到猪圈里一看，雨水灌进猪圈了，猪娃淋得象水罐子。屈福常大爷一脚踩进水塘子里，一只一只把猪娃抱出来。深秋天气下的是冰流子雨，老汉冻得够呛，但他心里想的只是猪娃子的安全。

有一次，羊倌抱回一只小羊羔，下生才五天，就把老羊折损了。羊羔饿得咩咩叫。屈福常大爷心疼起来：“想个啥法子能叫这羊羔子饿不死呢？”想来想去，想起到别的羊群找奶子喂小羊。下晚羊群回来，屈福常抱上小羊

羔，顛來跑去找奶子。這母羊有點私心，不是它養的，貴賤不喂。屈福常真有耐心，想方設法地哄的母羊肯喂奶了，小羊羔的性命保住了。這沒腦子的小羊羔也似乎有了腦子，不知是親熱還是感激，只要屈福常兩腳在羊圈里一站，它就湊上來趴在他的腳背上。老漢慈愛地摸着羊羔身上的細毛，自言自語道：“畜類物件，通着人性哩，”滋滋地樂起來。

屈福常大爺自從當上了保管員，寸步不離保管室。回家吃飯，臨走時他總要到處查查看看，把一切安頓妥當了，才肯走。很多時候，黑夜他也睡在保管室里。有一回，家里老伴生了病，叫他回家去。他不放心晒在房上的一千來斤棉花，臨走，他直起脖子看天，見是個晴天，沒一絲云彩，放心地走了。不料回家睡到半夜，猛雷猛雨鬧起天來了。他騰地一下坐起來，顧不得穿衣裳緊跑慢跑，跑到保管室，三爬兩爬，爬上房頂，一趟一趟把棉花都抱下來放好後，嘴里才嘯出一口氣：“老天！一千來斤棉花，是兒戲的嗎？”他把倉庫門鎖上，才蹣跚地走回家。一進家門，老伴可就一指頭指在老漢的腦門子上：“你心里只揣着公家，家丟給誰呀？你看，咱家房上晾的白薯干全叫大雨淋壞了，我看你秋後吃啥。”

屈福常壓着肚里的火氣，不和她計較，心里話：“先公後私嘛，我不能撇開社里的棉花不管，先顧自个兒的白薯干。人心要知足，福中要知福，你過門那時光，家里有啥？現在熬到這步田地，還不是全仗着社嗎？分家時只分來

半截破缸碴子，再就是三百八十吊錢的饥荒，現在家里三間白光的新瓦房，紅漆躺柜，穿衣鏡，馬蹄表，儿媳妇穿上制服褲子，你还不知足嗎？七百斤白薯干算得了什么！再說天晴了，还可以晾嘛！”老汉看看天，已快亮了，一甩袖子，站起身，直端端又往社里来了。

第二天，他正忙着干活，大伙“忽”一下子把他圍严了，老汉歪着脖子問：“你們这是干啥？”

“开社員大会，表揚你哩。”

“我有啥表揚头？”

“你爱护公共財物，爱护社里的棉花，大公无私，應該受到表揚。”

屈福常張开嘴乐起来：“这点事情，值得表揚一場？昨晚差点沒把我急坏，你們知道，一千来斤棉花来得不易哩。”

有个調皮的青年接着他的話說：“是大伙的心血，对吧？”

說得全場子的人都乐起来，屈福常也乐起来。

大伙乐，乐的是屈福常当了模范，受了表揚。屈福常乐，乐的是社里一千来斤棉花沒有受到絲毫損失。

屈福常十年如一日，他愛社如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上从未出过差錯，遇到困难，就想法克服，做出成績，不驕傲，不自滿，他由文盲一变而成为西鋪村的文化人，成了模范保管員，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出席了人民代表會議。

新“伙計”

东 木

“伙計”，是飼養員張珍對牲口親熱的稱呼。

八、九年来，他一直和牲口打交道，彼此好得真象是稱兄道弟的伙計。

他原来是西鋪大隊的飼養員，这回下放到了二隊，也是不改老行。看吧，他在飼養棚前一站，黃驃子、黑驢馬立即豎起耳朵，踢蹬着腿，昂頭擺尾地听候吩咐；灰毛驢、老黃牛全都睜圓大眼，巴啞着嘴，恨不得一下圍上來。他羅羅一聲叫喚，豬娃們象賽跑一樣，望他跟前沖來。

說起怎樣結識新“伙計”，他的話象綫團一樣，是有得拉的。

——

擴大社那年，牲口棚里一下“伙計”增加了。

“老伙計”的品性脾氣，他是一匹一匹全摸透了的；“新伙計”的品性脾氣，却还是一匹一匹都陌生的。他提了一桶水，挨次先飲驃馬。飲到一匹毛色象黃緞似的兒馬，

它一埋头就咕嘟——咕嘟不歇气地喝起来。張珍想：“好家伙，这定是匹潑辣貨，要象这样喝下去，不伤水才怪！”他用力一推，想把水桶推开。誰知儿馬“唵啞”一个响鼻，双耳“唵而”一竖，右前蹄提起“拍塔”就踢。这个全面的抗議，使張珍吃了一惊，心想：“好，好，你这家伙还善耍流氓呢！送你个渾号叫儿馬蛋子吧！”他赶紧用左手使勁一托馬嘴，右手使勁一挪水桶，才挪开了。接着是飲驴和牛。飲到一匹毛色象黑漆似的大驴，它埋下头喝几口就抬起头不喝了，嘴边却流着长长的涎水。这是为什么？張珍心里刻上个問号。飲过水，就給牲口开飯。新鮮的草料里，拌上了花生潤籽餅，又香又脆，抵不上小灶也該是中灶的标准了。一会儿，牲口棚里奏起了奇妙的音乐——一片“切嚓，切嚓”的牲口进料声。作为飼养員听到这种音乐，心里是蜜甜的。他竖起耳朵，細細欣賞着，辨别着。“嚓、嚓、嚓”吃得又快又急的，又是那匹儿馬蛋子；“切—嚓，切—嚓”吃得特別緩慢的，却是一匹青驢馬。馬吃料一向是武势的，这一匹怎么这样斯文？他特意繞过去看了看，青灰色的毛油光閃亮，骨架匀称，膘肥肉厚，是匹壯馬，不会有病。拉出的屎却特別，一疙瘩一疙瘩就象驴粪球。这又是为什么？張珍心里又刻上了問号。

为了摸透新“伙計”的品性脾气，他决定先向老主人請教。儿馬蛋子原来是老桂家的。老桂听張珍一說，笑道：“对哇，对哇，我这匹小搗蛋就是这个德性，拉車走道是沒有够的，喝水进料也是不要命的。平常它拉車回来，

我是不管它是饥是渴，先吊一袋烟时间，让它喘过气再说。饮水也是分三次饮，第一次少饮一点润润嗓子，第二次饮个七八分，第三次再补饮一点。不这样不中呀！一头牲口顶半拉日子，一闹病，多花钱不说，工也耽误不起呀！”张珍说：“对，老桂，我也一定照你这样喂它、养它。”

黑走驴的主人是老佟。他家原来开了个豆腐房。他听张珍一说，裂开嘴笑道：“这个，我也不知啥原因哟。刚买来时，倒不是这样，后来不知怎的变呀变的，就变成这个流涎货。别的病倒是没有的，拉磨什么的，都挺壮健。”张珍说：“你平常都喂点什么呢？”老佟说：“还不是草料！渴了，就给它喝豆腐水和粉浆水，开始挺爱喝，后来慢慢就不大爱喝了。”张珍说：“这样，我回去另找原因！”在路上，他想呀想的，八九不离十，已想出其中道理来了。一定是喝多了变质的豆腐水或者粉浆水，有点伤了脾胃，所以到后来连这样有滋有味的东西，也不爱喝了！流涎就是这样引起的。他决心要针对这一点慢慢进行调治。

青鬃马原来是老祥家的。这几天，老祥出门了。他老伴听张珍一说，一口一个大叔，叫得亲亲热热：“咱这马，确实两样哪！听咱当家的说，这叫盘肠马，肠子细，所以吃食慢，尿拉起来一疙瘩一疙瘩象驴粪球。但是只要细草细料，一天多喂几遍，膘长得快，力气也可大着哪！你没见咱那当家的，一夜都要起来两三遍，喂这个馋嘴货。哟，大叔你也是有经验的人，一定知道马无夜草不肥的道理。听说你一夜都要起来三四遍，这，这比咱当家的

还要强哪……”張珍知道老祥家里的爱叨叨，如果让她一直說下去，就会从摘棉花說到卖估衣，沒完沒了，于是切断她的話說：“大嫂子，你这一說很好，我也一定照着老祥叔的办法来喂养。”說完，就辞出来。

新“伙計”的情况摸清了，張珍就坐在炕头一面抽着旱烟，一面琢磨計劃：

社里提出的，明年要展开大生产运动，粮食作物等要增产一成半以上，这就需要再进一步精耕細作。具体拿咱喂牲口的來說，就需要把头头牲口都喂得膘肥力壮，才能支援春耕。老話說：“早喂喂腿，晚喂喂嘴”，如果今冬不精心飼养退了膘，开春以后哪怕天天用好料催，也不赶趟了。但是，牲口的粮食定量是有一定数目的，在这方面决不能大手大脚。相反的，今冬还要小手小脚节省下几百斤来，才能在开春大忙日子里給牲口开小灶。对，就这样办：从今天起，草料再切得細些，粮面扣下一点但拌得匀些，少喂勤添，让它们每回都吃得又香又脆。自己晚上多起来几遍沒啥，一定要让它们吃饱、喝足、休息好！那几头怪脾气的新“伙計”，嗯，不用說，一定要額外照顾！

二

第二年，果然又大丰收在望。中秋的一天下午，王国藩对張珍說：“县运输队有一匹病馬，在咱乡兽医站治疗，由于病得太久，瘦弱得很，回不去，咱帮他們飼养一段时

問中不中？”張珍說：“中是中，但咱沒有經驗，飼養不好，給它病上添病，豈不笑話！”國藩說：“經驗是可以摸索出來的。你剛當飼養員時，哪有現在這樣的能耐。这回再鍛煉一下，說不定技術還可以往上提一步。再說，這也是咱社的對外關係問題，一定要把它搞好。”張珍聽國藩這樣一說，當場就表示：“那麼牽來吧，咱注意就是！”

病馬抬來了，剩下骨頭架子。

根據獸醫的介紹，這馬由于得了嚴重的寄生蟲病，胃已經穿孔。眼下寄生蟲雖說已打下來了，但胃腸的消化機能已十分衰弱，需要經心調治一兩個月才能復原。

張珍先在特辟的小屋里，鋪上一層細軟的谷草。病馬躺下後，他就扳開馬嘴灌進去半瓢微溫水。隔了半小時，又扶起它吃了點拌好的嫩草細料。社辦公室里有一只新買的小鬧鐘，他就去借來上足發條放在炕頭。每隔三小時小鬧鐘叮令令鬧一陣，他就趕快放下旁的活計去給病馬喂水喂料。有時還邊走邊叨咕：“瞧，要是沒有聽見，又該耽誤了。”每天上午，太陽好，又沒有風，他就在室外鋪上谷草，把病馬牽出來曬太陽。要是一起風，又趕快牽進去。這樣經心經意飼養了半個多月，病馬果然神色好起來了，食量也逐漸增加，張珍一進去，它就啞嘴擺尾，表示歡迎。

張志文，也是社里飼養牲口有經驗的莊稼人。為了給病馬遛遛腿腳，吃點鮮嫩的草葉，張珍就和社里說好，要張志文把它牽出去放放。這個老實巴結的老頭，對放

馬实在認真，回回放的是頭水好草。每次回來，從馬的神色上也可以看出吃得好，遛得夠。

一天，上午是個晴明的好天氣，張志文又放馬去了。誰知快中午時，突然雷轟電閃，陰雲四合，眼看就要下雨。那時，張珍正在給一頭老黃牛撓癢癢，只听他“啊——”的一聲，就將撓到半路的撓篋子丟下了。老黃牛惶惑不解地瞪着眼睛，噴着响鼻。他可顧不了這些，三腳兩步跨進房，抱起一條破被子就往南山梁趕去。他不时用一只右手摀在嘴上大叫：“張——志——文——”

其實這時張志文已經抄小路把病馬快牽到附近了，但他是個半聾子，天上打雷還差一點沒聽見，何況張珍這點兒叫聲。他仍然按照自己不緊不慢的步伐，牽馬前進。身上穿的破褂子早已脫下蓋在馬身上了。張珍先向遠處了望，見沒個踪影；就回過頭來看近處，發現張聾子已穿到身後了。他又好氣又好笑，几步竄上去，重重喊了聲：“聾子——”張志文才猛一回头，見是張珍，裂開嘴樂了。兩人就把破棉被也蓋在馬身上，往回走了一陣，急雨已洒開了。好在离飼養處已經不遠，緊走几步也到了。人挨了點澆，馬却一點也沒澆着。

這樣精心飼養了近兩個月，這匹白馬已經完全復原了。毛色象銀緞似的，油光水滑。一昂頭一擺尾都顯得神丰氣滿。一天，運輸隊里一個同志來看這匹馬時，簡直不敢認了，他十分感激地說：“真虧得你們，不然，這副骨頭架子怕早入土了！”馬牽回去了，兩方面兄弟般的情誼，

成了长流水，尽日欢唱。

約摸过了半个来月，一天，这匹儿馬蛋子忽然病了。平常那种威武抖擞、調皮捣蛋的神气全不见了，耷拉着头站着，渾身直哆嗦。兽医检查說是肺炎，打了針还要灌药。張珍就象看护亲人似的，一直在旁边忙碌着。

这一天，正好是張珍生日。他老伴早就叨叨过了：“早先咱穷得梆梆响，嘴也糊不住，哪管什么你的生日，我的生日。如今分了地又入了社，生活一天天好，今年又是丰收，咱也喜庆喜庆，我給你弄点好吃的……咳，你这老鬼也早点回来嘛，牲口棚里一不屬金，二不屬銀，成天起早貪黑死守着为哪般？下地干活也有个时间，管牲口的就連吃頓飯都支使不开？天天要等，頓頓要候，真是煩死人了……”論口才張珍是比得过他老伴的，再說有些落后話認真駁起来也容易。但張珍也确实有两怕：一怕自己說一句，他老伴叨三句五句，沒个完；二怕爭端一开，劳神費力，自己吃不消。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老伴一叨叨，他就抽烟、閉眼睛、打呼嚕，以簡制煩。今天要給自己做生日，这句话張珍是記住了的，而且还当面点过头，答应早回来。

他老伴破例地晚上也做了頓干飯，炒了一小盘粉条，还蒸了两个鸡蛋。太阳一銜山，她就准备好了，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站在門外瞧了瞧，也是不見影子，而下地的早已回家了。她有点恼火了，决定亲自上飼养处去找，可是一出門，心里就敲起小鼓：飼养处里人一定很多，人

家要是問起，怎麼說呢？兩隻腳走着走着就慢下來了。迎面剛好碰上了調皮鬼李賀。她問道：“小李，你知道咱那老的，現在在干啥？”小李一向愛說俏皮話，沒正經的說了句：“抱了匹黃騾馬在親嘴呢！”這一下，可把她氣慘了。趕緊回頭，到家搬出雞蛋炒粉，和小丫頭兩人就稀里嘩啦吃了個光。

張珍給兒馬蛋子灌過藥，直到它發了汗，呼吸也逐漸勻稱了，才放下心來。他一看小鬧鐘已九點多了，一下忽然覺得自己肚子餓了，做生日的事也想起來了，向人交代了幾句，就往家走。

一到家，黑燈瞎火，他老伴早睡了，叫了幾聲，也不見答話。他知道睡是假的，生氣是真的，為了避免麻煩，就自己動手掀鍋。見鍋里雖說沒有別的菜，但還留有干飯，就盛了起來狼吞虎咽扒了兩碗，又到飼養處看望兒馬蛋子去了。

三

因為牲口棚里的牲口一天比一天多，有幾頭還要下崽，社里經過考慮，就把劉占生也調來擔任飼養員。

劉占生的年歲比張珍輕，原來在生產隊干活。他有個毛病，是耳朵沉。對他說話不吊起喉嚨喊，簡直聽不見。兩人分了工，張珍管晚上，劉占生管白天。

飼養員這活計，甘苦滋味和在生產隊干活是不一樣

的。寒冬腊月，早晨冰杈子象长枪短剑一样挂在屋檐头，遍地严霜雪雪白，一般社员还可以再在热炕头上猫一猫，饲养员却无论如何得起来为牲口服务。张珍每次看刘占生起来接班，总是上排牙齿喀喀敲着下排牙齿，心想：“大概他这件破棉袄不抵事，要不然是不习惯。”他把这件事向温支书汇报了。温支书说：“咱们帮他闹件新棉袄吧！”就想法凑了八尺布给他。不久，刘占生果然穿上了一件青布新棉袄。张珍又暗下注意，发现这个年轻人现在起来接班，牙齿虽然不敲打了，但是眉头还是打着疙瘩。他有意找个机会大声问：“老刘，早晨冷吧？”刘占生带点情绪地说：“有啥法，冷也要起来呀！”张珍一听话里的意思，还是有意见，就把自己值夜班的时间拉长，想让他多睡一会。可是刘占生却象头老倔牛，到时又非起来不可。张珍只好又把这件事和温支书商量。温支书说：“那么你对调一下，他晚班你白班。”张珍说：“我是怎么都好说，只怕晚班活计重，他吃不消。”温支书说：“先试试吧！”这样两人的活计就倒了过来。刘占生的情绪，却还是不正常。

一天夜间，更深夜静以后，张珍正在朦朧睡着，猛听得牲口棚里好像有牲口的挣扎声，一下就惊醒了。这已经是他的习惯了，只要牲口棚里有响动，多沉的瞌睡也能揉碎，更何况这几晚还多操了个心。他睁眼看看刘占生，这个年轻人大概以为事情已经完毕，埋起头正坐在炕头打瞌睡。张珍怕把他惊醒，就轻手轻脚下了炕，望牲口棚

走去。

进去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两头驴子的槽头绳拴得长了点，它们互相挤撞，你的绳子套进我的脖子，我的绳子套进你的脖子，又都是没脑子货，不知道互相松松，只知道你拉我扯。绳子已陷进老深，脖子已挺得老长，只差点就会全都倒下。张珍赶紧把绳子解下，彼此分开，然后又不长不短拴好。隔了一会儿，让它们喘过气，又喂了点水，清清嗓子。看看都没有什么了，然后又普遍喂了一回草料，才回转身房。这个年轻人还在打着呼噜哩！到这时，更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打岔了，张珍就又自管自上炕半醒半睡躺着，五更天才起来接班。

第二天，他找了个机会，连说带比划把这件事情对刘占生说了。这个实心眼的年轻人害怕了，主动提出又要干白班，不愿干晚班。张珍也就再接受他的意见，又倒了过来。经过这样一个教训和周折，这个年轻人的态度转变了。以后，敲开冰棱打水什么的，硬是乐呵呵的有说有笑。

一天晚上，张珍回家吃晚饭，他老伴忽然一反往常，满脸堆笑地迎上来。那个亲热劲，是他们结婚以来少有的。结婚那天究竟怎么样，因为年代久远，张珍已恍恍惚惚记不清了，但是眼前的笑脸，却像是霜后的菊花，特别照人眼睛。饭菜也是特别丰盛，除了干饭，还有一小盘炒粉条和两个蒸鸡蛋。张珍正想问个清楚，他老伴又叨叨开了：

“嗨，想不到咱們养牲口的也上电影啦！昨晚你没有看电影吧？”

张珍說：“昨天晚上我們正忙着給一头老黃縫接崽子呢，哪有时间？”

“嗨，真有意思，电影里的驴呀馬呀就象活的一样，飼养員一吆喝，个个都立起耳朵听；一喂料，立即‘切嚓、切嚓’吃得挺欢騰……他們表揚咱們社啦，咳，你这老鬼也照上啦，一手提了个水桶，还乐呢！咳，人上照相，硬是会好看起来……”說着，說着，她又偷眼細看了一下这么多年就在一起过来的老伴。

张珍一面吃飯，一面問：“还有别的嗎？”

“还有严屯的飼养員苗——，名字咱忘啦，也照上啦，咳，这个老鬼也乐呵呵的，挺有意思……”

张珍立即切断她的話說：“那是苗印大爷，他才是咱們飼养員里拔尖的呢！我和他比，不論經驗和干劲，就象筷子头和筷子尖中間还差一截呢！”

“咳，管它筷子头筷子尖，反正都是筷子，吃飯少不了。嗨，想不到飼养員还这么受人重視哪！……”

“我早就对你說过，干啥活計都是一样光荣，你还不信呢！”

老俩口越談越欢騰。

放在桌子旁的这盞小油灯，火苗子也忽突忽突跳得很欢騰。

老 羊 倌

任 彦 芳

秋天，丰收的色彩是这样浓烈！梯田上的庄稼成熟了，高粱谷子，堆金砌玉；苹果园第一次结的果，分外红。山头上的羊群，好象滚动的珠子。放羊人焦脆的鞭子声，在山谷里迴响着，很挑逗入心。这是在抒发牧羊人骄傲的感情吧！

我顺着山路，一直望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想象着当年“穷棒子社”创业的情景，那二十三户“穷棒子”，上山打柴，就是从这条山路上走的吧？能够找到他们留下的脚印吗？此刻，满山的白羊，顺着那山路下来了。我想去访问一下放羊人，让他指给我那一条穷棒子创业走过的道路。

“这，我说不清，”年轻的放羊人说，“你得问屈恩，他是老二十三户的放羊的。满山的路他最清楚。”

说完，他一扬胳膊，甩了一个响鞭。这鞭声震得我一惊。他对我一笑，攏着他的羊回村了，好象涌着白色的浪花。

我向西鋪生产大队长杜奎打听，他兴奋地說：“他可是个好放羊的。从打成立社到去年，他整整放了十年，沒有伤耗过一个羊羔子。一样放羊，他放的羊最壮最肥。最初我們只买了十九只羊，現在羊群滿山了！光西鋪就有四百只羊，全是經屈恩的手喂养出来的。”

我問道：“他有什么絕招妙法？”

“一句話：經心！他疼小羊，就跟疼自己的孩子一样。一九五三年冬天，在山上下了小雪，冻的不吃奶，他揣在怀里抱回家，放在自家炕头上让他媳妇給小羊奶吃……要不是有个愛社的心，誰办得到？那时候咱們社困难多，他什么也不向社里張口。后来，我們給他买了块雨布，他乐坏了。可到山上放羊，真遇上雨他甘願让雨澆，却用雨布包了小羊。人們問他：‘你就不怕淋出病来？’他笑着說：‘愈澆筋骨愈硬朗。’……”

这时，我心中浮现出一个忠心愛社的放羊人的形象，十年来，風風雨雨，日日夜夜，他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保护着社的羊，于是羊在他的身边长大了，愈变愈多……直到今天羊群滿山。

傍晚，我到屈恩家里，他不在家。

我說明来意。

“你快別問他！他丟三拉四的，什么也說不好，他就知道低着头傻干活。”他妻子有意貶他，“我看那放羊，有胳膊有腿就中，还有啥技术？”

“他說不好，那你告訴我吧！”我想從她的嘴里了解屈恩，“你說說，當初他放羊的時候，淨遇到過什麼困難？”

“困難？叫我看，他沒碰上什麼困難！”

她的回答，讓我驚奇。停了一會兒，她接着說：“社乍成立，頭三腳難踢。這就跟開門過日子似的，要啥沒啥呀！可我看，那也比我們自家種地的時候強多啦！……”

這幾句話，是她對生活的總結。當我們今天去回想那為新生活創業的艱苦時，她用自己的生活告訴我：這艱苦比起干受貧困的折磨要幸福得多了。

這時，從外邊跑進來了兩個孩子，大的十一、二歲，小的有八九歲。她問大孩子：“你爸爸呢？下工了還不回家？”孩子說：“爸爸從地里回來，又跟三隊放羊的看羊去了。”

“他就忘不了羊！”妻子話語里，埋怨中帶着自豪，“要不看看羊，他吃飯不香。他今年不放羊了，比自己放羊還操心多！見着小羊，他更喜愛。”

“我也喜愛小羊。”那個大孩子說着從門后摘下一個放羊的鞭子來。這鞭子做得精緻，叫做一條龍三掛穗的響鞭。女人望望我，說：“看，真是他爹的兒子。什麼種什麼苗，什麼葫蘆什麼瓢。我看沒啥出息。可他爸爸從小就熏他們。讓他們大了放羊。我不管他們，放去吧！”

說完她爽朗地笑着。

“聽說你也喜愛小羊，還給小羊吃過奶呢？”

“唉呀！這是誰告訴你的！”她大聲地說，“怎麼這事

也給我傳講！你忙別記在本本上，不值得。這有好多年啦，那時候正奶着我們大小子哩。……”

院子里有腳步聲，把她的話打斷了。“他回來了。”說着迎出去，喊：“有同志在家等你哩！”

屈恩進屋來。他有五十來歲，中等身材，臉孔稍有一點清瘦，顴骨突出，紅銅臉色。是經過多年風雨吹打的證明。

“給三隊扎了扎羊。”他洗着手說，“起瘋了。”

“要緊不？”女人着急地問。

“不礙事。”屈恩說，“這些小放羊的，你不說他們真不中！你說淺了，他不當回子事；說深了，他們不高興。”看來，他有些生氣了。

我一提起他照應小羊羔的事，他高興了，“那全凭她支持，不然不中！”說完，看他妻子一眼，兩眼一眯，象個孩子。

“他把羊羔抱的家來，讓我給它奶吃，我說：‘它不咬我？’他說：‘不咬。你給它吃吃奶，就是救了一群羊。這小羊大了不是得給社生嗎！’”她說到這兒笑了，“我是什麼都聽他的。這老爺子呀，當初入社都沒跟我商量。……”

屈恩不好意思地笑笑向我聲明道：“那是早先的事。”

原來，當初互助組開會商量辦初級社，王國藩找到屈恩，問他怎麼打算，他說：“入。”王國藩說：“這得爭取全家同意，回去和家裡的商量商量。”屈恩心急，說：“我商量

了，写上吧！全家同意。”回到家，屈恩跟娘說：“媽呀，咱們入社了。”娘問：“什么叫入社呀？”屈恩說：“就是把地合到一块，咱們就伙种地分粮食。”娘一听很高兴：“那敢情好，咱們省得为种地发愁了。”屈恩給娘說的話，妻子在外屋全听到了，心里也滿乐意。她本想丈夫会把这件大事，“正式”地跟她說一下，誰知道屈恩竟沒有告訴她。是怕她不同意呢，还是馬虎忘記了呢？以后她常常提起这事，嫌沒和她商量，算是对丈夫的一种警告吧？

“这时候是妇女当家，”屈恩笑道，“我有什么事，就得跟她商量，要不，那臉就刷的一下——”

“你信他的話？”她問我。

我沒有回答，只微微一笑。从这儿感受到一种喜悦，这是只有在不愁吃穿，并相信自己劳动可以創造幸福的家庭才具有的。

“我要下地了，”屈恩直爽地告訴我，“咱們有空再嘮吧！”

“那我晚上来？”

“中！”他干脆地說。我告辞出来。

我晚上来找他，他又不在。我以为他忘記了相約的話。誰知呆了会儿，他的孩子跑回家来給我送信，說他爸爸給队里看栗子了，派孩子来領我去找他。

在一棵栗子树下，望着他多年放羊爬过的大山，他說起放羊的历史：

“从我记事，家里只有三亩兔子不拉屎的山坡地。我从小住姥姥家，十四岁给姥姥家放小羊羔子放了两年，姥爷说：你放大羊吧，也学点艺。那时放到六月就‘出山’，山里吃，山里宿。山南地北的放羊的聚到一处，好赛鞭子，一对一下的抽，看谁的焦脆。旧社会是给别人放羊，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这一抽鞭子，就把什么都忘了，这是放羊的‘乐事’。这鞭子还是个镇物，头把羊赶进山，先摔几声鞭子，有野牲口，就都吓跑了。……你不信问问这些小放羊的，要鞭子干什么，他们都说不上来哟！”

“我那时候有心眼。我碰上过一个老放羊的，会看羊的毛病，我就想法跟他学。老辈子认师傅可不易哩。除了孔圣人不留一手，哪行都得留一手，放羊的更心独。开头我问他怎么治羊病，他说：‘你摔鞭子去吧，问这个有甚用？小小的年纪，还要放一辈子羊，受一辈子罪啊？’不肯告诉我。以后，我看他的鞋烂了，就把我的鞋脱给他；见他爱抽烟，可老采树叶子抽，我就从姥姥家给他带了大叶烟来，慢慢地，我们俩好了。后来，我的羊出了毛病，我急得要哭，问他：‘这怎么办哪？’他长叹口气：‘唉——’这是说，告诉吧，不愿意；不告诉吧，又这么好了……这才只得告诉我几样，他说：‘羊得摸腰疯，扎三根肋巴骨；羊翘巴疯，它东摇西晃，就在脑袋上扎六针；得摇头疯，扎四针……’老师正跟我学说着，见别的放羊的来了，就没有说全。我心想：告诉我几样了就不错，剩下的不告诉就不告诉吧。看来，干什么都得用心哩！以后，慢慢的我自己

也捉摸会了几样。你看我們村的羊没有一个破耳朵。羊火大了不吃草，叫‘慢草’，旁庄都是用刀子割耳朵，我是針扎耳边的小血管，血一出，准好。这是我的傳点。前些天，洪山口公社的羊‘慢草’，找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就領着找我，我就把这技术告訴了他們。

“在早先，可不行。老放羊的要扎針了，不让小放羊的看，一点本事也学不到。他要扎屁股，就說：‘来，你搬着脑袋。’他要扎脑袋，就让你揪羊屁股。不說別人，打入了社，要我傳授，我还有斗争哩。杜奎副主任說：‘老屈呀，你把技术掏出来吧！不然，死了还不都装了去呀！’我嘴說：‘中啊！’心里可不通。我也不是要都装了去，是想等我的儿子起来，让他放羊全告訴給他。哈哈！”

“这时候，我是光想告訴了，可有些小放羊的倒不經心学了。你在那儿給羊扎針，把手亮給他，他不好好看，就会在一边呱呱地甩鞭子！一听这鞭子，我就想起在旧社会放羊的不易，鞭梢上都带过泪珠子呀！这时候生活好了他們可就知道摔个响鞭，美了！当初小社的时候，我沒用鞭子，也放好羊！”

屈恩望着对面，好象是用心和山头說話。这声音在深夜山谷里，特別清晰。我不由得想起我見到的年輕放羊人。我想：應該告訴他山上的每一条道路！那条路上，有过去放羊人的血泪；我們走着那条路打柴創業的。我問屈恩：“十年前，咱們穷棒子买羊的事，你还記得吧？”

“这忘了还中？”屈恩兴奋了，在夜晚，也能看到他的

眼睛閃光，“那年冬天，我們打柴換了錢，大家都乐意买羊，叫誰放呢？我說：‘我放！’大家都說：‘中！’那時貧賤，多买几只，赶回来的羊全是一把骨头，大家都担心伤耗，我說：‘有骨头就不愁肉，你們下去两个月看，它們不全滾瓜肥，我一个工分不要！’我心里想：既說出‘我放’来，就得对得起大伙，这每只羊都是大伙的汗珠子換的呀！过了两个月，这羊都变样了，大伙也都乐了。”

屈恩笑了，笑得那样甜蜜，好象回到了十年前，重新体验了那种愉快。是怎样让这穷棒子社的第一群羊肥起来的，他没有說。我想那一切，这长峪山会記得。在它的身上，踏遍了屈恩的足迹，留下了一个貧农对社会主义热爱的感情。当望到公社的羊群在滿山吃草的时候，該想到，那是老放羊人的脚印在閃光吧！

明天，我再見到那个年輕的放羊人时，我願把屈恩的話告訴給他。

1963年9月25日